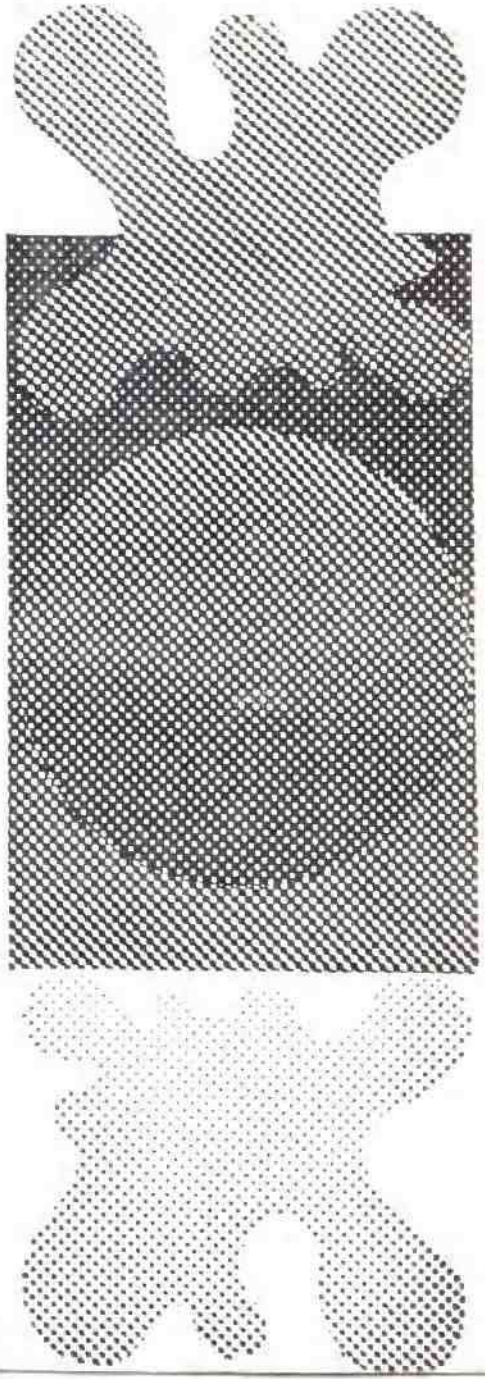


人心中的历史

VISIT…

人心中的历史

——当代西方历史理论述评

刘　昶 著

四川人民出版社

一九八七年·成都

责任编辑：叶　典
特约审稿：王小强
封面设计：戴士和
封 面 图：施本铭
插　　图：戴士和
装　　帧：盛宁萍

走向未来丛书

人心中的历史

刘　叙　著

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成都盐道街三号）
四川省新华书店发行
自贡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960mm 1/32　印张12.5插页5　字数 200 千
1987年4月第一版　1987年4月第一次印刷
ISBN7-220-00022-7/C·14
统一书号：17118·168　印数：1—104000册

定价：2.20 元

编者献辞

《走向未来》丛书和读者见面了。

她凝聚着我们的心血和期望。

我们期待她能够：展现当代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日新月异的面貌；反映人类认识和追求真理的曲折道路；记录这一代人对祖国命运和人类未来的思考。

我们的时代是不寻常的。二十世纪科学技术革命正在迅速而又深刻地改变着人类的社会生活和生存方式。人们迫切地感到，必须严肃认真地对待一个富有挑战性的、千变万化的未来。正是在这种历史关头，中华民族开始了自己悠久历史中又一次真正的复兴。

在艰苦而又富有生命力的改革道路上，我们坚定了马克思主义的信仰，理解了科学的价值，并逐步深化了对我们时代和民族的认识。今天，我们听

从祖国的召唤，热情地投身于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伟大潮流。

马克思有一句名言："思想的闪电一旦真正射入这块没有触动过的人民园地，德国人就会解放成为人。"* 今天，照亮我们民族的思想闪电，就是马克思主义、科学精神和我们民族优秀传统的结合，以及由此开始的创新！

《走向未来》丛书力图从世界观高度把握当代科学的最新成就和特点，通过精选、咀嚼、消化了的各门学科的知识，使读者特别是青年读者能从整个人类文明曲折的发展和更迭中，理解中华民族的伟大贡献和历史地位，科学地认识世界发展的趋势，激发对祖国、对民族的热爱和责任感。

她特别注重于科学的思想方法和新兴的边缘学科的介绍和应用；把当前我国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以及文学艺术方面创造性的成果，严肃地介绍给社会，推动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结合。

《丛书》是个新的园地，她将自始至终贯彻严肃认真的学风和生动活泼的文风。

《走向未来》丛书，从她一开始就受到老一辈共产党人关怀，受到学术界前辈的热情支持。

---

*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卷，第16页。

约四百年前，弗兰西斯·培根在《伟大的复兴》一书序言中，曾经这样谈到书中描述的对象，他“希望人们不要把它看作一种意见，而要看作是一项事业，并相信我们在这里所做的不是为某一宗派或理论奠定基础，而是为人类的福祉和尊严……。”我们怀着真挚的感情，把这段话献给《丛书》的读者，希望广大读者关心她、批评她、帮助她。

让她成为我们共同的事业。

《走向未来》丛书编委会

一九八三年六月于北京

前　言

历史这个词通常有两种含义，一方面，它指的是人类所经历所创造的一切，指的是人类的全部过去；另一方面，历史指的是人类对自己过去的回忆和思考。这两方面，前者可以称之为历史的本体，后者可以称之为历史的认识，当这种认识活动成为一种专门的学问时，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历史学。认识历史离不开理论的指导。与历史的两个方面相对应，历史理论也可分为两个方面：关于历史本体的理论和关于历史认识的理论。一方面，历史是由人创造的，关于历史本体的理论可以归结为这样一个问题：人怎样创造历史？另一方面，人对历史的认识要通过语言特别是文字表述出来，所以关于历史认识的理论则可以归结为人怎样写历史这样一个问题。人怎样创造历史和怎样写历史就是历史理论所要探讨的两个课题。

对这两个课题的探讨，使历史理论具有两种实践功能。通过回答人怎样创造历史，历史理论可以指导人们具体地去认识历史和研究历史；而通过回答人怎样写历史，历史理论可以帮助人们对历史认识或历史研究活动本身进行批判。比如，当我们掌握了历史唯物主义这样一种历史理论后，我们在具体认识和研究历史时，就会用社会存在来说明社会意识，而不是相反。再比如，当我们懂得了历史研究中史料考据的重要性时，我们就会自觉抵制过份玄想思辨的倾向，而注重经验实证，注重史料证据。当然，历史理论这两种功能的目标是一致的，那就是指导和帮助人们更好地认识历史和研究历史。

具体说来，人怎样创造历史包括这样一些问题：人类历史演变发展的动力是什么？历史是循环的、进步的、还是倒退的？历史发展有无规律？是否统一的？人类历史的目的是什么？意义何在？等等。而人怎样写历史则包括这样一些问题：历史研究的性质、对象、方法及价值等等。一种历史理论并不一定要回答所有这些问题，但它必定要回答其中这一些或那一些问题。

历史理论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它随时代、社会的变迁而变化。不同的时代，不同的社会会有不同的历史理论，甚至在同一时代、同一社会也会有不

同的历史理论。历史理论归根到底是时代和社会现实的产物，当然，先后相继的历史理论之间又有着批判继承的关系，这也是不可忽视的。

本书所要介绍和讨论的是当代西方历史理论。所谓当代西方指的是本世纪以来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的西方。当代西方历史理论所讨论的也是上面提到的两个课题，不过这种讨论产生了三个不同的部分：思辨的历史哲学、分析的或批判的历史哲学和历史学家在研究中自己提出的历史理论。这三部分分别是本书第二、第三和第四章的内容。这里有必要谈谈历史哲学与历史理论的关系。应该说历史理论就是一种历史哲学，因为历史理论就是上升到哲学层次的历史认识。然而历史哲学与历史理论又有所不同，这种不同与其说是本质上的，不如说是语义上的，而且是历史造成的。我们知道，在很长的时期内，历史主要是对历史上发生的各种人事的描述，当然这种描述也是在某种理论指导下进行的。近代以来，为了揭示历史发展演进的规律，一些哲学家提出要从哲学的高度来把握历史，反对描述性历史的芜杂和琐细，于是产生了历史哲学。哲学家的出发点固然是好的，然而，他们的努力并不很成功。他们提出的各种历史哲学理论确实不乏深刻精采之处，但为了证明自己的理论，哲学家们

常常不惜阉割历史。这自然要遭到历史学家的抗议。十九世纪历史学的独立意识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从这之中产生的。到十九世纪后期，历史哲学受到了普遍的冷落，很少有人再去从事这种工作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历史哲学再度复兴，并且产生了两个分支：思辨的历史哲学和分析的历史哲学。所谓思辨的历史哲学就是近代出现的那种历史哲学，它讨论的是人怎样创造历史。而分析的历史哲学则基本上是当代的产物，它所讨论的完全是另外一个问题：人怎样写历史？按理说，当代历史哲学的这两个分支已经把历史理论的两个课题都包括进去了，历史学家没有必要标新立异、另搞一套，只要在这两个分支内参加讨论或汲取其成果就行了。但是思辨的历史哲学由于染上了近代历史哲学那种过份主观玄想的痼疾，思辨色彩太强，事实上很难指导历史学家从事具体的历史研究，所以历史学家不得不自己提出一些理论来指导研究。与此不同，分析的历史哲学运用当代分析哲学的那种逻辑语义方法来研究历史认识论方面的问题却获得相当的成功，它吸引了许多哲学家和历史学家来讨论历史学的性质、对象、方法、价值等等，形成了一个独立的学科分支。这样，在当代西方历史理论中，对历史研究有实际指导意义的是分析的历史哲学和

历史学家为回答人怎样创造历史而提出的一些理论。这并不是说思辨的历史哲学毫无意义，事实上，思辨的历史哲学在当代西方曾产生过很大的影响。尽管它对历史学家从事具体的历史研究没有很大的指导意义，但我们并没有说过，历史理论只能用于指导历史学家从事研究。在一个更大的范围内帮助公众去认识历史，不也同样应该是历史理论的本份吗？在这一方面，思辨的历史哲学自有其功绩和意义所在。

当代西方历史理论是当代西方社会现实的产物。本书在介绍和讨论当代西方历史理论时将努力把其放到当代西方的现实背景中去进行。另一方面，当代西方历史理论与当代以前的历史理论又有着很深的渊源关系，为了更好地把握当代西方历史理论，有必要理出西方历史理论发展的一个大概脉络。这就是本书第一章的内容。

当代一位著名的政治家说过这样一句话："创造历史的最好办法是写历史。"①历史学家可能会从这句话中感到恭维，受到鼓舞。不过，切莫受宠若惊。政治家口中的这句话很可能脱胎于他同时代的一句历史学家的一句话。这位历史学家说，制造

① 这是当代英国政治家温斯顿·丘吉尔说过的一句话，转引自尼克松：《领导者》一书。

历史的唯一办法就是写历史。历史学家说这句话决不是自夸或自负，而是在强调一个事实。我们知道，历史分为本体和认识两个方面。历史本体是唯一的、永恒的，它一旦被创造出来，就无可改变，而历史的认识则是丰富多样的、不断变化的。从本体的角度言，历史是客观的，它是一种独立的和外在的东西，不再为人的意志和行为所左右，对历史，无论我们做什么，都不能改变增损它的分毫。但从认识的角度言，历史又是主观的，历史只存在于人的记忆和思考之中，历史怎样，取决于人对它的记忆和思考，同样一部历史，不同的时代、不同的社会，乃至不同的人对其会有截然不同甚至尖锐对立的看法。应该说，认识历史就是要完整准确地把握历史的本体，不幸的是，人类无论怎样努力也无法克服与生俱来的主观认识上的局限，人所知道的历史始终只是某时某地他所能达到的历史认识，而不是绝对永恒的历史本体。虽然每一个人都需要在一定的范围内了解和认识历史，但事实上，对任何一个时代、任何一个社会来说，认识历史始终只是一部分专业研究者即历史学家的任务。一个时代、一个社会对历史的认识主要就是由历史学家通过他们的研究来提供的。正是基于以上事实，那位历史学家说："历史是历史学家的经验。历史不是

别人而是历史学家‘制造出来’的：写历史就是制造历史的唯一办法。”①这一事实的存在并不意味着历史学家可以无所顾忌、随心所欲地去制造历史，恰恰相反，它加重了历史学家的责任。人所以要认识历史，并不纯粹出于好奇，人之所以要认识历史，是为了更好地认识现实。现实是历史造成的，对历史的认识就是对现实状况的说明，这种认识必然要影响到人们的现实活动，并通过现实进而影响未来。历史学家的责任之大不是显而易见的吗？历史学家应该珍视自己的特权，克尽自己的职守。当然，认识历史并不是历史学家的专利，每一个关心现实和未来变化的人都会对认识历史发生兴趣，从这个意义上说，每一个人都是他自己的历史学家，不仅如此，人们对历史的兴趣必然会影响专业历史学家的研究方向。本书的写作不敢说是为历史学家提供什么参考，倒是真诚地希望它能给关心历史，对认识历史和研究历史有兴趣的广大青年朋友一点帮助。当代西方历史理论有许多值得我们借鉴的地方，如果我们抱着兼收并蓄、择善而从的态度，而不是用鸡蛋里面挑骨头的那种所谓批判来对待它的话，我们是能从中学到不少东西的。

① 〔英〕爱德华·霍列特·卡尔：《历史是什么？》，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19页。

目　录

第一章　二十世纪以前西方史观的演变 ……1

1-1 英雄时代 …… 3
1-2 克莱奥的古典形象 …… 6
1-3 上帝之城 ……15
1-4 人的主题，理性和进步 ……19
1-5 历史哲学的兴起 ……26
1-6 史的自觉 ……42

第二章　思辨的历史哲学 ……59

2-1 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 ……62
2-2 汤因比：《历史研究》 ……89

第三章　分析的、批判的历史哲学 ……121

3-1 历史是什么？ …… 124
3-2 克罗齐：“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 …… 132

3-3 科林伍德：“历史是过去思想的重演” …… 147
3-4 几个基本的理论问题 …… 166

第四章 年鉴学派的总体历史理论 ……223

4-1 新史学的呼声 …… 226
4-2 从《综合评论》到《年鉴》杂志 …… 231
4-3 时间、历史与人 …… 242
4-4 总体历史和长时段 …… 290
4-5 当代史学的规范 …… 320

第五章 历史与人 …… 333

5-1 历史与哲学 …… 335
5-2 相对主义和进步 …… 348
5-3 新的综合 …… 355
5-4 历史与人 …… 370

第一章
二十世纪以前西方史观的演变

当代西方历史理论毫无疑问是当代西方社会的产物。然而，它同当代以前的西方史学有着深刻的渊源关系，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当代西方历史理论是在批判地继承十九世纪历史理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而十九世纪史学与其前辈亦有此种继承和批判的关系。要了解当代西方历史理论，不能不简单回顾它以前的历史。

1-1 英雄时代

一般认为，古希腊史学是西方史学的开端，这一方面反映了某种历史事实，但另一方面也是出于后人追述和研究的某种方便，因为历史和人类一样古老，这里的历史也包括两种含义，即人类历史本

身和人们对这种历史的记忆、思考。当然，在希罗多德为古希腊史学奠基以前，西方既无史学这一名称，亦无作为一门独立学问的史学。上古时代的历史只是以传说的方式保留在先民的记忆中，这种传说已具有某种史学的功能和性质，但还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史学。研究史学史的人可以忽略这种传说，然若要追述史观的演变，则不能不首先提及这种传说，因为它已包含了一定的史观。

西方上古先民的传说很多，荷马史诗是西方上古传说中最著名的代表。从荷马史诗中，我们就能看到上古传说所包含的史观。上古时代是人类的英雄时代，一切上古传说都是一部英雄史诗，荷马史诗也不例外。荷马史诗所叙述的就是希腊祖先的英雄事迹：同异族的战争和同大自然的斗争（这两者构成了上古时代人类生存斗争的主要内容），前者主要反映在《伊利亚特》中，后者则更多地表现在《奥德赛》中。史诗充满了神话和传奇色彩，诗中的英雄不是具有神的血统，就是具有神的力量。英雄时代的史诗所宣扬的是一种英雄史观，正是人类的英雄祖先创造了人类的历史。没有他们也就没有人类的后来。这种史诗的创作和流传并不只在于娱人耳目，更重要的是启发人的心智，它告诉人们，他们的渊源来历和生存归宿，也即回答人生最首要

迫切的问题：我们是谁？我们来自哪里？去向何方？它昭示人们象英雄祖先那样去从事生存斗争，继承祖先的英雄业绩，保持和发扬祖先的荣光。史诗极大地提高了人们现实生活的意义。一个有着英雄祖先的民族是值得自豪的，正因为如此，当时希腊各城邦都竞相将荷马史诗中的英雄尊为自己的祖先。甚至连荷马本人也成了争夺和崇拜的对象，维柯说，“希腊各民族都争着夺取荷马故乡的光荣，都说荷马是他们那个地方的公民，理由就在于希腊各族人民自己就是荷马。”①荷马史诗并非一个人的创作，它是保留在全体希腊人记忆中的希腊历史。

一切英雄史诗都是以一定的历史事实为基础的，这种历史的真实性不容怀疑*，正如一位历史学家所指出的，先民史诗不仅是建立在事实基础上

① 维柯：《新科学》，转引自《西方文论选》（上），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版，第548页。

*历史的真实性包括两个方面，历史事件的真实和历史背景的真实。上古传说不仅在历史背景上是真实的，就是具叙述的历史事件也大体是真实的，甚至具细节都很真实。以荷马史诗为例，它所描绘的古希腊民族社会后期的状况完全能与考古材料及民族学家、人类学家关于当代原始民族的实地调查相互印证。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及国家的起源》中就曾以荷马史诗中描述的社会状况为证据来论证自己的观点（见《马恩选集》第四卷，第100页）。另一方面，它所叙述的历史事件的细节都往往是十分真实的。考古学家正是根据它的描述，发现了古希腊文明的许多遗址。关于这方面，可以看安娜·莫利·怀特所著《湮灭的世界》一书，该书中译本由知识出版社1985年出版。

的，而且是严格真实的。但是，在英雄史观的不自觉指导下，人们总是力图用最神奇的色彩来描绘他们所崇拜的英雄。古罗马历史学家李维说："造作传说，惟古人优为之；盖以为神人错杂，可使国家之起源分外尊严也。"①史诗中神话和传奇的交织渲染正是为了突出英雄的形象，在这里，真实与否已经降到了次要地位（当然，神话、传奇本身也代表着一种价值上的真，不过这与历史的真是性质不同的两回事），而英雄本身所体现、所代表的力量和业绩成了历史中最重要的东西。这种英雄史观与后来的英雄史观不同，它突出英雄并不是为了贬低大众，而是为了抬高英雄的子孙，抬高创作和传播史诗的人们自己。因此，这种英雄史观代表了一种文化上乃至血缘上的寻根和认同，而这正是历史的最初和最基本的价值所在。实现这一目标的途径正是英雄史诗。

1-2 克莱奥的古典形象

自从古希腊的历史学家希罗多德（Herodotus，

① 引自汤普森（J·T·Shotwell）著：《西洋史学史》，中译本，商务印书馆，民国二十四年，第291页。

约公元前484～424年）的《历史》以来，在西方，史学成了一门独立的学问，希罗多德因此获得了西方“史学之父”的殊荣。其后在整个希腊、罗马时代，产生了许多优秀的史学家，他们创作了许多流传千古的史学名著。其中最著名的有修昔底德（Thucydides，约公元前460—395年）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色诺芬（Xenophon，公元前430—350年）的《远征记》、李维（Livy，公元前59—公元17年）的《罗马史》、塔西佗（Tacitus，公元45—120年）的《编年史》、波里比阿（Polybius，公元前204—122年）的《通史》等等。

古典时代不仅奠定了西方史学的基础，而且是西方史学的第一个发展阶段。在古典时代，随着社会发展所引起的巨大变动，人们的观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英雄时代的史诗和神话已不再激起他们那样强烈的兴趣和向往，世俗的生活，包括个人的和城邦的事务成为人们关注的中心。希罗多德曾谈到这样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他说，当时神庙里的祭司在告诉人们家世谱系时已否认神是人的祖先。这样一种观念的变化，表现在历史方面，就产生了这样一种结果，“思想放弃了神话性的历史及其较为粗糙的形式，即神异的或奇迹的历史，变成了尘世

的或人类的历史。”①人们不再用宗教典故来解释战争的起因，而是力图从人类活动本身来解释战争、征服、扩张以及社会的变化和个人的遭际命运。正象人们所指出的，希腊——罗马史学的一个基本特点就是它的人文主义，“它叙述的是人的历史，是人的业绩，人的希望，人的成功和失败。当然，它也承认神的干预，但这种干预的作用是十分有限的。……在这种倾向背后的一个哲学观点是，人有意志自由地去选择自己的目标，他的成功取决于他在追求这些目标时所拥有的力量，他理解这些目标的智力，以及他为达到这些目标所采用的手段。这意味着，历史上无论发生了什么都是人类意志的直接结果，总有某人将对此事负直接的责任，他将因此事的善恶而受到赞赏和谴责。”②

古典时代的开山之作是希罗多德的《历史》，又名《希波战争史》，这一著作所记载的是发生于公元前五世纪前半期的希波战争。在这场战争中，希腊城邦联盟打败了不可一世的庞大的波斯帝国，战争的胜利对希腊社会其后的发展繁荣意义十分重大。希罗多德决心要把这场伟大的战争如实记载下

① 引自绍特韦尔（J·T·Shotwell）等：《西洋史学史》，中译本，商务印书馆，民国二十四年版，第168，169页。

② R·G·Collingwood: The Idea of Histor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46, PP40～41.

来，他在自己著作的一开头就开宗明义地写道：

> 这里所发表出来的，乃是哈利卡纳苏斯人希罗多德的研究成果。他之所以要把这些成果发表出来，是为了保存人类所达成的那些伟大成就，使之不致因为年代久远而湮没不彰，为了使希腊人和异邦人的那些可歌可泣的丰功伟绩不致失去应有的光彩，特别是为了要把他们之间发生战争的原因记载下来，以永垂后世。①

把发生的事件如实地记载下来以永垂后世，希罗多德对自己著作提出的这一要求成为古典时代史学所共同遵守的宗旨，并对后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垂训后世是古典史学的基本目的。垂训什么呢？英雄时代的神话已经退出了历史的舞台，人的活动开始成为历史关注的中心。当时，社会分工的发展和阶级的分化，已经造成了社会关系和社会制度的巨大变化，这种变化并无明显的物质技术进步做动力，却伴随着明显的道德观念的变化，因此，史学家的注意力也被吸引到了道德方面。在古典时代的历史学家看来，社会历史的发展变化，治乱兴

① 转引自郭圣铭：《西方史学史概要》，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7页。

衰是同人们的道德活动密切相关的。所以历史垂训主要就是道德评判，而对历史人事的道德评判是为了给旁观者、给后人以道德教训、教育。塔西佗说："我认为，历史之最高的职能就在赏善罚恶，不要让任何一项嘉言懿行湮没不彰，而把千秋万世的唾骂，悬为对奸言逆行的一种惩戒。"① 李维在《罗马史》的序言中则这样说："……无论世人对于此类传说（即罗马建城之传说——引者）之意见为何，予总不以为重要。予盼望读者之加意者，在乎社会上之生活与风化；以及国国民内之策略及对外之作战而使领土拓展之人物与品格。然后再注意道德之日下，国民性之日落，观其初衰之渐，其继也日非一日，最终乃陷于土崩瓦解，终止于病入膏肓，无可救药之日。是以研究过去，可得无穷之利益。盖在历史真理光明之下，各种先例具在也。从各种先例之中可选择其足为自身与祖国之规范而模仿之，择其发轫不吉结果不祥者而避免之。"② 当然，并非一切人的道德都足以影响历史，都值得重视，古典时代史学家首先注意的是掌握政权，左右城邦和国家政治的奴隶主贵族代表人物，历史写的是他们，也主要是给他们看的，历史的教训也是希

① 转引自郭圣铭：《西方史学史概要》，第48页。
② 维特卡尔：《西洋史学史》，中译本，第292页。

望他们来接受的。琉善（Loukunos. 125？—200？古罗马作家）要求历史学家必须具有政治感，李维希望人们注意政治人物的品格，塔西佗的历史著作被后人称为“惩罚暴君的鞭子”，① 波里比阿则明确地说：“就政治生活而言，最好的教育和训练就是研习历史。”② 总之，历史教训是给统治人物的一种借鉴，统治者的道德不仅会影响社会历史的过程，而且会给他本人带来因果报应。这里我们看到一个有趣的现象：英雄史观中的神话成分虽被摒弃了，但英雄创造历史的观念却经过变形被人们悄悄地接受了，现在英雄人物（即统治者）不是通过神话、奇迹，而是通过个人的道德行为影响社会及政治生活，进而作用于历史的。英雄史观演变为道德史观，道德史观又包容英雄史观，这种道德史观基本上支配了古典时代的史学。

既然历史的基本目的和最高职能是道德评判，赏善罚恶，历史学家在记录和撰写历史时就应当站在道德审判官的立场上，不偏不倚，公正不阿，对过往人事的是非善恶如实记载，秉笔直书。既不应轻信传说，更不能党同伐异。只有这样，历史才能起到惩恶扬善，教育众人的作用。当时，几乎所有认

① 郭圣铭：《西方史学史概要》，第49页。
② 同上书，第55页。

真严肃的历史学家都对自己提出了这样的要求。修昔底德说："在叙事方面，我决不是先入为主，一拿到什么材料就写，我甚至不敢相信我自己的观察就一定可靠。我所记载的，一部分是根据我亲身的经历，一部分是根据其他目击其事的人向我提供的材料。这些材料的确凿性，总是尽可能用最严格、最仔细的考证方法检验过的。"① 作者是否做到了他自己提出的要求是一回事，他的态度却是十分明确的：要尽可能写出确凿可靠的信史。塔西佗说，写历史应该"不怀怨毒之情，不存偏私之见，超然物外，摒绝所有那一类的不良动机。"② 把写出信史实录作为对史学、史家的基本要求，这是史学成熟的一个标志，从此，史学开始摆脱了传说的影响，成为一门独立的学问。

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历史要干预现实，影响政治，给人以教益，还必须以富于激情和文采的笔调，生动有趣的情节安排来引起读者的兴趣，抓住读者的注意力，古典史学对这一点是十分重视的。在古希腊，克莱奥是位缪斯，而且居九位缪斯之首，③ 也就是说，在当时，历史被当作一门艺

① 转引自郭圣铭：《西方史学史概要》，第26页。

② 同上书，第49页。

③ 克莱奥（Clio），希腊神话中司历史的女神，是九位缪斯（Muse，希腊神话中的艺术女神，共有九位）之首。

术，是艺术的一个分支。人们对历史学家要求更多的是诗人的才情，散文家的文笔，是叙事的能力和技巧，诸如如何安排细节，如何铺陈事实，如何开场，如何结尾等等，这些都有关乎艺术：叙事的艺术，作文的艺术。古典时代对史学的这一看法如此强烈，直到今天对人们还有着深刻的影响。十九世纪法国史学家道诺在论及历史研究时说，要做一个史学家，应先读叙事诗的名著，再读小说的名著，有了这样一个文学根底，可再读史学名著，先注意其文体，次及其内容。二十世纪英国历史学家屈维廉在反驳实证主义史学时则干脆以“克莱奥，一位缪斯”为其论文的题目。

以优美的文笔如实叙述过往的人事，对其进行道德评判，从中揭示出历史的道德教训，这就是古典史学的基本特点。一位缪斯加一位道德评判家，这就是克莱奥的古典形象。

当然，道德评判并不是史学所独具的功能。文学、哲学等都可以用来进行道德教育，并不一定需要历史的孤诣苦心。而且用文学来进行道德教育，还可以根据需要，随意编排情节，编造故事，而不必受事实的限制，这种自由是历史所没有的。不过，用历史来进行道德教育自有它的优越之处，历史是以实例进行教育，这就使它的训戒更为实在，

更为有力。然而，道德评判的历史对实事求是的要求并不是很严格、很彻底的。既然历史是道德教训的工具，所以在古典时代的人们看来，把历史当做故事和把历史当作事实是没有什么原则性的区别的。事实上，实事求是只是对当代史的一种要求，对过去的历史则没有这么严格。因为很显然，关于过去的记载，无论真假，对过去的人事都不再会发生任何影响，只要能从中引出适当的道德教训，即使这过去的历史完全是出于编造，也照样能对后人达到道德教育的目的。(让我们举个例子来加以说明。比如，曹操这个历史人物，在传统社会中，长期被看作是奸臣，遭后人唾骂，后来有人出来为他翻案，认为他并非奸臣，而是个值得肯定的人物。其实，如果只是从是非善恶的道德评价角度来看曹操，为的是要给后人以道德教育，那么曹操是奸臣还是值得肯定的正面人物是无关紧要的，要紧的是我们从中吸取什么教训。长期被当作奸臣的曹操不是照样能教人懂得善恶忠奸吗?)当代史则不同了，当代史不仅要给旁观者以道德教训，更重要的是给当事人以道德审判，这种历史只有实事求是，公正不阿才能达到惩恶扬善的目的。正因为这样，古典时代真正优秀和有价值（这里所说的有价值主要是指史料价值，指历史记载的真实性。）的历史著作

都是当代史，都是关于历史学家自己时代的历史。

1-3 上帝之城

古典时代的结束不仅造成了西方历史的巨大转折，也一定留下巨大的困惑。西方世界突然堕入了野蛮无文的"黑暗时代"，历史似乎有意要捉弄人，它把人类已成就的丰功伟业活生生地毁灭给人看。如此巨大深刻的现实悲剧，在当时人的心理上造成的创痛是不可名状的。人们除了抱怨命运无常，找不到其他理由来排遣内心的失望。基督教乘虚而入，主宰了西方中世纪的精神世界。基督教义成为解释一切的根本依据。西方的史学和史观也为之一变。

中世纪的史观主要是基督教史观，这种史观集中体现在公元五世纪圣·奥古斯丁（St. Augustine, 354—430）所著的《上帝之城》一书中。公元410年，哥特人洗劫了罗马城，一些人把这场灾难（这是公元476年罗马城毁灭的预演）归咎于罗马人不再信仰古代诸神的结果，他们说，当罗马人信奉朱比特（Jupiter，罗马神话中最高的神，即希腊神话中的宙斯。）的时候，罗马一直保持强盛；但现在皇帝们都不再信奉他，所以他也不再保护罗

马人了。为了回答这种异教徒的议论，奥古斯丁写了这部著作。奥古斯丁说，自从亚当犯了原罪以后，世界便被分为两个部分、两个城市：一个是上帝之城，一个是世俗之城。前者是上帝所代表的天国，后者是魔鬼撒旦统治的地狱。但在现世，这两个部分是混在一起的。人类的历史，就是上帝的信徒和魔鬼的信徒之间斗争的历史。斗争的结果就是要在最后审判时将这两个城市分离开来，让上帝的信徒同上帝一起生活在幸福的天国，而让魔鬼的信徒永受地狱的折磨。世俗城市罪孽深重，它的劫难、毁灭在所难免，正是在罗马的废墟上，将建立起永恒的、充满仁慈、光明和幸福的上帝之城。奥古斯丁还据此对历史做了具体的划分，认为人类历史可分为两个大的时期，以基督降生为标志，前此为福音准备时期，后者为福音传播和胜利时期。基督降生是为了带领上帝的信徒走向天国，基督教会代表上帝的意志，在人间传播救世的福音，教人克己爱人为善，虔诚地信奉基督教，因为最后审判将据此来鉴别上帝的信徒和魔鬼的信徒。

奥古斯丁在《上帝之城》中宣扬的显然是一种天命史观，上帝支配着人类的历史，主宰着人类的命运，现世的悲剧并非历史的中断或倒退，而是上帝意志的体现，是上帝对人类世俗罪恶的惩戒，人

类历史并不存在中断或倒退，而是在不断趋近于上帝的天国。这种解释虽然充满了宗教色彩，但是这种史观将人类历史看做是一个统一的整体，认为人类历史是一个不断进步的过程，并且指出了历史发展、进步的动力是善与恶，上帝的信徒和魔鬼的信徒之间的斗争。这三点在古典史学中是不明确的。正是这三点，使基督教史观超出了古典时代的史观，对后来的历史哲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① 天命史观取代了道德史观，把对历史的解释从人事转移到超自然的天意上去了，这看上去是一种理论上的倒退，实际上却是一种必然。因为道德史观无力解释许多历史现象，特别是无法解释象罗马帝国毁灭这样玉石俱焚、善恶同归的大悲剧，人们只得把历史归诸天命，归诸上帝。当然，上帝并不是随心所欲操纵历史的，上帝所代表的天命是有理性的，它对历史的安排支配，仍然是依据人事的善恶，只不过将这种善恶的赏罚放到了将来，推到了末日审判的那一天。正象中国俗话所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时候一到，一起都

① 西方学者一般都认为基督教史观为以后的历史哲学确立了某些重要前提。其实基督教史观对后世的影响远不止在历史哲学方面，比如狄更斯的文学名著《双城记》，这书名就出典于奥古斯丁的这种史观。

报。”显然，在这里道德史观又被包容到天命史观里去了。

在基督教史观的支配下，中世纪史学成了基督教神学卑贱的侍女。基督教史学家完全抛弃了古典史学人文主义的优良传统和实事求是的精神。在他们看来，史学无非是为宗教神学服务的一种工具，他们撰写历史就是要证明上帝对人类历史的主宰力量，体现上帝无所不在的意志，这种著作充满了神迹。奥古斯丁的弟子奥罗修斯（Orosius，生于公元五世纪时，是罗马帝国末年的历史学家。）写了一部七卷本的《反对异教的历史》，在他的眼光里，根本无所谓埃及、希腊，罗马的功业，有的只是异教国家的灾难。他认为，在基督降生以前，人世充满灾难，他将古史中的战争、瘟疫、饥馑、地震、火山、水旱等等灾难和罪恶的事例汇集在一起写成一部历史，用以证明他的观点。这部著作在将近一千年时间里竟是西方一部标准的世界史著作。没有理由说奥罗修斯的著作是一派胡言，他所汇集的不也是某种史实吗？但在基督教史观的照射下，他在历史中只能瞥见异教世界的罪恶、灾难和基督的神迹，别的一概进不了他的视野。他的史观规定了他所能看到的只是这些史实。正如科林伍德所指出的：“这种缺点不是偶然的。它不在于学者所能掌

握的史料的限制。它不取决于他们所能做的，而取决于他们所要做的。他们并不想对历史的实际事实进行精确的科学的研究，他们所要做的是对神性做精确的科学的研究，将神学建立在信仰和理性的双重基础上，这种神学将使他们能够先验地确定在历史过程中必然发生过什么事情以及必然要发生什么事情。”① 站在今天的立场上，人们很容易发现和指责这种史观的荒谬和虚妄，但这只是说明这种史观不符合今天的潮流而已，丝毫也不能改变这种史观在当时的合理性。

1-4 人的主题，理性和进步

如果说，基督教史观对历史进步的预言是正确的话，那么这种进步恰好证明了这种史观的虚妄。中世纪过去了，西方并没有出现上帝慈光普照的基督教千年王国，却进入了充满人文精神和崇高人类理性的近代。

文艺复兴唤醒了近代西方，人取代神重新成为文艺复兴时代精神和思想界的主题，自然，也成为该

① R. G. Collingwood: "The Idea of History", PP 55—56

时代史学的主题。史学从天国回到尘世，重又世俗化了。它“再次将人放到它画面的中心。”仿佛回到了古典时代，它重新以强烈的人文精神关注世俗的人生。人文主义历史学家布鲁尼、[①]马基雅弗里[②]等不再用上帝的意志来解释历史，而是力图通过研究人的世俗活动来寻找社会历史的因果。在他们的著作中，我们很少能发现什么神迹，即使有的话，也完全是为了取笑它们，为了用一种纯然人性的方式去解释它们，一种对于个别人物的兴趣和敏锐分析代替了神圣的天意的干预和教皇的活动，宗教冲突的本身也往往根据实利的情欲得到解释，只注意到它们的政治意义。而波丹[③]在其《理解历史的方法》这一史论著作中则更进一步把历史变迁和民族命运归之于人种和地理环境。这在当时，确实是一种很高明的见解。

刚刚走出一个时代，人们很难摆脱对这一时代强烈的感情好恶的影响。文艺复兴时代的历史学家也是如此，他们和同时代人一样，对中世纪抱着深

① Leonardo Bruni, 1369—1444，意大利著名的人文主义史学家，主要著作有《意大利史评述》、《佛罗伦萨史》。

② Nicolo Machiavelli, 1469—1527，人文主义历史学家和政论家，著有《君主论》、《佛罗伦萨史》。

③ Jean Bodin, 1530—1596，十六世纪，法国著名的政论

深的厌恶，基督教史学和史观成为他们嘲笑和批判的对象；另一方面，他们对古典时代抱着浓厚的兴趣，力图从古典文化中找到思想武器。这导致了两个结果，一、人们开始研究以往的历史，而不仅仅只注意当代史。这种自觉的历史反省精神是古典史学和中世纪史学所没有的。古典时代和中世纪的史学基本上是当代史的记述，而在文艺复兴时期则出现了标准的古代史著作。意大利史学家比昂多（Flavio Biondo，1388—1463）在《罗马衰亡以来的千年史》中对中世纪史的研究，成为中世纪研究的开端。二、为了整理、刊布古典文化名著，揭露基督教会对历史的伪造，史学研究中的疑古精神和考据方法得到了提倡和发展。意大利史学家瓦拉（Loenzo Valla，1406—1457）对教会伪造的历史文件《君士坦丁的赐予》加以考证，揭露了这份文件的真相，极大动摇了教会的权威。不过，这种考据方法的运用当时还往往只局限于古典著作的整理方面。

文艺复兴只是开始了一个时代，紧接着，启蒙运动接过了文艺复兴的旗帜，并在人文主题旁加上了理性和进步的字样。人文主义史学家在批判基督教史学的时候，把它的史观中的某些信念也一同抛弃了，比如历史是合乎理性的（虽则是上帝的理

性）、进步的。启蒙时代则赋予这种信念以新的时代意义和内容，并将其做为时代的口号明确响亮地重新提出来。

启蒙时代的思想家比他们的前辈幸运。在文艺复兴时期，人们不得不借复古来求革新，他们不仅在古典文化的辉煌成就面前颇觉自卑，而且对自己时代的前途也感到没有把握。从古代的历史中，“他们看见他们所十分珍惜的许多东西消逝不见了，他们为他们所仍享有的东西胆战心惊，至少是因预见到它们迟早必然会让位给它们的反面而替它们担心受怕。”① 当启蒙运动发生的时候，西方历史的面貌较之文艺复兴时代已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随着近代资本主义的兴起，物质文明水平的空前提高，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社会结构的巨大变动，加上新航路的开辟，新大陆的发现，西方文明获得了史无前例的成就，它使西方历史上乃至人类历史上的一切文明成就都相形见绌，瞠乎其后。这种文明的发展和进步不仅如此确凿、不容怀疑，而且方兴未艾、没有底止，进步不再仅仅是一种信念，更是一种无可否认的事实。启蒙时代的思想家如此崇尚进步是不足为奇的，重要的是，他们从这进步的事实中看到了历史发展的实际动力，这就是

① 克罗齐：《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中译本，第188页。

人类的理性。近代历史上的所有进步，归根到底，不正是由人类知识的积累增长所引起的吗？而人类知识的获得不正来自于人类理性的探索和追求吗？理性不再是上帝从心所欲的意志，而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以往的历史之所以晦暗无光，停滞不前，就是因为理性受到了禁锢和摧残，当理性以自由和正义为支点的时候，就会成为掀动时代和历史的强有力杠杆。启蒙思想家这种乐观昂扬的情绪感染了整个时代，自然也感染了该时代的史学。事实上，一些杰出的启蒙思想家如孟德斯鸠、伏尔泰等本人同时就是杰出的史学家。

启蒙时代的历史观是理性史观，在这种史观的支配下，人类历史的进步和对这种进步的研究成为启蒙时代史学的主题。为什么人类的历史会在时间和空间这两个向度上都会存在如此巨大的差别，为什么人类理性的命运在各个时代各民族的历史中会如此不同？启蒙时代的思想家认为这些问题同样应该用理性来加以探讨，并深信能找到合乎理性的解释，而无须求助命运女神的纺车和上帝一丝不苟的意志。孟德斯鸠(Louis Secondat, Baronde Montesquieu, 1689—1755)认为，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地理环境和气候条件决定了该民族法律、政治和道德的演变，从而决定了一个民族的历史发展。他

在不朽名著《论法的精神》中对这样的关系做了大量的比较研究，可以说他是现代历史比较研究的先驱。伏尔泰（Francois Marie Arouet voltaire, 1694—1778）则写道，有三件东西不停地影响着人类的精神，即“气候、政体和宗教”，并认为这是“解释世界之谜的唯一方法。”①这样，历史的研究领域扩大了，在伏尔泰看来，记载战争、条约、典礼、仪节之类并不是真正的历史，真正的历史其任务是通过对过去历史的研究来说明人类的时代精神。他在自己的重要史著《路易十四时代》的导言中说：

> 本书所要叙述的，不仅是路易十四的一生，作者提出一个更加宏伟的目标。作者企图进行尝试，不为后代叙述某个人的行动功业，而向他们描绘有史以来最开明的时代的人们的精神面貌。②

英国历史学家吉本(Edward Gibbon, 1737—1794)在他的《罗马帝国衰亡史》中，则把罗马帝国灭亡的原因归结为基督教的广泛传播和蛮族对帝国的不

① 克罗齐：《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中译本，第204页。

② 伏尔泰：《路易十四时代》，中译本，商务印书馆，第5页。

断入侵。这部著作为启蒙时代理性主义史学树立了一座永久的丰碑。该书第十六章“从尼禄到君士坦丁历朝罗马政府对待基督徒的政策”的结论清楚地反映了作者的理性主义观点：

> 在西罗马帝国被推翻以后的蒙昧时代里，帝国都城的主教们把他们的管辖权扩大到拉丁教会的神职人员身上，也扩大到一般世俗民众身上。他们建立起来的一套迷信机构，似乎曾长期使理性的微薄力量对立无可奈何，……①

伏尔泰认为历史对现实有极重要的教益，若取消了历史，“我们就可能在法国看到一个新的圣巴托罗缪惨案*，在英国看到一个新的克伦威尔。”②他说，写历史要有哲学家的眼光，要写出哲学的意味，给人以哲理上的教益。后人评论说，“伏尔泰第一个走上了新的道路——他把哲学的明灯带进了幽暗的历史档案库。”③伏尔泰的看法在理性主义

① 见《世界历史译丛》，1980年，第5期。

* 1572年，法国胡格诺战争期间发生的天主教派突袭胡格诺派的大屠杀事件。因事件发生于圣巴托罗缪节日（8.24），故名。——引者

② Fritz Stern: The Variety of History, From Voltaire to the Present, Vintage Books, Edition, 1972, P45.

③ 郭圣铭：《西方史学史概要》，第122页。

史学中具有普遍性。理性主义史学强调以理性的精神探讨历史发展的因果，给历史以合乎理性的解释，这样的历史是“用实例进行教育的哲学”①。正是在这种理性史观的影响下，一大批试图解释人类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模式和趋向的历史哲学著作相继问世了。

1-5 历史哲学的兴起

据说，“历史哲学”这一概念是伏尔泰首先提出的。不过，近代西方最早试图认真探讨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是比伏尔泰稍早一些的意大利思想家维科（Giovanni Battista Vico，1668—1744）。在《关于民族共同性的新科学原理》这一著作中，维科强调人类的历史是由人类自己创造的，推动历史发展的是人的共同意志。他接受了古代埃及人对人类历史的一个传统看法，认为人类各民族的历史发展都要经历这样三个阶段：神祇时代、英雄时代和平民时代。这三个阶段类似于人的童年、青年和壮年，它们各有其相应的心理、语言、宗教、艺术和

① 鲁滨孙：《新史学》，中译本，商务，1964年版，第28页。

政治等等。他说：

> 根据埃及人所说的他们以前经历过的那三个时代，即神、英雄和人的先后衔接的三个时代，我们将看到诸民族都是按照这三个时代的划分向前发展，根据每个民族所特有的因与果之间的不间断的次第前进。这三个时代有三种不同的自然本性，从这三种本性就产生出三种习俗；由于这三种习俗，他们就遵守三种部落法，作为这三种法的后果就创造出三种民事政权或政体。为着便于已进入人类社会的人们一方面互相交流上述三种主要制度，就形成了三种语言和三种字母；另一方面为着便于辩护，就产生了三种法律，佐以三种权威（或所有制），三种理性和三种制裁。这三种法律流行于三阶段的时间，这是诸民族在他们的生命过程中都遵守的。①

维科强调各民族历史都是有规律地一个阶段一个阶段向前发展的，并将人类历史做了三段论式的划

① 引自《外国美学》第一辑，商务印书馆，1985年，第264—265页。

分，这种观点对以后的历史哲学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不过，在维科那里，历史是进步的，又是循环的。他说："人类的事物次序是这样：首先是森林，接着是茅屋，再下去就是村庄和城市，最后是学院。人类首先感到必需，接着追求效用，再接下去就是讲求舒适，寻乐，然后在奢侈中变得淫逸，最后发狂，浪费他们的资产。各民族的性质是粗野，接着是严峻，接着是慈祥，再下去是精巧，最后是淫逸。"① 维科认为，这种质文相胜的过程周而复始，构成了人类的全部历史。

维科的观点在当时并未受到人们的注意。比维科稍后提出历史哲学观点的是德国哲学家康德。一七八四年，康德发表了《从世界公民的立场来看普遍历史的观念》一文。在这篇文章中，康德阐述了他的历史哲学观。康德认为，一个人若不具备广博的历史知识就决不可能对历史做出哲学的解释，他认为自己并不具备这种广博的知识，所以他把自己的工作限定在对历史哲学做一粗线条的勾勒，找出线索这一范围内，而把撰写历史哲学的工作留给后人去做。康德强调历史哲学是道德哲学的姐妹篇，他的工作是为理解历史提供一种道德知识背景。康

① 《西方文论选》（上），第538—539页。

德认为，历史是一个理性过程，这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历史发展是一个可以理解的过程，另一方面历史的目标是道德理性的实现。然而，当我们开始具体去观察历史时，情形并不如此。历史上人类表现出来的愚蠢、幼稚和邪恶常常令人厌恶，令人失望。康德说，这并不奇怪，当我们把眼光对着个别人事时，我们只能看见一片混乱而无意义的现象，但当我们把眼光转向历史整体时，情况就发生了变化，混乱而无意义的人事变成了有秩序可理解的过程，并服从于一个宏大的目标。康德认为，造物主在历史领域追求自己的长远目标，它的最高动机是赐惠于人类全体，虽然这一过程中常要以牺牲某些个人为代价。这些微观混乱而宏观合理的过程是如何可能的呢？康德说，人被造物主赋予许多潜能，这些潜能并不能在个别人身上得到充分全面的发展。造物的设计是要使这些潜能在漫长时期中发挥作用，所以这些潜能是关于人类全体的，而不是个别人的。造物的这种精巧特性，康德称之为人的“非社会的社会性”。康德说：

> 人具有合群的天性，既然在这种状态中他能发展自己的自然本能，他就会感到自己不仅仅是一个人。另一方面，他也有强

烈的摆脱同伴的倾向，因为他发现自己同时有按照自己的意志去摆布一切事物的反社会的特性，结果他就会处处遇到对抗，并从自己的经验中知道他自己就倾向于同他人对抗。正是这种对抗唤起了人的全部力量，迫使他去克服自己的懒惰，并用荣誉、权力、财富等欲望去驱使他，在同伴之中为自己谋取一个地位，这些同伴是他既不能与之和睦相处又无法须臾脱离的。这样，人类就为摆脱野蛮状态进入文明跨出了真正的第一步，而人的社会性就体现在这之中；由此，人类的所有才能才得以逐渐发展，审美趣味培养起来了，将原始的道德本能及时转变为明确的实践原则成为可以想像的了；也即是说，终于实现了把出于病态需要而形成的社会统一转变为一个道德整体。若无这种丑陋的反社会的特性，哪里会有人在追求私利时所必然被激发出来的对抗呢？人或许仍象阿迦底亚的牧羊人那样生活着，和谐、互爱，自满自足，但他们的种种天赋将永远被埋没掉。人们如果象他们所畜牧的羊群那样脾气好，就不能达到比他们的畜类有更高价

值的存在。①

康德的这段话集中体现了他的历史观，在他看来，正是人类个体的恶成就了整体的善，使人类的各种才能在其成员的相互竞争、对抗和冲突中发展起来，并推动人类历史走向道德理想目标。康德举例说，树木只有在茂密的树林中，各为争取阳光而竞相生长，才能长得高大笔直，如果孤立地生长在空旷的地上，让它任意伸枝，就反而长得低矮弯曲。同样，人的才能只有在群体中，在同他人的竞争对抗中才能得到发展。然而，人的非社会的社会性决定了人既不能离开群体（社会）又不能和群体完全和睦相处，所以，在社会生活中调整好个人和群体的关系十分重要。一个理想的社会应是保证其成员有充分的自由去进行竞争的社会。他说："唯有在这样一种社会里，其成员有高度的自由，从而成员之间有剧烈的对抗，但社会却使这种自由具有精确的规定和保证，使每人的自由与别人的自由彼此共存——唯有在这样的社会，大自然的最高目标，它赋予人类的全部才智禀赋，才能获得实现。"②康

① 转引自W·H·Walsh: Philosophy of History, An Introduction, Harper Torchbook, 1960, P125.参见李泽厚：《批判哲学的批判》，修订版，第393页。

② 转引自李泽厚：《批判哲学的批判》，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94页。

德的历史哲学观点，反映了时代的普遍要求，无论他是否受到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的影响，我们可以看到，他的观点与《国富论》作者关于在经济生活中应实行自由竞争的主张有异曲同工之妙。这种对人类、对历史的乐观自信对西方思想界产生了深刻长远的影响。①

赫尔德（Gottfried Herder，1744—1803）是康德的学生，西方不少学者认为赫尔德是历史哲学的真正创立者，不论这种说法是否成立，赫尔德在历史哲学方面的影响之大是不容否认的。赫尔德认为历史哲学就是要从宏观整体上来考察和认识人类历史。他说："历史哲学是……真正的人类史，在它之外一切外部的世界事件都仿佛是一些怪影或骇人听闻的怪现象。在革命、永无休止的创举和难以理解的命运转换之后留存下来的废墟的情景，是非常可怕的。只有一个发展的链条从这些废墟中造成一个整体，诚然，在这个整体中个人的形象在消失，但人类的精神却永远活着，永远进步着。"②

① 在西方思想史上，主张人性恶，即人本性是自私的这种观点占主导地位，从这一观点出发，西方思想家认为历史就是由人的私欲行为推动的，其结果是造就了碑体之善，造成了历史的进步。这与中国思想史上一直以人性善的观点占主导地位不同，从人性善的观点出发就会导出与前面完全不同的历史观。

② 转引自〔苏〕阿·符·古留加：《赫尔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64页。

赫尔德写了四卷本的巨著《人类历史哲学要义》来阐述他的历史哲学思想。赫尔德认为，世界（包括自然界和人类）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有着演进的规律，而人则是万物之灵，这不仅在于人有语言和思维能力，而且在于人有宗教和道德生活。人类历史是一个不断趋向人道理想的进步过程，也就是说人类历史的发展将不断地使人变得更象人。不过这种进步不是简单而笔直的，进步是一个辩证的过程，这包含两层意思：一方面，人类活动的个人目的与其社会结果不一致，推动了历史的辩证发展；另一方面，历史上任何事件的发生都不是为了任何别的目的，而是为了自身。同时也从各个事件中产生着统一的人类历史。历史学家的任务就是从大量的史实中看到统一，找出规律。赫尔德和维柯一样，也把人类历史分为三个阶段，即：诗的时代、散文时代和哲学时代。他认为，历史中有两个基本因素，一是外部的自然力量所构成的人类生存环境，一是内部的力量即人类的精神或民族的精神特性，而这后者是更为基本的东西。人类社会即在这两者的相互作用下演化，民族精神与地理环境的各各不同是造成千差万别的各民族各地区历史的基本原因。赫尔德从他的历史观和人道主义立场出发，对欧洲中心主义的偏见十分反感，他强调，各民族的历史不能

用野蛮、文明之类的概念来做简单的分类，对待不同的民族应用不同的标准去衡量评判。

赫尔德之后，历史哲学的研究产生了两种倾向，一种是重精神力量的倾向，一种是重科学实证的倾向。前者以德国哲学家黑格尔为代表，后者以法国哲学家孔德为代表。作为一个思辨的哲学家，黑格尔在他的《历史哲学》中首先将自然界与人类社会做了区分，认为前者只有循环，没有进步，所以谈不上历史；只有人类社会才有历史，因为只有人类才具有一种"真正的变化的能力，而且是一种达到更完善的能力，一种达到'尽善尽美'的冲动。"① 历史精神领域，只有在精神领域我们才能看到发展和进步。精神的本质是自由。黑格尔说，"世界历史无非是'自由'意识的进展，这一种进展是我们必须在它的必然性中加以认识的。"② 在黑格尔看来，自由有两种意义：一、从外在的（自然的、特别是人为的）控制下得到解放；二、从内在的情欲束缚中得到解放。这种自由意识得以发展的手段是人的活动。人的活动是受各种欲望和热情推动的，若无热情，世界上任何伟大的事业都不会

① 黑格尔：《历史哲学》，中译本，三联书店1956年，第94页。

② 同上书，第57页。

成功。每个人都受热情和欲望的驱使去从事各种活动，追求各自的利益，结果却往往事与愿违。人们的活动结果与他们活动的目的的这种不一致，是狡猾的理性在起作用。理性不仅是强有力的，而且是狡诈的，理性并不直接干预历史进程，它只是让历史主体——各种人去竭力追逐自己的私利，让他们的努力互相影响和抵销，这最终促成了法律和政治制度也即国家组织的建立。在国家这个政治组织中，实现了社会的和谐与发展，人类才结束了原始状态真正有了自己的历史。黑格尔并不认为一切民族都能取得同样的历史成就，他认为世界历史的进步、也即自由意识的发展是由世界各民族相继完成的。正象太阳从东方升起在西方落下一样，自由意识的进展也经历了从东方起源，辗转到西方完成的漫长历程。黑格尔根据自由意识的发展把世界历史分为四个阶段，它们分别同从东方到西方的世界各民族的历史相对应。世界历史的第一时期是东方世界。东方世界包括中国、印度等东方各国。在东方世界的专制政治下，人们只知道一个人是自由的，即专制君主，相对此人，人人都是平等的，即人人都是他的奴隶。正因为一个人是自由的，这种自由没有任何规定和限制，所以这并非真正的自由。东方的专制君主虽然可以不受外在的力量的任何控

制，却无法摆脱内在情欲的束缚。事实上这种独一无二的自由，恰恰导致内在情欲的放纵，所以本质上他也是不自由的，他是他自身情欲的奴隶。世界历史的第二阶段是希腊世界，第三阶段是罗马世界。在希腊、罗马世界，自由意识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人们知道有一部分人是自由的，并且这种自由在罗马世界得到了法权意义上的肯定，这为后世提供了一份宝贵的遗产。世界历史的第四阶段是日耳曼世界，日耳曼世界通过封建制度、天主教会、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法国大革命等历史运动逐渐意识到一切人都是自由的。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主张历史的必然性，却反对宿命论，极端强调人的能动性，强调精神力量的重要性，把精神看作历史发展中的决定性力量。并认为只有哲学的思辨才能透过历史表面的喧嚣去领悟精神的历史。

与黑格尔不同，孔德（Auguste Comte，1798—1853）受过严格的科学训练，并受到当时代科学进步和社会主义思潮的鼓舞，认为人类理智是历史进步的主要推动力。在《实证哲学教程》中，孔德说他自认为发现了一条“伟大的根本规律，为人类智力的发展永远必然遵守。……这条规律就是，我们每一种主要观点，每一个知识部门，都先后经过三个不同的理论阶段：神学阶段，又名虚构阶

段；形而上学阶段，又名抽象阶段；科学阶段，又名实证阶段。”① 孔德说，在神学阶段，人们探求的是绝对的知识，是初始因或目的因，现象世界被看做是受超自然力量支配的。在形而上学阶段，人们把超自然的力量换成了一些抽象的力量，却并未改变问题的实质。到了实证阶段，人类认识到不可能得到绝对的概念或知识，于是放弃了对宇宙起源和目的的探索，而把研究世界的因果规律（即现象间不变的先后关系和相似关系）做为自己的目标。同人类智力的这三个发展阶段相适应，人类社会也经历了相应的三个阶段：军事时期，过渡时期和工业时期。孔德从他的实证主义哲学立场出发，反对社会历史研究中的形而上学思辨，认为社会历史的动力因和目的因非人智所能探求，而且这种探求也毫无意义，他极力主张将自然科学那种严格实证的方法应用于社会历史的研究，创立一门科学的、实证的社会学。*社会历史研究的是社会历史现象的因果律（现象因），在社会历史研究中应运用观察、实验、比较和历史的方法，应从经验事实出发来观察和研究社会，而不能用思辨和想象来代替对

① 见洪谦主编：《西方现代资产阶级哲学论著选辑》，商务印书馆，1964年，第25页。

* 孔德是社会学的创始人。

事实的艰苦研究。

除了黑格尔和孔德，对十九世纪历史哲学做出重要贡献的还有马克思。当然，马克思本人并不认为他的历史理论是一种历史哲学。无论是否可以算做历史哲学，马克思的历史理论都是应该着重介绍的。马克思的历史理论就是他所创立的唯物史观，这一观点认为："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① 马克思和恩格斯说：

> 这种历史观和唯心主义历史观不同，它不是在每个时代中寻找某种范畴，而是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的东西，……这种观点表明：……历史的每一阶段都遇到有一定的物质结果、一定数量的生产力总和，人和自然以及人与人之间在历史上形成的关系，都遇到有前一代传给后一代的大量生产力、资金和环境，尽管一方面这些生产力、资金和环境为新的一代所改变，但另一方面，它们也预先规定新的一代的生活条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477页。

件，使它得到一定的发展和具有特殊的性质。……每个个人和每一代当作现成的东西承受下来的生产力、资金和交往形式的总和，是哲学家们想象为“实体”和“人的本质”的东西的现实基础，……

过去的一切历史观不是完全忽视了历史的这一现实基础，就是把它仅仅看成与历史过程没有任何联系的附带因素。根据这种观点，历史总是遵照在它之外的某种尺度来编写的；现实的生活生产被描述成某种史前的东西，而历史的东西则被说成是某种脱离日常生活的东西，某种处于世界之外和超乎世界之上的东西。这样就把人对自然界的关系从历史中排除出去了，因而造成了自然界与历史之间的对立。因此这种观点只能在历史上看到元首和国家的丰功伟绩，看到宗教的、一般理论的斗争，而且在每次描述某一历史时代的时候，它都不得不**赞同这一时代的幻想**。①

人们在谈到唯物史观时更多提到的是一八五九年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所说的那段话：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43—44页。

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们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存在的物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

> 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做是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①

这段话中，除了“亚细亚形态”引起后人的许多争论外，关于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意识形态及其相互关系这些唯物史观中最基本的范畴和内容都表述得相当明确和严谨。不过，假如仔细琢磨上面引述的两段文字，我们可以看到，前一段文字虽然不一定严谨，但其包含的内容显然要比后一段经典表述多。这说明马克思的历史理论是非常丰富的，千万不能做简单化的理解。正因为马克思的历史理论是非常丰富的，这里引述的文字就不能代表这一理论的全部，至多只是一个提示。

马克思的历史理论对十九世纪的历史学并没有产生很大的影响，这并不奇怪，因为十九世纪的历史学是排斥“哲学”的时代；但却对二十世纪的历史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特别是在经济史、社会史和政治史的研究方面，这种影响尤其显著。仅此一点，就可以看出马克思是一位超越时代的思想家。

黑格尔的思辩哲学踌躇志满地宣称精神历史在日耳曼世界的最终完成，实际上是宣告了这种哲学本身的终结；孔德的实证哲学则要求限制人类过分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82—83页。

的野心，要求人们把精神探索的目标集中在可以通过经验来观察和实证的领域，这份谨慎和小心却使实证哲学获得了成功。在十九世纪的历史学中就出现了这种戏剧性的对比。

1-6 史的自觉

十九世纪被称为“历史的世纪”。席卷欧洲的浪漫主义思潮唤起了人们复古怀旧的强烈情绪，引导人们“逐渐脱离哲学的或纯粹理想的研究，而趋于历史的研究。”① 人们热衷于从过去的历史中找寻在现实中失落的个性，结果却看到了历史本身的独立价值。启蒙时代只承认一种价值，即理性的价值，它以理性为衡量一切的标准，把一切都理性化了，理性甚至成了一种新的迷信，专横地要求人们把所有的一切都奉献在它的祭坛上，这种非份的要求必然要招致人类本能的反抗，特别是当一个新的凯撒（即拿破仑）在启蒙和解放的旗号下把战争和独裁强加其它民族身上的时候，这种反抗更是汇成一股世纪性的潮流，席卷整个西方世界。浪漫主义

① 木尔兹（J·T·Merz）：《十九世纪欧洲思想史》，中译本 商务印书馆，民国二十五年版，第九册，第144页。

思潮构成了十九世纪前半期西方思想界的一个最深刻广阔的背景，它的影响远远超出了思想文化界，而波及到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并深入到民族的意识中。正是在这种时代的精神氛围中，历史学开始成长为一门独立的学问，并在短短的一世纪内取得了重大的成就。严格意义的西方近代史学正是在十九世纪诞生的。

十九世纪史学的自觉是对历史哲学的大胆反叛。虽然自从赫尔德以来历史哲学本身也浸润着浪漫主义精神，但它对历史学来说，扮演的恰恰是浪漫主义所要反对的角色，是一种专断独行的观念和理论。历史哲学家们为了证实自己心爱的理论，常常不惜对历史施以粗暴的剪裁和歪曲，他们"以一种普罗克鲁斯蒂斯*的方式割弃某些最重要的事实，而对其它被接受下来的事实则加以歪曲，使它们符合一种不是真正的而是强加于它们的意义。甚至那些仅仅作为叙述的实际助手的年代划分学也受到了折磨，希望它们能被提升到合乎理想的划分的地位。"①历史哲学力图使历史成为哲学的证人，虽然它也激发了人们认识历史、探索历史发展规律

---

* 希腊神话中的强盗，他有长短两张床，强迫路人躺在床上，比床长则砍足，短则拉长。

① 克罗齐：《历史学的理论与实际》，中译本，第226页。

的兴趣，但它同时又把历史降到了一门辅助学科的地位，降到了哲学婢女的地位。这种粗暴蛮横的做法自然要激起史学的强烈不满。更为重要的是，历史哲学还违背了历史意识，因此它无助于实际的历史研究。克罗齐说："历史哲学在三点上违背了历史意识，对这三点，历史意识是具有一切理由谨守勿失的；这三点是：历史事件的完整性、叙述与文献的统一性和发展的内在性。"①浪漫主义精神已经唤醒了历史的独立意识，人们开始认识到历史不仅其本身具有独立的内在价值，而且具有独立的研究价值，这种价值是任何其它东西所无法替代的。独立的历史意识的觉醒促使史学走向自觉。这种意识一旦觉醒，哲学凌驾于历史之上的局面就完全改观了。事实上，自黑格尔之后，历史哲学就受到了人们的冷遇。马克思和恩格斯强烈反对人们把他们的理论称为历史哲学，或试图将其变成历史哲学。马克思在给俄国一家杂志《祖国纪事》编辑部的一封信中说："他（……我的批评家）一定要把我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一切民族，不管他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但是我要请他原谅。他这样做，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

① 克罗齐：《历史学的理论与实际》，中译本，第290页。

会给我过多的侮辱。”①恩格斯则说，马克思的历史观“结束了历史领域内的哲学，正如辩证的自然观使一切自然哲学都成为不必要和不可能的一样。”历史反叛哲学成为十九世纪史学的一个鲜明特征。

一个觉醒的意识需要有行为主体来将它付诸实践。在十九世纪，历史成了一门职业，出现了一大批职业历史学家，和他们的有闲的前辈不同，他们是在大学里以讲授历史和研究历史为职业的学者。他们有自己的职业荣誉感和职业价值观，他们成立了专业协会，出版专业杂志来发表自己的研究成果。对于哲学家的越俎代庖，他们有一种出于职业本能的反感和不信任，这并不是一种狭隘的行会意识，而是一种正当的责任感和事业心。正是这种责任感和事业心，推动他们努力去追随科学的脚步，为使历史学成为一门独立的科学做出了贡献。近代以来，自然科学各学科相继从哲学中独立出来，并取得了迅速惊人的发展，完全改变了西方乃至世界的面貌，并对思想界发生了深刻的影响，正如当时一位著名的科学家所说：

我以为我们的时代从物理科学学到不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九卷，第130页。

> 少的教训。绝对地无条件地尊重事实，抱着忠诚的态度来搜集事实，对表面现象表示相当怀疑，在一切情况下都努力探讨因果关系并假定其存在，这一切都是本世纪与以前几个世纪不同的地方，在我看来，都足以说明这样一种影响。①

与哲学不同，自然科学注重事实，严格实证，反对脱离事实的玄想和思辨，正是这种精神和态度使它在近代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自然科学的成就使历史学家受到启发和鼓舞，他们决心效法自然科学，摆脱历史同哲学的暧昧关系，使历史成为一门独立的科学。

领导和代表十九世纪史学独立潮流的是当时的德意志史学界。十九世纪上半期，德意志已成为一个成熟的近代民族，政治上却仍处于四分五裂之中。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极大地激发了德意志人的民族自觉，而统一运动在现实中的挫折则使许多人把注意力转向历史，希望从本民族的历史中寻找信心和鼓舞力量。现实的推动造成了史学的繁荣，而这种现实的推动和思想界的潮流一经合拍，

① W·C·丹皮尔：《科学史》，中译书，商务印书馆，1979年，第411页。

便立即在历史领域里引起了一场真正的革命。在这场史学革命中，德意志涌现出一大批优秀的历史学家，而兰克（Leopold von Ranke, 1795—1886）是其中最杰出和最有影响的代表。

自从一八二四年，兰克的成名作《拉丁和条顿各族史》问世以来，直到他逝世为止，在漫长的学术生涯中，兰克写了大量的著作，兰克全集共有五十四卷，这还不包括九卷未完成的《世界通史》；除了著述之外，兰克还通过研究班培养了大批弟子，形成了一个代表时代历史学主流的学派——“兰克学派”。由于兰克在史学上的成就和影响，他被后人誉为“近代史学之父”。作为一个学术界的思想领袖，兰克不仅具有精深博大的思想，而且具有推进学术研究的实际能力。兰克认为，史学的任务，不在于无生气地罗列材料，而在于求得对历史的生动的理解，以便使人们知道一时代人类的趋向，人类所追求的目标以及人类所达到的成就。兰克说：“历史学家活着就是为了理解或学会理解每个时代自身所具有的意义。”①从这一点来说，兰克继承了启蒙时代以来理性主义史学包括历史哲学

① Leopold von Ranke: "The Secret of World History, Selected Writings on the Art and Science of History" Edited with Translation by Roger Wines, Fordham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 1981, P269.

中的许多思想观点，主张对历史做宏观的理解和把握。但兰克认为要做到这一点，不能依逻辑的方法从某种最高观念出发来加以演绎，象以往的历史哲学那样用各种观念来图解历史，而必须耐心地研究史实，历史只对勤苦探讨史实的人才显露自身的意义。他说："只有广泛的历史研究和组合，才能使我们提高到直觉认识生命深处的精神规律的程度。"①针对当时的状况，兰克特别强调这后一点，而他对当代及后来史学的影响也主要集中在这一方面。后人评论说，在他面前有着"压倒一切和坚定不移的目标：用全部拥有的科学和博学手段去再现历史真实。"②兰克在他的成名作《拉丁和条顿各族史》序言中说了这样一句话，这句话后来简直成了近代史学的一篇独立宣言。兰克说：

> 历史向来把为了将来的利益而评论过去，教导现在作为它的任务，对于这样崇高的目的，本书是不敢想望的，本书的目的不过是要如实地说明历史而已。"③

① 田汝康、金重远主编：《当代西方史学流派文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8页。

② 同上书，第15页。

③ Fritz Stern: The Variety of History, Vintage Books, 1972, P57.

要如实地说明历史，并非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兰克认为，文艺复兴以来的一些史学大师都疏于考证，所以在他们的著作中往往错误迭出。写历史要真正做到如实直书，除了摒弃过去那种史学的功用观以外，还必须有一套完整的研究方法。兰克说："对可靠资料的批评考证，不偏不倚的理解，客观的叙述，所有这些应结合起来，目的是再现全部历史真相。"①这里史料是研究的出发点。历史必须从研究原始资料入手，先弄清史实真相，然后以不偏不倚的客观态度去写出确凿可靠的信史来。离开了原始可信的史料，历史就成了一句空话。兰克说过这样的话："只有当纪念碑成为可以理解的时候，可靠的成文证据也可利用的时候，历史才开始。"②在《拉丁与条顿各族史》序言中，兰克自豪地称他的这部著作的基本资料来自于回忆录、日记、信件、外交档案和当事人的原始陈述，其余资料只有当它们是从上述类型的材料中直接引述的或是与这类材料的价值相当时才被引用。所以这部著作的每一页都是由这些可靠的原始资料构成的。

如实地说明历史并非一个一般的治史态度和方

① Leopold von Ranke: The Secret of World History, Fordham Univ.Pr.New York, 1981, P243.

② 转引自〔德〕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著：《西方的没落》，中译本，商务印书馆 1963年，第142页。

法，而且是史学独立的一个根本原则。兰克认为，理解人类事务有两种方法，两条途径，即具体的方法和抽象的方法，历史和哲学。历史从个别出发去理解普遍，它是一门独立的科学。历史是具体的，研究历史的首要目标是如实地说明这具体个别的历史。一切外在目的的追求，只能妨碍史学的独立，而无助于史学的致用。兰克说："欲使科学能发生影响，必先使其成为科学而后可……，必先去其致用之念，使科学成为客观无私者，而后可语致用，而后能发生影响于当前之事物。""历史著作之最要条件，在于求真，所叙述者必须与事实相符，科学的贡献，实为其最重要之事。"①只有在具体而真实的历史中，我们才能看到历史本身的价值和全部意义。这在兰克看来就是在每一具体有限的历史中去体认普遍、无限，体认上帝。兰克说，写历史"确实存在一种崇高的理想目标，即写出体现在历史事件中的人类的理性、统一性和多样性，这是史家应达到的目标。我知道自己在多大的程度上还够不上这一目标。一个人经过尝试和努力，结果却达不到这一目标。不必为此伤心沮丧！最重要的事情是，如贾科比所说的，我们所面对的作为人类事务

① 伯伦汉（Bernheim）：《史学方法论》，中译本，商务印书馆，民国二十六年，第10页，第102页。

一部分的个人的生活，一代人的生活，乃至一个民族的生活，无论能否解释，都时时可以看见一只高高在上的上帝之手。”①

历史中常可以看到这样的情形，一个伟大的新思想（无论其多么丰富深刻）只有当它能简化成一些简单的信条并给出一种大多数人能效仿和掌握的具体方法时，才能形成一种推动时代的思潮或运动。兰克学派并未沉溺在对上帝和无限的追求中，而是把研究目标集中在具体史料和史实的考证和如实说明上。正象人们指出的：“兰克的批判性著作对职业历史学家的影响，要比他的直觉能力来得更强烈些，而这种能力在本质上则具有更多的个性。”② 显然，这种情况不仅有悖于兰克的主张，也歪曲了兰克的形象。然而，“十九世纪是个尊重事实的伟大时代”，它决定了是兰克那句“并不怎么深刻的格言”，③而不是他的整个思想获得了惊人的成功。当代英国历史学家卡尔说：“德国、英国、甚至法国的三代的历史学家在走入战斗行列时，就是这样象念咒文似的高唱这些有魔力的词句的：‘如实地说明历史’——这句咒文也象大多数

① Fritz Stern. “The Variety of History”, P.57—58.

②③ 〔英〕爱德华·霍列特·卡尔：《历史是什么？》，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3页。

咒文一样，编制出来就在于使他们释去一切重负，不再进行独立思考。”①一代大师丰富深刻的思想被简化成这样一句简单的口号，这实在有些可悲。但是，兰克史学的成功之处也就在这里。况且，造成这种结果，兰克本人也不是没有责任的。一方面，兰克出于对思辨哲学的不信任和警惕，从未系统地阐述过自己的史学主张，在自己的著作中也尽力避免做理论概括，总是力图让史实本身来说话；另一方面，他又极力强调原始资料和考证的重要性，这样就不能不使人对他产生这种误解。

以兰克为代表的十九世纪史学被称为“实证主义史学”*，这对兰克来说或许是不公正的，至少不全面，但对于十九世纪西方的史学来说，还是恰如其分的。我们在前面讲过，孔德的实证主义哲学强调社会历史的研究应从事实出发，这一点不仅深深地影响了时代（当然，它本身就是时代的产物），也深深地影响了史学。兰克的主张至少在这一点上与实证主义是完全一致的，而他对同时代史学的影响也主要在这一方面。实证主义哲学给十九世纪的

① 〔英〕爱德华·霍列特·卡尔：《历史是什么？》，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9页。

* 这主要是德国以外西方史学界的基本看法，在德国，兰克是被当作一个唯心主义史学大师来看待的。

史学打上了鲜明的印记。关于这一时代的史学，当代英国哲学家、史学家科林伍德做过这样的评论，科林伍德说，实证主义认为科学包括两个步骤，首先是确定事实，然后是制定规律。实证主义史学对第一步骤特别重视。“大多数历史学家对确定新的事实非常热衷，而对发现规律之事却少有问津。除了发现事实之外，历史学家根本不对事实提什么问题。”① 于是，十九世纪的实证主义史学就带上了这样的特征：

> 历史学家们对实证主义方案的第一部分充满热情，纷纷致力于确认可能范围内的一切事实。在他们对证据加以前所未有的精确、严格的查证之下，有关历史细节的知识逐大量增加。在这个时代里，各种经过分析整理的史料，如公开与未公开的档案记录，拉丁文碑文会编，新版史书、史料的大量问世，以及新考古方法的出现，大大丰富了历史的内容，最优秀的历史学家如蒙森*、麦特兰**都是考证大

① R·G·Collingwood: "The Idea of History", P127.

* Theodor Mommsen, (1817—1903)，十九世纪德国著名的历史学家，代表作有《罗马史》。

** F·W·Matiland, (1850—1906)，英国历史学家。

师。此时所谓的历史意识就是对孤立的个别的史实作精密的查证。“世界史”的理想为人弃为空洞的幻想。专题论文被视为历史著作的标准型式。①

在西方史学史上，实证主义史学第一次提出将历史当作一门严格的独立的科学来对待，反对历史去为任何外在的观念服务，强调历史的价值即在历史本身，这种主张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我们知道，在西方历史上，历史不是被看作文学的分支，道德教训的工具，就被看作是神学和哲学的附庸，观念的证据。现在，实证主义史学第一次推翻了以往加在历史上的一切外在的东西，使历史获得了独立，成为一门科学，这是一个巨大的功绩。英国历史学家伯瑞1902年在他担任剑桥大学近代史钦定讲座教授时的就职演说中说：“历史是一门科学，不折不扣的科学。”②他这句话代表了实证主义史学的一个最基本的信念。正是这种信念鼓舞了十九世纪的历史学家，并对当代西方史学产生了深刻影响。实证主义史学认为历史是一门严格的科学，历史研究是从具体的事实出发，而事实是独立于历史学家之外

① R·G·Collingwood: "The Idea of History", P127.
② Fritz Stern, "The Variety of History", P210

的，因此历史研究应遵循两条基本原则：一、客观主义的态度。写历史应遵循客观主义的态度，摒弃个人的主观好恶，不偏不倚，无党无私，如实直书。英国历史学家阿克顿（Lord Acton，1834—1902）在主编《剑桥近代史》时说："我们的滑铁卢战役必须使法国人、英国人、德国人和荷兰人同样都能满意。如果不查阅作者名单，便没有人能看得出牛津主教在什么地方停下笔，以后是费边恩还是加斯奎特，是李伯曼还是哈里逊接着写下去的。"①客观主义不仅要使各类读者都能感到满意，而且要使作者表现不出自己的个性特征。二、对史料和史实的尊重。历史研究的出发点是史料，只有通过史料才能确立史实，因此考据工作被赋予了极重要的意义，历史著作是记实，句句话都要有文献根据。一八九七年，两位法国历史学家朗格诺瓦和瑟诺博司合写了一部《史学研究法导论》，该书开宗明义就说："历史由史料构成，史料乃往时人类思想与行为所遗留之陈迹。……无史料斯无历史矣。"②朗格诺瓦和瑟诺博司的话在当时具有很

① 卡尔：《历史是什么？》，中译本，第4页。

② 朗格诺瓦（Ch·V· Langlois）、瑟诺博斯（Ch·Seignobos）：《史学原论》，中译本，商务印书馆，民国二十二年版，第1页。

大的代表性。既然历史由史料构成，历史学家撰写历史就应让史料本身来说话，只有在充分掌握了史料的基础上，才能对历史做出客观可信的陈述。实证主义史学并不一般地反对理论概括、制定法律，只是为了避免以往历史哲学的那种主观专断，因而对理论概括采取了非常谨慎和小心规避的态度。事实上，有一些实证主义史学家还是颇重视理论概括的，他们对按这种实证科学的方法，在考证史料，确定史实的基础上进行理论概括十分自信，认为这样做，就能象自然科学家一样在社会历史领域内发现严格的因果规律。英国实证主义史学家柏克尔（Henry Thomas Bwckle, 1821—1862）说："不借助自然科学，历史学便不能建立。""历史家的责任就是显示一切民族的活动都是有规律的，只有通过揭示因果关系，才能把历史上升为科学。"①他还说：

> 相信历史可以成为科学的人，既不抱命定论的看法，也不能持意志自由的论调。他在一开始就必须承认的唯一观点就是当人们表现一种行为时乃是由于某一个或某

① 转引自谭英华：《试论博克尔的史学》，载《历史研究》，1980年，第五期。

> 一些动机促成的，而这些动机又是某些前因的后果。因此，如果我们能认识全部前因，以及前因运动的全部规律，我们便能毫厘不爽地预言它们的全部直接后果。①

十九世纪是历史学的黄金时代。实证主义史学把历史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独立科学的阶段。在历史学家们的辛勤努力下，大量的历史资料整理出版了，以往的历史几乎全部重写过了，而且是在精确考证史实的基础上重写的。然而，历史无论怎样独立，也摆脱不了时代的影响，十九世纪是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胜利进军的时代。政治上的民主、自由和国际舞台上的民族统一、自决是时代的强大潮流，历史学家也自觉不自觉地被卷入到这种潮流中去，力图为它寻找历史的根据。政治成为历史研究的主题。历史参与现实，参与政治当然是好事，然而对政治的偏重，却使史学研究变得日益狭隘，它不仅忽视了政治以外的其它因素，而且忘记了构成民族、国家的人、普通人。比如兰克，人们就批评他“有一种过多地从会议室窗口来瞭望事件的倾向，因而忽略了群众，轻视了经济力量的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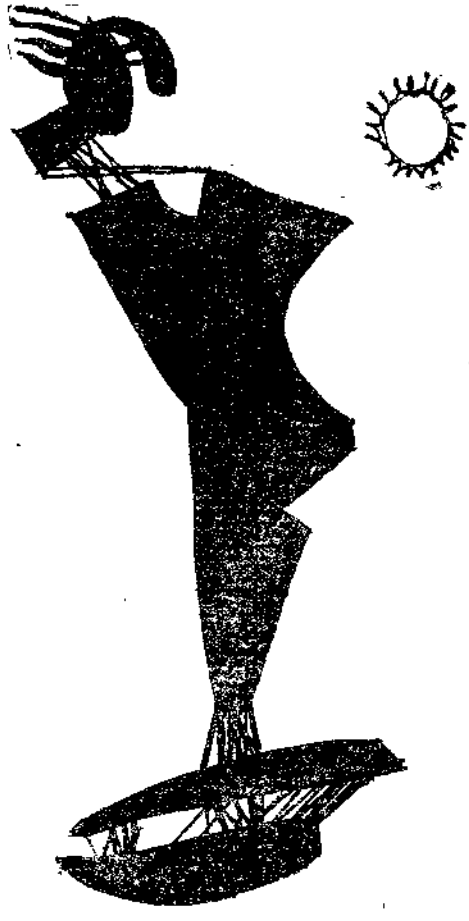
① 〔英〕汉默顿（J·A·Hammerton）编：《西方名著提要·历史学部分》，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348页。

力。”①当时，英国历史学家弗里曼（Edward Augustus Freeman，1823—1892）甚至说：“历史就是过去的政治，政治就是当前的历史。”②这种“政治挂帅”的历史固然是听从了时代的召唤，但历史学本身却为此付出了很大的代价。当然，十九世纪史学的局限性还不止于此，对史料考证的重视和对理论思辨的规避，使史学有沦为史科学的危险，而且关闭了它同其它学科交流的大门，这可以说是向科学看齐而排斥哲学，却矫枉过正的结果。不过所有这些局限要到二十世纪才能充分暴露出来。

总之，十九世纪留给当代史学的遗产是丰厚的，也是沉重的，当代史学将如何来消化它呢？

① G·P·古奇：《十九世纪的史学和史学家》，载《世界历史译丛》，1979年，第3期。

② 转引自郭圣铭：《西方史学史概要》，第201页。



第二章
思辨的历史哲学

十九世纪，经过史学家们的努力，史学获得了独立的科学的地位，以前凌驾于历史之上的历史哲学受到了人们的冷落，史学家们深信随着他们各种实证的研究工作的进展，不用多久，或终有一天，历史的全部真相会大白于世，人们甚至能找出历史发展的全部因果和规律。一切历史哲学都将变得多余和无用。柏克尔曾这样自信地说过："人的行为都是由先天状况引导的，而决非反复无常的，无论它们看上去多么变幻莫测，都是宇宙秩序的巨大构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就我们目前的知识水平来说，我们对此仅能看到一个大概，"但是，"研究手段的进展变得这样迅速和实在，我毫不怀疑，在下一个世纪结束以前，我们就能得到全部证据，正象在现在要找到一个否认物质世界规律性的哲学家一样，将难得看到有哪个历史学家会否认道德世界有不变

的规律。”① 但是历史刚刚进入下一个世纪，历史学家还没来得及找到历史发展的全部真相，十九世纪后期一度沉寂的历史哲学就惊人地复兴了。在二十世纪历史哲学对史学来说不但没有变成多余的而消失，反而成为一种必要的存在，至少到目前为止是如此。当代西方历史哲学分为两大领域：思辨的历史哲学和分析的、批判的历史哲学。前者可以说是二十世纪以前那种传统的历史哲学的一个继续和复兴，而后者则基本上是二十世纪的产物。本章所要讨论的是思辨的历史哲学，准备介绍本世纪在这方面最有影响的两个人物和他们的代表作品。

2-1 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

二十世纪是充满喧嚣、骚动和剧变的世纪。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个世纪是以一场大危机、大灾难开始的。这场危机和灾难就是西方世界内部的自相残杀——第一次世界大战。这场大战真正结束了自启蒙时代以来西方对理性与进步的乐观与自信，结束

① Great Issues in Western Civilization vol. I, Edited by B·Tierney, D·Kagan L·P·Willianos, Random House, New York, 1967, P686.

了维多利亚时代的繁荣与和平，西方进入了一个不肯定的时代。从此，西方的前途和命运开始成为越来越多的西方人士思考和焦虑的问题。一九一八年七月，第一次世界大战接近尾声，一位默默无闻的德国中学教师发表了一部耸人听闻的著作，这部书很快在西方引起了轰动。这位德国中学教师就是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Oswald Spengler，1880—1936），他的著作名为《西方的没落》。

斯宾格勒1880年5月29日生于布兰肯堡，年轻时先后在慕尼黑大学、柏林大学和哈勒大学受教，他兴趣广泛，对历史、艺术、生物学、数学等多种学科做过研究。他终身未娶，过着独身生活，以在中学教书为生。斯宾格勒身体很弱，1905年至1906年曾一度患精神分裂症，同样由于健康原因，他有幸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免服兵役，得以尽全力在极艰难的条件下从事著述。《西方的没落》是斯宾格勒的代表作，这部著作构思于1914年以前，也就是大战爆发以前，第一卷完成于1917年，第二卷于1922年出版，全书共一百余万言。该书书名清楚地表明作者的意图在于探讨西方的前途和命运问题。

斯宾格勒是本世纪初西方世界中少数对时代有着深刻敏感的人物之一。他认为西方世界正面临着

一个巨大的危机，而当时的哲学家和历史学家不是忽视这样的问题，就是回答不了这样的问题。造成这种状况的重要原因就在于西方人受西方传统成见的影响太深，他们不能跳出西方世界的狭隘眼界，从一个更广更深的角度来考察西方面临的问题。斯宾格勒激愤地说："环顾宇内，我找不出一个对当代某一重要问题作过一次深刻的或具有远见的发言，从而享有盛名的现代'哲学家'来。我发现他们只有一些与任何其他人相同的乡鄙意见。"① 要认识西方世界面临的危机，要回答西方的前途和命运问题，就必须从西方传统的狭隘眼界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在一种包括全部千万年来历史的世界形式的远大的、不受时间限制的远景中去考察"② 世界历史。斯宾格勒深信，西方当前面临的问题只是一个事件、一个历史片断，只有将它放入历史整体中加以衡量，才能说明这一事件的意义。他说，"在历史的世界图景中和在自然的世界图景中一样，没有一件事情，不论它是多么微小，其本身是不体现基本趋势的全部总和的。因此，我的原定题目的范围就大大扩大了。许多意外的（主要是全新的）问

① 奥·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63年，第71页。

② 同上书，第57页。

题和相互关系涌现出来了。最后就完全清楚了，直到把世界历史本身、即作为一个具有正常结构的有机体的高级人类的故事本身的秘密弄清楚以前，任何单个历史片断是不能彻底弄清的。”① 这样，对当代危机的说明，对西方命运的探讨让位给了一个更大问题：即对世界历史整体的研究，它成了《西方的没落》一书的主题，而作者是将这一主题当作一个文化问题来处理的，其目的则是要在此研究基础上建立一种哲学，作者自信这将是“我们当代的唯一哲学”。

斯宾格勒在他这部洋洋大观的著作一开始就提出了自己的基本设想和一系列问题。该书导言的第一节说：

> 这本书是第一次的大胆尝试，想去预断历史，想去研究一种文化宿命中的迄未被人经历过的各个阶段，特别是关于那在我们这一时代和我们这一星球上唯一正处于完成状态的文化，即西欧美洲文化的各个阶段。
>
> ……

① 奥·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63年，第77页。

历史是不是有逻辑呢？在个别事件的一切偶然的和无法核计的因素以外，是不是还有一种我们可以称之为历史的人类的形而上的结构的东西，一种本质上不倚赖于我们看得非常清楚的社会的、精神的、和政治的外表形式的东西呢？这种种现实是不是仅是次要的，从上述那些东西引伸出来的呢？世界历史中是不是经常有某些重大的特征一再出现在我们眼前，使我们可以得出某些正确的结论呢？如果是这样，从这类前提出发所作的推论，又能达到什么限度呢？

我们能不能在生活本身找出一系列必须经历的并且按照一定必要的顺序去经历的阶段来呢？…对于每一有机体说来，生、死、老、少、终生等概念是带根本性的，在生活本身方面，这些概念是不是也具有严肃的意义，至今还没有被人抽取出来呢？……

西方的没落，乍看起来，好象跟相应的古典文化的没落一样，是一种在时间方面和空间方面都有限度的现象；但是现在我们认为它是一个哲学问题，从它的全部

重要意义来理解，它本身就包含了有关存在（Being）的每一重大问题。

因此，如果我们想要发现西方文化的宿命将以何种形式来完成，我们首先应当弄清楚文化是什么；它和看得见的历史和生活、和心灵、和自然、和才智的关系是什么；它的表现形式是什么，这些形式——民族、语言和时代、战争和观点、国家和神祇、艺术和工艺品、科学、法律、经济类型和世界观，伟大的人物和伟大的事件——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当作象征来理解和看待。①

斯宾格勒的全部著作就是围绕着这一基本设想和这些问题展开的。

斯宾格勒认为没有一般意义的人类历史。世界历史就是人类各种文化的传记，这一点对理解斯宾格勒的历史观具有重要意义。在斯宾格勒看来，“‘人类’是一种动物学的说法，或一个空虚的字眼。”② 正是这一没有意义的概念长久以来蒙蔽了

① 奥·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63年，第13—14页。

② 奥·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63年，第39页。

西方人的历史意识，使人们热衷于从这一般意义的人类总体来理解人类的历史，于是就产生了以西方为中心把历史分为“古代—中古—近代”的这样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空洞无物且又毫无意义的体系”①。这种历史观以西欧为一个坚实的极，将千万年来的历史和遥远的各种文化都看作是围绕这一极旋转的现象。这种单线论、三分法的历史观在西方人的历史意识中根深蒂固，不同的思想家都只是按自己的理解赋予此三分法的历史的不同的抽象意义，却并未改变这种体系的托勒密性质，而且导致了用各种外在的观念、公式作准则来评价全部历史的状况。要推翻历史领域中的这一“托勒密体系”，就必须完全摆脱西方人传统的历史思维的方式，必须在观念上和方法上进行一场“哥白尼革命”。斯宾格勒自豪地宣布，他提出的历史观是这种革命的产物和结果，他说：“和这种种从传统或个人选择得来的、强把历史纳入其中的武断和狭隘的体系相反，我提出的历史进程形式是自然的，‘哥白尼式的’，它的根源寓于历史进程的本质深处，只有完全摆脱了成见的眼光才看得见它。”②

① 奥·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63年，第31页。

② 奥·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63年，第44—45页。

这种新历史观认为，世界历史是通过各文化的兴亡盛衰来体现的。文化是一有机体，各种文化都是独特的、等价的，自我中心的、却不存在共同的世界的中心。斯宾格勒说：

> 祛除错误，打破魔圈，…我看到的不是虚构的一份直线的历史，那是只有在无量繁富的事实跟前紧闭双眼才能保持的。我看到的是一群伟大文化组成的戏剧，其中每一种文化都以原始的力量从它的土生土壤中勃兴起来，都在它的整个生活期中坚实地和那土生土壤联系着，每一种文化都把自己的影响印在它的材料、即它的人类身上；每一种文化各有自己的观念、自己的情欲、自己的生活、愿望和感情，自己的死亡*。这里是丰富多采，闪耀着光辉，充盈着运动的、但理智的眼睛至今尚未发现过它们。在这里，文化、民族、语言、真理、神祇、风光等等，有如橡树与石松、花朵、枝条与树叶，从盛开又到衰老，——但是没有衰老的“人类”。每一种文化都有它的自我表现的新的可能，从

* 着重号是原文就有的，下同。

发生到成熟再到衰落，永不复返。世上不只有一种雕刻、一种绘画，一种数学，一种物理学，而是有很多种，在其本质的最深处，它们是各不相同，各有生存期限，各自独立的，正和每一种植物各有不同的花、果，不同的生长与衰落方式一样的。这种种文化是纯化了的生活精髓，它们和田野的花儿一样无终极目的地生长着。它们和动植物一样属于歌德的活生生的自然，而不属于牛顿的死板板的自然。我把世界历史看成一幅无止境地形成，无止境地变化的图景，看成一幅有机形式惊人地盈亏相继的图景。专业的历史学家却相反，他们把世界历史看作缘虫一类的东西，勤敏地把历史时代一节节地往自己身上增加。①

研究世界历史，就是研究各种文化的历史。既然文化是一个有机体，各种文化又都是独特的，所以，这种研究不是为了揭示历史的因果，而是为

① 奥·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63年，第39页。

了穷究文化本身的宿命。因为对一个有机体来说，要理解它就是要把握它生命的周期活动，而不是机械的因果。所谓宿命，就是指任何有机体都有的、命定的、无法超越的生命周期。斯宾格勒认为，历史研究中传统的因果解释根本无法说明这种问题。这种研究需要提出一个全新的研究方法，斯宾格勒把这种方法称之为“比较形态学”或“文化形态学”的方法。① 按照这种方法，研究世界历史，就是将世界历史上存在过的各种高级文化做形态学上的比较，找出各种文化在其生命周期中表现出来的形态上的相似性和共同点，以此来理解各种文化，更为重要的是，通过这种研究来预测西方文化的前途和命运。

通过研究，斯宾格勒提出了一整套关于世界历史或者说关于文化形态的理论。

斯宾格勒认为，在文化的起源和景观中，首先必须区分宇宙和小宇宙。他说，“植物是宇宙一类的东西，而动物则除此以外还是与大宇宙关联的小宇宙”②，因为，动物在宇宙面前是自由的（相对

① 奥·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63年，第81页。

② 奥·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63年，第84页。

植物而言）。“一切宇宙的东西都有周期性的标志；它有‘节拍’（节奏、拍子）。一切小宇宙的东西都有极性，它具有‘紧张’。”① 人类就个体而言，也属于与大宇宙相关联的小宇宙。与动物不同，人具有醒觉的意识，因而人的存在是一种醒觉的存在。存在是宇宙性的，醒觉的存在是小宇宙性的。在存在中宿命统治着，而醒觉的存在则区别原因和结果。前者的根本问题是时间，后者的根本问题是空间。所有存在都有两种循环器官：血液系统和性器官，而小宇宙的存在还有感官和神经。血是生存的象征，“植物性的——宇宙的东西，即富有宿命、血、性的存在，具有一种极古的优势，而且保持这种优势。”② 小宇宙的存在归根结底依存于大宇宙的存在，并使自己不断适应大宇宙。“尽管小宇宙在空间自由运动，宇宙循环的这种节奏仍然持续进行，并时时打破醒觉的个体存在的紧张，使之成为一种被感觉到的完全的和谐。”③

这段议论颇为奇特，它是斯宾格勒全部理论的一个前提或核心，从这里可以引出他的全部理论，

① 奥·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63年，第85页。

②③ 奥·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63年，第94—95、85页。

首先是关于文化起源的理论。显然，按照这段议论，当人作为个体时，只是一种小宇宙的存在，不具有历史和文化的意义，也不是历史——文化研究的对象。斯宾格勒说："'历史的人'，按我对这个词的理解并按所有大史学家对它的看法，乃是一种正以全力向着自我完成前进的文化的人。在此以前，在此以后，在此以外，人是没有历史的"①。但是宇宙的节奏会不时地干扰和打断小宇宙的活动，使它产生顷刻间的巨变。在这时，"小宇宙的墙垣被拆除了。它争夺、恫吓，它推进、拖曳，它逃跑、闪避并摇摆不定。肢体交错，驰足疾进，众口一呼，万众同运。从许多单个小世界的总合中突然产生了一个完全的整体。"②这种整体是由宇宙性的一致造成的。对于这种宇宙性的一致，"一个人是委身于它的，并以他的全部存在委身于它。这一类一致中群众容易被热情的激动和惊恐所掌握"，③而"这类被激励的人群是有生有死的"，④它成了一种宇宙性的存在。斯宾格勒说："在小宇宙存在的多样性中，我们总在遇到一种被激动的群众单位的形成，这是一种高一级的存在，无论它是逐渐发展起来的，或是顷刻之间出现的，它都具有个人所

①、②、③、④ 奥·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63年，第145、86、104、105页。

有的全部感情和激情，这种感情的本性是不可捉摸的、不是推理所能理解的”①。这种被激动的群众单位有一个重要的特征，就是它的所有成员有一种心灵上的一致。它与人类中的有些结合如学术团体不同，人可以随意加入或退出一个学术团体，因为这涉及的只是个人的醒觉意识，但却不能随意加入或退出这种具有心灵一致特征的群众单位，除非他以自己的全部存在委身于它，否则就决不属于它。这种被激动的群众单位有大有小，有久有暂，它完全取决于心灵一致的时空范围。从一七八九年巴黎街头偶然聚合的激动狂热的群众（指法国大革命时期的群众），到十字军武士、普鲁士乡绅、中世纪行会等等，一直到民族、文化，它们的共同特征就是它们都是由心灵的一致造成的。所谓宇宙性的存在指的就是这种由心灵一致所结合起来的人类组织。这种组织有自己的生命周期，也即宿命，正因为这样，它也就有自己的历史。然而，在所有这类组织中，真正持久和独立的存在是文化，所以真正的历史就是文化。斯宾格勒说，在所有的人类结合中，“最强有力的存在是高级文化，它们是在伟大的精神巨变中产生的，在千百年的生存中把一切低

① 奥·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63年，第104页。

级的结合——民族、阶级、城镇、世代——熔于一个单位之中”，于是就有了真正的历史，“历史上的大事都是由宇宙级的存在、由民族、党派、军队、阶级所进行的。”① 通过对宇宙和小宇宙关系的分析，斯宾格勒对文化的起源做出了一种解释，显然，文化起源于小宇宙(人)的活动受大宇宙干扰而产生的突变。这里的突变并不是强调变化发生在短暂的瞬间，而主要是指这种变化在性质上是不可名状、无法解释的。正象生物界的突变② 一样，这种变化是“宇宙性质的”，“它们在原因方面是人类知觉和理解所不能及的”。③ 斯宾格勒说：“迅速而深刻的变化在诸伟大文化的历史中表现出来，并无任何种可举示的原因，影响或目的。哥特式和金字塔式，就象始皇帝的中华帝国和奥古斯都的罗马帝国，就象希腊文化、佛教和伊斯兰教一样突然地完全出现了。……一切存在物，活跃的或沉思的，

① 奥·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63年，第105页。

② 斯宾格勒在这里天才地猜测到非达尔文进化的突变理论。他说：“人类的生命形态，与其他一切生命形态相同，起源于一种突变，这种突变‘从何处’、‘如何’以及‘为何’发生，依然是一个难测的秘密。”参见《西方的没落》，中译本，商务版，1963年，第121页。

③ 奥·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63年，第121页。

都经由各个转折点向着它的最后目标前进，而且我们必须假定在太阳系的历史和恒星世界中具有这样的转折点。地球、生命和自由活动的起源是这样的转折点，从而也是我们不能不承认的神秘。”① 斯宾格勒一方面认为文化起源是人无法知道的宇宙秘密，另一方面又用宇宙对小宇宙的干扰来解释文化的起源，这显然是一个矛盾。

在斯宾格勒看来，人类的存在可划分为两大时代：原始文化时代和高级文化时代。在原始文化时代，部落和氏族是仅有的生气蓬勃的存在物，在高级文化中，文化本身成了一个存在物。斯宾格勒所讲的，所研究的文化，一般就是指高级文化。高级文化一旦产生，真正的历史就开始了。斯宾格勒受哥德的影响很深，他把各种文化的历史分为四个阶段：前文化时期，文化早期、文化晚期、文明时期，并相应地把这四个时期分为精神上的春、夏、秋、冬四季。每一文化的生命历程约为千年左右。

前文化时期精神上的特征是乡野的和直觉的，从政治方面看，则尚无政治和国家，只有部落及其首领。斯宾格勒说，最初人是一种东奔西跑的动

① 奥·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63年，第121—122页。

物，他的醒觉意识不住地在生活的道路上摸索前进，完完全全是小宇宙。农业的出现使人发生了一种深刻的变化，由于这种变化，人自己变成了植物，即变成了农民。他生根在他所照料的土地上，人的心灵在乡村中发现了一种心灵。这是每一种文化的先决条件，文化本身也是依次从一种故乡景色中生长起来的，它不断地更新并加强人和土地的亲密关系。在前文化时期只有原始的民族——农民。农民是无历史的。它比文化出现得早，生存得久，它是一种神秘的心灵，是创造城市中的世界历史的血液的来源和不息的源泉。“永恒的和无历史的农民是文化破晓前的一种民族，在最根本的特性上仍旧是原始的民族。”①

斯宾格勒说：“一切伟大的文化都是市镇文化，……第二时代(即高级文化时代——引者)的高级人类是一种被市镇所束缚的动物。世界历史是市民的历史”。②随着“真正的奇迹”——市镇的心灵的诞生，“一种完全新型的群众心灵——它的终极基础是我们所看不到的——突然从它的文化的一般精神中长出来了。它一旦觉醒起来，就为自己形成了

① 奥·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63年，第826页。

② 同上书，第199—201页。

一种可见的实体。从那各有自己的历史的一群乡村的农田和茅舍中出现了一个整体，它生活着、生存着、生长着并且获得了一种面貌和一种内在的形式与历史。”① “一种文化的每个青春时期事实上就是一种新的城市类型和市民精神的青春时期。”② 当最初的城市出现时，一种文化就进入了它的历史的第二阶段：“文化早期。在这个时期，一个文化产生了成熟的意识，形成了独特的风格，并出现了具有确定风格与特殊世界感情的民族集团。贵族和僧侣成为这一时期的两个原始等级或阶级。“一切有效的历史都是从原始的阶级，即贵族和僧侣开始的”，③ 因为，“在每种文化中，农民是纯自然和成长的一部分，从而是一种完全不具人格的表现，而贵族和僧侣则是大力培养与形成的结果，因此，就表示一种彻底具有人格的文化”。④ 与这种等级状况相应的是地产经济和封建政治。

文化早期阶段的城市都是小小的原型城市，实际上这是聚集在封建城堡周围的小市镇。这种市镇根植于乡村之中，表现出强烈的被土地束缚的感情，植物性的——宇宙事物的感情，它是乡村景观

① 奥·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63年，第200页。

②③④ 同上书，第201、208、538页。

的强化，从属于乡村，受乡村封建势力的统治。随着城市的发展，第三等级——资产阶级——兴起了。城市的金钱战胜了封建的地产，城市摆脱了封建势力的统治，专制主义国家取代了封建制度，自由至上的观念和理性万能的信仰成为这一时期精神上的要求和表现。这就是文化历史上的第三个阶段：文化晚期。

当一种文化发展到第四阶段也即最后阶段——文明时期——时，出现了世界性的大都市，这时，“代替一个世界的，是一座城市，广大地区的全部生活都集中在它身上，下余的地方则枯竭了。代替典型的、土生土长的民族的，是一种在流质状态中不稳定地凝聚着的新的游牧民族，即寄生的城市居民，他们没有传统，绝对只顾事实，没有宗教，机智，不结果实，非常看不起乡下人，尤其看不起那种高级的乡下人、乡绅。这是走向无机、走向结局跨出的一大步……处于这些城市辐射圈外的整个地区的命运就是变成‘行省’。”① 在文明时期，第四等级——群众——又取代了第三等级，这是无形式的极端，满怀憎恨地迫害一切形式，一切等级差别，财产制度和知识体系。精神的创造力已经消失，艺

① 奥·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63年，第56页。

术沦为奢侈、享乐和神经刺激。武力政治逐渐取代了金钱政治即民主政治。第四等级为凯撒主义扫清了道路，而凯撒主义则使政治的原始性大大增强。所谓凯撒主义，是一种极端个人的权力，它的出现使世界陷入了比以前任何战争更为可怕的私人战争状态。这样，原始的人类状态逐渐加于高度文明的生活方式上，一种文化的历史或生命就彻底结束了。

在文化发展的每一阶段，以及在文化发展的前后阶段的对比中，都可以看到宇宙和小宇宙的对立和冲突，正是这种对立和冲突构成了文化的历史，文化的宿命。我们知道，文化是宇宙级的存在，但是在文化本身的生命历程中，又产生了僧侣、学者、理论家、城市的智慧，理性与自由的观念，世界城市等等这些力图摆脱宇宙宿命的醒觉意识和醒觉的存在，使文化在依次耗尽自己的生命精力和能量后，重新瓦解为无数无个性、无历史的小宇宙。这一历程、这种生命节奏贯穿于每一文化之中，无可逃避，无法超越。“有生就有死，有青春就有老境，有生活一般地就有生活的形式和给予它的限制。”① 这就是斯宾格勒的文化或历史宿命论。

斯宾格勒认为世界历史上曾经有过八个高级文

① 奥·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63年，第66页。

化（之所以有八个，纯粹是一种偶然），它们是：埃及文化、印度文化、巴比伦文化、中国文化、古典文化（希腊罗马文化）、伊斯兰文化、墨西哥文化、西方文化。这八个文化是等价的，甚至是同时代的，比如亚历山大与拿破仑、亚里士多德和康德、雅典和巴黎，由于它们在各自文化中的地位、意义相同，所以完全可以看做是同时代的现象。由于每一种文化都植物性地从属于产生它的土壤，所以每一种文化都具有自己独特的个性。如古典文化是阿波罗型的，它注重现在，泰然地忘怀一切内心的和外在的过去；西方文化是浮士德型的，它无休止地追求自我完善，追求无限，而不满足于现在。正因为每种文化都是独特的，而人只能站在自己的文化中看待一切，所以，要在不同文化之间加以沟通、相互了解是不可能的。这一点很重要。斯宾格勒说："两种不同文化的人，各自存在于自己精神的孤寂之中，被一条不可逾越的深渊隔开了。虽然印度人和中国人在那些日子里都自觉是佛教徒，他们在精神上依旧离得很远。相同的经文，相同的教义，相同的信条——但是两种不同的心灵，各走自己的路。"① 文化间的交流只是一种表象，

① 见·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63年，第153页。

本质上是不可能的。有时候我们自以为接受了一种外来文化，实际上只是找到了我们原来就有的东西。“我们赞美一种外来的思想的各种原则愈热烈，我们实际上对于这种外来思想的性质的改变也愈根本。”①

斯宾格勒对文化的这一番研究归根到底是要说明西方文化的前途和命运。他认为，在所有八个文化中，除了西方文化外，其余七个文化都已死亡了，只剩下一种无历史、无生气的僵死的存在。西方文化从前文化的法兰克时期（公元500—900年）发源，先后经历了它的文化早期哥特时期②（公元900—1500年）和它的文化晚期巴罗克时期③（公元1500—1800年），从十九世纪起开始进入文明时期，“从文化到文明的过渡，在古典世界是公元前四世纪完成的，在西方世界是十九世纪时完成的。”④这一事实，对西方人意味着什么？它意味着在精神和艺术领域，他们已无可征服，无所创造。

---

①④ 奥·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63年，第155、55页。

② 哥特式是指十二至十六世纪流行于欧洲的一种以建筑为主的造型艺术风格，其特点是庄严、神秘，反映了中世纪基督教盛行时的精神面貌。斯宾格勒在这里是借喻。

③ “巴罗克”原是指十七世纪以意大利为代表的一种文学和艺术风格，其特点是豪华浮夸。斯宾格勒在这里也是借喻。

此后，西方世界遂向凯撒主义过渡。斯宾格勒预言，这一过渡将在公元二〇〇〇年至公元二二〇〇年间完成。二二〇〇年以后，就是西方文化的瓦解。这样，斯宾格勒就回答了西方的前途和命运问题。他认为，西方文化将同其它七个文化一样，不可避免地没落灭亡。这不是悲观意义上的宿命论，而是对历史必然性的一种冷静清醒的认识。斯宾格勒冷峻而断然地说：

> 谁若是不懂得这种结果是不可避免的，不容修正的，不懂得我们的选择只能是情愿这样或一无所愿，只能是牢附这种宿命或对未来和生活悲观失望；谁若是不能从强有力的智慧的现实中，从铁石般性格的精力与风纪中，从以最冷酷最抽象的手段进行的战斗中也感到庄严壮丽；谁若是迷恋地方居民的唯心主义，想过过去时代的生活——谁就应该放弃理解历史、在历史中生活，或创造历史的一在愿望。①

在这样的宿命面前，西方人能干什么呢？斯宾格勒说他寄希望于新的一代，“我只希望新的一代被这

① 奥·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63年，第64页。

本书所打动，从而委身于技术而不是抒情诗，委身于海洋而不委身于画笔，委身于政治而不委身于认识论。他们所能做到的，仅此而已。”① 也就是说，自觉自愿地服从这种宿命。斯宾格勒在全书的结尾说：“我们没有奔赴这一目标或那一目标的自由，我们只有作必要的事和什么也不作的自由。历史的必然性所安排的任务，将要由个人或者是违背个人来完成。”最后他引用古罗马哲学家辛尼加的一句话结束了全书：

> 愿意的人，命运领着走；不愿意的人，命运拖着走。②

斯宾格勒的著作强烈地震撼了西方思想界，尽管大多数不同意他的结论，却没有人能回避他提出的问题。一些学术界的专家认为他是一个“江湖骗子”，可就是这个“江湖骗子”抓住了西方人的焦虑和想象。这部著作尽管有许多自相矛盾、牵强附会、不准确的地方，但“比批评它的一切评论家却高明得多。”③ 它的价值不在于具体的结论，而在

① 奥·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63年，第67页。

② 同上书，第776页。

③ 英译者序言。见中译本第8页。

于它引起的思考和讨论。斯宾格勒是一位天才，一个怪杰。他那种热烈与冷峻相互交织的风格，咄咄逼人的气势，滔滔不绝的辩才自有一种震撼人心的力量，而他著作中的那些深刻的直觉，大胆的猜测，丰富的思想和时时跳到读者眼前的出人意表的机智，更是令人叫绝。比如，斯宾格勒始终十分强调宇宙力量、宇宙关系的干扰和影响，他认为对自然和历史中的变化仅仅局限于在地球上找原因是远远不够的，因为许多突变巨变往往是宇宙性质的，是理性和因果关系所不能解释的。虽然这是非理性的观点，谁能说这是毫无道理的呢？毋庸讳言，斯宾格勒常常很偏颇，很专断，自信到了没有道理的地步。心理学家或许能从中找到许多很有价值的精神分析材料，批评家也很容易指摘他的错误，但对一个希望了解历史的读者来说，重要的不是他说错了什么，而是他为什么这样说。理解比评判更重要。

斯宾格勒的著作笼罩着非常浓厚的非理性色彩，他本人对此也公认不讳。根据宇宙、小宇宙的区别，斯宾格勒把人也相应地分为两类："有天生的宿命的人和因果的人。在纯粹生活着的人跟那或则由于心理的能力或则由于血的缺陷因而成为'才智之士'的人之间隔着整个一个世界。前者是农民与战士，政治家与将军，娴悉世故的人与事务家，

每一个想获得成功，想掌权执政、想战斗、敢冒险的人，组织家或企业家，铤而走险的人或暴徒或赌棍；后者是圣徒，僧侣，学者，理论家或理想家。”① 斯宾格勒认为，前者就是生活和历史本身，而后者只是代表了生活的一个方面。后者（思想家）应当为前者（行动者）服务，但是思想家往往不愿服务，而要去统治，并相信他是在统治。他们忘记了事实比真理更重要，却相信冷酷的抽象思维是接近终极事物的途径，相信他们找到的就是唯一的终极真理，而非一种代替不可知秘密的想象的图景，他们力图用这种因果的认识去对抗宿命，征服宿命，用醒觉的存在去取代存在。斯宾格勒蔑视这一类人和他们的信念，认为这种人是气血不足的产物，这种人身上“没有动因和冲动，没有知人知事之明，没有一切天生的行动家所具有的、完全不同于相信自己的观点的正确性的、对自己的命星的信仰，没有在决定性时刻发音的血统的声音，没有替任何目标和手段作辩护的坚定的、沉着的信心”，这种人是纯粹的小宇宙，“跟土地没有坚实的联系”。② 他

① 奥·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63年，第102页。

② 奥·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63年，第102页。

反复强调原始的生存本能和权力意志在生活和历史中的决定性作用，强调真理是相对的，“真理只是在和某一特定人类的关系中才成为真理”，① 宇宙事物的终极秘密是人的理性和抽象思维所无法接近的，理性和因果关系只适用于研究自然现象，而无法窥见历史和文化的宿命。思想家们的固执己见、一厢情愿只能使人在历史的宿命面前无所作为、放任自弃。尤为重要的是，这种对理性的崇拜和迷信造成了对生活、对人本身问题的极大忽视。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斯宾格勒认为，生活就是生活，就是宿命，没有理由，也不需要任何理性的说明，“当一个生活问题须要应用理性的时候，生活本身就成问题了”，② 而二十世纪初的西方恰恰就是出了这种问题。斯宾格勒说过这样一段话：

> 十九世纪是自然科学的世纪，而廿世纪则属于心理学的世纪。我们不再相信理性的能力高于生命；反之，我们觉得生命统治着理性。对人的认识远较一些抽象和普遍的理想为重要。我们已经从乐观主义转变为怀疑论者；我们所关心的不再是讨

①② 奥·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63年，第76、220页。

> 论过去什么事应该发生，而是那些未来将要发生的事。对我们而言，掌握事物真相比一味沉湎于理想更为切要。①

很明显，斯宾格勒的非理性倾向很大程度上是现实感受的产物，是对西方近代以来、特别是十九世纪的唯理主义、唯科学主义的一种批判。这种思想倾向影响了他的整个认识，整个理论，使其抹上了浓厚的非理性色彩。斯宾格勒多次提到尼采对他的影响，认为是尼采给了他质疑的能力。他说，“如果有人要我指出我对尼采的关系的公式，我将说：‘把他的“展望”变成了一种“概观”。’”②他还说：“想想尼采的历史眼界吧。他关于衰微、尚武精神，一切价值的重新估价，追求权力的意志等概念在西方文明的本体中是根深蒂固的，对分析西方文明具有决定性的重要意义。”③不能说，斯宾格勒对唯理主义的这种尖锐批评是毫无道理的。但是，斯宾格勒把这一切做得太过火，使自己滑向了神秘主义和唯意志论。既然他拒绝理性的因果解释，就

① 转引自郑世安：《西方文化的诊断者——斯宾格勒》，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台北，民国七十一年，第29—30页。

② 奥·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63年，第6页。

③ 奥·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63年，第42页。

不得不求助于非理性的玄想和直觉，这种玄想和直觉虽也能给人以某种启发，却缺乏理论上的明晰性和严谨性，缺乏经验的实证的基础，无法供人们作进一步的深入研究。当然，作为一种历史哲学的思辨，它的意义只在于此也仅在于此，我们不必对它提非份的要求，它也不应对自己抱非份的奢望。遗憾的是，斯宾格勒在这点上缺乏自知之明，他将自己的理论看做是今后时代唯一的哲学，却没有想到别人"也可以画出别的同样有效的图画"①。正象斯宾格勒自己说过的，对于思想家"真正的历史不是通过反驳他而是通过放任他和他的思想去对他作出裁决的。"② 斯宾格勒从默默无闻中崛起，又在几乎被人遗忘的情形下弃世，这是否算是真正的历史对他这位思想家的一种裁决呢？就在他逝世的前两年，一九三四年，由一位英国人所写的同样类型的著作问世了。

2-2 汤因比：《历史研究》

阿诺德·约瑟夫·汤因比(Arnold Joseph

① Ruth Benediet: Patterns of Culture, 1934, P50.

② 奥·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63年，第104页。

Toynbee，1889—1975）是英国的一个职业历史学家。一八八九年一月生于伦敦，他早年学习希腊罗马史，并成为这方面的专家。从一九一九年至一九五五年，他长期在伦敦大学执教。汤因比还是一个出色的社会活动家。一九一九年和一九四六年，他曾两次作为英国代表团的成员出席巴黎和会，结识了很多当代世界的重要人物，对当代西方和世界的现实政治作过非常切近的观察。这种丰富的社会活动经历对他的学术生涯有着很大的影响。汤因比一生著述十分丰富，他的主要著作有：《希腊的历史思想》、《文明经受着考验》、《战争与文化》、《世界与西方文明》、《一个历史学家的宗教观》、《我所认识的一些当代人物》、《居世界之半》、《人类与大地母亲》等。在西方，汤因比被称为“当代最伟大的历史学家”，他之所以能获得这样高的赞誉，却不在于上述成就，而主要应归功于他的那部十二卷本的巨著：《历史研究》，西方有的学者认为这部著作可以说是“二十世纪精神史上最重要事件之一。”①

《历史研究》与《西方的没落》是同一类型的著作，两者力图回答的是相同的问题。和斯宾格勒

① 〔苏〕沙巴：《资产阶级历史思想的危机》，三联书店，1961年，第272页。

一样，促使汤因比去从事这项研究工作的也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的西方现实。不过，汤因比同斯宾格勒相比要年轻得多。一九一四年战争爆发，当时斯宾格勒已在全力从事《西方的没落》的撰写，而汤因比还在大学里攻读研究生课程，同时担任古代史的教学工作。由于健康原因，汤因比也象斯宾格勒一样，没有服兵役。在讲解修昔底德的著作时，他的“理解力突然得到了启发”，体会到修昔底德在他所处的世界上早已经历过西方人当时所感受到的经验。① 这一新的理解使汤因比想了很多。他重新认真地读了修昔底德的著作，体会到修昔底德著作中的含义和感情，并认识到修昔底德著作中描述的情况就是西方人的未来。汤因比认为，这样来认识历史，传统的将年代分为古代、现代的年代记述法就显得毫无意义了。从哲学上说，修昔底德的世界与当时的西方是同时代的。而且，不仅仅希腊—罗马文明与现代西方文明之间的关系是如此，一切文明间的关系都应是如此。这个问题使汤因比深感兴趣，他开始反复思索世界历史中的文明问题。

既然将世界历史分成古代、近代、现代是毫无意义的，各种文明是同时代的，那么，历史研究的单

① 张文杰等译：《现代西方历史哲学译文集》，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第175页。

位就应是各个文明而非年代学意义上的古代、近代等。接下来的问题是，什么力量促使各个文明兴起、生长、衰落和解体？一九二〇年夏天，汤因比读到了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在读了“那些闪耀着历史洞察力的篇章”后，汤因比颇感失望。他说：“最初我曾怀疑：我的全部探索，甚至连那些探索的问题还没有在我心中完全形成以前（更不用说答案了），是不是已经由斯宾格勒解决了。”不过，汤因比很快就发现他仍有工作可做，他说：“当我在斯宾格勒的书中寻找我的关于文明起源问题的答案时，我发现我自己仍有工作可做，因为在我看来，在这一点上，斯宾格勒的观点是最无启发性的教条主义的和决定论的观点。按照他的观点，文明的兴起、发展、没落与消灭是永远按照一成不变的时间表进行的，而对此却没有提出什么说明。……这种武断的态度与斯宾格勒的卓越天才看来是令人失望地不相称的，而且从这里，我开始意识到民族传统上的一种差别。既然德国人的先验方法注定要失败，那末让我们看看英国人的经验主义能有什么作为。”① 汤因比决心回答斯宾格勒所没有回答的这些问题。

一九二一年，希土战争爆发，汤因比以《曼彻

① 《现代西方历史哲学译文集》，第176—177页。

斯特导报》记者的身份去近东采访，途中他凭吊了希腊，罗马的古迹，面对着宏伟古建筑的断壁残垣，他感慨万千。在驰往东方的列车上，他拟下了一份简单的提纲，就在这份提纲的基础上，日后，汤因比写下了他的宏伟著作：《历史研究》。

《历史研究》是一部十二卷本的巨著。从一九三四年第一至第三卷出版，到一九六一年第十一至十二卷出版，前后相隔二十七年时间。汤因比对文明研究的全部观点集中在前十卷内。第十一、十二卷是前十卷的地图以及他对大量批评所做的答辩。《历史研究》的前十卷于一九五四年已出齐。由于这部书篇幅太大，书中引用的各种语言的原始材料很多(汤因比因此遭致了卖弄学问的批评)，一般人难以卒读，这大大影响了该书的流传，后来一位美国作家索默韦尔① （D. C. Somerwell）将该书缩写成两卷*，才使该书获得大量的读者。

与斯宾格勒不同，汤因比是位职业历史学家，加上他英国人文化背景，使他的著作与斯宾格勒著作相比有显著的差异。斯宾格勒着重分析文化的宿命，在斯宾格勒看来，文化为何起源、如何生长这

---

* 一九五九至一九六九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分三册出版了由曹未风等人翻译的《历史研究》的缩写本。

类问题是人的理智无法探求的宇宙秘密，所以他对这类问题不太感兴趣，只是泛泛地谈了宇宙与小宇宙的关系如何激发了文化的兴起，又促使文化的衰落。汤因比在《历史研究》中则主要讨论了文明的起源、生长、衰落、解体的原因和机制，研究了新旧文明的交替继承，通过这样全面的研究，来回答西方文明的前途和命运问题。

在《历史研究》的序论里，汤因比讨论了他从事文明研究的两个基本观点。一、历史研究中可以自行说明问题的范围是社会文明。汤因比认为，以往人们研究历史往往以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为基本的研究单位，这样的研究是无法解释人类历史上的文明问题的。要研究文明问题，历史研究的范围就应大大扩展。对于研究文明来说，民族、国家仍然只是一个局部，对局部的研究无法说明整体，只有整体才是一种可以自行说明问题的研究范围。那么要研究文明问题，能够自行说明问题的范围是什么呢？汤因比认为："历史研究可以自行说明问题的范围既不是一个民族国家，也不是另一极端上的人类全体，而是我们称之为社会的某一群人类。"① 汤因比在这里说的社会是指生活在某种文明之中的

① 《历史研究》，中译本，上海人民出版社，上册，第7页。以后凡引用该书，仅在注文里注明册数和页数。

社会整体，实际上它是文明的同义语。二、一切叫做文明的各种人类社会的历史，在某种意义上说都是平行的和同时代的，它们在哲学上是价值相等的。① 因此，在不同的文明社会之间应该而且可以进行比较研究。汤因比的这两个基本论点和斯宾格勒这方面的观点几乎完全一致，当然两人是通过各自的研究独立地得出这相同结论的。稍有不同的是，斯宾格勒体系中的文化在汤因比那里成了文明，不过这无关大局，两位不同背景的思想家在这一方面的不谋而合才是意味深长的。这不是偶然的巧合，只有将这一现象放到广阔的时代背景中，我们才能理解这种巧合。汤因比和斯宾格勒不约而同地在他们的研究中提出了文化形态学或比较形态学方法，力图从更为宏观的角度来把握人类历史的奥秘，从而认识西方文明的前景，这完全是当代现实刺激的产物。当代西方把整个文明问题而不再是某一个民族或国家的命运放到了人们面前，不同的人对此会做出不同的回答，但没有人能回避这个问题。汤因比和斯宾格勒从共同的问题出发，但在以后的具体研究中，两人就分道扬镳，各自循着自己的思路去开拓研究的航道，并在许多问题上得出了截然不同的结论。

① 《历史研究》，中译本，上海人民出版社，上册，第2页。

文明起源问题是汤因比理论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它牵涉到文明研究中的几乎全部问题。汤因比不象斯宾格勒，他对这一问题不是采取神秘主义的非理性态度，而是力图对此做出理性的、经验的说明。汤因比认为，迄今为止世界历史上存在过二十一种社会或文明*，它们是：西方文明、拜占庭东正教文明、伊朗文明、阿拉伯文明、印度文明、中国文明、希腊文明、叙利亚文明、古代印度文明、古代中国文明、米诺斯文明、苏美尔文明、赫梯文明、巴比伦文明、埃及文明、安第斯文明、墨西哥文明、育加丹文明、马雅文明、俄罗斯东正教文明、朝鲜文明。这二十一个文明可以分为两类，一类直接是从原始社会里产生的，另一类是前者的晚辈或子代，汤因比将这一类文明称为亲属文明。前一类文明有六个，它们是：古代埃及、苏美尔、米诺斯、古代中国、马雅和安第斯文明。在分析文明起源时，汤因比首先把注意力放在这六个文明上。

汤因比认为，原始社会与文明社会不同，其中有一个根本的区别，即两种社会有完全不同的模仿行为和模仿的方向。在原始社会里，模仿的对象是

---

* 在别处，汤因比又提出有二十六种文明，即在这二十一种文明外，加上五个停滞的文明，它们是，玻里尼西亚文明、爱斯基摩文明、鄂图曼文明、斯巴达文明等。

老一辈，是已经死去的祖宗，在这种对过去进行模仿的社会里，传统习惯占着统治地位，社会是静止的。而在文明社会里，模仿的对象是富有创造精神的人物，这就打破了传统习惯的堡垒，社会是在变化着、生长着。那么，文明社会这种变化、生长的动力，换句话说，创造精神是从何而来的呢？近代以来，西方的历史学家们常常用种族和环境来解释现存人类社会文明发展的不平衡问题，汤因比否认这种貌似科学的传统说法，认为这两个理由之所以是错误的，是因为他们采用了研究物质科学、生物学、地质学的方法来研究事实上属于精神世界的问题。事实上，“无论种族或是环境，如果孤立地看，都不足以成为积极因素，在过去六千年中，它们都未足以刺激人类，使其脱离原始社会水平的静止状态，进而使其追求高深莫测的文明生活。无论如何，种族论或环境论都没有也不可能提供任何关于人类历史上（不仅在某些特定地点，而且在某些特定时间）发生的这一度伟大变革的线索。”①汤因比决心另辟蹊径，他从欧洲古老的神话《浮士德》以及古代其他一些伟大神话中得到了灵感和启示，领悟到“挑战和应战”这一对行为在文明起源上的重要意义。在《浮士德》中，上帝接受了魔鬼

① 《历史研究》，中译本，上册，第79页。

靡非斯特的挑战，让魔鬼来破坏他最精心的创作，以便在自己所创造的完美无缺的世界上有机会继续进行新的创造。正是这种“挑战和应战”激发了创造性的火花，在人类文明的起源上不也是这样吗？汤因比通过对六个第一代文明起源的分析，得出结论说，产生文明的环境不是安逸的，而是困难的。有各种各样的困难环境，这种困难环境对生活于其中的那部分人类构成了一种挑战，为了奋起应付这种挑战，人类表现出空前的努力，于是，一种文明就在这“挑战与应战”的过程中产生了。挑战与应战，——这就是文明起源的规律。比如，古代埃及文明就产生于人们对尼罗河三角洲自然环境挑战的成功应战——建设排水工程——中。再比如，古代中国文明不是起源于安逸的南方，而是起源于黄河流域。* 这里除了有沼泽、丛林和洪水的灾难外，还有更严酷的气候环境：夏季的酷热与冬季的严寒，这种状况构成的挑战，迫使人们发挥自己的创造才能起来应战，由此产生了古代中国文明。第一代文明彼此之间是没有什么亲属关系的。与第一代文明不同，亲属文明的起源虽然也遇到自然环境的某种挑战，但它们所遇到的主要挑战则是人为的挑战，

* 汤因比对中国文明起源的看法是不正确的，至少他不了解中国古代南方文化的发展成就。

即垂死文明的挣扎。摆脱这种垂死文明需要一种觉醒的精神力量，一旦这种精神力量成功地克服了垂死文明的压迫，一个新的“亲属”文明就诞生了。汤因比还指出，挑战和应战并不是无条件的，即有挑战就有成功的应战。要使挑战能激起成功的应战，挑战就必须“适度和中庸”，也就是说挑战既不能太大亦不能太小。挑战太大，超出了人们应战的能力，人就会被这种挑战压垮；反过来，挑战太小，则不足以刺激人们起来进行积极的应战。所以，规律应该是这样的：“足以发挥最大刺激能力的挑战是在中间的一个点上，这一点是在强度不足与强度过分的某一个地方”。①

人们可能会认为，一个文明诞生后，它的生长就是一件自然而然、再容易不过的事情。果真如此吗？汤因比否认这种看法，他认为，并非所有的文明在诞生和度过童年种种危难之后都能无例外地长大、成年。事实上，存在着一类停滞的文明，它们在诞生后由于没有力量控制它们周围的环境和生活方式，使得刚诞生的文明停滞了下来。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挑战过分严重，虽则这挑战也激起了应战，但应战者在努力之后，耗尽了自己的精力，无力再从事发展了。比如，北极的爱斯基摩人和草原

① 《历史研究》，中译本，上册，第179页。

上的游牧民族遇到的就是这样一幕。那么，文明是如何生长的呢？汤因比认为，在挑战和应战过程中，挑战不仅应刺激人们成功地进行应战，而且还应该刺激人们“积聚更大的力量继续前进一步：从一次成就走向另一次新的斗争，从解决一个问题走向提出另一个新问题”，也即挑战与应战应成为一种“重复的不断发生的有节奏的运动”①，在这一不断进行的过程中，文明生长起来。文明的生长有内外两个方面，从外部方面说，它表现为对环境控制力量的增强。环境分为自然的和人为的，控制环境的力量的增强也相应地表现为技术的进步或军事征服、地理扩张。从内部方面说，文明的生长则表现为这个文明有了日益增强和日益积累的内部精神自决能力和自我表现能力。但是这两个方面不是平行的、对称的。一个社会控制环境的力量增强后，外部环境的挑战就减轻了，但同时却产生了一个新的问题，出现了一个新的挑战：即如何控制这种不断增强的力量本身。一个社会若不能成功地回答这个挑战，那么，技术的进步，地理扩张，军事征服等控制外部环境力量的增强就不能证明文明本身是在生长。在历史上可以找到很多技术在进步，地理在扩张，而文明本身却停滞或衰落了的例证。既然技术进步与

① 《历史研究》，中译本，上册，第235页。

文明生长无关，军事征服往往是军国主义的结果，军国主义则是文明衰落的象征，那么，文明生长的标志是什么？动力何在？汤因比说，问一个过程是否就是文明生长过程，应看在一系列挑战与应战过程中，挑战与应战的场所是否发生了转移，是否从外部的物质环境或人为环境转移到了内部的人格，如果发生了这种转移，我们就可以说文明是在生长。比如，古埃及人为了征服尼罗河而高度组织起来，当河水听从了人类的旨意后，就出现了一个新的问题：埃及的统治者们和埃及人如何使用这个了不起的人力组织。这是个道义上的挑战：统治者将利用这组织来扮演普罗米修斯的角色呢？还是扮演宙斯的角色？埃及统治者选择了后者，他用这组织的力量建造了金字塔，从而导致了自身统治的垮台，并留下了千古骂名。这样，当外部挑战转移到内部时，古埃及文明就遭到了死亡的命运。汤因比接着说，“我们今天的局面和这个很有点类似，工业的挑战正从技术的范围转移到道义的范围”，西方文明正处在考验中①。文明生长不仅表明挑战与应战的场所发生了转移，而且也意味着社会内部自决能力的增强。因为随着外部挑战降到次要地位，挑战也越来越来自于成功的应战本身，一次成功就

① 《历史研究》，中译本，上册，第261页。

决定了下次挑战的方向，从而也预示了下一次应战的可能范围。这样，社会的发展，文明的进步，就不是漫无目标的，而是人们不断选择、努力、创造的结果，这是一个不断走向自决的过程。文明的发展是自决的，是文明的自我表现。

但是，在文明的生长过程中，动力并不来自社会整体，因为社会只是行动的场所，行动的来源则是个人。在挑战面前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被激发出创造性行为的，在一个社会中，文明生长的动力来自于赋有创造能力的少数人。对一个文明的生长来说，这少数人有双重的任务：退隐和复出。退隐的目的是为了他个人得到启示，是为了完善他自己；复出则是为了启发他的同类、同胞，复出是整个活动的实质和最终目的。汤因比指出，在人类历史上有很多这样的退隐和复出的故事。比如，世界性的宗教创始人都曾经历过这样的过程，耶稣、释迦牟尼、穆罕默德都是如此，在他们创立各自的宗教以前，都有一段明显地脱离社会生活的独自隐修时期，在这时期，他们领悟到某种重要的精神原则，于是复出去启发自己的同类。除了这种个人的退隐-复出活动外，在历史上还有做为“小社会”的退隐和复出，其意义与前者相同。所谓小社会是指社会里由少数人组成的团体，“这些小社会在他

们对社会的生长做出贡献以前，常常有一个显然脱离那个大社会一般生活的时期”。①例如，古希腊社会生长史第二阶段的雅典，西方社会生长史第二阶段的意大利和第三阶段的英格兰等。一个社会中，既然只有少数人具有创造能力，那么没有创造能力的大多数人就一定会落在少数人后面。要克服这种差距所可能引起的社会分裂，一方面，少数人要在复出后启发同类，提供创造性的规范；另一方面，这大多数人需积极地加以响应。要做到这一点，要想在整个社会规模上将那些没有创造能力的一般人提高到富有创造性的少数人的水平，只有利用人类最简单的本能——模仿的本能。但这时，人们模仿的对象不再是原始社会中的那种先辈和传统习惯，而是那些打破了常规、富有创造性的人物。少数人创造，多数人模仿，整个社会以此保持一致，并成功地对一系列挑战进行应战，这就是文明生长时的状况。

理解了文明的起源和生长，我们就能比较容易懂得文明衰落的原因了。汤因比认为，文明的生长不是必然的，只要应战敌不过挑战，文明随时可能在其生长的任何一点上衰落下来。而决不是像某些人所认为的那样，文明生长有固定的生命周期。显

① 《历史研究》，中译本，上册，第320页。

然，衰落的原因是精神的，而不是物质的，是内在的，而不是外在的。技术的衰退，外部敌人的入侵，环境的恶化等等，并不象通常认为的那样是文明衰落的原因，而往往是文明衰落的结果。衰落来自于一个社会对新挑战不再能进行成功的应战，它实质上可以归结为三点：一、少数创造者丧失了创造能力，仅仅变成了少数统治者；二、多数人相应地撤回了他们的支持与模仿；三、作为结果，社会整体失去了统一。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可以是多方面的。当少数创造者沉溺于自己以往的成就居功自傲，或希图以旧的曾经有效的方式去应付新的挑战时，当已获得的胜利冲昏了这少数人的头脑，引导他们去追求不适当的目的和目标时，这少数人实际上就丧失了自己的创造能力，和自己真正的使命疏远了，和生活脱离了。另一方面，在少数人还有创造性时，多数人对他们的模仿虽然是走向进步的不可替代的捷径，却也是一条充满危险的道路。因为模仿乃是一种“社会性的军事训练”①，多数人在模仿时往往只是“一知半解、三心二意”而非“心甘情愿”地追随少数人而已②。这种模仿存在一个弱点，它必然导致社会生活和行动的机械化，少数

① 《历史研究》，中译本，中册，第41页。

② 《当代西方史学流派文选》，第126页。

人在这种日益机械化的模仿面前，不论是消极地顺应它，还是用强力去企图矫正它，都会面临失败。其结果则是社会在新挑战面前丧失应战能力。丧失应战能力也即丧失自决能力，于是文明就开始走向衰落。

文明衰落之后，必然的命运并不一定是解体，另一条出路是僵化，如古代埃及文明和中国文明（不是古代中国、而是与它有亲子关系的第二代中国文明）就是这样。汤因比说，中国文明在第九世纪唐帝国崩溃以后就出现了正常的解体过程，先是一个混乱时期，接着是一个统一国家，以后蒙古人的入侵，明朝的建立，使社会没有通过统一进入间歇时期，而是在一种僵化状态中存在着。随着衰落而来的是“混乱苦难时期”，挑战出现了，但没有遇到应战，同一个挑战反复出现，结果却是一样。这种反复挑战和一再地失败就是文明解体的朕兆。① 文明解体有一突出的特征，就是社会明显地分裂为三个部分：一、少数统治者。这是由原来的少数创造者蜕变成的，这少数人丧失了自己的创造能力后，却又不愿放弃自己优越的的领导地位。既然他们已完全丧失了对多数人的精神感召力量，所以这时只能凭借武力来维护他们已不应占有的地

① 《当代西方史学流派文选》，第127页。

位，于是他们就创立了一个以暴力来维护权力的机器——统一国家。二、内部无产者。当统治者以压服的办法来代替以往争取大多数人归心的示范领导，这种暴虐行为使群众离心离德，于是他们开始退出社会，成为内部无产者。所谓无产者，在汤因比的体系中是从心理上而非经济上加以定义的，指的是“那些自己觉得他们的身体虽然在那个社会之内而精神上不再属于那个社会的人们。”① 内部无产者在这一时期逐渐创立起一个统一的教会与少数统治者创立的统一国家相抗衡。三、外部无产者。当文明在生长时，它能影响自己周围的蛮族，使他们也模仿和效法生长着的文明，但当文明衰落时，这些生活在文明周围，一向和平地留在它的文化影响范围之内的各蛮族，就变得充满敌意，他们组成为外部无产者。这里无产者的定义与上述的完全一样。于是一道固定的军事边界线代替了曾经是不明确的边疆。外部无产者成了时时威胁解体中的文明的蛮族军事集团。当然，上述分裂还只是社会体的分裂，在解体阶段，更为严重的分裂是灵魂的分裂，这是社会表面呈现的所有分裂的基础。人们采取不同的行为方式来应付腐朽时代的生活考验：有人放纵，有人克制，有随波逐流者，也有殉道者，对过

① 《历史研究》，中译本，下册，第386页。

去的迷恋，对未来的企盼，流离感和罪恶感、杂乱感和划一感。所有这一切，交织在一起，都找不到出路。社会无可挽回地走向崩溃。虽然这解体的过程还有着“动乱与集合”的内部节奏，却无论如何奏不出新时代的序曲来了。

旧文明的解体，并不意味着一切结束了。文明生命行程的这一幕并不是为了向人们显示斯宾格勒所断言的那种宿命，而是应该向人们展示人类历史本身的生生不已。汤因比分别讨论了统一国家，统一教会和蛮族军事集团，从这里找到了新旧文明嬗递代兴的契机。

统一国家，常被人们视为历史发展的目的，视为不朽，或至少视为历史的一种进步，但实际上，这似乎很显赫的统一国家是少数统治者在垂死文明的解体社会中的最后手段，他们的主观意图是想保持住社会逐渐减退的活力，以保存自身，因为他们的命运就是维系在这一社会的命运上的。统一国家在文明史上的这种消极地位及本身所具有的消极特征，决定了它不可能长期存在，也决定了它不是文明发展的目的。不过，统一国家的这种消极特征表面上是不明显的，虽则它是社会解体的产物，但它同时又企图阻止这种解体，而通过统一，它暂时制止了文明衰落后的社会动乱，人们以此感激它，希

望它长存。尽管这样，“事实上它只代表了社会解体过程中的一个阶段，而且如果除此还有什么重要意义的话，那就只能是作为达到它本身以外的某些目的的手段了。”① 经验研究证明，统一国家是为内部无产者创立高级宗教服务的一种手段。统一国家的建立为创立和传播高级宗教提供了种种便利，这包括：地理上和社会关系上的可沟通性，和平的心理，帝国的组织和制度，诸如交通系统，卫戍站和殖民地，行省和首都，官方的、统一的语言文字、法律、历法、度量衡、货币，常备军和文官制以及公民权等等。

那么，作为统一国家主要受惠者的教会，在文明的兴衰史上有什么意义呢？传统上，人们往往站在统一帝国的立场上，把统一教会当作是“造成统一国家衰落的毒瘤”。持这种观点的人很多，包括一些著名的学者，如吉本在《罗马帝国衰亡史》、弗雷泽在《金枝》中都是这样来谴责教会的。这种观点对教会的一个基本批评是，宗教是反社会的，它使人放弃社会责任，从而导致社会解体。汤因比否认这种似是而非的论点，坚持认为教会不但不减弱信徒的社会责任感，反而会增强这种责任感，显然，一个真心信奉上帝、爱上帝的人，是不会不爱自己的同胞、同类的，因此教会不是毒瘤。那教会

① 《历史研究》，中译本，下册，第8页。

是什么呢？汤因比说教会是新旧文明之间的“蛹体”。他说：“统一教会之所以存在的理由是因为：在一种人类文明崩溃和另一种文明产生以前的这一危险的间歇时期，它保存了宝贵的生命胚种，因而使活着的文明种籽继续递嬗下去。因此，教会是文明的繁殖系统的一个部分，充当从蝴蝶到蝴蝶之间的卵、幼虫和蛹体。”① 教会是使新旧两代文明在嬗递代兴过程中发生亲子关系的媒介，这就是汤因比对教会的一个看法。不仅如此，汤因比认为，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来看问题的话，那就可能是这样的：教会是更高一级的社会品种，是历史的主角，而文明只是带动宗教前进的车轮。汤因比认为，从人类历史来看，人类是不断地从小型社会走向世界大同的，但要真正向这一目标迈进，没有高级宗教的参加是不行的。因为从人的本性来讲，“人天生地适合于小型社会”②，人本能地只会有对自己亲属、邻居的爱，而不可能自然地产生对人类的普遍的爱，而没有后者，世界大同就是不可能实现的。对人类的普遍的爱是通过宗教培养出来的感情，而只有通过神，宗教才能引导人去爱人类。所以，“如果没有神的参加，就不能有人类的统

① 《历史研究》，中译本，下册，第98页。

② 《历史研究》，中译本，下册，第128页。

一"①。近代以来，人们崇仰科学，排斥宗教，认为是科学带来了近代西方的繁荣和进步，并相信这种幸福将永远延续下去。汤因比警告说："须知近在目前的不是'应许之地'，而是一片'荒原'"。②汤因比认为，对于人的精神生活来说，科学并不能提供很多的东西。他说：

> 事实上，科学本身所具有的对人以外的自然的支配力，对于人来说，远远比不上人对自己、对同胞、对神的关系那样重要。如果人类以前的祖先并不具有使自己成为社会动物的天赋能力，如果原始人并不充分利用这个心灵上的特点掌握群居的基础——为了完成共同协作和越来越多的工作所必不可少的知识上的条件，那么，人的智力永远不会获得使人成为万物之灵的机会。人为的知识和技术的功绩，对于人的重要性并不在于功绩本身，而仅仅在于这些功绩能迫使人面迎道德问题并且努力解决道德问题；如果不是这样，他就会设法继续躲避这些问题。近代科学曾提出了异常重要的道德问题，但是它不曾、而且也无

①② 《历史研究》，中译本，下册第129、126页。

力促使这些问题获得解决。人必须回答的最重要的问题都是科学说不出所以然的问题。①

在汤因比看来，科学和宗教分属不同的领域，对人类来说，各有其不同的作用，两者不可偏废。

宗教必须准备让位给科学，凡是属于知识范围以内的，包括传统上属于宗教范围以内的事，只要科学能成功地建立一门学科，宗教就应该让位。宗教对各知识领域的传统支配是一个历史的偶然事实，就它放弃对这些领域的支配权而论，它还是有所得的，因为管理这些知识领域，根本不是它的本分，而它的本分却是引导人们达到崇拜神、和神交往的真正目标。②

宗教引导人们去认识神、崇拜神，不仅帮助人去培养泛爱的情感，而且帮助人去克服文明社会结构中的唯一弱点，即模仿的危险。前面已经说过，简单的模仿导致机械化的结果，使文明失去活力，社会产生分裂。但在一个崇拜神的社会里，模仿的危险将通过模仿的转变来消除，这个转变是“从模仿世俗文

① 《历史研究》，中译本，下册，第120页。
② 《历史研究》，中译本，下册，第121页。

明的短命的领导人转变为模仿人类一切创造性根源——上帝。”模仿上帝，不象模仿俗人（即使他是个创造性人物），它不会使人感到失望，因此也就不会造成“强暴而难以驾驭的无产者与少数统治者之间精神上的疏远。”①

解体中的文明与周围的蛮族之间有一条互相隔离的军事界线，这条界线是一道拦洪坝，而蛮族军事集团则是一座蓄水库。边境以外的蛮族愈来愈多地学会了他们所对抗的文明的军事技术，帝国本身则愈来愈虚弱。这样，这条军事界线或者说拦洪坝所遭到的压力也越来越大。文明的监护人自己逐渐不得不雇用那些蛮族来保卫边界，这种收罗蛮族来防范其同族的政策是一种自杀政策，最终会对帝国本身酿成灾祸，雇佣兵们最后必然会转向雇主进攻。军事界线的崩溃恰如拦洪坝决口，结束了蛮族与垂死文明对峙的“英雄时代”，全社会一下子堕入了黑暗时代。旧文明彻底灭亡了，蛮族军事集团在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后也与它同归于尽了。“蛮族的脚刚一跨过陷落的军事界线，魔鬼就占有了蛮族的灵魂”②，道德和纪律荡然无存，大规模的暴行不仅把社会推入黑暗苦难的深渊，也使胜利

① 《历史研究》，中译本，下册，第131页。
② 《历史研究》，中译本，下册，第164页。

了的蛮族本身遭到毁灭。黑暗时代是一个大间歇时期，在这一时期，内部无产者创立的统一教会成为孕育新文明的母胎，引起新社会诞生的挑战则是旧社会的阶级战争，统一教会的创造力足以战胜这一挑战，于是挑战和应战过程又重新开始。旧文明的废墟将成为新社会的故乡。文明的兴亡交替并不是历史循环论的证明，“当文明兴起而衰落，并在衰落中导致了另一个文明兴起的时候，有一些比它们更高级的事业可能一直在前进着。而根据神的意图，从文明衰落所造成的痛苦中所学得的知识可能是进步的最有效的工具。”① 汤因比并不认为自己关于文明兴衰的理论是历史循环论，在他看来，文明的兴衰只不过是世界、人类走向大同的一个个插曲罢了。

以上就是汤因比《历史研究》一书基本观点的一个概要。汤因比之所以去研究这样一个宏观历史问题，或者说历史哲学问题，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接受了现实的挑战。这种研究所要回答的归根到底是西方文明的命运问题。在汤因比看来，迄今为止存在过的二十一个文明，除了西方文明以外，余下的文明不是已经完全死亡了，就是已经衰落了。西方文明是否也将遭到同样的命运呢？汤因比明确表示没有理由因为所有其它文明都已经毁灭或正在毁

① 《现代西方历史哲学译文集》，第181页。

灭，就认为西方文明也一定要这样，“维多利亚式的”乐观主义和“斯宾格勒式的”悲观主义，做为证据来说都是同样没有说服力的。迄今为止，西方文明在同战争、军国主义这类疾病做斗争中并未成功，但它在其他方面都取得了空前的成功，如废除奴隶制度，民主和教育的发展等，在对付西方世界内部无产者问题上，也取得了某些显著成绩。另外，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人类控制自然界的能力以及由这种能力所带来的社会变革的不断加速，也是过去的文明历史所不可比拟的。只要西方社会能从以往文明的历史中吸取经验教训，并在未来的挑战面前表现出足够的明智，西方就有可能避免其他文明所遭到的命运。汤因比说：

> 我们虽然分析文明的不断的周期性的运动，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这个过程本身是具有循环性的。……人类并不是永远缚在轮子上的伊克休翁，也不是永远推着巨石上山的西西弗斯，永远往上推，而又无能为力地看着它滚下来。对于我们西方文明的子女来说，这正是对于我们的鼓励之音，我们今天独自挣扎向前，在我们的周围全是一些垂死的文明了。说不定死神把我们

> 的文明也会置之于绝路。但是我们并没有面对任何不可避免的必然。死去的那些文明并不是命中注定必死的，也不是天生要死的，所以我们的文明也不是必须与其它多数文明共命运的。虽然据我们所知，有十六个文明已经死了，另有九个已经在死亡的边缘，我们的这个第二十六个文明却不一定非服从命运的安排和统计数字的盲目计算不可。创造性的神火还在我们身上暗暗地燃烧，如果我们托天之福能够把它点燃起来，那么天上的所有星宿也不能阻挠我们实现人类努力的目标。①

要做到这一点，历史学家就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来帮助人们认识过去。汤因比说："人类的生活是生活在时间的深度上的，现在的行动的发生不仅在预示将来，而且也是根据了过去。假如你随意忽视过去，不去思考甚或损伤过去，那么你就妨碍自己在现去去采取有理智的行动。"②

正如我们在前面看到的，汤因比非常强调精神道德力量在文明历史中的重要作用。他之所以推崇

① 《历史研究》，中译本，中册，第14—15页。
② 《当代西方史学流派文选》，第142页。

宗教，正是从这点出发的，而这又是他对西方现实批判认识的产物。他反对过分抬高科学的做法，反对科学万能的迷信，在这一点上，他与斯宾格勒的态度很一致。世界大战不就是人类运用现代科学所进行的空前野蛮的自相残杀吗？汤因比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他的约半数的中学和大学同学均死于战场，这场悲剧"对我产生了长远的影响"，"我在一九一九年和一九四六年两次参加巴黎和会，每次我都看到，事情真是搞得再糟也没有了，世界又再次回到了纷扰和混乱之中。这一类的事会使人对人类事务采取一种宗教态度，会使人……相信，任何一类物质上的成功都是虚荣、幻觉和人类本性的叛卖。"① 但是汤因比又与斯宾格勒不同，斯宾格勒对西方唯科学主义的批判使他完全走到了非理性的立场上，甚至将理性本身也否定掉了。他否认人的理智有认识和选择现实及未来的能力，否认人类有自决能力。汤因比则在批评唯科学主义的时候，强调人的理智、良心，也即人的道德理性的重要性，认为只要能唤起这种精神自觉，就有可能对人类物质上、科学上的成就加以成功的控制，帮助人类避免以往文明史上的悲剧，胜利地走向未来。汤因比说过这样一段话：

① 《当代西方史学流派文选》，第140页。

> 也许在每一个时代里，都有一个道义上的问题成为关系这个社会未来命运的挑战；但是不管怎样，在我们今天社会面前却是一种道义上的挑战，而不是一种物质上的挑战。①

正是这种对物质成就的贬抑和对精神道德力量的推崇，以及对西方现实、未来的忧虑，常常使汤因比把眼光转向以往文明的经验，尤其是东方、中国文明的经验。他说："如果说，廿一世纪是东亚人的世纪，并非惊人之言。"②尽管汤因比在《历史研究》中把中国文明称之为僵化的文明，他对中国文明的某些成就还是十分赞赏，并对中国在未来世纪中的作用寄予了很大的希望。在一次和日本一位佛学家的谈话中，汤因比这样说：

> 可以确信，未来世界将不是由西方或西方化的国家，而是由中国来统一。同样可以确信，关于中国在未来的政治作用的预兆是目前中国惊人的世界威望的原因。在将道二十二个世纪中，除了偶然的例

① 《历史研究》，中译本，上册，第260页。

② 汤因比编：《半个世界——中国和日本的历史及文化》，中译本，台湾枫城出版社，民国六十八年版，扉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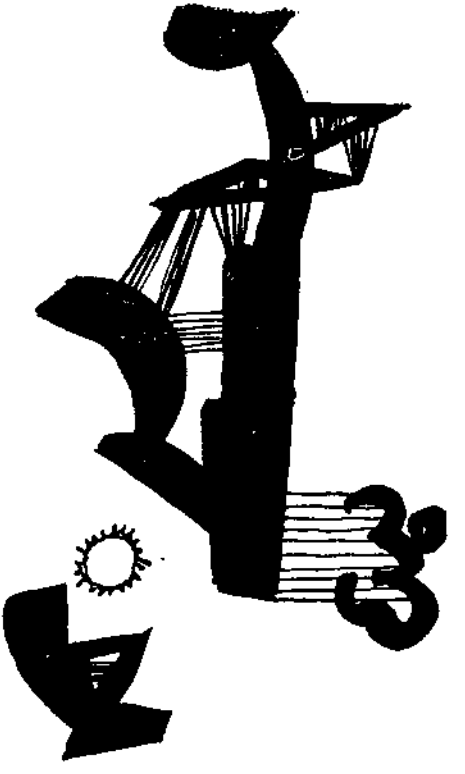
外，一个统一的中国政府一直将千百万人凝聚为一个政治实体，更为重要的是，统一的中国做为一个中世纪的王国，它政治上的宗主地位一直为它周围的藩国所承认，而它的文化影响则辐射到更远的地方。事实上，自公元前三世纪以来的大多数时间里，中国一直是半个地球的引力中心。在最近的五百年里，全世界除在政治方面外，已被西方编织成一个整体，或许今后中国的使命就是给予全世界，而不是半个地球以政治上的统一和持久和平。①

和《西方的没落》一样，《历史研究》也在西方思想界产生了极大的反响，它给人以深刻的启示，也招致无数的批评。这毫不奇怪，试图建立包罗万象体系的任何努力都不可能做得十全十美，无懈可击。从细节上对这种理论加以批评是很容易的，却并不恰当。尽管汤因比一直认为自己是用经验实证的方法在从事研究，事实上，他得出的结论是思辨的，这种结论并不十分理会经验细节的实证检验。另一方面，若要从宏观上去批评这种理论的

① The Toynbee-Ikeda Dialogue Man Himself Must Choose, Kodan sha Inter national Ltd, 1976, P288.

话，除非自己去构筑这样一个理论体系，就象汤因比对斯宾格勒所做的那样，或至少自己也有这样一个理论假设，否则，就很难同它在对等的或平等的立场上对话。因为，这种批评不是是非对错的评判，而是思辩能力的交锋，它的意义不在于比输赢、决胜负，而是诉诸社会，特别是思想界、知识界来关注它提出的问题，汲取它的某些合理的价值成分。汤因比和斯宾格勒的成功正是在于这一点。当然，这种思辩性的理论并不是随时都受欢迎的，也并不是随时都能提得出这种石破天惊的大理论来的，黑格尔以后，历史哲学的长期沉默就是证明。事实上，这种理论往往只是特定时代、特定情境的产物，它抓住了此时此地人们的想象，回答了他们感到焦虑的迫切问题，于是就令人注目地凸显出来。一旦事过境迁，人们也就不再那么注意它了，对于一般人来说，他们有新的问题要去注意，对于学术界的研究者来说，除上述原因外，这种理论也不能提供深入研究的基点或规范，所以它遭到冷落就很可理解了。战后世界的相对稳定和迅速发展，使西方人的注意力转移到了其它方面，学术界把斯宾格勒与汤因比的理论称为形而上的历史(Meta history)、思辩的历史哲学，这种说法在西方学术界多少有点贬意，就象十九世纪后期人们称呼历史哲学一样。

人们既不在细节上批评它，也不同它做正面的理论上的争辩，只是不理会它、冷落它。尽管如此，这种理论还是在当代西方历史理论中，在当代西方思想史上留下了宝贵的一页，它们提出的许多问题至今仍有认真思考的价值。而且，有谁敢断言，这种思辨的历史哲学没有再度复兴的可能呢？



第三章
分析的、批判的
历史哲学

一九五一年，W·H·沃尔什在《历史哲学导论》一书中，按照历史一词的两层含义，第一次将历史哲学分为相应的两个部分：思辨的历史哲学和分析的、批判的历史哲学。历史哲学出现这种区分实际上是当代才出现的一个现象。在二十世纪以前，历史哲学所探讨的问题大致是相同的，都是力图用哲学的思辨来把握宏观的历史进程，回答人怎样创造历史这样一个问题，分析的、批判的历史哲学则基本上是二十世纪的产物，它所探讨和研究的问题与传统的思辨的历史哲学不同，它要回答的是人怎样写历史这样一个问题，本章所要介绍的就是分析的、批判的历史哲学。

3-1 历史是什么?

任何一门学科都产生于一个基本的问题。分析的、批判的历史哲学的基本问题是从实证主义史学中产生的。

十九世纪的实证主义史学将历史当做一门科学，一门和自然科学一样的精确科学。这既是史学上的一大进步，却又留下了一个重要问题：历史是否真的就是一门不折不扣的科学？这看上去是一个学究式的问题，实际上却包含着深刻的哲理和丰富的现实内容。后来人们发现，从这个问题引申开去，竟有一个广阔的未经认真开发的学术领域，这个领域就是分析的、批判的历史哲学。

狄尔泰（W·Dilthey，1833—1911）首先提出了这个问题。狄尔泰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德国哲学家，他一生的学术兴趣主要集中在人文科学方面，他以人文科学领域的康德自励，力图解决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之间的矛盾和分裂。美国哲学百科全书认为他对哲学的最重要贡献是他对社会科学或人类研究，特别是对历史认识论的分析。

一八八三年，狄尔泰发表了他的重要著作，

《精神科学引论》。在这本书中他强调指出，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不同，自然科学研究的是物质，而人文科学研究的是人的精神；物质对研究者来说是外部的、客观的东西，而精神作为研究对象则是与研究主体同一的，因为任何研究总是一种精神活动。物理客体只是作为现象被我们所知，而精神现象则是可以洞察其内在奥秘的真正现实；自然科学寻求的是客观的因果解释，而人文科学研究则首先要求主观的体验。人文科学研究的是人，研究人就离不开人的历史，因为“人是什么，只有人的历史才会说清楚”①，一部人类史实际上就是一部精神史。研究人和人的历史，靠单纯搜集、考订史料，客观地再现史实，象实证主义史学所主张的那样，是不行的。狄尔泰强调人文科学研究中主观理解和体验的重要性，他说：“历史世界的第一性的要素就是体验，而主体在体验中，同自己的环境处于积极的、生动的相互作用之中。这种环境作用于主体，同时也受到主体的作用。”②狄尔泰要求历史学家生活在自己的客体里，或者说，使客体生活在自身里，而理解和体验就是进入历史人事的精神生

① 《当代西方史学流派文选》，第9页。

② 〔苏〕康恩：《哲学唯心主义与资产阶级历史思想的危机》，中译本，三联书店，1961年，第108页。

活深处。针对实证主义史学方法的简单贫乏，狄尔泰提出了人文科学研究的解释学的方法。这种方法把研究活动、研究过程看作是主体（解释者）与客体（被解释者）相互之间不断进行的一场对话，目的是通过这种对话使研究者直观地体验和把握对象的内在精神。

狄尔泰最早讨论了历史学的性质、历史认识的方法等问题。虽然他的理论在当时并未受到很大的注意，产生很大的影响，但却不断地启发着后人。他提出的许多问题都是当代分析的、批判的历史哲学所关心和讨论的基本问题。继狄尔泰之后，德国另外两个哲学家文德尔班、李凯尔特也在世纪之交提出了基本相同的问题，并做了进一步的探讨。

文德尔班(W · Windelband, 1848—1915)是十九世纪后期德国新康德主义哲学家，弗莱堡学派的创始人。文德尔班力主将文化——历史科学同自然科学区分开来，强调两者的根本不同，自然科学的方法不能用来研究人的历史。文德尔班认为自然科学与文化——历史科学的区分不在研究对象的不同，而在研究目的、研究方法及研究结果的不同。自然科学研究一般规律，历史科学研究事件。“规律与事件同是我们世界观中最后的不可通约数，永远

处在对峙状态中。”① 自然科学是规律科学，历史科学是事件科学，前者制定规律，后者描述特征；前者讲的是永远如此的东西，后者讲一度如此的东西；前者追求的是规律，后者追求的是形态。规律的知识具有外在的研究价值，而历史的知识则具有内在的认识价值。“人是有历史的动物。人的文化生活是一种世代相承愈积愈厚的历史联系：谁要想参加到这个联系中去通力协作，就必须对它的发展有所了解。”② 历史学的价值在于帮助人们认识和了解历史，文德尔班说：

> 历史学都有一项不可转让的形而上学权利，它的第一个伟大而坚强的感觉，就是要为人类的记忆保存这个在一去不复返的现实中成为过去的东西。③

李凯尔特（Heinrich Rickert，1863—1936）是文德尔班的弟子，历史哲学理论在他的哲学中占主要地位，他的几本主要著作都是讨论历史哲学理论的，他提出了较完整的历史哲学理论，对当时和以后的讨论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李凯尔特继承了

①② 洪谦主编：《当代西方资产阶级哲学著作选辑》，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67、71页。

③ 洪谦主编：《当代西方资产阶级哲学著作选辑》，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64页。

其老师的观点，将自然科学和文化——历史科学做了严格的区分。他认为，自然领域内只有一般的东西，而文化领域内只有个别的东西，因此，自然科学只能采取普遍化的方法，以形成普遍的概念或规律，历史——文化科学则只能采用个别化的方法，其目的不是形成普遍的概念成规律，而是描述一次性的、特殊的和个别的事物和现象。区别自然现象和文化现象的标准是价值，自然现象肯定没有价值，无需从价值观点加以考察，文化现象则必定具有价值，必须从价值的观点加以考察。不仅如此，对历史来说，价值也是历史学家选择史料的一个标准，李凯尔特说："没有价值，就没有任何历史科学。"① 任何历史事实只有当它与价值存在联系时，才是本质的、有意义的，否则就是非本质的、无意义的。历史学家遵循这种"价值联系原则"来确定哪些历史事件是本质的、有意义的，哪些是非本质的、无意义的。这与是非好坏的评价不同，不能混淆。李凯尔特说过一句与兰克的名言几乎是针锋相对的话：

> 历史学家不仅应当为了现在和将来而把过去连接起来，而且应该真正对过去作

① 转引自杜任之主编：《现代西方著名哲学家述评》，三联书店，1980年，第24页。

出评价，也就是说，要从自己的理想观点出发来估量过去的价值。①

狄尔泰等人都是德国哲学家，他们对历史——文化科学（也即人文科学）所做的哲学思考其影响并未超出德国思想界。* 事实上，他们所要批评的与其说是实证主义的史观，毋宁说是知识界、思想界更为普遍存在的实证主义、科学主义倾向。这种倾向要求一切知识部门都向自然科学看齐，一切研究都应运用自然科学那种经验实证的方法，采取自然科学家那种纯客观主义的、不偏不倚的中立态度。这种倾向不仅影响了人文科学的研究，更为重要的是它导致了对现实人生的忽视。人文科学研究者象自然科学家那样钻到越来越狭窄的研究课题中去追求所谓确凿可靠的细节知识，却不去回答或回答不了重大而迫切的现实人生问题。十九世纪后期，科学的发展已根本动摇了西方人传统的基督教信仰，却没有找到新的价值观来及时填补西方人精神上的巨大空白。实证主义、科学主义忽视这种问题，更

① 转引自刘放桐：《现代西方哲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30页。

* 十九世纪后期德国思想界率先起来批评实证主义思潮，这一现象很值得研究。英国历史学家卡尔说："德国是个干了许多事情，搅扰了十九世纪自由主义的称心如意的统治地位的国家。"（《历史是什么？》，中译本，第17页。）

助长了西方精神生活的危机。狄尔泰等人的批评和探讨正是这种背景下的产物。正如研究者所指出的："狄尔泰对时代的物质主义和对精神生活缺乏兴趣的状况深感忧虑。因此他为自己确定的任务就是恢复先前那种（即基督教信仰——引者）对深刻的人生问题的兴趣"。① 狄尔泰等人的批评和探讨最后都集中到历史领域，这是颇耐人寻味的。在西方，人文科学一般指的是哲学、历史、古典语言（希腊文和拉丁文）、修辞等学科，它与近代产生的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人类学等学科不同，这些学科在西方一般称为社会科学。除了研究对象的不同外，社会科学在研究方法和研究规范上颇接近于近代兴起的自然科学，它主要运用经验实证的方法对社会现象、人文现象做分门别类的研究，正因为这样，十九世纪实证主义和科学化的倾向对它并不成为什么问题。人文科学则不同了，传统的人文科学象历史、哲学都是力图从总体上把握人和人文现象，过分追求所谓的科学，完全效法自然科学去做分门别类和经验实证的研究，就会使它丧失自己原来的功能和价值。特别是在十九世纪后期这种现实

① Ilsen Bulhof: "Wilhelm Dilthey: a Hermeneutic Approach to the Study of History and Culture", Martinus Nijhoff Publisher, 1980 The Hague, P16.

背景下，这样片面追随科学、仿效科学造成的后果就更为严重。批评实证主义倾向，强调人文科学不能等同于自然科学，最后都集中到历史领域，那是因为只有在历史领域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关系问题才变得特别尖锐。① 历史既不象传统哲学那样玄虚，也不象古典语言修辞那样过时，它的特殊性在于，它是通过具体的过去来体现和把握人类精神生活的一般，这种历史的和综合的特点又把它同社会科学各学科区别开来。传统的思辨哲学固然抵挡不住科学的批评和冲击，历史则有充分的理由在这种批评和冲击下保持自己的个性。正因为这样，从历史出发来回答实证主义思潮，批评片面追求科学化的倾向，以强调人文科学的特殊性就是十分合乎逻辑的了。当然，由哲学家们发动的这场争取历史第二次独立的"战争"，决不仅仅是为了历史本身，而是为了维护整个人文科学的独立地位。狄尔泰等人的批评归根到底可以归结为这样一个问题：历史或人文科学究竟是什么？能否与自然科学混为一谈？他们从历史的对象、性质、研究方法和目的等各方面对这个问题做了哲学上的探讨，虽然他们的努力并

① Covlo Antoni: From History to Sociology, Translated by H.V. White, Detroit-Wayne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59, Introduction.

未扭转当时的普遍倾向，却给后人留下了许多重要的思想资料。

3-2 克罗齐："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

二十世纪初，西方社会所经历的深刻震荡，引起了思想观念的巨变，人们开始普遍怀疑起十九世纪的许多信念，新的历史哲学——分析的和批判的历史哲学正是在这种大背景下产生的。意大利哲学家克罗齐（BenedettoCroce，1866—1952）首先系统地提出了他的历史哲学理论，为当代分析的、批判的历史哲学奠定了一个基础。

克罗齐是当代意大利著名的哲学家、史学家、文学评论家和政论家，同时也是一个出色的社会活动家。西方哲学界对他有这样的评论："任何一个二十世纪的哲学家都没有象他这样，把刻板的学识与知识的活用结合在一起，而同时能在大学的门外度过长期的多产的生活。"①

克罗齐是新黑格尔主义哲学家，"他比二十世纪任何一个杰出的思想家都更接近于黑格尔思想的精神。"②他继承了黑格尔的哲学，但又认为黑格尔

①② M·怀特：《分析的时代》，中译本，商务印书馆，第87页。

的哲学不彻底，还存在严重的二元论残余，必须加以扬弃。我们知道，西方近代哲学史上一个争论不休的问题就是心物，或者说精神（思维）与物质（存在）的关系问题。克罗齐认为，无论我们认为两者之中何者为第一性，都是把两者看作为两个基本的独立的范畴，这是一种二元论的观点。在黑格尔那里，这个二元论问题是通过绝对精神的辩证发展得到解决的，尽管如此，黑格尔哲学的出发点还是承认主体与客体的二元对立，只是借助了辩证法，通过精神的历史运动，才最后扬弃了二元对立，达到了主客体的统一。克罗齐认为，黑格尔对辩证法的求助说明他“经常被二元论所纠缠，坚强地挣扎着来反抗，但摆脱不出来。”① 要克服二元论，哲学家就必须把现实看做是一个生动完全的整体从精神上来加以把握，既不能象传统哲学那样将主客分离开来、对立起来，也不能象自然科学那样对现实世界做分门别类，割裂静止的研究。生动完整的现实应该也只能从精神总体上加以把握，它也只在人的精神活动中显现，而哲学就是关于精神活动的科学。克罗齐说：“精神就是整个现象，……除精神以外没有其它现实，除精神以外没有其他哲

① 克罗齐：《黑格尔哲学中的活东西和死东西》，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59年，第113页。

学。”① 另一方面，既然精神就是整个现实，哲学思考的起点和对象就不是外在的物，而是内在的精神活动。克罗齐认为，精神活动具有两种形式：理论的和实践的。理论的精神活动又分为直觉的和逻辑的，实践的精神活动则又分为经济的和伦理的。这四种精神活动对应于四个基本的范畴：美、真、益、善，研究它们的学科分别是美学、逻辑学、经济学和伦理学。那么，历史在克罗齐的哲学体系中占有什么地位呢？克罗齐称自己的哲学是“绝对历史主义”，在他看来，精神活动的整体是哲学，而其过程就是历史。他说：

> 精神就是世界，它是一种发展着的精神，……精神的自我意识就是哲学，哲学就是它的历史，或者说，历史就是它的哲学，二者在本质上是同一的，……②

这里，我们碰到了克罗齐历史理论的一个基本观点：历史即哲学。

如前所述，克罗齐认为世界是一完全的整体，又是一生生不已的过程，对于这一整体，我们只能从精神上加以把握，而对这一过程，我们又必须历

① 朴任之主编：《现代西方著名哲学家述评》，三联书店，1980年，第55页。

② 克罗齐：《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第249页。

史地来看待。精神活动就是对这生生不已，至大无外的现实加以思考和把握，这种活动必然取判断的形式。显然，这判断既是一种哲学的思考，亦是一种历史的判断。克罗齐说：

> 说历史是历史的判断还不够，必须补充说，每个判断都是历史的判断，或简言之，就是历史。如果说判断是主词和宾词的联系，那么主词或事件，不管在判断的是什么，总是一件历史事实，一个变化，一个进行中的过程，因为没有不变动的事实，在现实世界中也看不到这样的事物。……历史的判断不是知识的一种，而是知识本身；历史的判断是完全铺满和穷尽知识领域的形态，而再也没有其他东西占此领域。①

单是这样抽象的讨论好象是在做概念游戏，无法讲清楚克罗齐的这一基本观点，我们还必须结合历史思考的具体过程从另一方面来加以讨论。克罗齐主张历史即哲学，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从反对实证主义立场出发的。克罗齐认为，二元论的一个基本假设是心物、主体与客体的分离与对立，客体（物）

① 怀特：《分析的时代》，第42页。

独立存在，然后主体（心）对其加以认识。而一般人的历史观也是建筑在这种心物二元论之上的，这种历史观认为，历史事实早已独立存在，历史学家根据有关材料来说明这史实，找出其因果，解释其意义，这就是历史。历史通过史实显示意义，史实是客观存在，与史学家无关，不管有无历史学家，它总在那里；意义则是历史学家的发现，没有历史学家去发现它，它就被埋没了。我们看到，这实际上就是实证主义的史观。克罗齐反对这种常识的史观。他认为，现实世界的演变过程就是历史。我们怎样去认识它思考它呢？正如我们刚才说的，精神活动必须取判断的形式。要了解历史的性质，我们就必须先了解这判断的性质。比如说，“拿破仑是欧洲的征服者”这句话就是关于历史的一个判断。常识史观的错误——也即二元论的错误——就在于认为这种判断仅是一个个别事实的陈述。实际上，任何判断都是个别事实与普遍意义的结合，历史判断也不例外。

> 历史就是思想，因而是关于普遍的思想，是关于具体的普遍的思想，所以总是用一种特殊方式加以规定的。没有一件事实，不管多么微小，能不被认为（被表现

> 为和被形容为）普遍的。历史在其最简单的形式上——即，在其基本形式上——是用判断，即个别与普遍的不可分割的综合来表述的。①

克罗齐认为，所有判断的主词都是直觉所见的个别形象，一切判断的宾词都是以概念所表示的普遍意义或道理。就拿上述那句话来说，“拿破仑”是主词，代表一个个别形象，“欧洲的征服者”是宾词，是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概念。我们不去认识或思考历史则已，一旦我们要认识或思考历史，就必须将一个别史实例如拿破仑同一普遍概念，如欧洲的征服者，欧洲的解放者，或专制暴君等等结合在一起想，否则，我们永远也无法认识历史，或者说，历史就根本不存在。正象我们翻来覆去唠叨“拿破仑是拿破仑”并不能告诉我们关于拿破仑这一历史人物的任何情况一样。通过对历史判断的这样分析，克罗齐向我们揭示了这样一个道理，史实并非先已独立存在，经过人的思考，才显现出意义的，史实及其意义是在思想或精神活动中同时产生的，史实与意义结合在一起才构成一个历史判断。这判断不是关于个别事实的客观报导，而是思想活动的

① 克罗齐：《历史学的理论与实际》，第42页。

一个结果。换句话说，思想产生了历史，思想活动就是历史，此外别无历史。说现实世界的演变过程就是历史与说思想活动就是历史是同义反复，两者并不矛盾。前面已经说过，克罗齐认为精神活动，思想活动就是哲学，所以，“历史即哲学”。

这样，克罗齐就旗帜鲜明地回答了实证主义史实留下的那个重要问题：历史是什么？历史即哲学。克罗齐做出这样的回答，并不是出于一个哲学家的偏好，故弄玄虚；也不是有意要与人们的常识抬杠，标新立异，他是有所感而发的。我们知道，十九世纪科学的发展，导致了超越一切学问之上的传统哲学的破产，这本是件好事，但科学越出了自己的本份，要求一切学问都向它看齐，都要采用它的方法，这就不能让人信服了。狄尔泰等人批评过这种倾向，克罗齐受到他们的影响，他认为自然科学“处理实在的方式是抽象的”，“而他心目中的哲学与历史都尽量求其具体，尽量求其接近人的积极的与活动的精神。由此引导他对科学方法的越份进行攻击。”“克罗齐对科学方法的攻击多半是由他所非难的十九世纪的某些趋向所引起的……，他反对奥古斯都·孔德和约翰·斯图亚特·穆勒的经验主义和赫伯特·斯宾塞的进化的不可知论。”① 这种

① 怀特：《分析的时代》，第40页。

趋向表现在史学方面，就是实证主义史学的流行。克罗齐肯定实证主义史学在否定传统的历史哲学，推动历史研究方面有重大的功绩。他说："幸亏有了实证主义，历史著作才变得不那么幼稚，著作中的事实才变得较丰富"，"实证主义存心否定超验论，存心观察它的一切，它觉得自己在这方面是正确的，实际它也是正确的。我们每一个适当地注意那类事情并再次提出那种否定的人们是在收获实证主义的果实，在这方面是一个实证主义者。"① 但是克罗齐又认为，实证主义史家对历史哲学的批判并未获致正确的结论，而是误入了歧途。陷入了二元论的泥淖，重又为超验的历史哲学打开了大门。这里，克罗齐实际上是在进行两线作战，一方面，他力图肃清近代以来哲学领域内由于二元论困境而导致的超验哲学，这表现在历史领域就是传统的历史哲学；另一方面，他反对经验主义、实证主义对自然科学过份崇拜而导致的二元论结果。我们知道，历史哲学的一个逻辑前提就是认为历史本身并不自动显示其意义，必须从哲学思辨的高度去认识和把握它，这是一个二元的假设，它导致了超验哲学——传统的思辨的历史哲学；另一方面，实证主义史学批判历史哲学的观点，认为历史的意义即在

① 克罗齐：《历史学的理论与实际》，第244页。

历史事实本身，历史脱离人而独立存在，只要把历史事实搞清楚了，历史的意义就会自动显示出来，即便是谈到历史规律的探讨，实证主义史学也只是从这个意义上引申出去，这样，实证主义史学同样把历史中的事实和意义割裂开来，犯了前面讨论过的二元论的错误。而二元论不正是超验哲学的逻辑前提吗？所以克罗齐说，实证主义“在事实上导致了历史哲学。”① 我们在实证主义哲学创始人孔德身上就看到了这种矛盾现象：孔德一方面倡导实证主义，另一方面又构思了一个思辨的历史哲学体系。现在看来，这是不足为奇的。克罗齐认为，要在历史领域克服二元论，不仅要克服传统的思辨的历史哲学，也应克服实证主义史观。而这种克服的途径就在于端正我们对历史的看法、对哲学的看法。在克罗齐看来，这不是通过信仰改宗，也不是类似格式塔的转换，而是通过对思想、对精神活动的具体分析来实现的。这个分析的结果告诉我们：历史即哲学。这个结论把哲学从传统的超验地位降到了现实世界，即降到了具体的精神活动中，同时把历史提升到应有的精神活动的高度。

实证主义史学不仅犯了二元论的错误，而且在这种史观指导下的历史研究状况也必然不能使人满

① 克罗齐：《历史学的理论与实际》，第240页。

意。许多史学家沾沾自喜于一得之功、一孔之见，整日钻在文件和档案堆里昏天黑地、无止无休地搜集史料，还自以为是在从事伟大的科学工作。克罗齐对此有一段妙极的讽刺：

> 在德国，每一个平庸渺小的原件抄录者，每一个不同文本的搜集者或每一个考查原件之间关系的人和文本的真伪甄别者都自高身价，侧身科学家和批评家之列，不仅自视为谢林、黑格尔、赫德或施勒格尔等人的平辈，而且还看不起和蔑视他们，把他们叫做“反方法的”。这种伪科学的傲慢心从德国传遍了欧洲其他各国，现在达到了美国，……这些历史家把他们的信念安放在一份叙述当中，其中每一个字都有一件原本作依据，此外，在他们的著作中什么也没有，有的只是原本中所有的，那是脱离了上下文的，是没有经过语文学叙述者的思索重述出来的。……有时候为了减轻工作的枯燥性，也会用带有情感的爱好和理想的见解来略略点缀一下自己。为了这个目的，他们就求助于求学时的记忆，求助于当时流行的哲学口

> 号，求助于当时人们对于政治、艺术、道德的日常情操。但做这一切时，他们是很有节制的，以免失去他们的科学严谨性的声誉，……他们所知的哲学只是“历史哲学”，甚至这也是从它的可怕的恶名知道的，而不是从直接熟识中知道的。他们记得有名的哲学家确实记错五六个人名和日期的掌故，并且随时准备重述那些掌故，却很容易忘记他们所犯的无数错误（更易犯，更危险）；他们几乎使自己相信了哲学就是被发明来改变人名和混淆日期的，而那是委托给他们去热情地加以照管的，相信哲学是用来毁灭严肃的“文献性历史”的陷阱。①

强调历史即哲学同样也是针对这种可悲的现实状况。它要求一个历史学家同时也是一个哲学家，而不单纯是一个文献搜集者。一个历史学家如果没有哲学的头脑、理论思辨和分析的能力，他对文献再熟悉，搜集的材料再多，搞出来的也只是资料汇编，而不是真正的历史。当然，区别历史和资料汇编不仅仅取决于其中有无哲学，有无思想，还取决

① 克罗齐：《历史学的理论与实际》，第283—285页。

于它们的内在特征。这就涉及到克罗齐历史理论的另一个基本观点。克罗齐认为，历史与哲学的同一并不是无条件的，只有“当历史被提升为关于永恒的现在的知识时”，历史才“表现为与哲学是一体的，哲学原不过是关于永恒的现在的思想而已。”① 这样来规定历史与哲学的同一，必然会得到一个结论：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而这正是克罗齐历史理论的另一个基本观点。当然这个结论本身就是“历史即哲学”这一观点的逻辑推演。因为，历史就是思想活动，而任何思想活动对于思维主体来说总是发生在现时现刻，所以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它总是现时现刻活动在历史学家头脑中的思想。克罗齐说，过去史和当代史没有任何区别，“像当代史一样，它的存在条件是，它所叙述的事迹必须在历史家的心灵中回荡。”② 不仅如此，如果我们进一步追问一下，这种过去史为何出现在历史学家现在的思想中，为何在历史学家的心灵中回荡，我们立刻就会发现，这种涌到历史学家心灵和头脑中的过去的历史总是和现在的生活有着某种密切关系的，“显而易见，只有现在生活中的兴趣才能使人去研究过去的事实。因此这种过去的事实只要和现在生

① 克罗齐：《历史学的理论与实际》，第49页。

② 同上书，第2页。

活的一种兴趣打成一片，它就不是针对一种过去的兴趣而是针对一种现在的兴趣的。”① 这种现在的兴趣引导我们去研究过去的历史，确切地说是唤醒和复活过去的历史，并按照现在的兴趣来思考和理解它。这样“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这句话就包含了三层意思：一、研究历史总是现时现刻的思想活动；二、历史研究是由现时的兴趣引起的；三、历史是按现时的兴趣来思考和理解的。这三层意思都强调历史与现时生活的统一，正是这种统一使过去的历史获得了当代性。但并不是过去所有的历史都能获得这种当代性的，过去的历史假如不能引起现时的思考，不能打动现时的兴趣，不能和现在的精神生活打成一片，它就不能在现时的思想中复苏，就不能获得它的历史性即当代性。古希腊、罗马人躺在墓室里近千年，对中世纪人来说，他们是不存在的，是死历史或并非历史。但是到了文艺复兴时期，欧洲人突然想起了他们，并唤醒了他们，使湮没千年的古典时代重新活在人们的心灵中，变成了文艺复兴时期的当代史。为什么？因为这时生活本身发生了变化，欧洲人的精神产生了新的要求，被中世纪人遗忘的古典时代引起了人们的兴趣，所以这部分特定的历史就对他们复活了。反过来，当代

① 克罗齐：《历史学的理论与实际》，第2页。

性却是“一切历史的内在特征。”① 只要是真正的历史，活着的历史，就必然具有这种当代性。据此，我们就能区分什么是真正的历史，什么仅仅是文献汇编了。

克罗齐认为，理解了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对历史确凿性和有用性的怀疑立刻就会烟消云散”，他说：“一种我们的精神现在所产生的东西怎么能不确凿呢？解决从生活中发生的问题的知识怎么能没用呢？”② 实证主义史学脱离现实，凭空去追求所谓的历史真实，在克罗齐看来这样做既找不到历史的真实，也无助于人们认识现实。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这个观点不仅指出了历史的内在特征，也说明了历史的价值，同时还对历史学家提出了要求。历史有什么价值呢？历史解答现实生活中发生的问题。人们之所以会对历史产生兴趣，是因为现实生活中发生了某些问题，这些问题与历史有关，所以人们迫切地希望从有关历史中去寻找答案。* 历史的作用就是帮助人们去看清现实，因为现实本身是由历史构成的。克罗齐说：“历史的

①② 克罗齐：《历史学的理论与实际》，第4页。

* 这一点对于经历过十年动乱的中国人大概都是深有体会的。十年动乱之后，人们突然对历史发生了很大兴趣。为什么？因为在十年动乱期间，历史上的许多东西惊人地复活了，人们深受其害，痛定思痛，于是力图从历史中去寻找这种问题的答案。

判断标志着在行动中站一站或看一看，其作用是要打破任何妨害人们看清环境的障碍。"① 既然历史的价值在于解答人们现实生活中发生的种种问题，那么，历史学家的任务就是去实现这一目标。这并不是单纯地去如实说明历史，而恰恰是为了现在和将来的利益去认识过去，解释过去。克罗齐出于他的现实责任感强烈地反对为知识而知识的口号。兰克提出如实说明历史，不管他的本意如何，他的追随者正是就这一口号的字面意义来接受它的。克罗齐说："为知识而知识远没有什么高贵和卓越的地方（象有些人相信的那样），那只是愚昧之人（或我们每个人在糊涂时刻所有）的愚昧游戏；实际上没有这种知识，这本来也是不可能的。"② 这种说法尽管不无偏激之处，却基本上是对的、正当的。显然，只有受到现实的刺激，人们才会真正去研究历史，也才能真正懂得历史。

克罗齐在上述两个基本观点之上构筑了他的历史理论体系，并对当代历史理论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克罗齐强烈反对传统的历史哲学，认为传统的历史哲学不仅其内容应该否定，而且这个概念本身也是同义反复，应该取消。他说，历史哲学"是一

① 译注：《分析的时代》，第42页。

② 克罗齐：《历史学的理论与实际》，第33～34页。

套空想和揣测的方法，历史在执行这种神圣纲领的时候，就象有些人想照范本进行大体近真的临摹一样。‘历史的哲学’是智力无能的结果，或者象维科谈到神话时所说的，是心灵破产的结果。”①尽管如此，人们还是把他的理论称之为历史哲学，不过冠之以分析的、批判的定语罢了。克罗齐是通过对历史知识的最基本单位——历史判断的分析来探讨历史学的性质，建立他的理论的，这种分析方法的运用和探讨对象的转移，使他的理论同传统的用思辨来把握历史进程的历史哲学断然不同，它实际上是开创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分析的、批判的历史哲学。虽然克罗齐可能会对这门新学科的名称不太满意，但他毕竟享有这门新学科的奠基者的光荣。

3-3 科林伍德：“历史是过去思想的重演”

罗宾·乔治·科林伍德（Robin George Colliugwood，1889—1943）是英国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和哲学家。他早年就读于牛津大学，以后长期在剑桥和牛津大学任教。做为一个职业历史学

① 克罗齐：《历史学的理论与实际》，第45页。

家，科林伍德十分强调历史知识在人类认识中的重要性，他认为哲学探索有赖于历史研究，所以他非常注重研究历史与哲学之间的关系，写了大量论著来探讨这种关系。科林伍德受到克罗齐的很大影响，他追随克罗齐，对分析的和批判的历史哲学的发展做出了很重要的贡献。在这方面，他最重要的著作是《历史的观念》，该书是他死后由他的学生和友人诺克斯（T·M·Knox）编辑出版的。由于他在历史哲学方面的成就和贡献，他被人们认为是英语国家中最重要的历史哲学家，有的学者认为"近几十年来分析的历史哲学的发展和成就，部分地要归之于科林伍德的影响"，而《历史的观念》一书则被认为是当代"最重要的历史启示"①。可以说，在开创和发展分析的、批判的历史哲学这门学科方面，科林伍德能与克罗齐平分秋色，两人的功绩是旗鼓相当的。

科林伍德认为，除数学和科学外，历史是人类求知的第三条途径，而这一点往往被人们所忽视。他说，自古希腊以来，人们习惯于承认有两种知识：经验的知识，即通过经验所得到的知识，自然科学就是这种知识；先验的知识，即内在的必然的

① 康恩：《哲学唯心主义与资产阶级历史思想的危机》，第164页。

真理，它指的是数学和逻辑。人们却忘记了历史的知识。科林伍德说："过去不是现实，无法被经验知觉。历史知识也不是直接的，它的对象不是给定的，而只能靠推理去接近它。"①然而历史的推理又与科学的推理不同，因为它的对象不是某种不受时空影响的永存的东西，而是有着十分明确的时空界限的。所以能够给我们以历史知识的，既不是知觉也不是思想，历史"是关于某种间接事物的推理知识。"②在《历史的观念》一书中，科林伍德说：

> 历史是一门科学，一门特殊的科学。这门科学的任务是用推理的方法来研究那些我们无法直接加以观察的事件，并运用某些我们可以直接观察的东西来讨论这些事件，这种东西是历史学家所感兴趣的，他将其称之为"史料证据"。③

历史是一门特殊的科学，这就是科林伍德为历史所下的定义，这种特殊性把历史同自然科学区分开来。

---

①② W·J·van der Dussen, History as a Science, The Philosophy of R·G·Collingwood, Martinus Nijhoff Publishers, 1981, P285.

③ R·G·Collingwood: The Idea of History, PP251～252

科林伍德认为，历史哲学所要讨论的就是这门科学的这种特殊性。

什么是历史哲学？在科林伍德看来，历史哲学“是哲学探索的一个特别分支，它致力于探讨历史思维所提出的特别问题。认识论的问题，如人们常常归结成的这样一个问题：‘历史知识怎样才是可能的？’形而上的问题，它关心的是历史题材的性质，澄清诸如事件、过程、进步、文明之类概念的含义。”① 科林伍德反对传统的思辨的历史哲学，认为那是一种不合法的幻想，他说：“如果说应该有历史哲学，那末这只能是对历史学家为获得真理而作的努力的一种哲学上的看法，而不是关于尚未获得的真理的一种哲学上的看法。”② 显然，他提倡和捍卫的是对历史学而不是对历史本身所进行的那样一种哲学探讨，也即是分析的、批判的历史哲学。他说：

> 历史哲学就是对历史思维的研究，不仅对它的实际过程进行心理学上的分析，而且对它为自己所树立的理想进行分析。

① W·J·van der dussen: History as a Science, The Philosophy of R·G·Collingwood, Martinus Nijhiff Publishers, 1981, P65.

② 《现代西方历史哲学译文集》，第158页。

> 历史思维是人们思考客观世界时所采取的许多态度中的一种态度；这种态度假定：存在着一个与人们的认识无关的事实世界（不是一般的规律，而是许多个别的事实）；这种态度还假定：如果不能完全发现这些事实，至少也能发现它们的绝大部分。历史哲学应当是对这种态度、对历史思维的前提和含义的一种批判性的探讨，是为发现历史思维在整个人类经验中的位置，它与其它经验形式的关系，它的起源及其有效性所作的一种尝试。①

我们看到，科林伍德比克罗齐更为明确地提出了分析的、批判的历史哲学的原则，克罗齐囿于他的哲学——历史观，把历史当作哲学来讨论，而科林伍德则明白无误地强调历史哲学就是对历史思维所做的哲学上的探讨。

科林伍德是从两个方面来探讨历史哲学问题的，即历史认识的客观方面和主观方面。从客观方面看，即从形而上的方面看，历史哲学的第一条原则是历史学家所研究的过去不是已死的过去，而是在某种意义上仍旧活在现实中的过去，因为历史所

① 《现代西方历史哲学译文集》，第158～159页。

真正关心的不是“事件”，而是“过程”。因为事件一旦过去就永不复返，而过程则“无始无终，只有转化”。① 现实是由历史生成的，它囊括了过去的全部历史，所以过去并没有死亡，它以改变了的形式被浓缩在现实之中。可是这一点在以往一直为人们所忽视，不仅古希腊罗马的思想家没有认识到这一点，就是狄尔泰、李凯尔特诸贤也颇欠深思。科林伍德说，狄尔泰认为“历史处理的是具体的个别，而自然科学关心的是抽象的一般，但这却没有引导他提出令人满意的历史哲学，因为他所考虑的个别只被认为是孤立的、过去的事实，而不是集合起来构成历史发展的真实过程。”② 同样，“李凯尔特因袭实证主义的观点，认为自然是能分成各种不同的事实的，他进一步也将历史破了相，认为历史同自然一样也是个别事实的集合，它同自然事实的区别仅在于它蕴涵了价值”。科林伍德接着说：“但是，历史的本质不在于构成它的个别事实，不论这事实有多大的价值，而在于它是一个过程，一种由此及彼的发展。”③ 至于汤因比的错误则更为严重，科林伍德认为他是在重复实证主义的观点，“他的全部框架真是一个精心安排和贴着标签的鸽

① W·J·van der Dussen: History as a Science, P270.
②③ The Idea of History, P172, P169.

子笼，可以塞进各种现成的史实。这种做法导致了一个困境：人们忘记了实际存在着的和历史学家实际上所知道的历史事实，始终是一个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一些东西变成另一些别的东西。而这种过程正是历史生活的要素。”① 那么，作为历史的过程与作为自然的过程，例如达尔文所提出的生物进化过程是否一样呢？这在科林伍德的历史理论中十分重要，因为它涉及到自然与历史的差别。科林伍德认为两者的区别有三点：一、自然过程是由事件构成的，而历史过程则是由人的行动构成的；二、自然事件只能从外部去观察，而人的行动本质上应从内部去透视；三、自然过程的过去是死的，而历史过程的过去是活在现实中的。根据这三点区别，科林伍德很自然地得出一个结论：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这一著名结论是科林伍德历史哲学的一个基本观点，它是从历史思维的客观方面对历史所下的定义。该怎样来理解科林伍德这一基本主张呢？科林伍德认为，自然过程仅仅是事件的集合，而历史过程则由人的行动构成，这行动后面必然有行动者的思想动机，只有了解了这思想动机，我们才能理解行动及由一系列行动构成的历史过程。科林伍德说：“若人的行动仅仅是事件，历史学家就不能理

① W·J·van der Dussen: History as a Science, P68.

解它们，严格说来，他甚至不能确定它们是否真的发生过。只有当它们是思想的外在表达时，它们才能为历史学家所知道。”① 比如，地震和战争都造成大量死亡，但两者的性质大不相同，地震仅仅是自然现象，自然事件；战争则是人的行为。地震背后没有动机，战争背后则有人的动机，只有知道了这思想我们才算真正知道了这场战争。当然，并非人的一切行为都可以称之为历史行动，如何区别历史行动和非历史行动呢？科林伍德说，凡属受人的自然本能或欲望支配的行动都是非历史行动，它们并不构成历史研究的对象。比如，历史学家对吃、睡和性爱这类满足自然本能或欲望的行为并不感兴趣，他们感兴趣的只是不同时代人们为满足这些本能而创造出来的种种道德规范和社会习俗，因为在这后面才有着人们的思想。研究历史，归根到底是去弄清隐藏在历史行动背后的人的思想动机，只有把这弄清楚了，我们才能真正理解历史。从这个意义上说，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历史学家或历史思维的确切对象就是思想。由此，我们也能知道自然科学和历史学的区别了。科林伍德说：

对科学家来说，自然始终是也仅仅是

① The Idea of History, P115.

现象，……相反，历史事件则决不仅仅是现象，决不仅仅是现察的景象，它要求历史学家看透它并从中辨析出思想来。

这样，在透视事件的内部并辨析它们所表达的思想时，历史学家所做的是科学家不必做也无法做的事。在这一方面，史学家的任务要比科学家更复杂。但另一方面，它又更简单：历史学家不必也无法效法科学家（这并不妨碍他做一个历史学家）去寻找事件的因果或规律。对科学家来说，他通过知觉来发现事件，并通过将它们分类、确定它们的属类以及它们与其它属类的关系来探讨它的原因。对历史学家来说，要探究的对象不仅仅是事件，而是表达在其中的思想。去发现这思想就已经是去理解它。当历史学家弄清了事实，就不必再进一步去探讨其起因了，因为当他知道发生了什么，他就已经知道为什么会发生了。

这并不意味着“原因”之类的字眼在历史中是不恰当的；它只意味着这些字眼用在这儿有特殊的意义。当一个科学家问：“为什么那张试纸变红了？”他的意

思是说，“是什么情况使得试纸变红了？”而当一个历史学家说：“为什么布鲁图斯刺死凯撒？”他实际在问：“布鲁图斯想到了什么促使他决意去刺死凯撒？”事件的原因对他来说意味着造成事件之行动者头脑中的思想，这不是外在于事件的，它就在事件本身之中。①

自然科学家要寻找的是现象的因果的规律，历史学家力图把握的是体现在历史过程中的思想，这就是自然科学与历史的区别。

知道了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这一基本观点以后，我们就能比较容易理解科林伍德关于历史思维的主观方面或认识论方面的主张了。从这一方面看，科林伍德认为：“历史是过去思想的重演。”既然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历史学家要研究这历史，除了去理解这思想以外别无他途，但怎样才能理解过去的思想呢？科林伍德说：

历史学家如何去辨析他力图发现的思想呢？要做到这一点只有一条途径，就是在他自己的头脑中去重新思考这些思想。哲学史家阅读柏拉图是试图知道当柏拉图

① Collingwood: The Idea of History. PP214—215.

> 说某些话时，他意欲表达的是什么。这样做的唯一途径就是亲自去思考这些话。事实上，当我们提到“理解”这一字眼时它的意义就在于此。政治史家或战争史家也是这样，当他们要说明凯撒的某些行动时，就是在力图理解这些行动，也即是说，去发现当凯撒决定去做这些事时他脑子里想的是什么。这意味着他对凯撒所处的形势应有身临其境之感，并亲自去思索凯撒对形势和可能采取的对策所做的考虑。因此，思想史，乃至一切历史，都是历史学家在自己头脑中对过去思想的重演。①

要重演过去的思想，首先必须肯定过去的思想是能够重演的，而这就意味着它必须是合乎理性的。科林伍德认为人类精神的非理性方面不是历史的题材，而是科学或心理学的对象。他说，它们只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却不属于历史过程，事实上，它们的重要性在于构成人们理性生活的环境。它们是理性生活的基础，但不是理性生活本身。理性生活本身就是思想，就是体现在历史行动中的人们的思

① Collingwood: The Idea of History, P215.

想。但对思想这一概念，仅仅从常识角度来理解是不行的，科林伍德认为要理解思想这一概念必须注意两点：一、思想的相对独立性和超越性。科林伍德说，只有当我们假定一种思想能在别人头脑中重演，这一思想行为才是能够为人们所知的。显然，对于历史学家来说，重演过去思想的这种活动不可能是偶然的，而必须是有意识的，“除非他知道自己是在进行历史的思考，否则他就不是在历史的思考。”① 思想是我们精神生活的一部分，是意识流，它既与经验生活密切相连，但又不与经验生活之流完全纠缠在一起，所以才能不断地加以重演。科林伍德说，思想活动当然是思想家经验的一部分，它发生在特定的时间和由其它情绪、感觉等活动构成的特定的情境或者说上下文关系中，这种情境使思想具有了直接性，虽然思想不仅仅具有直接性，却不能没有直接性。思想的特性在于，“除了能出现在此时此地的情境中以外，它还能在变化了的情境中保存自己，并在不同的情境中复活。这种自我保存和复活的能力使得思想活动比单纯‘事件’和‘形势’有着更多的意义。”② 把思想活动仅仅当作事件来看待，那么重演过去的思想不就成了过去事件

① Collingwood: The Idea of History, P289.
② Collingwood: The Idea of History, P297.

的再现了吗？这显然是荒唐的。思想的直接性即当时的情景是无法重演的。比如，某一真理第一次被发现与任何后人对这一真理的重新思考就完全不同，并非真理发生了变化，亦非这两种思考活动本身有什么不同，而是两者的情景不同。做出首次发现时的那种思想的直接性，比如由新奇所引起的震动，从困惑中得到解放，获得预期的胜利，战胜反对者和赢得声誉等等的感情永远不能被再次经验到了。二，思想的普遍性。所谓思想的普遍性，是指它能超越自己的直接性，而在其它各种情景中复活和生存。正因为这一点，在历史学家和他的研究对象之间的时间鸿沟上才能架起理解的桥梁。科林伍德的所谓活着的过去，真正的含义是指过去的思想并不会随过去的人事死亡，它能超越具体直接的人事而在现在的（以及其它的）情境中生存或复活。既然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除了思想以外，任何别的东西都不可能有历史，那么，能够活在今天的历史，只能是也仅仅是过去的思想。当历史学家重演过去的思想时，过去就在史学家头脑中复活了；更为重要的是，作为一种思想方式，过去的思想还会普遍地保留在今人的头脑中。正是这一点，使得今人能够设身处地去思考古人的思想，理解他们的想法。科林伍德说，思想的普遍性保证它能够

在历史学家的头脑中复活，另一方面，也保证了历史学家能在自己头脑中为这种复活提供一个场所。

根据思想的这种特点，重演过去的思想，就决不可能是一种简单的再现，而必然要在重演过去的思想时将其纳入不同于原来的，今天的思想情境中去。也就是说，历史知识不是简单的过去思想的摹写，而是活在现实中并被纳入现实思想情境中的过去的思想。对于当事人来说，过去的思想就是他的现在的思想，而对历史学家来说，过去的思想是被纳入现在的思想中的，它活着，但不是无条件的，它不是构成真实生活的问题中的一部分。科林伍德由此区分了原始的思想与次生的思想。原始的思想是历史学家的，次生的思想是关于其研究对象的。两者的关系是这样的，原始的思想构成我们的真实生活，若我们的真实生活没有提出问题，我们就不会要求历史来回答；当真实生活提出问题时，它可能要求历史来回答，这时，我们就会不仅仅思考过去的思想，而且会象过去那样去想，但这只是次生的思想，它实际上是被纳入今天的思想情境之中的，它不会同现实生活、或同原始的思想相混淆。这一点至关重要，它意味着当一个历史学家在重演过去的思想时，他并不是消极地屈从于过去，而是始终将现时的精神生活做为首要问题来考虑。通过

把过去的思想纳入今天的情境中，我们就可以对过去的思想做出批评和判断，而这样，重演过去思想的活动才告完成。显然，这样的重演过去思想的活动要求历史学家运用他的全部知识和心智来进行。科林伍德以柏拉图和凯撒为例，讨论了这一点，他说：

> 只有当历史学家运用自己的全部心智和哲学方面的知识来考虑柏拉图或凯撒的思想时，重演活动才告完成。这不是消极地暂时屈从于别人的头脑，而是一种积极的努力，也即一种批判性的思考。历史学家不是单纯地重演过去的思想，而是将其纳入自己的知识结构中来重演它，因此，重演它就是批判它，并对它形成自己的价值判断，纠正他所能辨认出来的错误。这种对他所研究的历史思想所进行的批判对历史研究来说并非次要的、第二步的工作，而是构成历史知识本身的必要条件。①

概括地说，重演过去的思想包括了一系列步骤，首先是现实的情境中涌现出问题，它要求历史来作答，于是有对过去思想的思考，它使过去复活并将

① Collingwood: The Idea of History, P215.

其纳入现实的思想情境中。在这一过程中，历史学家运用自己全部的学识和智慧来批判过去的思想并形成自己的价值判断，这就是重演的全部含义。

和克罗齐一样，科林伍德强烈反对十九世纪实证主义的史观，认为将史学等同于自然科学，用自然科学的方法来治史不仅无助于说明历史，更为重要的是无助于说明现实。在他看来，传统史学（包括实证主义史学）讨论的大都是资料问题，而非思想问题，离开了思想来谈历史，历史就成了无灵魂的躯壳。科林伍德认为这种仅仅将史料做排列组合的历史不是真历史而是假历史，他将其称之为“剪刀加浆糊”的历史。根据科林伍德的史学理论，一个历史学家研究历史不仅要考证史料的真伪，更重要的是探究史料的意义。他说：“就史料的内容来说，重要的不是真伪，而是它的意义，去探求意义，就走出了‘剪刀加浆糊’的历史的藩篱，而进入另一境界，在这里，历史不是抄袭那些经过考订的最完善的史料，而是做出自己的结论。”① 科林伍德认为维科是第一个提出历史学的这种重要观点的人。他说：“自维科以来，有关历史方法论的最重要的问题就是：作为一个历史学家，我们是如何知道我们的史料证据所没有告诉我们的东西的。”② 在这个

①② Collingwood: The Idea of History, P260、P287.

意义上，对一个历史学家来说，重要的不是看他掌握了多少史料，而是看他有无能力透过史料证据而从中辨析出过去的思想。科林伍德说："越是优秀的历史学家，资料对他的意义就越大，无比优秀的历史学家就有无数无比可靠的、关于某个论点的论据，供他任意引用。"① 这种能力从何而来？优秀的历史学家之所以优秀，不仅在于他的学识和智慧，而且同他的生活经验、现实处境及他看问题的角度有关。历史学家研究历史不是从客观的史料出发，而是从某种问题出发的，这问题是从现实情境中涌现出来的，"对历史学家来说，只有他经验中的某件事提出问题时，问题才存在；而就任何真正的问题来说……它提出的方式必然会给聪明人以某种方向性的暗示，以使他能探索到解答问题的证据。"② 并不是所有的问题都是有价值的：有真问题也有假问题。假问题是出于无聊而随口提出的。比如，问公元元年第一个寿终正寝的罗马人姓甚名谁就是一个假问题。但这也可以成为真问题，当它"产生于历史思维范围内时"，它就是一个真问题。所谓产生于历史思维范围内，就是指它是产生于这样一种意图，"即试图更充分地感知此时此地存

① 《现代西方历史哲学译文集》，第166页。
② 《现代西方历史哲学译文集》，第166页。

在着的，有待我们去感知的这个世界。”① 真问题是现实情境中涌现出来的问题，是力图更充分理解现实而提出的问题，正是这种问题帮助史学家去知道史料证据所没有告诉他的东西。由于各个历史学家的现实处境及见解不同，他们必然会提出各不相同的问题，产生各不相同的看法，这必然影响到他们的研究成果。“每个历史学家都以自己为中心，根据他自己的角度来观察历史，因此他看到别人所看不到的某些问题，而且每个历史学家都根据他自己特有的观点，也就是从他特有的一个方面来观察每个问题。”② 显然，根提科林伍德的观点，要成为一个优秀的历史学家，就必须同现实保持密切的关系，积极关心、注意现实提出的各种问题。

克罗齐和科林伍德的历史哲学内容很丰富，以上介绍的只是他们的基本观点。经过他们的努力，分析的批判的历史哲学在本世纪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吸引了大批哲学家和历史学家来关心十九世纪实证主义史学留下的问题。对这一问题的讨论，开拓了一个新的学术领域，产生了丰富的研究成果，而这是实证主义史学所始料不及的。实证主义史学自以为解决了历史学的最基本问题，已将史学置于坚固的基础之上，想不到正是这基础、这已解决的问题被

①② 《现代西方历史哲学译文集》，第166页，第167页。

兜底翻了过来。后人评论说：

> 克罗齐和科林伍德两人，在对早期理论家的批判中，特别要急于揭露那些经常发生的与历史题材有关的根本错误想法，其中最主要的错误想法就是这些理论家具有下述的设想：那种对无生物界的科学起重要作用的普遍法则也适用于历史事件，而且可以用来解释历史事件。按照他们的说法，这种设想是一个严重的错误。①

不仅如此，在这一设想基础上建构起来的实证主义史学的全部理论观点都受到了当代分析的、批判的历史哲学的严格检讨和严厉批评。当代分析的历史哲学正是通过这种全面的讨论形成了对历史学的性质、历史研究的对象、历史思维的特点、历史知识的可能和限度及历史学的功能和价值等一系列问题的看法。这一讨论大大开阔了人们的眼界，启发了人们的思想，锻炼和提高了人们的分析能力，对当代历史学的研究无疑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

① 加德纳："历史哲学概论"，载《文摘》，1980年，第8期。

3-4 几个基本的理论问题

如果说历史哲学是哲学的一个分支的话，当代分析的、批判的历史哲学就更其如此。分析的历史哲学的形成和发展同当代最重要的哲学潮流之一的分析哲学是密切相关的，分析哲学在多方面影响和启发了分析的、批判的历史哲学。分析哲学是当代最重要的哲学运动之一，它甚至成为当代哲学的表征，以至有人将当代称为分析的时代。分析哲学的早期主张和其理论出发点是要清除人类知识领域中传统哲学或者说旧形而上学的种种影响，让科学变得更科学。要达到这一目的，早期的分析哲学家们强调对语言进行严格的逻辑分析，在他们看来，传统的哲学之所以争论不休，毫无结果，根本原因就是误用了我们的语言，而逻辑分析能帮助我们避免这种语言的误用，澄清我们每一陈述的意义和内容，所以哲学从根本上说是一种逻辑分析活动。分析哲学的重要人物罗素说："只要是真正的哲学问题，都可归结为逻辑问题。这并不是由于任何偶然，而是由于这样的事实，每个哲学问题，当经受必要的分析和澄清时，就可看出，它或者根本不是真正的哲

学问题，或者是具有我们所理解的含义的逻辑问题。”① 分析哲学家们认为逻辑分析有正反两个方面的功能，一方面帮助我们澄清科学认识，另一方面帮助我们清除形而上学。分析哲学家卡尔纳普说：“应用逻辑或认识论的研究，目的在于澄清科学陈述的认识内容，从而澄清这些陈述中的词语的意义，借助于逻辑分析，得到正反两方面的结论，正面结论是在经验科学领域里作出的，澄清了各门科学的各种概念，明确了各种概念之间的形式逻辑联系和认识论联系。在形而上学领域里，包括全部价值哲学和规范理论，逻辑分析得出反面结论：这个领域里的全部断言陈述全都是无意义的。”② 分析哲学的这种理论主张和它所倡导的分析方法深深地影响了分析的、批判的历史哲学，人们运用这种分析方法来讨论历史中的各种问题，取得了很有意义的丰富成果。不过，有趣的是，分析哲学的初始目标似乎是将科学看做是唯一确凿可靠的知识，主张一切学问如果不想堕落为形而上学* 的话就应向科学看齐；而分析的、批判的历史哲学则恰恰相反，

① 《西方现代资产阶级哲学论著选辑》，第221页。

② 洪谦主编：《逻辑经验主义》，上册，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13页。

* 形而上学在这里指的是传统的那种本体论的哲学思辨，十九世纪以前的哲学基本属于这一类性质的学问。

它一开始就强调历史的独特性，极力反对将历史与科学等同看待，它的目的在于要把历史从科学中重新独立出来。不管这种努力的目的实现没有，这种努力本身已成为一个独立的学科探讨分支。正因为这样，分析的、批判的历史哲学之所以与传统的思辨的历史哲学不同，并不是因为它使用了分析的方法而反对主观的玄想思辨，而在于它是一门独立的、不同于传统历史哲学的新学科分支。它不象传统的历史哲学讨论的是人怎样创造历史的问题，而讨论的是人怎样写历史这样一个问题。本节所要介绍的是分析的、批判的历史哲学所关心和讨论的一些基本理论问题。科林伍德认为历史哲学讨论的问题是历史学的性质、对象、方法和价值。沃尔什在他的《历史哲学导论》中则认为分析的历史哲学所讨论的基本问题是：（1）历史同科学的关系；（2）历史中的事实和真理；（3）历史的客观性；（4）历史中的解释。本节基本参照他们的意见来讨论分析的历史哲学的基本理论问题。

（1）历史与科学、哲学、艺术

讨论历史与科学、哲学、艺术的关系实际上就是讨论历史学的性质，以回答历史理论中一个最基本的问题：历史是什么？

十九世纪以来，历史与科学的关系成了历史理论中最重要的问题。实证主义史学认为“历史是一门不折不扣的科学”，它刚刚宣布了同哲学断绝关系以后就一头扎进科学的怀抱。在实证主义史学看来，所谓科学，就是指处理史料的那种实证方法和看待历史的那种客观主义态度。在这种科学观指导下，十九世纪历史学家在研究中遵循的基本信条是：史料第一，历史学家应该让史料本身来说话，不妄加猜测，也不随意概括；不妄做褒贬，也不感情用事。这种观点和信念完全是十九世纪自由主义的乐观气氛的产物，在二十世纪，它们就同时代的氛围显得格格不入。不仅如此，这种观点和信念本身也经不起理论上的推敲和实践中的检验，当代分析的历史哲学正是从理论上指出了这种观点和信念的谬误。

我们在本章第一节中看到狄尔泰等人是如何力图将历史科学同自然科学区分开来的。进入二十世纪以后，这种努力由于得到时代的推动和分析哲学那种严密精细的逻辑分析方法的启发，又获得了新的进展，取得了重大成功。克罗齐就是通过对历史判断的分析，得出历史即哲学这样的结论的。当代分析派的历史哲学家大都热衷于用这种逻辑分析方法来讨论历史理论问题，当然是指人怎样写历史这样一个问题。在历史与科学的关系问题上，他们基

本上都倾向于强调两者的区别和不同，只是在具体说法上各有千秋。

科林伍德将历史看做是一门独立的学问，是人类求知的第三条途径，反对将历史等同于自然科学，这我们在前一节中已经介绍过了。但是，科林伍德又说过历史是一门科学，一门特殊的科学，并同意布瑞的话，说历史是一门不折不扣的科学，他这样说并非出偶反偶、自相矛盾，而是从他的哲学观出发、重新定义了科学之后所做出的论断。科林伍德反对当时分析哲学的科学观，认为科学是一种认识活动，这一活动包括提出问题和解答问题这样两个步骤，历史研究也是这样，从这个意义上说，历史是一门科学。他说，一般说来，历史学“属于我们称之为科学的那一类学问，即属于我们提出问题并试图解答这些问题的思维形式。”① 科林伍德接着专门讨论了科学的性质，他说：

> 懂得这一点很重要，科学一般来说并不在于搜集我们已知的知识并把它们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安排在一起，而在于抓住那些我们尚不懂得的东西，并力图去弄懂它。耐心地摆弄那些我们已有的知识可以是实

① The Idea of History, P9.

> 现这一目的的有益的方法，但决不是目的本身，至多只是一种方法。只有当一种新的安排方式有助于回答我们早已决定要问的问题时，它才有科学上的价值。这就是为什么所有科学都始于我们知识上的无知：不是对一切事物的无知，而是对某些特定事物的无知，比如，国会的起源，癌症的病因，太阳的化学构成，不用人畜推动的水泵的工作原理，等等。科学就是发现事物；从这个意义上说，历史是一门科学。①

科林伍德说是培根制定了近代科学的宪章，提出"科学家不应消极地观察自然，而应积极地询问自然，即通过他头脑中形成的问题来研究自然。"②科学不是始于消极的观察，而是始于积极的发问、探索，这一点对历史学同样适用。科林伍德说："历史研究的出发点，不是搜集和思考未加解释的原始材料，而是提出一个问题来引导我们去寻找能够帮助我们回答这一问题的史料。一切历史研究都是以这种方法专注于一些特别的疑点或问题，并以此确定自己的研究对象。"③这样，在科林伍德看来，历

① The Idea of History, P9.

②③ W·J·van der Dussen: History as a Science, P298, P299.

史研究就是一项提问和解题的活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同意历史是一门科学的说法。但现在这句话的含义与实证主义史学的原始含义已经完全不同了。实证主义认为科学始于客观的、不带任何先入之见的观察，对史学来说，则始于史料的尽可能全面的搜集。科林伍德针锋相对地提出历史研究同科学一样始于问题，是问题帮助我们在浩如烟海的史料中保持正确的航向，成功地驾驭史料来回答我们的问题。当然要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并不是随便什么问题都能引导我们去从事研究。科林伍德认为，提问必须符合某些必要的条件：（1）问题必须包含某种假设；（2）问题与史料证据的关系必须是明显的；（3）问题必须出之于正确的程序。这三点都强调了提问不能漫无边际、随心所欲，也不能含糊不清、琐细无聊，科学并不过问于一般或过于琐细的问题，象科学一样，历史研究提出的问题也应遵循“限定目标的原则”，把目标限定在那些需要解释又能够回答的特定问题上。

英国哲学家沃尔什在《历史哲学导论》中也着重讨论了历史与科学的关系，他首先分析了科学的特征，认为科学具有如下的特征：（1）它是通过一定方法获得的系统的知识；（2）它由一组普遍原理所构成，或者至少包括一组普遍原理；（3）它

能帮助我们成功地预测未来事态的进程，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是如此；（4）它是客观的，就是说，任何怀有偏见的观察者，不论其个人偏好或个人处境如何，只要将证据放在他面前，他就会承认它。接着，沃尔什将历史同科学的这四个方面的特征一一加以分析比较，以此来阐明历史同科学的关系。沃尔什说："就历史按照它自己的方法和技术追求自己的目标这一意义来看，说历史是一项科学研究似乎是难以否认的。"① 历史研究的是人类过去的经验和活动，成就和痛苦，这种研究经过人们一代一代的努力，特别是最近两个世纪以来，在研究方法上已经日趋完善。虽然人们可以争辩说，历史是用日常语言撰写的，它并未发展出自己的一套专门术语，历史可以为没有受过专门训练的一般人所理解，而自然科学则不然；据此，不能将历史与科学相提并论。这确系事实，但从这一事实并不能得出结论说，任何傻瓜都能够撰写历史。一个受过历史学方法训练的人与一个未受此训练的人相比，在进行历史研究时，无疑要优越得多。所以从第一方面来说，沃尔什认为历史可以称得上是科学的研究。但是，与科学的其它特征相比，历史与科学

① W·H·Walsh: "Philosophy of History, An Introduction", P37.

的差异就很明显。与科学不同，历史学家在自己的研究中并不追求建立普遍原理，沃尔什说："历史学家全神贯注之所在，无疑是个别事件的过程，而非一般原理。这个别事件是他希望加以解释并赋予其意义的。他要做的是说明发生了什么，并同时解释为何发生，……不象科学家，他并不时时力图越过事件去考虑事件所说明的普遍原则。例如，他感兴趣的是一七八九年的法国革命，一六八八年的英国革命或一九一七年的俄国革命，而不关心（除个别情形外）诸如此类革命的一般性质。"① 当然，历史学家并不仅仅关心事件，他们常常进一步去说明一个时代人们的特征和性格。比如他们常常关心此类题材：中世纪的英国，启蒙时代的法国，维多利亚时代等等，并努力在他们的著作中告诉人们大量关于那些时代、那些国度的人们的一般性格特征。这虽然也是历史研究的重要内容，但不应将此同科学研究混为一谈。因为这种研究所得出的结论同个别事件的陈述相比虽可说是一般的，但这并非"真正意义上的普遍判断，它们只是关于某些特别事件的高度浓缩的总结罢了"。② 它同科学所要寻找的普遍原理根本不是一回事。科学定律所概括的

①② W·H·Walsh: "Philosophy of History, An Introduction", P38—39.

对象是开放的、无限的，而历史研究即使是讨论一个很大的时代，其对象也是有限的、封闭的。同科学的第三个特征、预言未来的特征相比，历史也显然不同。确实，研究历史是为了说明现实，如果过去同现在没有任何联系，人们何必操心去研究历史呢？对于历史的研究使历史学家在预测未来方面比对历史一无所知的人要来得高明，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能确切预言未来，这和他们的研究对象与科学家的不同有关。沃尔什说："如我们所知，科学家的基本兴趣是在一般真理，他们运用这一真理去做预言；相反，历史学家的基本注意力集中在个别事件上，他们在工作过程中，几乎不下什么普遍的结论。这一点或许可以解释他们为何不能预言未来，尽管他们的工作使得他们在这一方面优于那些毫无历史知识的人。"① 关于客观性的特征，历史与科学更是大相径庭。沃尔什说，历史客观性的问题"是分析的历史哲学中最重要也是最棘手的问题。"② 虽然任何一个著名的历史学家都知道自己的工作要求某种公正和客观，反对将历史变作宣传，反对将个人感情和先入之见掺和到对历史的看法中去，大多数历史学家也会同意他们的工作只是一种

①② Philosophy of History, P84.

追求知识的活动，研究对象是与主体无关的独立的过去。但事实上，历史学家之间的分歧是司空见惯的，而且是难以调和的，对同一史料证据人们会做出各种截然不同的解释，马克思主义的或自由主义的，天主教的、新教的，或理性主义的，保皇党的和共和派的等等。该如何解释这种现象呢？沃尔什说，主要是因为历史思维中主观因素的作用不同于其在科学思维中的作用，历史思维中极为突出的特征是它的选择性。这种选择性至少包括两种含义：（1）每一部历史著作都是部份的，因为一个历史学家不论其兴趣多么广泛，都只能将自己的注意力集中在过去的某一方面或几个方面；（2）没有一个历史学家能够把过去发生的事讲得面面俱到，即使在他本人的研究领域中也是如此：人们必须选择某些事实给以特别强调，而忽略其余。正是这种选择性，使得历史中主观色彩远胜于科学，而无法达到科学中的那种客观，并造成历史学家间对同一问题的意见分歧。影响历史学家选择的因素很多，如个人偏见、党派利益、理论或哲学观的差异等等。沃尔什认为这些因素往往是不可避免的，观察历史总要根据一定的观点，这观点与其说是对立的，不如说是互补的。“历史为我们提供了关于过去的一系列不同的图画，它们并不是互不相容的，每一幅

画都从某一观点反映了过去的一个方面。”① 每一种历史都反映了历史的一个方面，一种形象，历史正是这样一种学科。沃尔什说：

> 历史，并不是作为实践活动的科学的一个分支，我们可以用心理观察来支持我们的主张，因为生活在文明社会中的人都会感到为了自己现实活动的目的需要去描绘过去的图景；他们对过去感到好奇并力图重建这过去，因为他们希望从那里发现他们自己的志趣和利益。既然他们看到的历史取决于他们的观点，这种需要就总是在某种程度上得到满足的。从这里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说历史之光并不投射在“客观的”事件上，而是投射在写历史的人身上，历史照亮的不是过去，而是现在。毫无疑问，这就是为何每一代人都觉得有必要重写他们的历史的缘故。②

既然在不同的人眼中有不同的历史，每人都有权利按自己的观点、利益来看历史，那么客观的历史不就没有了吗？沃尔什不同意这种极端的看法。他认

① Philosophy of History, P21.
② Philosophy of History, P111.

为，历史象是一种游戏，它要求玩这种游戏的人遵守一定的规则，否则这游戏就玩不下去了。历史的客观不同于科学的客观，却与艺术的客观很相象。比如，一个肖像画家要根据自己的眼光来观察对象，但他同时必须内在地把握对象的真实特征；同样，一个历史学家也是从自己的先入之见出发来看待历史的，正是这种观点帮助他从一特定的角度看到历史的一个方面。总之，沃尔什通过他的分析否认将历史等同于科学的看法。

英国历史学家卡尔主张历史是一门科学，同科林伍德一样，他将科学重新做了定义。他这样做有着特殊的理由。卡尔说："我反对人们拒绝把历史叫做科学的主要点是，这会为所谓'两种文化'之间的裂缝进行辩解，而且使它永远存在下去。"① "两种文化"是英国作家C·P·斯诺在一九五九年的一次著名讲演中提出的一个说法。斯诺认为在科学家和人文学者之间的鸿沟正在日益加深拓宽，他们互不沟通，缺乏共同语言和相互间的理解信任，在他们之中产生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斯诺的讲演在当时引起了人们的重视和深思。卡尔反对在历史和科学之间划定界限，就是出于反对在两种文化之间加深鸿沟的愿望。他说："我本人还不相信，

① E·H·卡尔：《历史是什么？》，中译本，第91页。

使历史学家跟地质学家分开的那个裂口，就一定比使地质学家跟物理学家分开的那个裂口要深些，或者无法填补一些。……我想提出的一个补救办法便是改善我们历史的标准，使它更科学一些，使我们对于追求这一目标的人要求更严格一些。……另外一个弥补这道裂缝的办法是促进对科学家们与历史学家们之间的目标的同一性的更深刻理解。”①卡尔强调历史和科学的目标一致，并不是指具体的研究目标（如科学追求一般原理，历史探讨个别价值），而是指两者对于人类生存的意义。他说：“科学家们，社会学家们以及历史学家们都在从事同一研究的不同部门的工作：研究人及其环境，研究人对环境的影响以及环境对人的影响。这项研究的目标是相同的：增加人对于他的环境的理解以及对于环境的控制能力。”②接下来，卡尔和科林伍德一样，也认为历史与科学同是遵循问答逻辑的。他说：“物理学家、地质学家、心理学家以及历史学家在他们的假定和方法的细节方面，是很不相同的。我并不坚持这样的主张：为了更加合乎科学，历史学家必须更加专心地仿效自然科学的方法。然

① E·H·卡尔：《历史是什么？》，中译本，第91—92页

② 同上书，第92页。

而，历史学家与自然科学家在寻求解释这一根本目的上，在提出问题与回答问题这一根本步骤上，是团结一致的。历史学家，正如任何其他科学家一样，也是个不断提出‘为什么’这一问题的一种动物。”①

关于历史与科学的讨论远不止以上这些，这是人们讨论最多的一个问题。尽管讨论中大家各抒己见，颇多分歧，但在反对实证主义史观上却是相当一致的，不管人们是否意识到这一点，事实上，各种意见都是从这一点出发的。从以上讨论中可以看到，对实证主义史学的批评大致有两种做法：一是具体对照历史与科学的特点，指出两者的性质及在研究对象、目标、方法等诸方面的不同，从狄尔泰一直到沃尔什都是这样做的；另一种做法是重新定义科学，从更一般的意义上来看待科学活动及科学的功能目标，以此将历史包容到科学中去，虽然它同意历史是一门科学，但这个看法与实证主义观点完全不同，科林伍德、卡尔等人的做法就是这样。

在传统的思辨历史哲学看来，历史同哲学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是不容置疑的。黑格尔就力图从哲学高度来把握历史，并认为只有哲学的眼光才能越过历史表面的喧嚣去透视历史进程中的绝对精神。但是黑格尔这样的哲学家并不尊重历史，他仅将历

① E·H·卡尔：《历史是什么?》，中译本，第91页。

史当做哲学观念的证据。实证主义史学反对传统的历史哲学的这种统治和干预，宣布历史是独立的科学，努力清除传统哲学对史学的影响，其出发点是对的。但这种努力并不很成功，这并不是因为他们还不够努力，而是因为他们并未正确理解历史与哲学的关系。用外在的哲学框框来图解历史固然行不通，但这并不能证明历史就不需要哲学，或者说历史就与哲学无缘。只有那些没有思想能力、鼠目寸光的资料搜集者才会不懂得这一点，真正优秀的历史学家从来不这样简单地排斥哲学。比如，兰克虽然反对用哲学思辨来代替历史研究，但他并没有主张在历史研究中排斥哲学，相反，他甚至认为在认识人类、认识永恒、无限和上帝方面，历史比哲学更优越。因为哲学仅从一般出发来认识永恒和无限，而历史则从每一个别中都看到了永恒、无限，看到上帝无所不在的意志和力量。实证主义人为地分裂离间历史和哲学，不仅有害于史学研究的深入，更为重要的是，在当代严峻的现实面前，史学丧失了正视生活、回答现实挑战的能力。所以这种做法理所当然地受到当代人的反对。斯宾格勒作为一个思辨的历史哲学家就宣称："一切真正的历史著作都是哲学，除非它纯粹是一种蚂蚁工作。"①

① 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第67—68页。

分析的历史哲学也同样主张加强历史同哲学的交流联系，这并不简单的是指在历史学家和哲学家之间多对对话，而主要是强调历史本身应具有思想的力量。克罗齐认为历史就是哲学，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基于这样的主张。科林伍德认为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历史研究是对过去思想的重演，强调历史中思想的地位，思想的作用，同样是为了恢复历史与哲学的统一。科林伍德认为哲学探索有赖于历史研究，历史研究离不开哲学思考。他在自传中说："当我五十岁时，回顾我过去的工作，我的主要目的就是旨在重建历史与哲学的统一。"①重建历史和哲学的统一，是从反对实证主义史学的立场出发的，也是从二十世纪的现实出发的。虽然不同的人对此提出了不同的主张、不同的方案，但主旨基本上是相同的，就是要恢复理性思辨和思想主题在历史中的地位和尊严。这不仅是分析的历史哲学，而且是当代整个历史理想中的一个基本课题。分析的历史哲学只是在理论上探讨了这一课题，而更重要的却是在实际研究中做好这一课题。

把历史看作一门艺术，这是一种非常古老的看法，在古典时代人们就将历史看作是艺术的一个分支。以后神学、哲学相继统治历史，导致了十九世

① W·J·van der Dussen: History as a Science, P65

纪史学的独立。然而，这种独立在某种意义上说是以丧失自己的个性、将自己淹没在科学行列中为代价的。史学家争相仿效科学家们严谨、客观和注重经验实证的作风，这种模仿落实到研究实际中，就变成了对资料和考据的崇拜。这样做，严谨固然严谨矣，客观固然客观矣，科学的目标似乎追求到了，历史"被弄得象门科学似的"①，但这同时也使大多数历史论著变成了枯躁乏味的资料堆砌，既缺乏思想，更少有趣味。历史不再是使一般读者在赏心悦目的阅读中获得教育和享受的艺术作品，而仅仅成了在极少数专业研究者中才能进行的干巴巴的对话。总之，历史不再能启发人们的心智，激起人们的热情，它丧失了自己最古老也最重要的传统，即作为一门艺术的传统。这一点也使现代人感到精心疾首。人们重新捡起最古老的话题，争辩说：历史是一门艺术，或者至少不应忘记历史除了其它属性外，它还同时是一门艺术。当然，坚持历史是一门艺术并非当代的创新。十九世纪英国历史学家麦考莱（Thomas Babington Macaulay，1800—1859）就说过一句很著名的话："历史，在它的圆满理想的境界，至少是一种诗和哲学的合成品，它通过特定人物和特定事件的生动描述将一般

① 《当代西方史学流派文选》，第201页。

真象印入人心。”①他提到了诗（艺术）和哲学，唯独没有提到科学。经过实证主义史学的“独立运动”以后，当代人重新提出历史是一门艺术，却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人们主张历史是艺术的出发点，更多的是强调历史的实践功能，而不是它的审美价值。英国历史学家屈维廉（George Macaulay Trevelyen，1876—1962）一九一三年发表了一篇论文，该文针对伯瑞“历史是一门科学，一门不折不扣的科学”的话，以“克莱奥，一位缪斯”为题。在文章里，屈维廉认为历史与自然科学有两点不同：一、它不象自然科学那样有实际的效用，一个人的历史知识再高深，也不能借此发明蒸汽机或治疗癌症等；二、它不能像自然科学那样演绎出普遍适用的因果规律。引力规律是普遍有效的，说饥荒能引起暴乱却算不上一条规律，因为饥荒也常常导致屈服。所以把历史等同于自然科学的结果是使人误入歧途。屈维廉说：“把历史同自然科学类比的做法，在过去三十年里错误地引导历史学家离开了他们的职业的正确道路。在关于过去的知识里，没有实用的价值，也没有科学地演绎关于人类的行动的因果规律的方法。总之，历史的价值不是科学

① 转引自陈明鉴：《马考莱的史学观点》，载《世界历史》，1981年，第4期。

的，它的真正价值是教育方面的。它能够使人们回想过去，从而教育人们的心智。”①历史的教育价值在于帮助人们回想过去，启发心智，开拓胸襟，消除偏见，孕育热情，激发志气，帮助人们欣赏文学作品和凭吊古迹。但是，历史学家受了“使人德意志化的教士集团的训练”，不把历史当作一个故事，而是把它当作一门科学，以致他们会“如此严重地忽视了归根到底是历史家的主要技能的东西——叙述的艺术。正是在叙述方面，近代历史著作是最薄弱的。而且照我想来，这是一个很严重的缺点——事实上是带有根本性的缺点。……就历史的不变的本质来说，它乃是‘一个故事’。围绕着这个故事，就象血肉围绕骨骼一样，应该贯穿许多不同的事物——对于人物的刻画，对于社会的和文化的运动的研究，对于可能的原因和结果的探讨，以及历史家能够用以说明过去的任何东西。但是历史的艺术始终是叙述的艺术，这是最基本的原则。”②屈维廉认为历史有三种不同的任务：一、科学的，即史实的积累和证据的检验；二、想象的或推测的，研究史实，做出推测和概括；三、文学的，以惨淡经营的文学技巧把科学和想象的结果陈述给广

① 《当代西方史学流派文选》，第182页。
② 《当代西方史学流派文选》，第182页。

大公众。屈维廉反复强调历史研究中艺术的地位，认为艺术至少应是历史的主要特征之一。他强烈反对在历史中为了其它原因而牺牲艺术，他说："有一种说法，认为读起来有趣的历史一定是资质浅薄的作品，而晦涩的风格却标志着一个人的思想深刻或工作谨严。实际情况与此相反。容易读的东西向来是难于写的。"①反复锤炼写出优秀的历史来，是历史学家的份内之事，它要求历史学家不仅具有学术能力，而且具有艺术修养，这样才能成为合格的历史学家。屈维廉的论文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四十年后，他的同胞、哲学家罗素还对此文记忆犹新。像屈维廉一样，罗素也强调在教育方面历史的艺术力量所发挥的作用，他认为历史兼有科学和艺术的成分，但整个说来，历史是一门艺术。"历史——我将这样坚持认为——就象人们公认的诗歌的情况那样，是每个人精神生活中值得想望的一部分。"②"历史所能够做和应该做的，不仅是为历史学家们，而且为所有那些受过教育而具有开阔眼界的人，表现某种精神气质，即关于当代事件及其与过去、将来的关系的某种思维方式和感觉方

① 《当代西方史学流派文选》，第193页。
② 《现代西方历史哲学译文集》，第130页。

式。”① 主张历史是艺术不仅是考虑到历史的上述教育功能，而且在于它的认识功能，这一点也为很多人所强调。前面我们已经提到沃尔什认为历史思维与艺术思维是类似的，两者都是从每个主体特定的角度出发来观察和把握客体。当然这只是两者相似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两者都是从具体和个别出发来丰富和深化人类的一般认识。认识什么？历史最重要的认识功能在于它帮助人类认识自我，这一点又是与艺术相同的。当代哲学家卡西尔说：

> 毫无疑问，没有历史学，我们就会在这个有机体的进展中失去一个必不可少的环节。艺术和历史学是我们探索人类本性的最有力的工具。没有这两个知识来源的话，我们对于人会知道些什么呢？我们就只能依赖于我们个人生活的资料，然而它能给予我们的只是一种主观的见解，并且至多只是人性的破镜之散乱残片而已。诚然，如果我们想要完成由这些内省资料所暗示的那幅图画，我们可以求助于更客观的方法：我们可以做心理学的实验或搜集统计事实。但是即使这样，我们描绘的人

① 《现代西方历史哲学译文集》，第146页。

> 的图画将仍然是僵滞呆板、毫无生气的。我们将只会发现“平常的”人——注重实际和社会交往的日常的人。在伟大的历史和艺术作品中，我们开始在这种普遍人的面具背面看见真实的、有个性的人的面貌。为了发现这种人，我们必须求助于伟大的历史学家或伟大的诗人……。诗歌不是对自然的单纯摹仿；历史不是对僵死事实或事件的叙述。历史学与诗歌乃是我们认识自我的一种研究方法，是建筑我们人类世界的一个必不可少的工具。①

历史作为一门艺术并不仅仅在功能上与艺术相似，而且在于它们的表现手段也极为相似。历史著作是一种文学作品，它通过生动、具体、形象的叙述把历史呈现在读者面前。这种叙述并不仅仅是一种艺术手段，它本身就具有认识论的意义。这一点最近正越来越受到历史理论讨论的关注和史学研究实践的重视，这种势头被人们称之为“新叙述史的复兴。”美国哲学家路易斯·明克在《国际历史研究手册》上撰文评述当代西方历史哲学时说：“近来历

① 〔德〕恩斯特·卡西尔：《人论》，中译本，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第261—262页。

史哲学的发展渐渐已经不再倾向于把历史研究作为‘科学的’，甚或‘社会科学的’分支来加以分析，而是更多地倾向于历史写作的结构，即强调恢复传统的，但常常被忽视的历史与文学之间的联系。不过，这仍然是强调叙述结构的认识论意义，而不是强调文体的优美。这种令人注目的转变的前提是：在叙述性的史学中，叙述的形式既具有本体论的意义，又具有认识论的意义；它不是被概括出来、抽象出来的，也不能分成独立的部分，或根据其中的某一方面加以规定。在这方面，几乎完全是由从事实践的历史学家来为历史哲学作出贡献的。G·汤尔顿《历史的实践》（1967）和J·赫克斯特的《历史入门》（1971）均未涉及批判的历史哲学的有关争论，但都强调了叙述形式的必要性。后者进而指出存在一种独特的历史的或‘过程性’的解释，而这种类型的解释只有为叙述的形式本身来展示。”①历史的解释只能由叙述的形式来展示，这是“新叙述史学”的基本主张。这一主张值得我们充分重视。

在历史上，艺术、哲学和科学曾先后给史学打上了深深的印记。当代关于历史学性质的争论，实

① （美）L·明克：“当代西方历史哲学述评”，载《国外社会科学》，1984年，第12期。

际上是在现代意义上重温、或者用科林伍德的话来说“重演”历史；另一方面，这又是在现代水平上对这种历史的综合。当代的争论并未越出整个历史所给的范围，却大大超出了历史上各个时代的局限，所有的争论似乎可以归结为这样一点：历史就是历史，它是历史上曾经争论过的一切（艺术、哲学、科学），但又什么也不是。这场争论似乎并没有解决实证主义史学留下的问题，人们似乎也不急于想一劳永逸地解决这个问题。争论的意义看来就在争论本身，它启发了人们的思想，深化了人们的认识，也影响和推动了历史学的实践。

（2）理论与史实

理论与史实的关系是每个历史学家在历史研究中必然碰到的一对关系，实证主义史学认为在历史研究中史实是先于和独立于历史学家的客观存在，历史学家的工作是通过搜集考订史料来确立史实，然后才能做理论上的概括，而所谓概括，当时在多数人看来无非是让史实本身来说话。也即是说先有史实，然后才能有理论概括。实证主义的这种史观在当代受到了普遍的反驳。克罗齐首先对此发难，他毫不容情地指出实证主义的主张是一种假想和幻觉。按照他的观点，理论和史实是不可分割的，他

说："认为史料存在于历史之外的看法也是一种应予消灭的假想。"①问什么是历史事实什么是非历史事实是毫无意义的，所谓非历史事实就是没有被思想过的事实，因而是不存在的。"历史存在于我们每一个人身上，它的资料就在我们自己的胸中。因为只有在我们自己的胸中才能找到那种熔炉，使确凿的东西变为真实的东西，使语文学与哲学携手去产生历史。"②把这段话同我们前面介绍过的他的思想结合起来，我们就能理解他的意思了。如前所述，克罗齐认为真正的历史、活的历史是回荡在当代人心灵中的历史，这种历史并不是靠单纯搜集史料证据、罗列史实就能重建起来的，再现过去需要有内在的精神动机，正是这种精神动机为我们指明了方向，帮助我们去重建过去。生活中一旦产生了这种强烈的精神冲动，我们就知道如何去选择史料，再建过去。另一方面，历史就是精神活动，就是思想过程，所谓历史事实就是我们正在思想着的事实，它同我们的思想、精神活动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不可分割。每一件史实都渗透着理论，包含着解释，只要它涌现到我们头脑中，就必定如此，纯粹的、赤裸裸的史实是没有的。

科林伍德认为，十九世纪史学的基本理论前提

①② 克罗齐：《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第11页，第14页。

是它对历史事实的实证主义观点，这种观点将历史事实看做是离散的和原子的，这导致了当时的历史学家在对待历史事实时采取了两条方法论规则：（1）每一事实被认为是能通过个别的研究来加以确定的，这样历史知识的全部领域就被分割为无数细小的、能够孤立地加以思考的事实。（2）每一事实不仅被认为是独立于其它事实的，而且是独立于研究者的，因此，历史学家的任何主观因素必须消除，历史学家不应对事实加以评判，他只应如实叙述。实证主义史学的这种观点固然包含了某些合理的价值：它要求历史学家尽可能达到细节的准确，并训练他们尽量不把自己的感情因素渗入到研究对象上去。但这种观点在原则上是错误的。第一条规则导致这样的结论：在历史中除非是一个微观问题或能被当作一组微观问题来处理的问题外，其余的问题都是不合法的。科林伍德说，“近代实证主义史学在这方面的遗产就是对细节问题的空前精通而在处理重大问题方面的空前无能。”①另一方面，拒绝对事实做出评价则意味着历史只是一种外在事件的历史，而不是事件所由以发生的思想史。这就是为何实证主义史学陷入了将历史等同于政治史

① R·G·Collingwood: The Idea of History, P191—192.

的那个陈套中，而忽视了艺术史、宗教史、科学史等的原因。因为这些课题是实证主义史学没有能力对付的。科林伍德强调历史事实与科学事实不同，历史事实既不能重复，又无法直接感知，实证主义史学恰恰忘记了这种区别。按照科林伍德的观点，历史不是孤立的、个别的事件的集合，而是生生不已、无始无终的过程，研究历史是要透过历史事件的表象去辨析出其中的思想来。历史就其主观方面来说是过去思想的重演，所以它自始至终是一个思想过程，是一种反复问答的活动，根本无法把它截然分为搜集史料、确定史实和概括规律、阐发意义这样两个不同的阶段。在这一过程中，思想和历史是不可分的，也就是说，理论和史实是融为一体的。

克罗齐和科林伍德的观点基本上代表了分析的历史哲学在这一方面的看法。这种看法是基于这样一个重要认识之上的：人不能完整准确地认识历史，或者说，人对历史的认识永远不能同历史本体达到绝对的同一，从这一认识出发，人们甚至否认有绝对永恒的历史本体存在。克罗齐早就指出了这一点，他说历史无限，而人的所知有限，这是一个极令人苦恼的矛盾。这种矛盾不仅限于我们所知甚少这一方面，而且在于我们的所知极不确切。

事实上，关于罗马或希腊诸国的源流、关于希腊和罗马以前各该国的民族，尽管我们拥有学者们的全部研究，我们究竟知道些什么呢？如果关于这些民族的生活有什么断简零编传到我们手里，人们对它的解释又是多么不确凿啊！如果有些传说流传到了我们手里，那又是多么贫乏、混乱和矛盾百出啊！……但模糊并不限于"起源"方面；整个历史、甚至与我们最接近的近代欧洲史都是模糊的。……关于9月中的日子，关于雾月十八日，关于莫斯科的焚毁，人们写出了堆积如山的书籍；但是谁说得清这些事情真是怎样发生的呢？甚至那些直接目击的人也说不清，因为他们遗留给我们的叙述是分歧的和矛盾的。我们就不谈大历史吧！至少对于一件小历史，姑且不说有关我们的国家、城镇或家庭的小历史而说我们每一个人自己的极小的历史，我们能不能完全知道呢？……①

克罗齐在这段话里提出的问题是难以否认的。既然

① 克罗齐：《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第36—38页。

如此，人又该怎么办呢？克罗齐回答说，很简单，“忘掉它们”，忘掉无限的历史，因为它不仅无用，而且有害：“通向无限的道路跟通向地狱的道路一样宽广，如果它不导向地狱，它就必然导向疯人院。……它对我们是没有用处的；它只会使我们望而生畏。”① 要认识历史，就应把眼光放在具体可怜的有限上，“只有可怜的有限才对我们有帮助，才是肯定的、具体的，才能被思想所掌握，才能成为我们的存在基础和我们的行动起点。”② 在这里，为我们提供观察有限的视角的是现实。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它只同当代的兴趣有关，为当代的兴趣照亮，这种历史必然是有限的，它只限于当代的兴趣和需要知道的那一部分。历史的其余部分既与现实无关，就不能为现实所知。然而，这种历史对现实来说，又是整体和全部，是现实所感兴趣和需要知道的全部。克罗齐说：“我们不能不说，在每一顷刻，我们都知道我们所须知道的全部历史；其下余的既与我们无关。我们就无法知道它，或，到有需要时我们就会有办法知道它。”③ 克罗齐从这一立场出发，断然否认存在独立于人的认识和思想之外的历史本体，认为这只是一种永恒的幻想，是一种应该

①②③ 克罗齐：《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第87、33页。

克服的二元论观点。他在上述那段话之后接着说："那种'下余的'历史是关于'物自体'的永恒幻想，它既不是'物'，也不是'自体'，它只是我们的行动和知识的无限性的想象的具体化而已。"① 既然人不能认识普遍、无限的历史，既然不存在历史的"物自体"，即历史本体，那么在历史认识活动中，人的主观意向就成为决定性的东西了，它将决定人们的历史认识的内容和结果。而这种主观意向不管我们承认与否，不正是一种理论指导吗？

克罗齐的观点哲学意味太浓，当代美国历史学家卡尔·贝克尔（Carl Becker，1873—1945）则更为直截了当地表达了这种看法，他的观点在当代历史理论中影响甚大，很有代表性。一九二六年四月，贝克尔在康乃尔大学科学研究会上宣读了一篇论文："什么是历史事实？"讨论了三个问题：（1）历史事实是什么？(2)历史事实在哪里？(3)历史事实发生于何时？贝克尔的回答是：(1)历史事实是可以使人们想象地再现某一事件的一个象征。因为历史事件一去不返，历史学家不可能与事件本身打交道，他所能接触的仅仅是关于这一事件的一些记载，记载和事件之间有很大的差别，记载仅是一份证实发生过某个事件的材料。（2）历史事实存在于人们的头

① 克罗齐：《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第98页。

脑中，否则就不存在。显然，一个历史事实若无人知道，我们又怎能说它存在呢？贝克尔说，任何历史事实，“只有当人们，你或我，依靠真实事变的描写、印象或概念，使他们生动地再现于我们的头脑时，它才变成历史事实，才产生影响。”① 既然历史事实只存在于人们的头脑中，那么此刻它就是现在的一部分。现在只是时间中一个不确定的点，它不断变动着，人的思想也不断变动着，所以历史事实也在不断变化着。贝克尔说：“客观的过去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而历史领域是一个捉摸不定的领域，它只是形象地被再创造，再现于我们的头脑中。”② 一九三一年，贝克尔又在美国历史学会会议上发表了著名演说：“人人都是他自己的历史学家”，进一步发挥了自己的观点。他说：

> ……我们承认有两种历史：一种是一度发生过的实实在在的一系列事件，另一件是我们所肯定的并且保持在记忆中的意识上一系列事件。第一种是绝对的和不变的，不管我们对它怎样做法和说法，它是什么便是什么；第二种是相对的，老是跟着知识的增加或精炼而变化的。这两系列事

①② 《现代西方历史哲学译文集》，第231、233页。

作或多或少是相应的，我们的目的便是求这种相应尽量确切；但是事件的实在的一系列，在我们看来，只存在于我们所肯定并且保持在记忆中的那意识上的一系列之中。这便是为什么我不得不把历史和历史知识等同起来。为了一切实用的宗旨，对我们和对目前一时来说，历史便是我所知道的历史。①

从这一立场观点出发，贝克尔对历史做了严格的语义分析，得出了一个他认为是最简化的定义："历史是说过和做过的事情的记忆"。② 贝克尔由此批判了十九世纪史学家的幻想，十九世纪历史学家认为他们的工作就是展现所有的事实，让他们为自己说话。贝克尔认为这是一种可笑的幼稚，因为历史只是我们所知道的历史，所以要展现所有事实就是不可能的。他说："认为史学家要展现全部事实的论点是荒谬的。因为，首先要展现全部事实是不可能的；第二，即使你能展现所有的事实，那些鸡飞蒜皮的小事也不能说明任何问题。"③ 另一方面，让事实本身说话即使能做到的话也是一种假象。真

① 《当代西方史学流派文选》，第260页。
② 同上书，第261页。
③ 《现代西方历史哲学译文集》，第235页。

实的情况决不是历史通过我们来说话，而永远是我们通过历史来说话。历史学家决不是历史的消极的传声筒，他写历史、叙述历史永远要进行选择，选择那些他认为有意义、有价值的人物、事件等等。而这种选择离不开理论的指导。贝克尔说："去选取和确认即使最简单的一堆事实，便是去给它们在某种观念模型内以某种地位，仅仅如此便足以使它们取得一种特殊的意义。……因此说话的并不是那种未经区别的事实，而是历史学家的理解。"①

贝克尔的观点被他的批评者指责为历史相对主义，然而，正是这种历史相对主义成了当今西方历史理论的一个认识论基础。历史事实不再被看作是独立外在的本体或实在，理论在历史研究中被赋予了优先的地位。爱因斯坦的话"只有理论能够决定什么是可能被观察的"，也是历史学家的信条。与十九世纪历史学家"无史料斯无历史"的看法相反，当代历史理论认为："没有理论，历史是不可能想象的"②。英国历史学家赫勒（Agnes Heuer）说："编史工作不应用指导性原则，是无法进行的。如果有人不知道必须寻求什么，那么他或者什么也不去寻求，或者淹没在历史事实的汪洋大海之中，没

① 《当代西方史学流派文选》，第274页。
② F·Stern: The Variety of History, P291.

有希望重新登上稳固的陆地。”“反对利用指导性原则的历史学家犹如一个水手，决定不用地图、罗盘，甚至不听听别的水手有关海上经历的叙述，便扬帆出航。”① 他还说，历史的意义“是由理论提供的；证人是根据理论进行陈述。理论越完善，叙述就越能引人深思。”② 强调理论的重要性和优先性，并不意味着历史学家可以以论代史，如果这样的话，那就为传统的思辨历史哲学打开了大门，而是要求历史学家自觉地提高理论素养。不仅如此，既然只有理论、主观选择才能决定我们观察历史的角度和内容，这种观察就必然有局限和偏差。强调理论的优先同时也就意味着自觉地认识自己会有的主观局限和个人偏见，以便更好地从事历史研究。事实上，理论和史实不可偏废，也不分先后，是历史研究的同一个过程的两个侧面。卡尔说得好：“历史是历史学家跟他的事实之间相互作用的连续不断的过程，是现在跟过去之间的永无止境的问答交谈。”③

---

①赫勒：“编史工作的指导原则”，载《文摘》1984年，第9期。

② 赫勒：“史学的理论与方法”，载《文摘》1984年，第8期。

③ 卡尔：《历史是什么？》，第28页。

(3) 历史中的解释

既然历史不是史料的堆砌，也不是史实的罗列，而是人们对过去的一种记忆和解释，那么，这种解释具有什么特点呢？任何解释总要碰到因果、规律之类的范畴，当代分析的历史哲学也是从这些方面来讨论历史的解释的。

自从启蒙时代以来，人们就相信历史发展是有规律可循的，传统的历史哲学更是以探讨历史发展规律为己任，提出了五花八门的历史哲学理论。十九世纪的史学反对历史哲学的主观武断，却并没有抛弃启蒙时代以来对历史的理性主义观点，它实际上是接受了关于历史规律的假设。虽然大多数实证主义史学家埋头于史料史实的细节，他们的让事实本身来说话的主张还是隐含了历史有因果和规律的假设，否则事实怎么说话又能说什么话呢？除了这沉默的但决不是反对派的多数外，确实还有一些历史学家，他们象黑格尔、孔德等哲学家一样确信存在着历史规律，而且人们能发现这规律。柏克尔就是一个典型。但是，启蒙时代以来的这种理论假设在当代受到了最严厉的批评，人们普遍放弃了启蒙时代以来关于历史规律的那种假设，而从新的角度来看待历史中的解释。

当代历史理论中关于历史规律的最有影响和最有代表性的观点是英国哲学家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r）提出来的。卡尔·波普尔是当代著名的分析哲学家，他在三十年代就独树一帜，提出了他的批判理性主义哲学。波普尔认为，科学始于问题，而不是像近代以来归纳主义的科学观所认为的那样，始于观察。而有了问题以后，人们也并不忙于去观察，在观察之前，每个人都必须要知道观察什么？波普尔非常重视爱因斯坦的科学实践，他和爱因斯坦一样，强调只有理论才能决定什么被观察。波普尔认为，一个科学问题产生以后，人们接着要做的是提出一个试探性的理论来回答问题，然后才按照理论的指引去进行实际的观察（包括实验等等），观察的目的是为了检验这个试探性的理论。如果观察的结果支持了理论，那么这个理论就站住了脚。但是任何理论，只要它是科学理论，它就终有一天会被证伪，即被证明是错误的，哥白尼推翻托勒密，爱因斯坦取代牛顿，科学史上充满了这种革命。科学的发展就是新旧科学理论的不断代谢。什么是科学？科学就是能被证伪的理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不是科学，恰恰相反，它是伪科学，因为它不能被证伪，也就不能被取代、超越，它窒息发展、进步，成了万古不变的教条和陈词滥调。所

以波普尔又把自己的哲学称之为证伪主义。根据自己的理论，波普尔提炼出这样一个公式：

P_1————TT————EE————P_2……

（问题1）——（试探性理论）——（消除错误）——（问题2）……波普尔的批判理性主义哲学对当代思想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他根据这一理论探讨了历史理论问题，并写了《历史主义的贫困》、《开放社会及其敌人》这两本专著。由于他在当代思想界、学术界的影响，他的历史理论也受到人们的相当重视。

波普尔认为，历史与自然科学一样始于问题，这一点他和科林伍德持相同的观点。接着，人们便提出一个假设，也即试探性理论来回答这个问题，然后把理论放到史实中去做有选择的观察。一直到这里为止，历史与科学没有区别，但接下来的情况就完全不同了。科学理论将受到严格的经验检验，最终被证伪，历史则不那么简单。因为在历史中，我们掌握的事实总是非常有限的，历史又是过去的人事，无法按我们的意志去重演或补充；再说，我们所掌握的史料还是按我们的观点去搜集的，所以一种历史理论一旦产生，我们就根本无法象检验科学那样去检验它、证伪它。所以，波普尔说："在历史方面一种能够经得起考验因而具有科学性的理论

是很难获得的。”① 既然在历史中不能获得科学性的理论，人们努力去认识历史又有什么意义？而历史认识本身又如何推陈出新呢？波普尔认为这两个问题都应从历史学以外的社会现实中去找答案。他说：

> 既然每一代人都有它自己的困难和问题，从而有它自己的利益和自己的观点，那么每一代人就有权按照自己的方式去观察历史，去补充前人的不足。说到底，我们研究历史是因为我们对它有兴趣，并且也许是因为我们想懂得一点自己的问题。②

尽管历史中不可能有科学性的理论，并不能说认识历史就毫无意义，恰恰相反，波普尔十分强调认识历史的重要性。他说，每一代人不仅有权利，并且也有义务去重新解释历史，“因为的确有一种迫切的需要等着解决。我们要知道我们的困难同过去有怎样的关系，并且我们还要知道沿着怎样一条路线我们可以前进，去解决我们所感觉到的和所选取的主要任务。这种任务，如果没有公平合理的方法加以解答，那么，就会产生各种历史主义解释。”③ 波普尔的历史理论主要就是要驳斥各种历

① 《当代西方史学流派文选》，第152页。

②③ 《当代西方史学流派文选》，第154、155页。

史主义的观点。关于历史主义，人们有许许多多的定义，这些定义相互之间大相径庭。波普尔对历史主义也有自己的定义，他说："我所说的'历史主义'意味着一种研究社会科学的方法，这种方法假定历史的预言是其基本目标，而且它假定这一目标可以通过揭示隐藏在历史过程中的'节奏'或'模式'、'规律'或'趋势'来达到。"①我们看到，波普尔实际上是把自己的批判锋芒指向那种认为历史有规律，并能据此预言历史的历史主义观点的。波普尔认为，历史主义有两个基本理论前提："整体主义"和"乌托邦主义"，而这两个前提都是错误的。整体主义把我们所能认识的有限的个别史看成是人类的普遍，并试图从这里寻找出历史的线索、规律和意义。事实上，没有普遍史，这一点许多历史学家、哲学家都一再强调过，我们所知道的始终是个别史，从这个别史中根本无法推演出历史的普遍规律和意义。乌托邦主义则是建立在整体主义之上的一个观点，它认为历史有规律，人们可以据此来预言未来，控制未来的进程，以实现某种理想。波普尔断然否定历史有规律，未来可预言。他说：

① 波普尔：《历史主义的贫困》导言，载《哲学译丛》，1985年，第4期。

> 人类历史的进程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人类知识的增长。……
>
> 我们不能通过理性的方法或科学的方法来预测我们的科学知识在未来的增长，……因此，我们不能预见人类历史未来的进程。①

既然历史主义的两个理论前提都是站不住脚的，历史主义本身也就是根本错误的。那么，在反驳了历史主义的观点之后，在认识到历史无规律、无意义之后，人还能做什么呢？人是生活在历史之中的，历史无规律、无意义是否意味着人类生活本身的无意义、无所适从呢？波普尔并不这么看，他说，完全相反，承认历史有规律、有意义，是决定论的，人反而无事可做，只能服从历史的命运，这是最危险的社会哲学和伦理哲学，是为极权主义、专制主义张本的理论。反过来，我们倒能更清醒自觉地意识到我们现时生活中选择和行动的重要性。未来如何完全取决于我们现时的选择和行动，进步不是注定的，倒退完全有可能，我们必须自己去主宰和创造自己的命运。正因为这样，我们现在的

① 波普尔：《历史主义的贫困》导言，载《哲学研究》，1985年，第4期。

选择、行动乃至生存才有意义。波普尔从他的历史理论导出了这样积极的人生哲学，他把学术的论争放到了人生的战场上，把生活现实同哲理探讨紧密结合起来，紧紧抓住了当代人的生活现实，难怪他的理论在当代西方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事实上，当代西方历史理论关于这方面的讨论很大程度上也是从生活现实出发的。

否认历史发展有规律，这在当代历史理论中是相当普遍的。人们强调历史与自然现象不同，在历史中无法找到那种能预言未来、并据以控制未来进程的那种类似自然规律的东西，历史中充满了偶然事变，这种事变根本无法预言，也不服从任何规律，但却常常能完全改变历史进程、历史面貌。罗素说："我不相信俾斯麦若在童年夭折，欧洲七十年间的历史会跟实际所发生的完全相象。凡是适用于俾斯麦的说法，也同样适用于十九世纪许多名人，只是程度上稍差一些而已。"① 当代英国历史学家费希尔的一段话很有代表性，他在《欧洲史》序言中说：

> 有些人比我聪明和有学问，他们已经发现历史有一种情节、韵律、预定的模

① 《当代西方史学流派文选》，第201页。

> 式，我却看不见这种和谐。我能看到只是一个事变接着另一个事变，就象一浪接着一浪一样；只有一个独一无二，因而无法概括的重大事实；只有一条稳妥的规则可以让历史学家去遵循：那就是他应当承认偶然事件和意外事件在人类命运的发展中的作用。这并不是愤世嫉俗的和绝望的学说。在历史的篇章里用大字清楚地写着进步这一事实；但是，进步不是一条自然规律。由一代人所得到的成就也许会被下一代人丢失。人们的思想也会流进那条通向灾难和野蛮的渠道。①

对历史偶然性过分强调走到极端，就等于在重复巴斯噶的名言："如果克娄巴特拉的鼻子长得短一点，整个世界的面貌就会不同了。"②卡尔强烈反对这种过分注重偶然因素而拒绝对历史做合理解释的说法。他强调："历史学家是以他所提出来的原因而知名的。"③比如吉本把罗马帝国衰亡的原因归

① H·A·L·Fisher: "A History of Europe", Edward Arnold & Co: London, 1936. Preface. 译文参照M·玻恩：《我的一生和我的观点》，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79年，第28—29页，有改动。

② 转引自恩斯特·卡西尔：《人论》，第231页。

③ 卡尔：《历史是什么》，第96页。

结为蛮族和基督教的胜利，十九世纪辉格派历史学家把英国霸权的兴起和强盛归结为其政治制度的优越，这都是很著名的例子。卡尔辛辣地批评说："有人告诉我历史是一连串偶然的事件时，我往往倾向于怀疑这个人要么是个思想上的懒汉，要么就智力不高。严肃认真的历史学家的通常做法是，指出迄今为止已被当作偶然的那些东西完全不是什么偶然事件，而是能够加以合理解释的，是包含着能够说明更广泛的各种类型的事件的意义。"① 卡尔认为历史研究需要因果解释，也能够做因果解释，关键在于把合理的原因和偶然的原因区分开来。"前者有可能运用于其它国家、其它时代或其它情况，因而能导致有益的概括，而且能从它们获得教训；它们能扩大和加深我们的理解的目的。偶然的原因是无法加以概括的；既然它们都是十足独特的，它们便不能给人以教训，也不能导致结论。"②

认识历史，研究历史，就是去解释历史，如果历史没有规律，我们根据什么来解释呢？卡尔认为历史解释离不开因果，如果这仅仅是指个别因果，那这种解释就毫无意义，如同儿戏。因果解释若要超越具体个别而具一般意义，就必须根据某种共同

①② 卡尔：《历史是什么？》，第111、116页。

的东西，并表达某种共同的东西，这是显而易见的。当代分析的历史哲学可以否认能据以预言未来的历史规律，却无法否认必须有据以解释历史的规律（或不论我们把它叫做什么东西）。那么这共同的东西是否存在，又是什么呢？沃尔什说，有的，这就是人性。历史的解释既是根据了人性，又必须进一步表现和说明人性。沃尔什说："我们同意要理解某一历史情景我们必须依靠一些一般的知识，这里首要的问题是弄清这一般知识指的是什么。"① 沃尔什在批评了实证主义史学只承认专史（如政治史、军事史等）所需要的专门知识，而否认需要更一般的知识之后说：

> 在我看来，无论哪一种历史都有一个压倒一切的共同目标，就是将人类的过去看作是一个具体的整体，来描绘出一幅可以理解的图画，使他活生生地呈现在我们眼前，就象我们自己和我们同时代人那样有生气。不同类型的专史各以不同的方式对此基本目标做出贡献，不过我认为每一个历史学家都应将此目标牢记心间。历史学家们都希望阐明人类的过去，但假如他

① W·H·Walsh: Philosophy of History, P64.

> 们认为自己的工作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是服务于这一目标的，他们就不能担当起他们的专门研究。①

沃尔什认为，从这一目标出发，自然可以得到这么一个结论，就是历史学家除了需要某种专门知识外，还需要一些更基本、更一般的知识，这就是关于人性的知识。沃尔什说："历史学家正是根据他对人性所具有的认识来最终决定什么是可以当作事实来接受的，以及如何去理解他所认可的事实。他认为什么是可信的取决于他认为什么对人是可能的"②。如果把人性当作历史解释中共同的东西，那很显然，我们就得承认有共同的人性，或者说，人性中有共同的东西。沃尔什是坚决主张这一点的。他批评科林伍德只承认随历史而变化的人性而否认有共同的人性的主张，认为人性固然随时代的变迁而变化，启蒙时代的人与中世纪的人虽有很大的不同，然而万变不离其宗，人还是人，既然如此，就说明人总有某种共同的东西存在着、保持着，这就使我们今人能理解古人，认识古人。解释历史要根据我们对人性的认识，另一方面，在解释

① W·H·Walsh: Philosophy of History, P65.
② W H·Walsh: Philosophy of History, P66.

历史的过程中，我们又会不断改变、不断加深我们对人性的认识，这是历史研究、历史解释中一个很重要的方面。沃尔什说：

> 我已强调了在理解历史时关于人性的知识是一个前提条件，指出了历史学家是根据他对人性的认识来从事他的研究的。但事情并未到此为止。因为，很显然，当我们思考问题时，我们不仅运用某些关于人的行为可能性的知识来帮助理解历史，而且在这一历史研究过程中，我们也在修正我们这一方面的知识。正象在阅读距离我们相当久远的人的活动时，比如毁灭了罗马帝国的蛮族时，我们从某种标准出发来判断和解释他们的行为，但在阅读过程中，由于看到了我们先前并未预计到的可能性，我们不久就会要求自己对这些标准做重要的修改。”①

历史的解释就是关于人性的解释，从这里可以引申出当代历史理论关于历史的功能和价值的基本观点。在历史中既然不存在象自然界那样严格的普遍规律，研究历史、认识历史就不是为了帮助人们去

① W·H·Walsh: Philosophy of History, P70.

预言未来，而是帮助人们认识现在，认识自我。当代西方历史理论正是这样来认识问题和讨论问题的。

（4）历史的实践领域

历史有什么用？这是每一个面对历史的人都会提出的问题。本小节所要介绍的就是当代西方历史理论关于这方面的观点，准备主要介绍科林伍德的观点。*

科林伍德认为历史对于人类生活有很重要的价值，他的这种主张完全是针对现实来阐发的。科林伍德认为十六世纪以来西方科学技术的发展给社会带来了深刻的影响，也出现了一个奇特的对比，就是人类在驾驭自然方面的能力日益增长而在控制自身环境方面日益无能，这种对比在世界大战中表现得最为强烈。科林伍德辛辣地说："世界大战是自然科学史无前例的伟大胜利。培根曾许诺，知识就是力量。事实上，这只是一种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更有力更迅速地摧毁人的肉体和灵魂的力量罢了。"科林伍德认为没有人需要这种力量，因为"它使环境失去控制，而且随着这一力量的发展，人类的处境

* 本小节对科林伍德观查的介绍基本参照W. J. Vander Dussen 的 History as a Science中10.3节，

越来越无法控制。凡尔赛和约的签订只是使形势比以往更难驾驭。”① 科林伍德担心这种对比发展下去，终将导致巨大的灾难。他强调，避免这种后果的唯一途径不是改变人的良心——即“使人变得更善良和更人道，”“而是改变人的头脑——即‘使人更好地理解自身的事务并懂得如何处理它们’。”② 科林伍德主张，这种理解和知识只能得之于历史。在科林伍德看来，历史有三个方面的作用，即它帮助人类认识自我，认识现实和认识人性。这三个方面归根结底是一致的，即历史有助于人类的生存实践。

科林伍德多次强调，历史是为了人类的自我认识。他说：

> 人们一般认为对一个人来说认识自己是十分重要的，这里认识自己并不意味着知道自己不同于别人的那些特点，而是意味着知道自己作为人的特性。认识自己首先是知道做一个人意味着什么；其次是知道自己是哪一类型的人；再次是知道我之所以为我的所在；既然没有人能知道自己

① W·J·Van der Dussen: History as a Science, P370.
② W·J·Van der Dussen: History as a science, P370.

能做什么除非他尝试着去做，要知道一个人能做什么就只有去看他做过了什么。这样，历史的价值就在于它告诉我们人做过了什么从而告诉我们人是什么。①

科林伍德说，人的许多行为是遵循某些规律的，但在两种情况下，试图运用这些规律是不会成功的：一是人的处境与以往所知的情形完全不同，另一种情况是人们不满足于把自己的处境同已知的类似情形相提并论。在这种情况下，人们所应该做的就是认清形势，这样他们才能找到使自己满意的现实对策。而对形势的深入认识正是由历史知识提供的。科林伍德说："历史不是别的，只是认识现实的一种努力，这种努力是通过分析构成现实的必然成分即过去和其可能性即将来而实现的。"②任何现在都由过去构成它的既定部分，同时由人的自由行为构成它的未决部分；而现实的可能性、机会则是由过去决定的。科林伍德强调："如何选择这些机会固然不取决于过去，但人们所能得到的只是这些机会，它不会因人们如何选择而有所不同。"③这样，通过分析现实中的既定因素和未决

① R·G·Colhngwood, The Idea of History, P10.
② W·J·Van der Dussen: History as a Science, P370.
③ W·J·Van der Dussen: History as a Science, P371

成分，即现实中的必然性和可能性这两个方面，历史为人们提供了深入认识现实的必要知识。

科林伍德反对历史进程受人性的不变本质制约的观点。他认为“事实上并不存在对每一个人都相同的所谓人类本性这样一种东西。”① 人性同人的性格一样是历史的产物，既然历史是在不断变化的，人性也就是与时俱变的。科林伍德说，人的行为由两方面构成，它的过去或性格构成其既定因素，他的自由意志构成其未决成份。所以人的现在的行为是部分自由的，并非完全决定论的。既然人现在的行为对将来未说是过去的行为，这就暗示了人的性格部分地是他个人选择的产物。人性，在科林伍德看来是人的性格的相似物，所以，上述关于人的性格的说法也适用于理解和解释人性。他说：“在既定的历史传统的延续和发展中，这样或那样的人性是自我决定和自我创造的。”② 科林伍德认为人性这个名词“可以广义地当作一个集合名词用于我们所观察的任一给定时刻人类行为的方式或倾向，它是不变的、非人的力量所能改变的。”但“严格说来，没有人性这种东西，这一名词所指称的，确切地说，不是人类的本性而是人类的历

① W·J·Van der Dussen; History as a Science. P371.
② W·J·Van der Dussen; History as a Science. P372.

史。”①科林伍德强烈反对把人性看做是固定不变的，而心理学正是按照这种见解来研究人性的，科林伍德认为这种研究根本就是误入歧途。他批评心理学试图用自然科学的方法来研究人，认为这样做的后果是极为有害的。因为自然科学是建立在这种假设之上的，它认为人是自然的认识者和控制者，是有理性的，而自然作为被认识和控制的对象则是无理性的、机械的。心理学用自然科学的方法来研究人，也做了这种假设，它假定人性作为它的研究对象是无理性的。科林伍德说：“本来，现代人的富有和尊严就是来自于理性优越于自然和对自然主宰，把人的理性下降到无理性的机械水平，只能意味着人类的破产和堕落。”②不仅如此，科林伍德还进一步指出了认为人类有不变本性的看法会引出的实际后果。科林伍德举例说，比如抽烟这种习惯，有人认为是人的本性，有人认为是历史的产物。两者的区别在于：前者否认了戒烟的可能性，后者却肯定了这种可能性的存在。科林伍德又举了一个战争的例子来加以说明，他说：

> 如果（就我们所知）战争只是人类历史中产生的一种现象，如果它在我们这个

①② W·J·Van der Dussen: History as a Science, P372.

现实世界中作为反复出现的事实，是产生于我们政治制度的组织方式和政治习惯的形成方式，那么结论就是既然历史（这里历史是人类共同行为的历史）产生了战争，历史也就能废除战争；既然战争在原则上是一种能够消除的东西，那么认为战争是一种罪恶的人们的任务就是去重新组织我们的政治生活，以便找到消除战争的途径。如果战争是基于人类的某种好斗的自然本性，是不能消除的，那么试图消除战争只能导致灾难性的后果。①

从这样的立场出发，科林伍德认为正确地认识历史，认识人性能帮助我们时代建立一个合理的信念，来克服悲观失望的情绪。他说：

十七世纪需要一种合理的信念：自然是可以认识的，科学的问题原则上是可以解决的；二十世纪则需要另一种合理的信念：人类的进步是可能的，道德和政治生活的问题在原则上是可以解决的。两者的需要是相同的，只有哲学才能满足这种需要。……与文艺复兴时期认为自然是一个

① W·J·Van der Dussen: History as a Science, P373.

> 可以认识的体系这种观点相同的是这样一种哲学，它认为社会和政治制度是人类意志的创造物，并且为这种意志力量所支持，本质上是这种意志力量手中的产物，因此，无论什么罪恶在原则上都是可以治疗的。总之，哲学给予我们“不满、焦虑和渴望”的一代的帮助，就在于一个原则上合理的陈述：人类社会中没有一种罪恶是人所不能治愈的。①

科林伍德上述观点在当代西方是颇有代表性的。当代西方历史理论关于历史的功能和价值方面的讨论很多，限于篇幅，我们不再一一介绍了。

既然历史具有如此重要的功能和价值，做为一个历史学家，他对社会、对公众就负有很大的责任，因为他所撰写、所传播的历史会影响人们对现实、对人类自我或对人性的看法，并进而影响人们创造未来的行动。美国历史学家康尼尔·李德一九四九年在美国历史协会年会上所作的主席演说中说道，历史学家为过去描画的曲线当然会延伸到未来，所以“他拥有为社会服务的良好机会；……他掌握着不是造福社会就是危害社会的有力工

① W·J· Van der Dussen: History as a Science, P374.

具。”① 另一位美国历史学家萨缪尔·莫里逊一九五〇年在一次相同性质的演说中说：“迫使一个政治家或军人作出决定的意外的时间和空间，也同样要迫使——虽然不那么急需——历史学家作出决定。他的决定和政治家的决定不一样，并不会使他的国家投入一场血战或屈辱投降；他的决定和军人的不同，并不会赢得一场战役或被打得大败；但这些决定却完全能够注入历史的长流，对未来起很大的影响。假使班克罗夫特没有如此生动地描绘出争取统一的斗争，美利坚联邦会被保存吗？如果法国历史学家没有对拿破仑一世歌颂备至，拿破仑三世会在1870年投下那致命的赌注吗？……”② 正因为历史学家对社会、对公众负有如此重大的责任，一个历史学家要很好地承担起这种责任，就必须具备相应的个人品质，除了他作为一个历史学家的技能以外，这种品质对于他的职业成就来说是更为基本也更为重要的。虽然这个问题已超出了理论讨论的范围，却是值得每一个研究历史的人重视的。让我把莫里逊的看法录在下面，供大家去做进一步的思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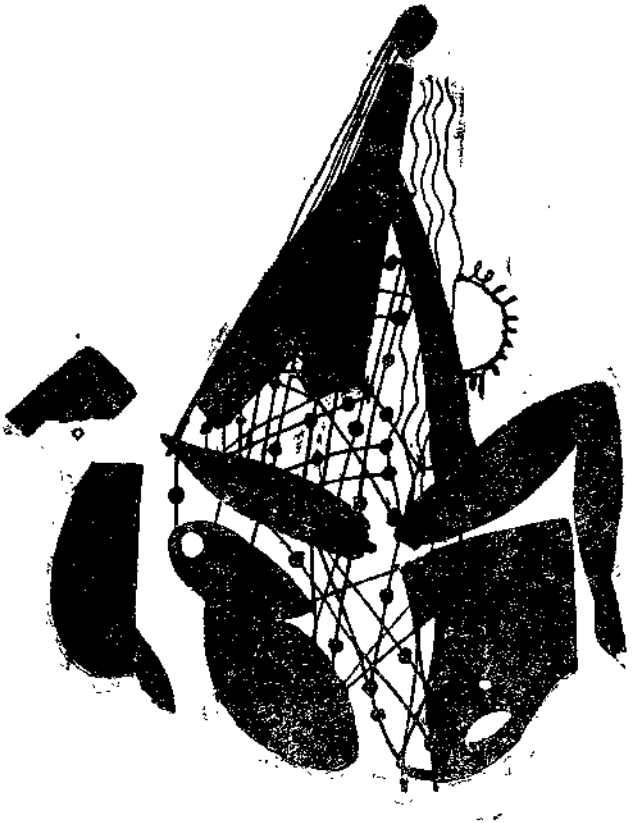
---

① 《现代西方历史哲学译文集》，第256页。

② 《现代西方历史哲学译文集》，第264页。

一个人如果没有忠实于真理的天性、高度的思想诚实和一种平衡感，就不可能成为伟大的或者只是优秀的历史学家。①

① 《现代西方历史哲学译文集》，第260页。



第四章
年鉴学派的
总体历史理论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历史。

实证主义史学是十九世纪的产物，它表达了那个时代的信念，体现那个时代的精神，反映了那个时代的特征，并回答了那个时代的问题，自然，它也给后代留下了它的遗产。对于二十世纪的史学家来说，这份遗产是丰厚的也是沉重的。二十世纪有它自己的问题，也有它自己的焦虑与渴望，这是十九世纪史学所无法回答、无力解决和无从满足的。历史与现实之间的这种“代沟”，需要有新一代的史学家来努力填平。与历史哲学领域里对实证主义史观进行清算的同时，历史学家们也开始认真反省十九世纪史学的传统，他们不是在理论抽象的层次上做哲学的分析或辩难，而是在历史研究的实践领域内，力图突破实证主义史学的陈旧藩篱，开创史学

研究的新局面，以回答时代提出的迫切问题。

4-1 新史学的呼声

对二十世纪来说，十九世纪史学的最大弊端就是它只崇拜档案柜里的陈编故纸，却忘记了活生生的人事和现实；只记得档案文献里的角色——那些政治家、国王、贵族、外交家和将军——以及他们的英雄业绩，却忽视了档案文字中没有记载甚至没有留下痕迹的普通人的生存。十九世纪的历史是政治史，是“英雄和英雄崇拜”①的历史。正象一位历史学家所说的，在十九世纪“历史学家是国王们的顾问，他们倡导了德意志和意大利的统一，为法兰西贡献了一位总理和一位总统（指基佐和梯也尔，前者在1847—1848年任法国七月王朝的总理，后者在1871—1873任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总统。——引者），他们鼓舞了年轻的美国成为新大陆的主人，又为新老民族的独立给出了证明，还为历史上的革命提供了合理的根据。”②是十九世纪的现实赋予

① 十九世纪英国著名历史学家卡莱尔（Thomas Carlyle）的一篇著名论文的篇名就叫“论英雄和英雄崇拜”。

② Ernst Breisach: "Historiography, Ancient, Medieval & Modern"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3, P1.

了史学这种政治挂帅的特征。但进入二十世纪以后，现实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西方各国相继完成了现代化，现代化使西方社会大大世俗化了，普通人、群众在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影响和作用日益明显和重要；接着世界大战又从根本上动摇了近代以来确立的西方人的价值观念，反英雄取代了英雄，海明威笔下的“逃兵”成了年轻人崇拜和效法的对象。现实和观念的巨大变化，要求人们以新的眼光来审视历史，说明现实，然而，史学来不及跟上这种变化，它同现实脱节了，被一种理论上无所适从的气氛所笼罩，还是把眼光盯在政治家、外交家和将军身上，政变、战争、外交谈判仍是它的中心议题。这种状况开始引起了普遍的不满，人们要求改变史学的现状，更新历史的观念和研究方法，冲破政治史的狭窄框框，建设符合时代要求的新史学。

一九一二年，美国历史学家鲁滨孙（James Havvey Robinson, 1863—1936）发表了一部著作：《新史学》，极力倡导建立一门新的史学，以取代传统的旧史学。他在《新史学》中开宗明义就说：“从广义来说，一切关于人类在世界上出现以来所做的、或所想的事业与痕迹，都包括在历史范围之内。大到可以描写各民族的兴亡，小到描写一个最平凡的人物的习惯与感情。……历史是研究人

类过去事业的一门极其广泛的学问。……”① 历史是包罗万象的关于人类过去的学问，这同实证主义史学的研究实践的狭隘形成鲜明的对照。鲁滨孙指出，当前的史学界存在以下的通病：

> （1）随便罗列人名、地名，对读者毫无意义，它不但不能激起读者的思想和兴趣，反而使他没有精神。
>
> （2）不讲别的重要事情，专偏重政治事实的记载。
>
> （3）好叙述非常特殊的事件，不是因为这些故事可以说明一般事物的进展，或某时代的情况，而只是因为它们在编年史中很突出。②

鲁滨孙认为，旧史学的这种通病，使人们忘记了历史学的最重要的社会功用。他说：

> 历史可以满足我们的幻想，可以满足我们急切的或闲散的好奇心，也可以检验我们的记忆力，用布林勃劳克的话来说，那就是它能提供一种“可信的无知”。但是历

①② 〔美〕詹姆斯·哈威·鲁滨孙：《新史学》，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64年，第8页、第14页。

> 史还有一件应做而尚未做的事情，那就是它可以帮助我们了解我们自己、我们的同类、以及人类的种种问题和前景。这是历史最主要的功用，但一般人所忽略的恰恰就是历史所产生的这种最大效用。①

历史要满足这项最重要的社会功用，就必须摆脱"从前那些对研究历史的种种限制"②，必须跟上时代的新潮流，在观念上大胆革新。鲁滨孙强调：

> 我们不应该把历史看作是一门固定不变的学问，它仅仅通过改进研究方法，搜集、批评和融化新的资料来获得进展。恰恰相反，我们认为历史学的理想和目标应该伴随着社会和社会科学的进步而变化，它在我们的精神生活中应比从前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③

在观念变更的同时，历史学应敞开自己关闭的大门，同其它学科合作，改进自己的研究方法，鲁滨孙认为史学应把现代许多新兴学科，如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等当作自己的同盟军，应大胆

①② 鲁滨孙：《新史学》，中译本，商务，第15、20页。

③ 鲁滨孙：《新史学》，中译本，商务，第20页。（本段译文参考英文原文做了一些关键性改动——引者）。

吸取和利用它们的研究成果，促进史学研究的加强和深化。他说：

> 许多新兴科学领域，有时很可能会言过其实，他们所提供的历史解释，也时常会遭到历史学家的反对。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和经济学家的思想，无疑地跑得太快，失去分寸，这就使得许多历史学家抱住过份的保守思想，心安理得地就什么也不去想了。但是无论如何，想得太少总比想得太多会有更大的冒险。假使把历史学的新同盟军好好加以利用，那么，不仅历史研究的范围可以大大加以扩展和深化，而且在史学园地里将会取得比自古以来更有价值的成果。①

鲁滨孙倡导新史学并不是孤立的事件，而是具有广泛代表性的，它是当时整个西方史学界共同努力的一个部分。当时西方各国的史学界都有人提出了类似的主张。在这种共同努力的过程中，产生了当代西方也是西方整个历史上最有影响的史学流派——法国的年鉴学派。

① 鲁滨孙：《新史学》，中译本，商务，第70页。

4-2 从《综合评论》到《年鉴》杂志

年鉴学派不是一个有着确定组织的学术团体，而是集合在一份杂志周围，在共同信念鼓舞下从事史学研究的一批学者，这份杂志叫《经济社会史年鉴》，年鉴学派就是由此得名的。

一九二九年一月，法国的两位历史学家吕西安·费弗尔和马克·布洛赫在斯特拉斯堡共同创办了一份杂志：《经济社会史年鉴》。在创刊号的卷首，两人联名发表了一篇简短的“告读者”，上面说：

> 我们都是历史学家，都有共同的体验，并得出了共同的结论，我们都为长期的、从传统分裂状态中产生的弊病而苦恼。目前的状况是，一方面，历史学家在研究过去的文献材料时，使用着陈旧的方法；另一方面，从事社会、近代经济研究的人，正在日渐增加。这两个方面的研究者，互不理解，互不通气。现在，在历史学家之间，在从事其他研究的专家之间，

> 存在一种不相往来的闭塞状况。当然，各行的研究家，都致力于自己的专业，在自己的庭院中辛勤劳动，如果他们再能关心一下邻居的工作，就十全十美了。可是却被高墙堵住了。我们之所以站出来大声疾呼，就是针对这种可怕的分裂的。①

发刊词号召打破史学与其它社会科学之间的界限，改变历史研究的落后状况，话说得相当温和，并无惊人之语。当然，问题不在于一个宣言，而在于持之以恒的努力。由于费弗尔和布洛赫等人的出色工作、辛勤耕耘，《年鉴杂志》日益获得成功，它的影响越来越大，在它周围逐渐集合起一批志同道合的史学家，并形成了一个阵容强大、成就卓著的史学流派——年鉴学派。年鉴学派从《年鉴》杂志创办迄今已有半个多世纪了。半个多世纪来，通过不懈努力和持续探索，年鉴学派在历史研究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从该学派中产生了一批世界一流水平的历史学家，他们撰写了一大批经典性的史学研究著作，这大大改变了人们对历史的看法。当代年鉴学派的重要史学家E·L·拉杜里在纪念年鉴杂志创刊五十周年而写的一篇文章："新史学的斗士

① 转引自《国外社会科学》，1980年，第6期，第66页。

们”中说：

> “年鉴派”已经五十岁了（1929—1979）。五十年前，两位法国研究工作者马克·布洛赫和吕西安·费弗尔创建了一个新的历史学派，称作“年鉴派”。五十年里，这个学派虽曾有过命乖运蹇的时候，但时至今日，它至少已取得了局部的但又辉煌的成就。它主要在知识界，而不是在官僚行政方面，夺得了几乎一统天下的地位。这种霸主地位首先是在法国确立的，这件事本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的影响已扩大到世界各国的历史学界，不论是英语区各国（英国、美国）、拉丁区各国或波兰、匈牙利等国……①

拉杜里的话并非自夸，这事实上是西方学术界的一个相当普遍的看法，人们认为年鉴学派是最近五十年来世界历史科学中最有意义的现象，无论哪一个历史学家或社会科学的代表人物，如果他不研究年鉴学派的著作，不深入了解它的历史观，就不能立足于现代要求的水平。

① E·L·拉杜里：“新史学的斗士们”，载《世界历史译丛》，1980年，第4期。

年鉴学派是法国人的光荣和骄傲，正象一位研究者所指出的："自从十八世纪以来，这个新成立的从事经济社会史研究的学派第一次使法国站到了欧洲史学研究的前列。"① 拉杜里也是这样自豪地认为的，他说："总有一天，当我们的同胞在总结二十世纪的知识、科学和技术时，他们会发觉——用句客气点的话来说——自己在军事艺术、尖端工业或原子物理等领域里，并不始终处于领先地位。这些浅薄的法国人或许能够聊以自慰，他们毕竟在1930至1965年间，全靠'年鉴派'的努力，产生了世界上最好的历史学家，虽然他们自己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② 拉杜里的话并不错，不过他揶揄自己的同胞，过分夸大年鉴派本身的努力，却未免有点不恰当，而且有悖于年鉴学派的史观，要知道正是在这一大群"浅薄的法国人"中间，产生了年鉴派，这块非偶然。

应该说当初许多国家的史学家都想摘取年鉴学派后来所获得的桂冠，却唯独年鉴学派获得了最大

① H·Stuart Hughes: "The Obstructed Path: French Social Thought in the Years of Desperation 1930—1960", Harppr Torchbook, 1969, Chapter2.（该章的资料是由在美国伊利诺斯州立大学Normal分校留学的朱孝远同志提供的，因是复印件，没有标明页码，只能注明书名和章节，特此说明——引者）。

② E·L·拉杜里："新史学的斗士们"，载《世界历史译丛》，1980年，第4期。

的成功，这其中自有道理。年鉴学派是当代法国的产物，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法国社会及其学术界的知识氛围、精神气候为年鉴学派的产生创造了条件，当然这并不排除年鉴派创始人的努力。

众所周知，近代法国是一个有着大革命传统的国家，大革命使法国的思想家、学者清楚地看到了人民在历史中的力量和作用。十九世纪三、四十年代法国产生了一批优秀的历史学家，他们用阶级斗争的观点来解释近代法国的历史，在知识界、思想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是历史上最早用阶级斗争观点来观察和解释历史的学派，给十九世纪法国的史学打上了深刻的印记。在这些历史学家中，米纽勒（Jules Michelet, 1798—1874）占有独特的地位，与梯也尔、米涅、基佐等人不同，米细勒更加注意人民群众在历史中的作用，他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人，历史学家应该注意写出人民的历史。虽然不少人认为在米细勒身上诗人的激情甚于学者的严谨，但他的史观还是给法国史学留下了一份宝贵的遗产。普法战争之后，法国史学家受到以兰克为代表的德国史学的影响，发生了很大变化，史学家们纷纷追随德国的同行，极力强调历史的科学性和实证性，以致人们嘲笑说，普法战争之后，德国人把自己的精神传入了法国人的脑袋之

中。这种状况一方面产生了许多积极的成果，另一方面也带来了消极的影响。“史学变得更科学了，也更少综合性了。资料、原文、摘录、专论统治着这个学术园地。”① 一八七六年，兰克的再传子弟摩诺德（Gabnel Monod，1844—1912）创办了著名的《法国史学杂志》，摩诺德担任该杂志主编达三十六年之久。在此期间，该杂志只刊载考证文章，绝不涉及历史哲学或其他理论性的问题。摩诺德认为历史学家应当为历史而历史，除了要弄清楚历史事实的真象以外，不能有任何其他目的，更不能用历史事实来支持这一种或那一种政治观点。实证主义史观在法国史坛取得了绝对的统治地位，大革命熏陶出来的法国史学传统被人们渐渐遗忘了。朗格诺瓦和瑟诺博司的《历史研究法导论》这本基本上是讨论史料搜集考证方法的著作成为当时一部经典的史学方法的教科书。

然面实证主义史学一统天下的局面并不长久，它很快就遇到了来自多方面的挑战。十九世纪后期是社会科学的各门新兴学科迅速发展的时期，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地理学等学科都已发展成熟，并产生了众多的流派，他们提出了丰富多彩的理论来解释人文和社会现象，这些学

① 孙秉莹：《欧洲近代史学史》，湖南，1980年，第231页。

科的发展和成就改变了关于人类社会和历史的许多传统陈见。正如鲁滨孙指出的："这些新的社会科学，都有人在做专门的研究，他们已经使历史学家惯用的许多名词的意义全部改变了，如'种族'、'宗教'、'进步'，'古代人'、'文化'、'人类的天性'等等。他们推翻了历史学家的旧说，解释了许多历史学家使用自己的方法再不能解释的历史现象。"① 在法国，迪尔凯姆（Émile Durkheim，1858—1917）创立了他的社会学学派，就对实证主义史学形成了有力的挑战。迪尔凯姆强调社会学应把社会整体而不是个体行为做为自己的研究对象，社会学的任务不是研究个别事实而是社会事实，所谓社会事实，须具备两个特征：（1）它们是外在于个人的；（2）它们能对个人行为施加影响或限制。社会事实不能还原为个体行为或用个体行为来加以解释，相反个体行为只有放在社会事实中才能加以解释。迪尔凯姆又认为比较研究是社会学研究中最主要的方法，他说："比较社会学不是社会学的个别分支，而是社会学本身，因为它将不再是纯粹记述性的，而是力求说明事实。"② 迪尔

① 鲁滨孙：《新史学》，中译本，商务版，第59页。

② 转引自〔苏〕И·С·科恩主编：《十九世纪至二十世纪初资产阶级社会学史》，上海译文出版社，1982年，第231页。

凯姆及其学派力图将这种社会学观点和方法论主张推广应用于其他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领域，虽然并没有获得成功，却对其他学科产生了很大的冲击，历史学自不例外。年鉴学派的创始人费弗尔和布洛赫都曾受到迪尔凯姆的社会学理论的很大影响，布洛赫很久以后还提出迪尔凯姆是他的先生。

拉杜里说，年鉴学派最初曾受到四个方面思想的影响：迪尔凯姆的社会学，亨利·贝尔及其《综合评论》所推崇的跨学科，弗朗斯瓦·西米安（Francois Simiand，当代法国经济学家）所制定的价格、工资和环境的经济史，以及维达尔·德·拉布拉什*的地理学派。四者之中影响最大也最直接的是亨利·贝尔的“历史综合”理论。

亨利·贝尔（Henri Berr，1872—1954）不是职业历史学家，他的本行是文学和哲学，但他对历史理论问题极感兴趣。贝尔同时是一个出色的学术活动组织者，一九〇〇年，他建立了一个“国际综合中心”，并创办了《历史综合评论》杂志。这个中心和这份杂志吸引了各学科的著名专家学者来共同合作，甚至爱因斯坦、卢瑟福、朗之万这样

* Vidal de la Blache，Paul（1845—1918），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法国重要的地理学家，他强调地理学的特殊任务是阐述自然和人文条件在空间上的相互关系。他的理论对当代法国地理学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著名的物理学家也曾与其事。费弗尔和布洛赫也先后参加了该杂志的工作。贝尔说，他创办杂志的目的是要克服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以来法国史学界的狭隘性，并通过进一步明确史学的共同任务，使史学各领域的专家能加强相互的支持和合作。贝尔认为史学界过分专门化造成的狭隘性是由于史学家们拒绝哲学综合造成的。在这方面迪尔凯姆的社会学获得成功的例子对史学是极有教益的，迪尔凯姆的功绩就在于他对史实运用了明确的、实证的比较方法。除了社会学以外，贝尔认为对历史研究来说，更有意义的是个体心理学和集体心理学。贝尔说，对社会的比较研究，必须具备社会心理学的知识并懂得人的基本需要，因为社会制度及其变化正是反映了这种需要。贝尔提倡对历史要做综合的研究，他批评当时史学界只注重史料，只罗列史实的经验主义，说："史料的搜集并不比集邮或搜集贝壳有更大的科学价值。"不仅史料，即使个别历史事实也是如此。史料学的工作是重要的，但不是目的，它只是手段，只是历史综合研究的准备工作，没有综合，史料的发掘往往造成孤立化的倾向。另一方面，贝尔又反对思辨的历史哲学，包括社会学的先验公式，他认为抽象的公式和捏造的规律对认识历史毫无用处。贝尔的所谓历史综合研究，就是要把

历史学、历史哲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学科统一起来，用以解释历史。贝尔对当时史学的危机并不悲观，恰恰相反，他认为“往往有些危机却在准备着美好的未来。我们相信科学迟早必将战胜理智的错误和意志的迷误。”贝尔这里所说的科学并非泛论，而是特指，他说：“有些人说历史脱离理论是因为它过于科学了；相反地，我坚信这种情况之所以出现是因为它的科学性还不足。”贝尔对史学的上述看法是有其理论依据的，他认为，在人类的社会和历史中，存在三类因果关系：(1)简单的连贯性的关系，即一些事实被另一些事实所决定；(2)经常的关系，即一些事实和另一些事实的必然的联系；(3)内部的关系，即事实之间互相合理的联系。这些不同的因果关系是与三种历史事实或因素相适应的：(1)偶然的、或“粗糙的”事实，是流动的因素，历史中的“偶然”；(2)必然的事实、社会的规律性，是静止的因素；(3)“内在逻辑的”事实，是“趋势和长期性”的因素，决定运动的方向和持续性。贝尔这样说：“偶然性是纯粹的秩序，必然性是不变性或重复，逻辑是倾向和长期性，这三点因素的结合能引申多远和如何作用，我不知道。这方面的研究现在还只是刚开始。”在贝尔看来，正是这三类因果关系和三种历史事实决定了对历史上

的个别事实进行孤立研究无法解释历史，只有综合运用多学科的观点和方法才能完成这一任务。*

贝尔的史学观点和他所倡导的跨学科研究对当时的法国史学界无疑是一个很大的推动。费弗尔曾说《历史综合评论》是安放在传统史学营垒中的"特洛伊木马"①并说是《历史综合评论》孕育了年鉴学派，这是对贝尔所做的工作的高度评价，但并不过份。年鉴学派著名历史学家布罗代尔说，正是在《历史综合评论》上，年鉴学派的两个创始人布洛赫、费弗尔发动了他们同十九世纪德意志史学决裂的最初战役②。费弗尔早在一九〇三年至一九〇六年就同贝尔及《综合评论》建立了密切联系，以后他又成为该杂志的主要撰稿人。布洛赫在稍后一些时间也同贝尔及《综合评论》建立了联系。一九一三年贝尔开始编辑一套规模庞大的丛书"人类的进化"，费弗尔和布洛赫都积极地参加了丛书的编写工作。贝尔及《综合评论》的经验与成就，以

* 以上关于亨利·贝尔的介绍主要参考了康恩的《哲学唯心主义与资产阶级历史思想的危机》第288—300页；H·S·Hughes 前引书第二章（见本书第234页注①）；《国外社会科学》，1980年，第6期，第65—68页。材料出处不再一一指明。

① Fritz Stern: The Variety of History, P403.

② Traian Stoianouich: "French Historical Method, ——The Annales Paradigm," Cornell Vniversity Press, 1976, P11.

及同贝尔和《综合评论》合作的经历对费弗尔和布洛赫的影响是深刻的。一九二〇年，布洛赫和费弗尔在斯特拉斯堡大学结识，共同的观点、志趣使他们成了生死不渝的莫逆之交。从此，开始了他们在学术事业上的共同追求和长期合作。一九二九年，他俩共同创办了《经济社会史年鉴》，《年鉴》的创刊，不仅仅把他俩的合作，而且可以说把整个法国史学都推进到一个崭新的阶段。

4-3 时间、历史与人

虽然年鉴学派只是一个非常松散的史学派别，但这一派的史学家还是有着大体一致的史观。作为年鉴学派的创始人，正是费弗尔和布洛赫的年鉴学派确立了某些基本的理论原则和大致的发展方向，没有他们俩人筚路蓝缕，耕耘开拓，就不会有今天年鉴学派的空前盛况。

吕西安·费弗尔（Lucien Febvre, 1878—1956）一八七八年生于法国南锡，他的父亲是一位语言学家，大学教授。费弗尔最初并未想到要当一个历史学家，年轻时他醉心于文学。但费弗尔有一个历史学家的叔叔，他父亲也酷爱历史，并把

阅读历史当作一种消遣。在父亲的书房里，费弗尔第一次读到了米细勒的著作，这位充满激情的“人民历史学家”给费弗尔留下了深刻印象，以后费弗尔曾多次提到米细勒，他称米细勒是自己的先生，并说他所要做的“就是成为另一个更具批评精神的米细勒，象他那样具有直觉，但不象他那样被自己的天才冲昏头脑。”②一八九九年至一九〇二年，费弗尔在巴黎高等师范学校学习，毕业时他获得了历史学与地理学的中学教师资格。在大学期间，他最密切和对他最有影响的朋友是作为哲学家、心理学家和医生的亨利·瓦隆，另外，他结识了著名地理学家维达尔·德·拉布拉什，后者的人文地理学观点对他影响很大。地理学是费弗尔学术生涯中的第一个爱好。一九〇三年至一九〇六年，费弗尔获得梯也尔基金会的奖学金，留在巴黎继续攻读，这时他开始参加亨利·贝尔的《综合评论》杂志的工作。一九一一年，费弗尔完成了他的博士论文：“腓力二世和弗朗什——孔泰：政治、宗教、社会史”，这是对十六世纪后半期弗朗什——孔泰地区的历史、地理、经济、社会生活和宗教信仰等各方面的一项十分广泛的研究。弗朗什——孔泰是费弗尔的故乡，在这里，许多早

② 转引自H·S·Hughes前引书第二章（见本书第234页注①）。

先时代的景观、气息和情调一直保持到十九世纪末期，费弗尔的童年就是在这里度过的，这种经历使他对法国的乡村生活及其活生生的历史有了切身的了解。接着，费弗尔获得第戎大学的教职。一九一四年世界大战爆发，费弗尔应征入伍，战争结束时，他以上尉军衔退伍。一九一九年，费弗尔到斯特拉斯堡大学任教。一九三三年，法兰西学院新设立了近代文明史讲座，费弗尔被任为讲座教授。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费弗尔仍留在巴黎从事学术研究。战后初期，费弗尔出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法国代表。一九四七年法国高等实践研究院第六部——经济社会科学部成立，费弗尔任该部主席直至他逝世。一九五〇年，费弗尔从法兰西学院退休。一九五六年，他在家乡佛朗什——孔泰逝世。

马克·布洛赫（Marc Bloch，1886—1944）一八八六年生于法国里昂。他的父亲是一位出色的历史学家，古代史教授，他是布洛赫最早的也是最好的老师。布洛赫曾说过这样的话："使我成为一个历史学家的最重要的东西是我父亲赋予我的。"① 布洛赫是在巴黎一个很有教养和知识的环境中长大的。在中学时，他就是一个极优秀的学生。一九〇四年，他进入巴黎高等师范学校学习，一九〇八

① 引自H·S·Hughes前引书第二章（见本书第284页注①）。

年毕业时，他获得了历史和地理学的中学教师资格。在大学期间，他还选修了索邦大学、高等实践研究院、法兰西学院的许多著名学者的课，如摩诺德、朗格诺瓦、瑟诺博斯等人的课。这期间，他还结交了许多朋友，这些朋友中有数学家、哲学家、社会学家，甚至包括未来的政治家。总之，布洛赫在大学时代不仅在历史学方面，而且在整个古典文化方面都是获益非常的。一九〇九年至一九一二年，布洛赫在巴黎获得梯也尔基金会的奖学金，开始了他的学术研究生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布洛赫应征入伍，中断了博士论文的写作。大战结束后，他以上尉军衔退伍。一九一九年，布洛赫去斯特拉斯堡大学任教。次年，他完成了博士论文："对法兰西岛*地区王家农奴释放的研究"，这篇论文使他成为公认的中世纪史专家。一九二一年，布洛赫成为斯特拉斯堡大学的教授。一九三六年，索邦大学任命布洛赫为经济史的讲师，次年，他获得教授衔。一九四〇年，巴黎陷落，因为他的犹太血统，他被迫离开巴黎，先后在维希政府辖区内的两所大学任教。一九四二年，他拒绝了维希政府让他流亡国外的安排，投入了抵抗运动，成为一名出色的反法西斯战士。一九四四年三月，他被盖世太保逮捕。

* 法兰西岛（Ile-de-France），法国旧区名，位于巴黎盆地中部。

在历尽折磨之后于六月中旬被盖世太保枪杀。

费弗尔和布洛赫有着十分相似的家庭背景和个人经历（特别在早期），对他们的学术生涯影响最大的社会经历无疑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但是这场战争爆发时，他们基本上都到了不惑之年（当时费弗尔36岁，布洛赫28岁），正象休斯所指出的："虽然四年战争的经历给他们留下了创伤，但第一次世界大战使他们所受到的冲击要比对那些年轻几岁人的来得轻些。因为他们的价值观念已经确立了，战争使他们意识到一个新时代的来临，由此激发了他们历史的想象力，却并未摧毁他们的道德观念。①所以战争并未使他们变得象大多数年轻人那样悲观失望，反而使他们更坚定、更富有信心地去从事学术研究。这种相同的家庭背景、个人经历和价值观念使他们的学术兴趣也极为一致。尽管费弗尔比布洛赫年长八岁，他们两人自一九二〇年在斯特拉斯堡相识后，就结下了很深的友谊，并共同为法国史学的革新做出了重大的贡献。早在结识以前，费弗尔和布洛赫就都已是出色的历史研究者了，他们对当时法国史学界的现状深感不满，决心要改变这种状况。正是这种愿望促使他们创办了《年鉴》杂志，他们希望杂志成为一块自己的阵地，在这里发

① H·S·Hughes前引书第二章（见本书第234页注①）。

表自己的见解主张和研究成果，同实证主义史学决裂。发刊词中的那段话就表达了他们的这种希望。费弗尔和布洛赫坚决主张摒弃那种以事件为中心的历史，这种历史以政治为自己叙述的首要内容，不仅无法把握人类生活的整体，而且使史学本身陷入绝境。它造成了学术界的分裂，现实生活与历史的脱节，结果出现了这样一种状况，“一方面是一小撮古董鉴赏家，他们只醉心于找寻死魂灵，另一方面，是那些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和法学家，他们只关心现实生活。”① 费弗尔呼吁改变这种现状，他说：

> 历史不应再是一片沉睡的墓地，只有阴谋诡计在那里出没无常。历史学家们充满战斗渴望，他们身上披着硝烟，染着妖魔鬼怪的血迹，必须冲进公主长眠的古老沉寂的宫殿，打开窗户，点亮烛台，让这世界恢复声息，然后以他们自己的沸腾充沛的生命力，去唤醒在沉睡的公主身上已中止的生命。②

① Marc Bloch: "Historian's Craft", Alfred A. Knopf, Inc. 1953, P38.

② 转引自Ernst Breisach: Historiography, Ancient, Medieval & Modern P370.

成为历史学家的费弗尔并没有泯灭自己身上的文学激情，他用形象生动的语言来呼吁重建历史与现实的统一，赋予古老的历史学以新的生命，同样也赋予沉睡的历史以现实的生命。他说，一个真正的历史学家应该“全身心地投入到生活中去，沉浸在生活之中，沐浴在生活之中，把自己和人类生存打成一片，这样在研究和重建过去时他就能获得十倍的力量，而这过去……又将反过来使他懂得人类命运的神秘意义。”①

历史与现实隔着一条明确的界限，两者之间到底有何关系，使得研究者必须把两者统一起来呢？布洛赫强调，我们只有根据过去才能理解现在，也只有根据现在才能理解过去。他说：

> 一个即使是刚被完全改造过的社会也一定有一个十分坚韧有如脊髓的结构。它不得不是这样一个社会，在这个社会中，不同世代之间的交流，也即孩子同他们祖先的接触，只有以他们的父母为中介。……〔不仅如此〕，在分隔遥远的世代之间，文字材料大大地便利了思想的传递，保证了文明的延续。……有谁敢说，理解新教

① 转引自H·S·Hughes前引书第二章（见本书第284页注①）。

> 运动和天主教改革对于正确把握今天的世界没有理解更为晚近也更为短暂的无数运动中的思想感情重要呢？……总之，谬误是清楚的，……这种理论认为人类进化的过程是由一系列短暂的、剧烈的跃进构成的，没有哪一次事变能超越几代人的限度。然而，观察表明，恰恰相反，那些巨大的、持续的发展所带来的重要变化完全能够从它发生之日起一直持续到今天。若一个地球物理学家满足于一英寸一英寸地将月亮和太阳离地距离测量下来，然后得出结论说，月亮对地球的影响要远远超过太阳，我们对此会作何感想呢？单独用外部空间或时间的距离来衡量一种力量的潜在作用是行不通的。①

布洛赫强调现实是深深扎根于历史之中的，而历史是持续发展的过程，即便是遥远的过去，它对现实的影响也不能轻易低估或简单否定。单单用时空距离来衡量历史的重要与否是危险的，这种做法来自于对历史的错误认识，它把历史仅仅看做是一系列事件的集合，因此历史与现实的关系至多只限于同

① Marc Bloch: "Historian's Craft"，第40～42页。

现实最接近的那个时期。布洛赫认为这种认识之浅陋恰如那个认为月亮对地球的影响大于太阳的地理学家，其错误不值一驳。

既然现实深深扎根于历史之中，我们要理解现实就必须理解历史，反过来，要理解历史又必须理解现实。布洛赫说："不同时代休戚相关，其联系如此密切，这种联系的作用是双重的。对现实的误解不可避免地会造成对过去的忽视；同样，一个人若完全无视现实，他在试图理解过去时就会毫无结果、徒费精力。"① 布洛赫举了这么一个例子。他说他曾和亨利·佩伦(Henri Pirenne,1862—1935，比利时历史学家)一起去斯德哥尔摩，这地方他们以前从未到过。佩伦对布洛赫说："我们应先去什么地方观光呢？那里好象有一个新的市政大厦，我们就从那里开始吧。"接着佩伦像是要消除布洛赫的疑惑，补充说："如果我是一个古物鉴赏家，我会把眼光盯在那些古旧的东西上，但我是一个历史学家，我热爱生活。"布洛赫在举完这个例子后说："不容置疑，这种理解活生生的现实的能力是历史学家的最基本的素质。"② 一个大数学家可以

① Marc Bloch: "Historian's Craft"，第43页。
② Marc Bloch: "Historian's Craft"，第43页。

相对地无视他所生活于其中的世界，但一个历史学者若对发生于他周围的人事不感兴趣，那么他就只称得上是一个古董鉴赏家。布洛赫认为，在现实生活中我们能直接感知人生的变动，而在历史中这却需要我们付出极大的努力去加以想象。我们曾无数次地提到战争和战斗，但只有在真正经历了战争或战斗中那可怕而又令人厌恶的现实以后，我们才能真正理解这些字眼的含义。不仅如此，对现实的认识还直接影响我们认识过去，认识历史。布洛赫反对研究历史应从历史的本来顺序出发，首先探讨起源，他把这称之为“起源偶像”①。他说：

> 那种认为历史学家在从事研究时所遵循的顺序必须与历史事件本身的顺序相符合的做法，是一个可悲的错误。即便我们能找到这一顺序的正确方向，我们还是常常受益于麦特兰（Frederic William Maitland，1850—1906，英国历史学家。——引者）所说的从相反的方向来阅读历史。对一切研究者来说，合理的程序是从最清楚明白或者最少错误的形式出发去理解那

① Marc Bloch: “Historian's Craft”，第29页。

> 最模糊的。确实，当我们检视历史的时候，我们常会看到史料所能揭示的历史真相并不见得随着历史的演进而显得越来越清楚。比如，西方十世纪能告诉我们的东西就远比凯撒和奥古斯都时代能告诉我们的要少。然而，在大多数情况下，最晚近的时期相对来说总是最明晰的。我们还必须加上一句，机械地从初始追溯到晚近，常有空废时日之虞，这样去追寻现象的起始和原因，到头来，得到的结果很可能会是出于某种想象。①

布洛赫认为即使是一些杰出的历史学家当他忽视了这种反向观察方法的时候，也会犯这种错误，比如福斯特尔·德·古朗治（Fustel de Coulange, 1830—1889，法国历史学家）在研究封建制度起源时就描绘了一幅颇为混乱的图画。所以，“为了发现真相，历史学家应从现实出发去正确地探讨他的问题。例如，我们农村的地形景观中的某些基本特征可以追溯到遥远的时代。然而，为了解释这种很少有什么史料能帮助我们去推测它的模糊不清的起源的现象，为了正确地提出问题，甚至是为了弄

① Marc Bloch: “Historian's Craft”，第45页。

清我们在说什么，我们就必须从这个前提出发，即观察和分析现在的地形，因为唯有它能提供可以理解的景观，没有它我们就无法开始我们的研究。"①显然，按照布洛赫的上述看法，通过现实来理解历史有两个层次、两层意思：(1)经验感识层次，现实生活中的感受、经验帮助我们更好地体验、理解过去；(2)理性认识层次，从现实出发是理解历史的唯一正确途径。所谓从现实出发，是指通过对现实的认识和理解来反观历史。因为现实是历史发展的一个结果，它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相对成熟和完善的发展形态来帮助我们理解历史。正象人们常说的，对人体的解剖是对类人猿解剖的线索，对一个相对高级的发展形态的理解一定会大大有助于我们研究它的相对低级和不发达的形态。

重建历史与现实的统一，从现实出发来研究历史，并不仅仅是一个方法问题，它首先要求观念的更新，要求我们认清历史的性质及其基本研究对象。传统的史学以事件为中心来阐述历史，这种历史把人变成了单向度的政治人；不仅如此，最大多数的人在这种历史中是不存在的，他们被轻易地抹掉了，至少也只是历史画面中模糊晦暗的底色。费弗尔和布洛赫强烈反对这种断烂的历史，他们反复

① Marc Bloch: "Historian's Craft"，第46页。

强调、大声疾呼历史是一门关于人的学问，不是个别人，也不是人的个别方面，而是完整的人、人的总体。费弗尔说："人不能分割为一个个片断，他是一个整体，历史也决不能分割为这儿一堆事件，那儿一堆信仰。"① 历史研究的"不是个别的人，重复一遍，决不是个别的人，而是人类社会，是组织起来的人类群体。"② 布洛赫说：

> 确实，很久之前，我们伟大的先辈，例如米细勒和古朗治就教导我们要认清历史的对象天生就是人（man），不过让我们说是复数的人（men）。因为决不是单数的人或抽象的人，只有复数的人才是一门变化的科学的恰当对象。在地形景观的种种特征背后，在工具和机器的背后，在最正式的书写文件背后，以及在看来几乎完全同它的创制者分离的制度的背后，都站着人，历史所力图把握的正是这人。〔研究历史〕*若在这方面失败了，那么充其量也不过

① 转引自 Ernst Breisach: Historiography, Ancient, Medieval & Modern, P370.

② 见Marc Bloch: "Historian's Craft". 第26页注③.

* 方括号内的文字是根据上下文意思增加的，不是原文中的——引者。

是炫耀博学。一个优秀的历史学家就像神话中的巨人，他知道无论何处只要他嗅到了从人类血肉之躯发出的气息，他就指到了自己的目标。①

历史应该研究人，研究人类总体，这就是年鉴学派创始人为他们的新历史观确立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当然这个原则还过于抽象，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研究的都是人，历史学同它们有何区别呢？布洛赫说："说历史是一门'人的科学'，仍太模糊，必须加上'时间中的'人。历史学家并不研究抽象的人，他的思想是在时间这个领域中呼吸。确实，很难想象有哪一门科学能够把时间做为纯抽象的东西来对待。然而，大多数学科根据自己的研究目的，把时间任意分割为相同的片断，在那里，时间只是一种量度而非别的东西。相反，历史时间是具体的和活生生的现实，它不可逆转，一往无前。它是历史事件赖以涌现的场所，正是在这个领域中，这些历史事件才能被理解。"②"时间从本质上说，是一个连续统，是一种持续不断的变化。"③历史研究时间中的人，就不能忽视时间的

① Marc Bloch: "Historian's Craft"，第26页。

②③ Marc Bloch: "Historian's Craft"，第27—28、第38页。

这种性质及其对人和人的历史的影响。显然，按照布洛赫的观点，时间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同样，历史也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因此，要研究历史，就不能人为地分割过去与现在，而必然将两者紧紧地联系起来，因为现在是历史的必然延伸，它是包括在历史时间之中的。从这里，我们就能理解为什么布洛赫和费弗尔要极力主张将历史与现实统一起来了，因为不如此就无从理解和把握历史。历史时间作为一个整体，不仅有无限延续的广度，而且有持续变化的深度，要理解历史的变化发展，同样应着眼于变化的整体，而不能把眼睛只盯在个别时刻的个别人事上。布洛赫说：

> 马基雅弗里曾写道，休谟和波拿尔德（Bonald）也这样认为：在时间中，'至少有某些东西是恒常不变的，那就是人'。今天，我们当然不会再这样认为了。我们已经知道人也有了很大的变化，不仅他的心智，就连他身上大多数精巧的器官也肯定是如此。难道不是这样吗？人的精神气候*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同样，他的卫生

---

* "精神气候"（mental climate）是年鉴学派历史学家喜欢用的一个术语，指的是一个时代的思想氛围、精神状态等。

状况和饮食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当然，在人类天性和人类社会中存在一个持久的基础，不然的话，人或社会这样的字眼就会变得毫无意义了。既然如此，我们怎么能相信，只要研究某一特定时刻人对环境的反应就可以理解人呢？这样来研究人是不恰当的，即使我们研究的是特定的时刻。许多潜在的可能性或许能在某一事实中成为现实，但也总有许多决定着个人或集体态度的隐蔽的无意识，仍旧留在事变的阴影中。在一个单一的事件中，我们无法区分出特别的要素，因此也无法对这一事件做出解释。①

历史研究时间中的人，不仅意味着要把时间和历史当作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而且意味着要把历史上的人事放到具体特定的时间中做深入全面的考察，坚持历史主义的观点，避免时代倒置的错误。年鉴学派历史学家特别反对这种错误。费弗尔说："这种错误是某些人无意识造成的，他们把自己投射（他们带着自己的感情、思想、理智上和道德上的

① Marc Bloch: "Historian's Craft"，第42—43页。

偏见的情况就是这样）到过去，把拉美西斯二世、尤里·凯撒、查理大帝、腓力浦二世（甚至路易十四）打扮成1938年的杜邦和杜兰，然后发现自己的主人翁身上具有他们刚刚附加上去的东西，就会心地故吃一惊，给自己的‘分析’下了个早已预定的‘太阳之下并无新物’的结论说：‘所以，人也总是一样的’。”① 事实上，人生活在时间中，生活在历史中，必然随着时间——历史的变化而变化，忽视了这一事实，就忘记了历史的最根本特征。

既然个别人事无助于我们理解和把握历史的总体，那么，历史研究的对象是什么呢？或者说，这历史总体应具体化为什么呢？费弗尔说，是历史事实。一九三三年，费弗尔在法兰西学院新设的近代文明史讲座教授的就职演说上说，综合性的历史研究的不是杂乱无章的事件，而是能够恰当地表现历史事件、现象和过程的有关事实。历史事实是什么呢？费弗尔认为这是历史学家的一种发明和建构（Construct），他甚至说“没有历史，却有历史学家。”② 历史事实建立在历史学家个人兴趣和时代的总的知识水平基础之上，它的可靠性因时间变

① 转引自康恩：《哲学唯心主义和资产阶级历史思想的危机》，中译本，第339—340页。

② 《国外社会科学》，1982年，第6期，第9页。

化而异，它取决于人怎样运用各种各样的象征方法来确立它。这些方法包括：书写文字、口头叙述、数学公式、手势语言、碑铭记录、美学创造、技术手段等等，它也取决于知识水平的变动。一个历史事实，可以是一个事件，也即一个行动或一组行动，它突然迅速地发生在有限空间和短暂的时间内。但并非所有的历史事实都是这种类型。有些历史事实具有无意识的基础，也有些与大空间尺度和漫长的时期相关，要确定这些事实只有借助于地理学、人口统计学、人种学、语言学、经济学、工艺学、心理学和其它一些学科。因此，历史事实并不简单地只是我们称之为事件的那种建构，它的正确定义是包括一切历史的现象的建构或抽象。费弗尔确信，一个历史事实它的时空容量越大，或者说与它相关的时空背景越大，它所具有的意义就越丰富、越深刻。在这类历史事实之上，甚至有可能概括出历史规律来。显然，按照费弗尔的观点，历史学家若能抓住这类历史事实，他就有可能更准确地理解和把握历史的整体和本质。

这样来理解历史和研究历史，就完全冲破了实证主义史学所划定的政治事件、个别人物的狭窄框框，它把历史学家召唤到一个更广阔的领域中去，在这个领域中，成千上万普通人，各种各样自然

的、地理的、技术的、经济的、社会的、心理的、宗教的等等现象取代了以往的个别人物和政治事件，成为历史研究的主要对象。拉杜里在谈到布洛赫时说过一段话，这段话很能反映年鉴学派史观和史学的特征，他说：

> 如果用一个简短的公式来说明这位大师的功绩，我们可以概括为社会学方法和历史展望的时间深度这两个方面。马克·布洛赫主张的社会学方法，就是要坚决地脱出历史事件、纯政治因素和历史人物的框框，以便更好地抓住真实历史的动力，即成千上万的基层人物和成千上万的优秀人物。这两个'成千上万'把那些在时代广告橱窗中充当摆设的人像（如扣人心弦的贝雅尔和威名赫赫的路易十四……）抛在一边，自己创造着真实的历史。①

费弗尔和布洛赫正是在他们自己提出的这种新史观指导下进行长期合作、从事具体研究的，以后这种新史观又成为年鉴学派的旗帜，鼓舞着一批志同道合的历史学家去创建和发展新史学。

---

① 参E·L·拉杜里："新史学的斗士们"，载《世界历史译丛》，1980年，第2期。

要研究普通人的历史，研究历史中地理的、经济的、社会的、心理的等等各种各样的现象，传统的考证方法就显得无能为力了。传统的考证方法是传统史学的工具，研究历史事件和个别人物，我们需要往往也可以弄清它们的来龙去脉，考证它们的真伪对错。但一旦要研究成千上万的普通人，研究影响这普通人生活历史的各种各样因素，考证方法就用不上了。一方面，是缺乏足够的和系统的历史记载以资考证，传统的历史根本就忽视普通人和这众多的因素；另一方面，即便过去的历史记载中留下了足够的材料，我们又如何能够对其一一加以考证呢？因为放在我们面前的不是一个两个历史人物，而是无数的普通人，我们又能搞清他们之中多少人的身世经历呢？当然，史料问题只是一个方面，一个不太重要的方面，事实上，在这里考证方法有用与否、能用与否与史料的多寡并无多大关系，它牵涉到的不是一个技术问题，而是一个理论问题。研究普通人并不需要象传统史学研究英雄那样，去注意他的英雄行为，考证他的生活经历。普通人之所以普通，就因为他平平凡凡，没有惊天动地的英雄业绩，他一生的经历有时还不如一个伟人一天的活动。在历史中，少掉一个两个普通人一般并没有关系，传统史学因此而轻视他。但普通人作

为一个整体，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新史学所要研究的正是作为整体的普通人的历史，这种历史既不普通，也不平凡。在这里，考证方法之行不通并不在于有关史料的数量，而根本上是由于研究的目的和要求不同。从整体上来研究普通人的历史，是要揭示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和变化，以及受其影响又反过来影响它的普通人的心理、情感、信仰、思想观念、价值标准等等。这些仅仅靠史料考证是做不到的，它超出了传统史学所能回答的范围，需要引进新的理论和方法来进行新的研究。年鉴学派的创始人清楚地知道这一点，他们的史观和研究实践必然要向他们提出这样的要求。费弗尔和布洛赫并不是那种局限在史学领域里目光狭隘、作茧自缚的所谓专家，他们始终对其它学科提出的理论和获得的成果抱有强烈的兴趣，始终关注着同时代其它学科的发展，他们懂得这些学科对新史学研究所具有的意义。在他们自己的研究实践中，他们早就在运用那些从其它学科引进的新理论和新方法，并取得了重要成果。在《年鉴》杂志创刊后，他们更是积极主张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进行多学科综合和跨学科研究。费弗尔说："'发现种种相互关系的能力'，这是对于科学特性的最令人满意的定义之一。想想一位卓越的医生，卓越的临床医师，在对

种种分散的朕兆和症状进行比较中是确实会发明或创造出一种新的病型。‘在相邻的学科之间谋求协调、交换的能力’，这对一门扩展中的科学来说，不失为一个好的进步的定义。人们经常用另一种方式来说明这一经验的真实性：‘一些伟大的发现是从那些学科的边缘本身得来的。’”①后来布罗代尔回顾说：

> 他们(指费弗尔和布洛赫——引者)认为历史学是人文科学中的一支。历史学家们甚至无需踮起脚来，就能瞥见邻近学科的田野和花园。要走过去看看那发生了什么，呼吁人文科学的一体化，冲破将各门学科分割开来的墙垣，要将其它学科当作史学的辅助学科，真的这样复杂，这样反常吗？……斯特拉斯堡大学的两位教授的任务是被其明确的：走到其它学科去，并把战利品带回来，重新进行探索，打掉挡在各学科之间的墙垣。②

对于新史学研究来说，关系最密切的相邻学科是地

① 《当代西方史学流派文选》，第49页。

② 转引自 T · Stoianovich: "French Historical, The Annales Paradigm", P11～12

理学、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和心理学。费弗尔和布洛赫主要就是借助这些学科的理论和方法，来从事历史的综合研究的。

费弗尔和布洛赫都是优秀的历史学家，他们在自己的研究生涯中写了大量的论著，从这些论著中，我们可以看到他们是如何具体贯彻他们的史学观点并运用新的史学方法来进行研究的。费弗尔的主要著作除了前面提到的博士论文外，还有：（1）一九二二年出版的《地理历史学导论》，这是一部讨论自然地理因素对人类历史影响的专著。在这部著作中，费弗尔反对狭隘的地理决定论，认为自然地理因素在人类的历史中始终有着微妙的作用。（2）一九二八年出版的《马丁·路德：一个命运》。这部著作并不是一部单纯的传记，而是对马丁·路德及其时代的研究。费弗尔写这部著作首先是要批驳天主教历史学家海因里希·丹尼佛尔的观点。丹尼佛尔在他的著作中把宗教改革运动归结为马丁·路德感情上弱点。费弗尔认为这是对宗教改革运动的贬低，他在自己的著作中分析了当时德意志社会普遍感受到的压抑和不满，探讨了社会冲突与宗教和形而上的观念之间的相互作用，从社会精神气候的角度来解释马丁·路德的个人心理、行为及宗教改革运动。（3）一九四二年，费弗尔完成出版了他

花费十年时间撰写的《拉伯雷的宗教：十六世纪不信教的问题》。这部著作被公认为是费弗尔最优秀的著作，它除了对拉伯雷本人的生平和著作进行研究外，着重分析了拉伯雷那个时代的社会心态，并揭示出那个时代精神生活与现代精神生活的不同。除了上述著作外，一九五三年，费弗尔还出版了他的论文集：《为历史而战斗》。

一般认为，布洛赫的学术成就比费弗尔的大，这主要是因为布洛赫比费弗尔更严谨，同时也是因为费弗尔将更多的时间、精力用于学术组织活动上去了，这多少影响了他的学术成就。布洛赫的主要著作除了博士论文外，主要有三部：（1）一九二四年出版的《国王魔术师》。在中世纪，法国和英国的民众普遍相信他们的国王具有一种超自然的神奇能力，能够通过触摸使瘰疬病（即淋巴结核）患者痊愈，布洛赫对这种民间信仰及其所反映的民间对奇迹的态度问题很感兴趣，做了历史学、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的研究。（2）一九三一年出版的《法国农村的历史特性》。这是布洛赫两部经典性著作之一（另一部是下面要介绍的《封建社会》）。这部著作的研究范围远远超出了题目的容量，虽然其研究的对象是法国，但为了说明问题，布洛赫把法国放到整个西欧历史中加以比较研究。不仅如

此，作者还首次运用了他自己所说的“回溯”方法来研究欧洲农村。布洛赫认为，直至十八世纪为止，农村社会的历史始终没有文字记载，要按通常的纪年方式来对其进行研究是行不通的，我们必须从其现实状况或从其与现实最接近的过去出发来进行调查，探求其早先的状况。农村的变化是非常缓慢的，它的中世纪的概貌至今犹存，历史学家的任务就是从这种今天还能直接观察的东西出发去探寻它的过去。在这里，地名、田野景观、民俗、甚至航空摄影都能帮助历史学家去再现过去。在《法国农村的历史特性》一书中，布洛赫从基本的耕作技术或耕作制度出发，从地理上将法国划分为两个基本的区域，即使用轮犁实行三年轮作制的北部平原和使用手扶犁实行两年轮作制的南部地中海地区，这种分区与国家疆界无关，两个区域都延伸到法国国界以外。接着布洛赫分析了受这种分区影响的家庭结构、庄园性质及其变化，揭示了这些制度也具有上述跨国界的特点。（3）一九三九年至一九四〇年出版的《封建社会》（二卷本）。这部著作试图探讨欧洲社会的异同，并揭示其发展的基本方向。它是贝尔的《人类的进化》丛书中的一种。在这部独创性的著作中，布洛赫把大量的注意力放在分析地名、陆路交往的困难、历时态的社会波动和变化、

集体记忆的作用等等方面，这些构成了布洛赫所说的“背景”，它为布洛赫著作中的全部解释提供了一把钥匙。在这个背景下，布洛赫生动地刻画了高雅的名门贵族和粗俗的暴发户新贵，探讨这两股力量怎样各自在乡村中形成自己的势力范围和附庸体系。除了上述主要著作外，布洛赫还有一部史论著作：《历史学家的职业》，该书写于二次大战期间，并未完成，一九四九年由费弗尔整理出版。

费弗尔和布洛赫在长期的学术生涯中还形成了很密切又很默契的分工合作关系。从上述他们的研究来看，两个人的探讨基本形成了两个既有区别又密切相关的研究领域，这种分工的形成过程中，还出现过一个戏剧性的转变。我们知道，费弗尔在他的博士论文中探讨的主要是中世纪农村一个地区的经济社会史，而布洛赫在他早先的那部《国王魔术师》著作中研究的则是中世纪的民间信仰和社会心理。但后来，两人的研究领域刚好发生了互换：费弗尔转向中世纪精神生活的研究，而布洛赫则专注于中世纪经济社会史的探索。年鉴学派创始人分别着重于这两个历史领域的研究并不是偶然的。按照他们的观点，历史应该研究人类整体，研究人类生活、历史的各个方面。但在具体的研究实践中，人们还会碰到一个问题：怎样研究？从哪里出发进行

研究？人类整体或人类生活和历史的各个方面还是太宽泛、太不确切的说法。显然，研究和把握人类历史的总体并不是要求史学家面面俱到、纤毫不遗地再现历史，事实上这也做不到，而是要求历史学家尽可能准确地把握人类历史中本质的东西，尽可能全面、正确地解释历史。当然，所谓历史的本质，不同的史观会有不同的解释，在年鉴学派创始人看来，最能体现历史的本质，并能正确解释历史的东西并不是表面上轰轰烈烈的事件，如战争、革命、政变或伟人等等，而是那些大时空跨度的历史现象，这类现象涉及面广，延续时间长，具有变化缓慢的特点。具体地说，这类现象就是指社会结构和社会心态*，两者既有区别又密切相关，它们构成了费弗尔和布洛赫关注的两个研究领域：经济社会史和社会心态史。经济社会史从人们具体的经济活动和日常生活出发来揭示社会的结构及其发展变化；社会心态史则通过对社会心理、民俗民风、宗教信仰、流行观念等的研究来展示过去时代的精神生活。这两个研究领域各有侧重又密切相关，将这两种研究结合在一起我们就能提纲挈领地把握住人类历史的总体，对人类历史的发展做出更深刻合理

* "社会心态"（Mentalite）是年鉴学派的一个专门术语，又译为精神状态。

的解释。

无论是经济社会史还是社会心态史都是一种综合性很强的研究，它们要求吸收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其它学科的研究成果，引进它们的理论和方法，但这种研究并不是简单照搬。历史有它自己的特点，在吸收、引进和多学科综合研究的实践过程中，它必然会对其它学科的成果、理论、方法加以消化、改造和创新，形成自己的工作理论和研究方法。布洛赫和费弗尔的研究实践向我们展示的正是这样一个引进、消化、创新的过程。

自从与费弗尔结识以后，布洛赫受到费弗尔的鼓励和影响，对中世纪经济社会史的兴趣日益强烈，并将其作为自己主要的研究领域。在研究实践中，布洛赫深切地感到，就事论事地讨论历史上哪怕是很小一个经济社会现象都难以做出合理可信的解释，而必须将其放到大尺度的时空背景中结合各种因素去做广泛的比较研究。为了进行这种研究，就要大量地借助其它学科的理论、知识和方法，对历史现象做综合的思考，同时广泛研究各种有关现象来同研究对象做比较。布洛赫正是这样来从事研究的。布罗代尔指出，“综合”（多学科综合）和“比较”（历史比较）是布洛赫研究方法的两个特征。不仅如此，综合和比较是布洛赫同一研究方法

的不同侧面。布洛赫说："我们是在综合的旗帜下，即在跨学科合作的旗帜下进行工作的。"① 他又说："没有某种系统的比较就不会有真正的理解。"② 综合研究是人们比较容易理解的，布洛赫在他的研究中大量运用了地理学、工艺学、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心理学、语言学的知识、理论和方法来综合分析历史上的经济社会现象。在这方面，布洛赫对水力磨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实例。布洛赫说，在古代，人们就已懂得了水力磨的原理，但很少将其运用于实际。罗马帝国衰亡以后，由于基督教明令禁止使用基督徒做奴隶，造成了人力的缺乏，这种水力磨便成了经济生活中的必需。后来，中世纪的庄园垄断了磨坊的使用权，农民使用的那种原始的手推磨才被淘汰。除去许多例外，这全部的过程可以看作是技术的胜利。布洛赫说："总之，水力磨作为一项很古老的发明在其一开始就几乎达到了很完善的境地，但只有经过一系列与它的内在功用完全不相干的因素的作用才能得到成功运用。这些因素包括：帝国的灭亡，宗教信仰，新的公共权力结构等等。"③ 这样从多方面

① 参《国际社会科学百科全书》，"马克·布洛赫"条。

② Marc Bloch: Historian's Craft, P42.

③ 转引自 H. S. Hughes 前引书第二章（见本书第284页注①）。

来分析历史上技术的发明和应用，不仅解释了技术的变化，而且可以从中看到整个社会的变迁。

综合研究是一个侧面，比较研究则是布洛赫研究方法中另一个侧面，而且是更值得重视的方面。布洛赫的两部经典性著作：《法国农村的历史特性》、《封建社会》可以说是运用比较方法进行历史研究的杰作。除了具体运用外，布洛赫还写了专文对历史比较研究加以阐述。一九二八年，布洛赫发表了"欧洲社会的历史比较"一文。文章一开始，布洛赫就说："比较方法〔对历史研究〕*大有裨益，我认为，完善比较方法和广泛运用比较研究是今天历史学最迫切的任务之一。"① 遗憾的是，大多数历史学家忽视或看不到这一点，仍埋头于他们的专题研究中，布洛赫呼吁改变这种状况。什么是比较方法？对历史学家来说，比较意味着什么？布洛赫说：

> 毫无疑问，比较意味着，选择两个或

* 方括号内的字是根据上下文意思增加的——引者。

① Marc Bloch: "Toward a Comparative History of European Societies", in F.C.Lane and J. C. Riemersma: "Enterprise and Secular Change". (Homewood, Illinois, 1953), PP494—521。

以下引用该论文处，只注明文章，不再写出该论文出处——引者。

> 数个现象，这些现象发生在同一或数个社会背景中，乍看起来它们是类似的。然后找出这些现象之间如何类似或不同，尽可能地追寻它们的演变，解释这种相同或相异。为了进行历史比较，必须具备两个前提：观察对象必须具有某种相同或类似；这些现象所由发生的环境必须有一定程度的差别。……从技术上说，我在历史比较中所研究的全部对象都是从一个相同的社会的各部挑选出来的，这个社会从总体上构成一个大的单位。通常，历史比较几乎只是指比较发生在不同国家或民族疆界内的现象。确实，在一切社会对比中，政治的和民族的对比是最强烈也最明显的。但是，……这种对比较方法的狭隘观点太简单化了。因此，我们在这儿使用“环境的不同”这一说法，这是一个更可行也更确切的说法。①

这一段话里有两个关键的地方，表明了布洛赫所主张的历史比较方法的两个特征，一是“相同的社会”，二是“环境的不同”。所谓“相同的社会”，

① 参布洛赫“Toward a Comparative History of European Societies”一文。

指的是同一形态同一类型的社会，比如欧洲的封建社会，在布洛赫看来就可以称之为一个相同的社会。所谓“环境的不同”，不仅仅是指国家或民族的差别，甚至主要不是指这种差别，而主要是指由自然地理环境及具体生产技术的差别所造成的生存环境的不同。当然，布洛赫特别强调的这两点都是针对中世纪欧洲的经济社会史而言的。相同的社会和不同的环境这两个关键点在不同时代、不同地区和不同目的的历史比较研究中应该有不同的具体规定，这一点布洛赫虽然没有在文章里明确指出，但我们可以顺理成章地得出这个结论。接着，布洛赫指出有两种不同的比较研究方法，它们的原则不同，研究结果也不同。第一种是比较时空距离很遥远的社会，在这里，观察现象的类似无法用相互影响或共同起源之类的原因来解释。另一种比较的单位是地理上相邻又同处一个时代并始终存在相互影响的几个社会，在历史发展过程中，这些社会由于时空的接近而大体上有相同的因果，不仅如此，它们有着（至少是有着部分）共同的起源。从科学的观点来看，一种方法越严格就越有价值。上述后一种比较方法由于它更严格又更具批判性所以就能获致更精确和假想成分更少的结论。布洛赫说他就是使用后一种方法来研究欧洲的各个社会，主要是西欧

和中欧那些同时代的相邻社会。布洛赫认为这种比较的一个最明显的优点就是“对相邻社会的不同点做细致的比较能够帮助我们去把握这些社会之间的相互影响”。① 不仅如此，这种研究还“能帮助历史学家去探求真正的原因。”② 布洛赫强调对普遍的历史现象不能只从个别的范围去从事研究，“一个普遍的现象必然有着同样普遍的原因”，③ 即现象与因果有着基本等比的关系。研究一个普遍的历史现象就应将其放进相应的大范围中去。比如说，对法国等级会议这个历史现象，仅仅从法国本身入手做专题研究是无法给出完满的解释的，因为等级会议是欧洲中世纪历史上一个普遍的现象，只有将其同英国的、德意志的、意大利的、西班牙的同类现象加以比较，才能得到合理的解释。布洛赫说，这样来看问题，并不是否认区域研究或专题研究的重要性，而是要求历史学家努力将专题研究同整体的比较研究结合起来。他说：

> 总体的比较研究只是第二步的工作，
> 如果没有区域研究为前提，比较研究就会

①② 参布洛赫 “Toward a Comparative History of European Societies” 一文。

③ 参布洛赫 “Toward a Comparative History of European Societies” 一文。

> 毫无成就。另一方面，专题研究之所以重要只是因为它有助于比较研究从各种环境的混杂的多样性中引出普遍有效的真实的因果来。①

布洛赫指出，人们对比较研究存在某种误解，这损害了比较方法的应用。一个最常见的误解就是认为比较方法无非是指出类似的现象。我们常听到一种抱怨说，比较方法只满足于牵强附会，甚至武断地想象出一些东西来证明不同社会发展的类似。如果真是这样，比较方法就毫无意义了。布洛赫说，与这种误解相反，“比较方法的首要兴趣是对不同点做观察，探讨这不同是原生的，还是从一个共同起源上发展起来的不同。”② 仅仅观察到外表的对比是不够的，我们还必须特别努力去弄清在哪些方面两个对象是不同的。这种努力是更为重要的，比起仅仅看到表面的对比来也更加有趣。总之，比较研究要求历史学家具有两方面的能力，宏观把握的能力和深入细节的能力，两者缺一不可。

> 毫无疑问，比较只有当它是建立在深入细节的、严格查证的和有充分证据的事实

①② 参布洛赫 “Toward a Comparative History of European Societies” 一文。

> 研究基础上时，才是有价值的。同样明显的是，人类有限的能力决定了第一步的研究不可能应付太大的地理和编年范围的课题。恰当地说，比较工作很遗憾只是一小部分历史学家的任务。然而它需要加以一定的组织，并应在大学的讲台上占有一席之地。当然，我们不应自欺，既然许多领域还缺乏初步的专题研究，比较研究的进展只能是缓慢的。那句老话仍旧是正确的：一天的综合需要多年的分析。但是人们说这句话时常常忘记做必要的补正分析只有当它一开始就是出于这种综合的目的时，才对综合有用。①

布洛赫强调比较研究应建立在专题深入的基础上，同时强调专题研究要有综合比较意识，专题研究与综合比较应是整个史学研究的两个阶段，但并非可以截然分开的两段。综合比较应以专题研究为基础，要注意深入细节；专题研究则应以综合比较为目的，或至少应有综合比较的意识，这样才能将各自的研究搞好。布洛赫认为，比较并不只对宏观把

① 参布洛赫 "Toward a Comparative History of European Socities" 一文.

握有用，即使是一个从事专题研究的人，也能从比较中获得启示和教益。他说，从事专题研究的人应该注意阅读他们的前辈在研究同类课题时的著作。不仅应阅读关于与他们自己研究的地区相同或相邻地区的那些研究专著，也应该了解关于与自己研究的地区相距遥远的地区的研究，甚至那些关于不同民族或政治共同体的地区的研究。这一段话比较复杂，让我们来举个例子。比如，按照布洛赫的看法，研究法国北部诺曼底地区的人不仅应注意其他学者关于这一地区或与此相邻地区的研究，也应了解与此相距遥远的法国南部普罗旺斯地区或朗格多克地区的同类问题的研究，甚至了解人们对英国、德国或意大利的同类问题的研究。布洛赫强调专题研究不仅能从一般的概览中，更能从上述那些专题研究中大受其益，而且后者比一般概览要丰富和生动得多。这种对本专题之外的研究状况的广泛深入的了解，将帮助研究者正确地提出问题，做出假设来指导自己的研究，并帮助人们发掘新的事实，同时它也能提高人们在研究中的敏感性，帮助研究者避免过高估计从单一地区研究中找出的原因。正因为比较方法对各种研究都有意义，所以布洛赫认为没有某种程度的比较就不会有真正的理解。布洛赫对历史比较方法的重视和强调，并不是出于一种个

人的偏好，而是出于把握历史总体的需要。因为很显然，只有从对局部与局部，局部与整体的广泛综合的比较中，我们才能把握住宏观历史现象，并对其做出更深刻合理的解释。正象布洛赫自己曾经说过的："文明如同一个人一样，丝毫不象机械地摆好了的牌阵：一个片断一个片断地单独研究所获得的片断知识永远不能导致对整体的认识——甚至也无从认识这些片断本身。"①从这一角度来看比较研究，它就不是一种单纯的研究技巧，而是一个基本的方法论，任何力图在自己的研究中把握历史总体的研究者都不能避开或拒绝比较研究。

布洛赫在经济社会史领域辛勤耕耘，而费弗尔则在社会心态史领域内"为历史而战斗"。研究社会心态史是为了揭示过去时代的精神生活。事实上，同经济社会史相比，社会心态史在年鉴学派创始人那里受到更多的重视，他们认为研究历史，把握历史总体，归根到底是要揭示过去时代最大多数人的思想情感、精神面貌。布洛赫说，他写《封建社会》的目的就是要把握体现这种社会关系的活思想，因此他的任务是心理学的。他认为一切社会阶层的划分在本质上是心理的："一个社会阶

① 参布洛赫 "Toward a Compartive History of European Socities" 一文。

层划分的存在，归根到底是由人们创造的观念支持着的。”① 正因为这样，布洛赫强调，历史学家不能无视心理学家的观点。费弗尔则认为，在他看来心理学并不是史学研究的一个分支，毋宁说这是他力图径直把握历史的特殊手段，正象别人可能会选择经济学的或社会学的方法来这样做一样。费弗尔指出，历史学家关于过去的知识中存在一个很大的空白，“我们没有关于恋爱的历史，没有关于死亡的历史，没有关于怜悯和残忍的历史，没有关于快乐的历史”，② 总之，历史上整个人类情感的领域还未被历史学家触动过。要对这方面进行研究，首先必须借助心理学的理论和方法，将历史学与心理学结合起来。

费弗尔说：“心理学作为精神职能的知识，必然应该同社会职能的知识——社会学建立各种密切的关系；它也必然应该同那些并未下好定义而混在历史这个传统名词下面的学科保持多方面的关系。”③ 但把心理学同历史学结合起来并不象一般想象的那么容易。首先，我们应该明确历史学研究

① 转引自H·S·Hughes 前引书第二章（见本书第234页注①）。

② H·S·Hughes 前引书第二章（见本书第234页注①）。

③ 费弗尔：“历史与心理学——一个总的看法”，载《当代西方史学流派文选》，第49—84页。

什么，然后才能讨论心理学同历史学的合作。费弗尔说，人们一般认为，历史研究的对象包括两个部分，“一方面，研究对历史的巨大业绩做出某种贡献的混乱的无名人群的活动；另一方面，研究浮现在这个灰色画面上的某些称为‘历史人物’的个人的指导行为。”① 根据历史研究的这两个方面，心理学应用于历史研究就应分为相应的两个部分：集体心理学和个人心理学。

> 怎样对待无名群众呢？他们将以研究现在可以领会的群众为基础的集体心理学去判定，而且可以无须费力地（人们至少这样假定）把那些研究的结论扩大应用于过去的群众、历史上的群众。至于卓越的个人、“历史人物”，他们自然将认为属于个人心理学的范畴。②

这样的说法看上去没有什么大问题，但实际情况并不这么简单。它马上会碰到这样两个问题：一、社会、历史能否机械地截然分为这样两个部分、两个方面？二、当代心理学的研究能否简单地推广到历史的领域中去？费弗尔通过对这两个问题的分析阐

①② 参费弗尔“史历与心理学——一个总的看法”一文，原文载《当代西方史学流派文选》，第48—54页。

明了他对心理史学的看法。

费弗尔说，人们通常把所谓的“历史人物”看做是“一种巨大历史业绩的负责的创造者”，①这实际上是一种幻觉。费弗尔认为，历史业绩应该是“越出地区和民族而以人类为目标的业绩”，②人们往往因为有历史业绩而设想有创造业绩的作者——历史人物，并反过来认为历史人物创造了历史业绩，比如说，认为达尔文、莎士比亚、马克思、加尔文就是创造了某种科学、文学、哲学或宗教的伟大业绩的作者，即历史人物。费弗尔对这种观点提出质疑，他问道：“然而，如果这位作者没有选用这一成果的那个群体的协作和积极参预，不是就不可能赋予这一业绩以效能吗？一个人发表一种思想，而这种思想，在他看来全部为‘社会环境’所歪曲和改变——这样的惨事难道不是——如果不是正常地、至少也是经常地出现的吗？”③费弗尔举了马丁·路德的例子来说明上述那个观点的荒谬。马丁·路德的学说在传播中被他的信徒大大地改变了，他成百次地感到困惑，不安地忏悔，他的思想的这一遭遇具有很大的代表性。费弗尔说，历史往往不就是

①②③ 参费弗尔“历史与心理学——一个总的看法”一文，原文载《当代西方史学流派文选》，第48—64页。

这样的吗？因此，“在人类中，哪里有什么能够被人们看做自主的、独立的和孤立的权力者，看做崭新的和自发的创造物呢？人类中所有的人，不是都承受如此强烈的种种影响的吗？——有些影响来自各个时代的实在，另一些影响则以最直捷的方式由当前的社会环境显现出来，——而首先不是由语言和全套工具来传递的吗？……一言以蔽之，可以说，个体只可能存在于他的时代，存在于他的社会环境里。”① 既然个人只能存在于他的时代，他的社会环境，并受制于这种时空环境，就不存在能自主独立创造历史业绩的历史人物。费弗尔说：

> 社会环境事先就已浸透历史业绩的作者，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作者的创造。而当创造完成时，要么它凋落，要么使它活下来，它就得承受积极的合作，承受群众令人生畏的合作，承受环境的不可抗拒的和强制性的衡量。②

费弗尔强调，“就人而言，社会是必需品，是一种有机的真实。”③ 人不能脱离或超越他所处的

①②③ 参费弗尔“历史与心理学——一个总的看法”一文，原文见《当代西方史学流派文选》，第49—64页。

时代和社会环境，即便是那些所谓的“历史人物”也不例外。这样费弗尔就对第一个问题做了否定的回答，社会、历史不能截然地分为无名群众的活动和历史人物的活动这样两个方面，相反应时时将它们看做是一个整体。既然这样，心理学应用于历史研究就同样不能简单地分为集体心理学和个人心理学去分别研究上述两个方面。

那么，心理学应如何运用于历史研究呢？这涉及到前面提出的第二个问题。费弗尔说：“历史心理学有一个特殊的问题。当心理学家在他们的论文集里，在他们的专著里向我们谈论‘人’的情绪、决心、推理的时候——实际上，他们所研究的是我们的情绪、决心、推理。……那么，我们——历史学家们——怎么可以借助于从观察二十世纪的人所得来的心理学的结果来解释过去了的人的活动呢？而他们——心理学家们——又怎么可以用历史所提供给他们的（或者说，应该向他们提供的）材料，并从这种材料去把他们与他们同时代人接触所得的经验单纯地加以扩大来重新发现过去的人的精神面貌呢？这种经验，充其量只能够提供一些比较性的类型，使他们得以更好地领会我们的祖先曾显示出来的——直接的或非直接的，远的或近的——

与我们的差别点。”① 对于上述这些问题，费弗尔的回答是简单明了的：“事实上，我们当代心理学家的心理学，不可能通用于过去的人，我们祖先的心理学也同样不可能笼统地应用于今天的人。”② 这是因为人们生存的一般条件以及受其影响的人们的观念、心理、情感等都发生了变化。他说，比如，由于物质生活的变化，昼与夜的差别，对二十世纪的人来说和对于十六世纪的人来说，影响就完全不一样。对于二十世纪的人来说，昼夜差别的影响几乎不存在，电光代替了日光，人成了昼与夜的主人。但对十六世纪的人怎样呢？“他们可没有做过日和夜的主人。当夜晚来临时，这些可怜的人——他们甚至连油灯也没有，甚至没有可以点燃的蜡烛。这是一种每天由黑暗和光明的连续来划分和节律的生活；一种被分成两部分的生活：日，夜；白，黑；绝对的安静和喧闹的劳动——人们认为这样的生活会在这些人中产生与我们平稳无阻的、不会被突然切割为差别和对立的生活所产生的同样的精神习惯、同样的思考、感觉、意愿、行动和再行动的方式吗？”③同样，寒、暑、温饱、安全等

①②③ 参费弗尔“历史与心理学——一个总的看法”一文，原文载《当代西方史学流派文选》，第48—64页。

等许多条件的差异，也必然影响到人们的观念、情感和行为方式。历史学家在研究历史的时候绝对不能忽视时代之间这些巨大差别，否则他就要犯“时代倒置”的错误。当代心理学的结论之所以不能简单推广到历史中去，原因就在这里。费弗尔说：“如果我们不许把现在，把我们现在在过去中反映出来；如果我们排斥最恶劣、最隐蔽也最严重的心理上的时代错误；如果我们要求从考察它们生存的一般条件来弄清楚那些社会的全部活动，首先是心智的活动——显然，我们就不能认为，我们的心理学家就我们时代所提供的材料，对过去所作的描绘和论证会是有价值的。”①既然这样，心理学怎样与历史研究合作呢？费弗尔认为：

> 一种真正的历史心理学，只有通过心理学家和历史学家明白的协商，才有可能获得一致。历史学家由心理学家指点方向。但心理学家要密切依靠历史学家，必须关心他，为他创造种种工作条件，协同工作。说得清楚些，就是构成一个工作队伍。②

①② 参费弗尔“历史与心理学——一个总的看法”一文，原文载《当代西方史学流派文选》，第49—64页。

这种合作并不是对历史上的人物做简单的个体或群体的心理分析，而是要重建或再现过去时代精神生活的全貌。这不是心理学研究，而是一种历史研究，是历史学借助心理学的理论和方法去理解和把握历史的一种努力。它的研究过程和研究结果应该是这样的：

> 事实上，首先是清查细节，然后就所研究的时代，把关于为这一时代的人所有的心智的材料重新组织起来，以充分的学识、渊博的努力，再加上想象的努力，重建世界，重建形质的、智力的、道德的全部世界。在这个世界当中，每一个世代都由它前面的一个世代蜕变而来；一方面，要毫不含糊地明确事件的某些基本知识在这一点、那一点上的不足之处；另一方面，又要搞清楚所研究的社会在某个时期所使用的技术装备的性质，了解对这样的历史集体所显现出来的被锻造的社会、生活、宗教、政治必然会产生的缺点和歪曲；最后，还要弄明白——借用亨利·瓦隆的意见：一个“以人的筋骨为唯一力量去对付在它面前的具体实在”的世界，不是，也

不能是和人为了需要而役使电力——为了产生电力而役使自然本身的力量相同的世界；……①

这里，费弗尔所要求的显然不是对历史做心理学研究的个别结论，而是过去时代的整个社会心态。历史学与心理学合作的结果并不是简单地产生历史心理学或心理历史学，而是去开拓一个新的研究领域——社会心态史，这才是历史学家的真正目标。实现这一目标，需要历史学家付出辛勤的劳动和极大的努力，并对历史学家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在这方面，费弗尔的那部代表作《拉伯雷的宗教：十六世纪不信教的问题》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范例。

费弗尔反对将拉伯雷称为无神论者，他通过大量的分析来表明，在十六世纪的法国是不可能有理性的无神论思想的。他用生动的文笔描绘了当时的浸透了基督教精神的生活。教堂用钟声宣告一个人的出世，又用钟声为他离开人世送行，一个人一生的所有重要阶段都有宗教庆典！结婚、生育、参加行会等等。除非精神失常，没有人会因为这种或那种系统的理由去否认宗教，因为除了基督教文明以

① 参费弗尔"历史与心理学——一个总的看法"一文，原文载《当代西方史学流派文选》，第49—64页。

外，人们别无选择。人的道德生活、感情生活、审美生活以及政治和社会生活，所有这些方面都浸透了基督教精神，另一方面，却没有支持无神论的社会结构。当时的法语还无法成为思想的工具，它缺少这样一些字眼，如：绝对、相对、抽象、具体、综合、内在的、原生的、敏感的、因果、规律性、概念、标准、合作、分类等等，而语言本身的结构也是累赘和含糊的。当时的思想工具是拉丁语，而中世纪的拉丁语多少世纪来一直是神学家使用的工具，它不是一种民族语言，如果在法语中找不到一个表示新概念的字眼，那么在拉丁语中也同样找不到，这是一种近乎死的语言，根本适应不了新的不断扩张的思想。哲学也同样没有帮助，当时有不同的哲学学派，但无法在这一派或那一派中做选择，因为没有哪一派能为新观点提供坚实的基础，哲学也是为宗教服务并被圈定在宗教范围内的。数学也无助于无神论思想的产生，当时的数学甚至还没有加法符号。社会也没有受到数学推理和计算模式的影响。数量计算仍旧使用着罗马数字，这是一项繁重而令人疲乏的工作。除了上述情况之外，当时还缺乏科学方法和自然规律的意识，而没有这一标准，世界就无所谓不可能之事。没有谁能否认，一个被斩首者会拿着他的脑袋在路上走。农民们说在路上

遇到妖怪，也无人会觉得奇怪。因为当时没有科学的自然规律的概念能够去否认这种情况。总之，在十六世纪这种普遍的思想感情、精神状态下是不可能产生理性的无神论思想的。事实上，一直要到十七、十八世纪之后，随着近代科学的兴起，才有可能产生出新的非基督教的思想规范来。①

费弗尔的精彩分析是令人信服的，他的工作没有局限在当时的个别人身上，而是端出了整个时代的社会心态，并把个别人物放在这个背景中去加以考察，这样就比就事论事地讨论个别人物更准确地把握住了历史的真实。从费弗尔的上述分析我们还可以看到，心态史的研究，并不仅仅是心理学和历史学的合作，而是借助了多门学科的力量。费弗尔本人就说过，从事这方面的研究，“总括起来，只是坚持一个句话：必须以灵活、创新、机巧的精神去寻求合作者，并且在全部脑力劳动面前，将提出作为一个探讨者所应该提出的问题：‘对我来说，这种东西能有什么用处？我怎样去运用还没有搞的东西？’”②

① 参见 Lawrence D. Walker: “Mentalites, The Hidden Agenda of Stannard's Shrinking History”, The Psyeho history Review.

② 《当代西方史学流派文选》，第69页。

费弗尔和布洛赫在长期的学术实践中，努力贯彻自己提出的史学主张，力图从总体上全面地认识和把握历史。为此，他们积极进行多学科和跨学科的综合研究，这种努力不仅产生了丰富的研究成果，更为重要的是开拓了新的史学研究领域，初步形成了一个史学研究规范。虽然他们从未对自己的理论和实践做过系统的总结和阐述，他们的工作本身就为他们的同伴和追随者提供了指导和示范，当然这种工作本身也需要在理论上进一步展开并在实践上进一步深入，而这将是新一代年鉴学派历史学家的任务。

4-4 总体历史和长时段

一九四六年，《经济社会史年鉴》改名为《经济、社会、文明年鉴》，次年，法国高等实践研究院新创立了第六部，经济和社会科学部。杂志的改名表明年鉴学派开始追求一个更雄心勃勃的目标，即对历史做更为全面的总体和综合研究；第六部作为一个社会科学综合研究的中心，它的成立则标志着社会科学跨学科研究和综合的制度化，在第六部里，年鉴学派的历史学家发挥了最有影响的重要作

用。上述这两件事标志着年鉴学派结束了创始时期而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即成熟和扩展阶段。

年鉴学派这一新的发展阶段和当代法国最著名的历史学家费尔南·布罗代尔的名字是分不开的，由于他在这一时期对年鉴学派乃至对整个法国史学的繁荣和发展所做的贡献，有人干脆把这一阶段称为布罗代尔阶段。费尔南·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一九〇二年八月出身于法国东北部的一个小镇上，他的童年是在法国农村度过的。早年布罗代尔醉心于诗歌并对医学感兴趣，直到进了巴黎大学他才开始接受正规的历史学训练。既使在大学期间，他对历史学的兴趣也是较晚才产生的，他不是一个很用功的学生，全凭了他那非凡的记忆力，他才毫不费力地念完大学获得史地教师的资格。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三二年，布罗代尔在阿尔及利亚的中学教书，在这期间，他对地中海的历史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开始利用假期在地中海沿岸各国搜集资料，准备以地中海的历史为主题，撰写博士论文。一九三五年至一九三七年，布罗代尔又在巴西圣保罗大学任文明史教授。其后布罗代尔回国，在高等实践研究院第四部工作，在此期间，他结识了吕西安·费弗尔，深受其影响，并成为年鉴学派的一员。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布罗代尔被征入伍。

他所在的部队奉命坚守马其诺防线。一九四〇年七月，马其诺防线崩溃，布罗代尔和许多法国士兵一样成为德军的俘虏，在战俘营里度过了长达五年之久的囚徒生活。一九四五年，大战即将结束，他才回到法国。一九四七年，布罗代尔完成了他的博士论文并顺利地通过了答辩。同年，他成为《年鉴》杂志的主编。一九四九年，他接替费弗尔任法兰西学院教授。一九五六年，他又接替费弗尔成为高等实践研究院第六部主任。一九六八年"五月事件"后，布罗代尔年事已高，他辞去了《年鉴杂志》主编的职务。一九八四年，由于他在学术上的巨大成就，布罗代尔当选为法兰西科学院院士。一九八五年十一月，布罗代尔逝世。

布罗代尔不仅是当代法国最著名的历史学家，而且享有世界性的崇高声誉。人们评论说："如果设立诺贝尔史学奖，布罗代尔是无可争议的第一位获奖者。"并公认他为"当今世界首屈一指的历史学家"。① 这样的赞誉对他来说并不过份。布罗代尔年轻时受年鉴学派创始人费弗尔和布洛赫的思想影响甚深，在他们的史观指导下从事历史研究，以后他又发展和深化了他们的思想，推进了他们所开创

① 见《读书》1986年第4期陈彦："令法国人引为骄傲的历史学家"。

的新史学研究工作。在这方面他所取得的成就和做出的贡献，使他成为年鉴学派中继往开来的最重要人物。在布罗代尔的研究和论著中，总体历史的思想得到了最充分的体现。他在研究中力图把人类社会的过去作为一个整体，作为一个完整的系统来把握，并从这个系统及其各组成部分密切相关、相互作用所形成的结构和功能关系方面来再现处于动态过程中的历史总体。这样，总体历史就应在空间、时间这两个维度上同时展示它的全貌。当然，这些思想并非布罗代尔的独创，他的贡献在于他在自己的研究和论述中将年鉴学派创始人所提出的史学观点和主张做了进一步的阐发，并加上了自己新的创见。

布罗代尔最著名的著作是他的博士论文：《腓力蒲二世时代的地中海与地中海世界》撰写这部两卷本一千二百多页的巨著耗费了作者的全部青春，即使在德国的战俘营里，作者也未停止思索和写作。为了写作这部巨著，布罗代尔跑遍了地中海沿岸，查阅了大量的资料。到一九三九年已积累了一万多张卡片，并写出了全书的大纲。在战俘营里，他凭着自己非凡的记忆力，结合记在脑子里的资料进行思考，并把自己的想法和心得写在已获释的难友寄给他的学生练习簿上，等到获释时，他已写出了

博士论文的大部。战后不久，他就完成了论文初稿，一九四七年顺利通过答辩后，一九四九年，分两卷出版了这部巨著。该书使他一举成名，很快被公认为是一部经典、一部杰作。人们评论它说："在我们时代还没有一部历史著作象它一样如此地改度了我们的看法，不仅仅是对地中海历史的看法，而且是对历史学家任务的看法。……这部著作是无与伦比的。"①

《地中海》一书之所以能获得如此高的赞誉，不仅是因为它出色地写出了一个地区（地中海地区）、一个时代（腓力蒲二世时代）的历史，更为重要的是它本身就代表了一个时代（当代）的历史，至少是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一种历史。人们说过这样的话："如果说年鉴派有什么学说的话，布罗代尔的《地中海世界》一书堪称范例。"②在《地中海》一书中，布罗代尔从总体历史的思想出发，努力把十六世纪后半期，即西班牙国王腓力蒲二世在位时期（1556—1598）的地中海世界做为一个整体来加以考察。正象有人所指出的，这部书可以看做是一部巨型历史传记，一部地中海传。布罗代尔

① 见《地中海》，英译本（Paper Back），第二卷，封底书评。

② 《文摘》，1984年，第8期，第25页。

在该书序言中说：

> 关于历史与地理空间的联系，可以说没有比地中海这个直截了当的例子更能说明问题的了。特别是十六世纪以来，地中海与人类的关系得到了如此地扩展。它的性格是错综复杂的、难以把握的、又是独特的。我们无法用通常的标准来衡量它、区分它。简单的编年传记写不出这个海，单纯地叙述发生了什么也不能恰当地表现它的历史。地中海不是一个单一的海，而是许多海的综合体，这些海被岛屿所分割，被半岛所打断，又被犬牙交错的海岸所包围。它的生命与陆地休戚相关，它的诗意远远超出了田园的范围，它的水手可能季节性地成为农民；正如它是军舰和商船的海洋一样，它也是葡萄园和橄榄树的海洋。它的历史无法同环抱它的陆地分割开，正如粘土不能同制作水壶的手分开一样。①

然而，以往许多研究地中海历史的学者都没有看到

① The Mediterranean and the Mediterranean World in the Age of Philip Ⅱ: Harper Torchbook, 1976, P17.

地中海如此丰富多彩的个性，他们仅仅是在“用过去的一种语言说话”，“他们所关心的不是地中海的整体，而只是这幅镶嵌图画中的细小片断；不是地中海生活的整体运动，而只是过去一小撮国王和富翁的活动琐事，他们几乎不关心我们当作主题来研究的历史的缓慢而强健的脚步。所以，许多这种著作若要能恢复生命，就必须联系历史的整体来重写。”①为了写出地中海世界的总体历史，布罗代尔将自己的著作分为三个部分。布罗代尔说：

> 第一部分写的是人与其环境的关系的历史。这种历史的流逝几乎无法被察觉，在这种历史中，一切变化都十分缓慢，这是一种由不断重演、反复再现的周期构成的历史。我不能无视这种几乎不受时间影响的历史，这种人与无生命的世界交往的历史。我对许多历史著作中开头的那种传统的、无目的的地理环境导言很不满意，这种导言描述矿产，农业类型，典型的植物群落等等时，仅做简单罗列，以后就不再提及了，仿佛鲜花以后就不再每年春天

① The Mediterranean and the Mediterranean World in the Age of philip Ⅱ: Harper Torchbook, 1976. P18.

开放，羊群也不再每年迁徙，海上的船只也不再随季节变换航向一样。

在与第一种历史不同的另一层次上，可以看到另一种历史，这种历史的时间虽然缓慢却能感觉到它的节奏。如果我们的表达不会改变它的全部含义的话，我们可以称它为社会史，即人类群体或集团的历史。这种不断壮大的潮流如何在总体上影响地中海的生活是我在本书第二部分中向自己提出的问题，这部分研究的是经济制度、国家、社会、文明，为了更清楚地说明我的历史观，我试图揭示所有这些深深扎根的力量是如何作用于错综复杂的战争舞台的。众所周知，战争并不单纯是个人活动统治的舞台。

最后，第三部分注意传统的历史，……即事件的历史：这种历史充满表面的喧嚣，那是由历史潮流所掀起的泡沫，是短暂、迅速、不安而极敏感的波动，是由最小的震动所引起的颤抖。然而，正因为这样，它是最激动人心的，最富于吸引力的，但也是最危险的。……一个危险的世界，它的吸引力和魔力是我们要通过确定

> 其潜流来加以驱除的，这种潜流常常是沉默的，它的方向只有通过长时期的观察才能把握，喧嚣的事件往往只是瞬时的扰动，是这些更大的运动的表征，只有依据这些运动，事件才是可以理解的。①

根据这样的安排，布罗代尔在《地中海》中首先以大量的篇幅讨论了地中海地区的自然地理状况，这包括半岛、岛屿、山脉、高原、平原、近海、远洋、季节、气候，接着讨论了该地区的经济社会状况和文化生活，如城镇、乡村、水陆交通、商业贸易、内外交往、各地物产、民众生活、文化方式等等；最后才涉及十六世纪后期该地区的政治史。显然，布罗代尔这样安排他的著作并不是出于论述的方便，它鲜明地体现了布罗代尔的历史观。按照布罗代尔的观点，这三部分有着各自的历史，分属不同的时态，并在总体历史中分别扮演不同的角色，承担不同的功能。他说："这样做的最终效果是把历史分为不同的层次，或者换一个角度说，是将历史时间分为地理时间、社会时间和个体时间，或者再换一个说法，是将人分成多元的自我。"②将历史分为不同层次、不同时间，这在布洛赫和费弗尔

① 《地中海》，英译本，第20—21页。

② 《地中海》，英译本，第21页。

那里就已经是这样主张、并付诸实践了，但象布罗代尔这样明确地提出问题和认识问题，将不同历史层次和历史时间一一对应起来，却是一个理论上的创新和发展。从《地中海》一书我们可以看到，将历史从不同时间的角度来加以理解和把握是布罗代尔历史理论中的一个最基本的立足点。

尽管人们对《地中海》一书的理论意义评价很高，它毕竟是一部研究专著，而不是一部史论著作。为了进一步阐明自己的理论主张，布罗代尔在一九五八年发表了一篇著名论文："历史与社会科学：长时段"。在这篇论文中，布罗代尔集中讨论了多元的时间观在历史乃至在社会科学研究中的意义。布罗代尔说，许多社会科学忽视甚至无视历史学家的工作和社会现实中的历史这个方面，这实际上是忽视社会现实中时间这一因素。布罗代尔认为，时间"不仅决定了过去的性质，而且构成了现实的社会生活的结构。因此，在当前社会科学的讨论中有充分理由尽可能有力地强调历史的重要性和价值，或者说不同时间概念的重要性。这种不同的时间概念反复地出现在历史学家的研究活动中。对我们来说，在社会现实中，没有什么比单个的时刻同缓慢延伸的时间之间尖锐、本质和不断重复的对立更为重要和更为主要的了。在社会科学的方法论

中假如存在某种共同之处的话，那么，一个人不论是研究过去抑或是研究现在，清醒地意识到社会时间的多元性是必不可少的。”① 布罗代尔接着颇为自豪地说：

> 在近年来的历史研究实践中，产生了日益明确的关于时间多元性质的概念，特别是日益明确地认识到了长时段观点的价值，虽然人们对此认识的自觉程度各有不同。与其说是历史（因为有各种不同的历史），毋宁说正是这种多元时间概念，将会使我们的社会科学的同事们感到兴趣。②

那么，时间多元性的含义是什么呢？布罗代尔指出有三种不同的历史，即用三种不同的时间来量度的历史。第一种是我们早就熟悉的编史学，即政治史，它有着戏剧性的陆陆续续的节奏，强调的是短时段、个别人物和事件。第二种历史是经济史和社会史，它的研究重心是周期变化，这种研究比传统的史学时间跨度要大，如以十年、二十年、五十年

①② Fernand Brandel: "History and the Social Sciences: the Long Term" in The Varieties of History ed. by F. Stern Vintage Books, New York, 1972, PP403—420。以下凡引用本文仅注明文章不再注明出处——引者。

为研究单位。第三种历史的时间跨度更大，它通常以数个世纪为度量单位，这就是长时段的历史。布罗代尔分别讨论了这三种历史及其所体现的时间。

传统的历史是用事件或短时段来度量的。这种时间大家很熟悉，就是我们日常生活中的时间。在这种日常生活中，充斥着琐细的事件：火灾、交通事故、玉米价格、犯罪、剧院演出、洪水等等。显然，在我们生活的各个方面都有这种短时段的事件，经济的、社会的、文化的、制度的、宗教的、甚至地理的（如风暴），以及政治的。布罗代尔说："乍一看来，过去就是由这大量的细节构成的，有些壮观，其余则毫无意味，不断重复。这些同类的细节为微观社会学和社会计量研究提供了日常的原始材料，但远不能构成可以单独成为科学研究对象的现实的全体，或巨大复杂的历史结构。社会科学避开这种事件不是没有理由的，因为这种短时段的观点在观察现实时是最容易歪曲而最无预见力的。"① 同样地，一些历史学家也极其提防这种传统的历史，即所谓事件的历史，人们常将它同政治史相提并论。布罗代尔指出，事实上，没有这种将历史归结为事件史的人为的概括，人们无法加强

① 参Fernand Brandel: "History and the Social Sciences: the Long Term"一文。

自己的叙述；另一方面，由于缺少长时段的观点，上一世纪的人们也无法避免将眼光集中在那些短时段内发生的、戏剧性的大事件上，将历史写成政治史。上一世纪历史文件的大规模发掘使得历史学家们确信全部历史真相都躺在文件证据里。为了追求这种真实和确切，历史学家不惜任何代价，跟随在历史事件后面亦步亦趋，把眼光盯在外交通信和国会辩论上。

布罗代尔说，经济社会史的研究打破了这种传统史学的时间观，“它无疑引起了一场革命，观念的更新不可避免地伴随着方法的变革和兴趣中心的转移，并引进了数量历史，这是上一世纪所不曾听到的事物。”①

> 然而，除此之外，它还引起了传统的历史时间概念的变化。一天或一年对于昨天关心政治史的史学家们来说是最合适的时间度量单位。②

于是出现了一种新的历史叙述方式，它是对周期、或正确地说对跨周期现象进行描述，这就要求我们重新选择时间尺度。如十年、四分之一世纪，或者

①② 参Fernand Brandel: "History and the Social Sciences: the Long Term" 一文。

如康德拉耶夫周期所指的半个世纪。这样历史学家显然有了一个新的时间视野，获得了一个新的解释框架，来把握受周期波动制约的那种样式的历史。这种历史布罗代尔称之为“中时段”的历史，它构成了历史事件由以发生的社会背景，所以布罗代尔又称这种历史为“局势”，以区别前述短时段的、事件的历史。

对周期现象的探索不可避免地要导致对长时段社会因素（甚至社会结构）的注意。这种社会因素不会象经济因素那样自动地显示出来，我们不应让经济局势和社会局势这两种引人注目的现象过分吸引而忽视了其他的因素。由于缺少好的计量方法，这些因素的变动非常困难、或几乎不可能被察觉。这种因素就是长时段历史现象。布罗代尔指出，对于长时段历史来说，结构是一个最为重要的概念。

> 不论怎样，〔结构〕这一概念对于长时段历史所提出的问题来说极为重要。对一个社会观察者来说，结构指的是组织、凝聚、以及社会现实与社会整体之间一组相当稳定的关系。对于象我们这样的历史学家来说，结构意味着一种集合，一种构造，它是一种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变化甚少

而延续力很强的特别的实在。某些结构可以长期存在以致成为数代人生活中的稳定因素，它们阻碍着历史的进程并规定它的发展。另一些结构则瓦解的较为迅速，但所有结构都同时既是历史的基础又是历史的障碍。作为障碍，它们常常规定了一个人们无法超越的边界（如数学中的包络线）。正象要求改变地理的或生物的现实，打破生产率的限制，甚至摆脱精神上的强制（因为思维习惯也受着长时段的禁锢）一样，试想一下这将是多么困难。①

长时段现象构成了历史的深层结构，或者说，结构本身就是一种长时段的历史现象，它们规定和制约着历史，这就是布罗代尔对长时段历史的基本认识。在长时段历史现象中，最明显、最易于理解的是地理环境的决定性影响。布罗代尔说，人类可以在数个世纪中受制于气候、植被、动物的数量、农作物的类型、以及经长期积累才达到的生态平衡，扰乱这种平衡不可能不危及全部的生存结构。比如，畜群的季节性迁徙对于山地居民的重要性，长期形成的海洋文明对地理位置优越的海岸的重要

① 参Fernand Braudel: "History and the Social Sciences: the Long Term" 一文。

性，以及城市的分布、长期固定的交通路线等都反映了文明的地理结构的惊人的持久性。强调地理环境的决定性影响并不就是主张地理环境决定论。作为一种长时段的历史现象，所谓地理环境的影响指的是人与自然交往，对话的历史，相互作用的历史，动态平衡的历史。这种历史对人类文明的制约作用是不容置疑的，而以往又是最缺少深入、精细和全面研究的。正因为这样，布罗代尔把长时段现象的时间量度称之为地理时间。当然，地理环境的影响并不是唯一的长时段现象，布罗代尔指出，除了地理环境的影响外，可以在文化史中发现具有同样持久性的例子，其中特别突出的大概就是人们的思维习惯、社会的普遍心态。

布罗代尔强调长时段观点在历史研究中的极端重要性，他说：

> 对于历史时间中所有可能的方面来说，长时段观点是颇为复杂、颇难处理，又常常是很新奇的。要使它成为我们学科的中心并不是一桩轻而易举之事，并不是简单地扩大我们的研究范围。采纳这一观点也并不要求我们排斥其他的观点。一个历史学家若要接受这一观点，就必须改变他

的态度和风格，对他的思想重新定向，并更新关于社会现实的概念。这对他来说意味着去熟悉一种时间，这种时间变化得如此之慢以致几乎毫无变化。唯有这样他才能摆脱历史时间稍纵即逝的那种观点，然后再回过头来，以新的眼光、新的概念来看待它，向它提出新的问题。只有基于这种缓慢变动的历史背景，全部历史才能从它的基础上得到重新思考。只有面对这几乎静止的地心深处，历史时间的所有地层，成千上万的层次，成千上万的片断才构成可以理解的形式；它是所有一切的引力中心。①

长时段现象构成了历史的基础，它是其它一切历史现象的引力中心，这就是布罗代尔赋予长时段观点在历史研究中的地位。布罗代尔是比较谨慎的，他坚持自己的原则，却并不专断，他说："我并没有宣称上述看法就是对历史学家任务的一个规定，这仅仅是关于这种任务的一种可能的看法罢了。……对于我来说，历史是所有可能之历史的总和，是各种特殊的任务，和从过去、现在、未来来看历史的

① 参Fernand Braudel: "History and the Social Sciences: the Long Term" 一文。

各种观点的集合。在我看来，最大的错误莫过于只接受一种历史而排斥其它所有的历史，这将是在重复决定论的错误。”① 话虽如此，每个人还是应有自己的立脚点。布罗代尔认为长时段观点不仅对历史研究极端重要，对所有其它社会科学也同样非常重要。他说、社会科学常有一种根深蒂固的本能倾向，或也有可能是专业训练的结果，总是拒绝对社会现象做历史的解释。社会科学家们大都把目光盯在眼前的事件上而无视过去，将现在与过去截然对立起来，在他们看来，同丰富生动的现实相比，过去是一片贫瘠不毛的荒原，对于遥远的过去我们无法直接观察，只能加以重建。布罗代尔反对这种似是而非的看法，他承认历史学家必须从过去的历史中抽取他认为重要的事实来重建历史，但这并不只是历史研究的特征。他反问到：为了揭开现实的面纱，弄清那些混乱而不可理解的现象。一个现实的观察者常常需要后退一步或者借助于未来的眼光前进一步来观察现实，这又意味着什么呢？

> 一个现实的研究者，只有通过所谓重建的途径，通过提出假设和解释，通过拒绝接受现实的表面现象，通过简化或增

① 参Fernand Braudel: "History and the Social Sciences: the Long Term" 一文。

> 加，才能看透现存结构的精细构造，而所有这些都是摆脱材料的限制以便更好地去理解材料的方法，这些方法的共同之处就在于它们都是一种重建。我怀疑关于现实的社会学的照片就一定比关于过去的历史学的绘画更真实，这种照片越是试图避免重建，就越缺少真实性。①

布罗代尔强调过去和现在总是相互观照的，太局限于眼前，往往会被一连串眼花瞭乱的短暂变化所吸引、所迷惑，而无法真正理解和把握社会现实。有一种看法认为，惊奇、陌生这种感觉在历史研究中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因为历史学家研究的是过去，是他所不熟悉的环境，而现实研究中就不存在这种情况。布罗代尔简捷明了地回答："我要争论说，惊奇、陌生、疏远的感觉对于理解我们身居其中、如此熟悉而已不再感到惊奇的环境来说，同样是必不可少的，所有这些感觉都是求知的途径。"②布罗代尔举例说，假如一个法国人在英国住上一年，他对英国不会了解得很多，但作为比较，当他

---

①② 参 Fernand Braudel: "History and the Social Sciences: the Long Term" 一文。

对在英国所发现的一切感到惊奇时，他会突然明白某些法国人个性中最根本的东西，这是他以前因为始终生活于其中而永远不会注意的。在社会科学研究中还有一种倾向，就是完全不顾时间这一维度，仅把社会看做是一种静态的结构，并建立一些模式来研究和解释这些结构。布罗代尔认为在历史学中这种模式研究法也是有用的。模式实际上就是一组系统的解释。但这种研究不能无视时间的存在，不能无视历史。布罗代尔说："在我看来，摆在我们面前和摆在社会科学面前的一个共同的主要任务是明确模式的功能和局限，它的重要性在某些方而被夸大了，因此有必要把模式研究同历史观察相对照。我认为，一个模式的意义和解释价值严格地取决于它所采取的时间观。"① 总之，在布罗代尔看来，过分强调社会科学与历史学之间的差别，并试图在社会科学研究中摆脱历史思维、历史解释的做法是不可取的，从原则上讲，历史学与社会科学并无根本区别，而是共通的，正因为如此，历史研究中长时段或多元时间观点对社会科学研究同样是很重要的。布罗代尔反复强调说："事实上，没有任何社会研究能摆脱历史的观点"，"对我来说，长时段

① 参Fernand Brandel: "History and the Social Sciences: the Long Term" 一文。

观点是所有不同观点中最适合于社会科学进行观察和分析的一种观点”，“唯一能够面对不同社会科学的未来论战的就是长时段观点”。① 同年鉴学派创始阶段，费弗尔和布洛赫大声呼吁历史研究要汲取其它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的知识、成果、理论和方法，进行多学科、跨学科综合相比，布罗代尔更多强调的是在历史研究中提炼出来的长时段观点对其它学科的普遍意义和重要性，这里是否反映年鉴学派在理论和实践上的成熟呢？历史不再是其它学科各种理论和方法的“殖民地”、“输入国”，它已开始能提出成熟的理论，并积极地输出去影响和启发其它社会和人文科学的研究了。

对长时段观点的强调和重视可以说是布罗代尔历史理论中最重要的特征。在布罗代尔看来，只有借助长时段观点，研究长时段历史现象，才能从根本上把握历史总体。尽管布罗代尔把历史、把历史时间分为三种，但这并不是十分重要的。无论怎样区分历史和时间的层次，多元历史时间观点的关键在掌握一个基本的原则，即长时段历史现象与其它历史现象的区别和对照。在《地中海》一书第二版的前言中，布罗代尔说：

① 参Fernand Brandel: "History and the Social Sciences: the Long Term" 一文。

> 这是所有的历史研究全都会碰到的问题，就是有无可能以某种方式同时显示引人注目的历史和另一种深藏的、沉默的、并且常常是隐秘的历史？前者以它频繁的、戏剧性的变化抓住我们的注意力，而后者实际上无论是它的观察者还是它的参与者都没有察觉到它的历史，它很少为时间的持久侵蚀所触动。这一基本矛盾应始终成为我们思考的中心，它是求知和研究的最重要的工具。它同人类生活的所有领域相关，根据比较对照的要求它可以表现为各种各样的形式。①

要将长时段历史现象与其它历史现象做区别和对照也就必然要求将这两类历史现象尽可能同时显示出来，尽可能将其还原到它们由以发生的历史时空内以显露它们之间的相关和联系，这样才能将历史上的事件、局势和结构还原为一个整体来加以认识和把握。而一旦我们做到了“区别对照”和“同时显示”这两个方面，我们就对历史做了整体的解释。

质而言之，布罗代尔所认为的长时段历史现象基本上就是布洛赫所关注的经济社会史和费弗尔

① 《地中海》，英译本，第16页。

所倾心的社会心态史，它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地理环境与人类相互交往过程对历史所造成的强烈而持久的影响，以及在这种影响下所形成的人们的日常生活方式；另一方面，是受前者影响又反过来影响前者的人们的精神状态、心理结构、思维习惯等等。布罗代尔本人的兴趣范围和研究主要集中在前者。《地中海》一书就体现了布罗代尔的这种兴趣。布罗代尔在书中写道："如标题所示，本书的第一部分讨论的是地理，特殊的地理，它特别强调其中的人文因素。不仅如此，它也试图展示一种特殊的历史。……在这里，地理不再是它本身的一种目的，而是达到目的的一种手段，它帮助我们重新发现缓慢生成的结构性实在，并从长时段观点来看待事物。地理，和历史一样，是能回答许多问题的。"①布罗代尔对这一方面的重视并不象有人批评的那样是见物不见人，无视历史过程中的社会和人的因素。恰恰相反，他这样做是力图从历史的这一最基本现实出发来理解和把握历史上的其它现象。在他的笔下，自然地理现象与社会生活密切相关。有的评论家说，在《地中海》一书中，山脉和山谷与人一样是活生生的，所有的村庄和城市都复活了。当然也有人因此批评说布罗代尔将海洋、世

① 《地中海》，英译本，第23页。

纪和城镇拟人化。不管怎样，这说明布罗代尔并没有将长时段的历史写成无生命的过程，而是力图揭示在长时段历史中人是怎样活动并影响历史的。如果说《地中海》一书在这方面的努力还不足以说明问题的话，那么，布罗代尔的另一部著作可以做有力的补充。

一九六七年，布罗代尔的另一部经典性著作《十五至十八世纪的物质文明与资本主义》（第一卷）出版，该书在一个更为广阔的时空范围内展示了这一时期欧洲的历史，特别是中世纪向近代也即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的历史。该书是根据费弗尔的提议而写的，费弗尔提议布罗代尔写一部这一时期欧洲的物质文明史，而他自己来写一部相应的精神文明史。所以布罗代尔这部著作主要是一部经济史著作，但它与传统的经济史不同，作者坚持自己的历史观，从三个层次来划分这一段历史，来展开讨论。《物质文明与资本主义》共分三卷。分别讨论三个层次的历史。第一卷讨论物质文明或曰日常生活；第二卷讨论市场经济，即生产与交换的机制；第三卷讨论资本主义，所谓资本主义，按布罗代尔的意见主要是指建立在市场经济之上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一九七九年第一卷的修订版和第二、三卷同时出版。在修订版的导言中，布罗代尔说：

“传统的经济史只注意社会经济活动中比较明显的表面，在这类教科书中，前工业时期欧洲的发展被视为是向合理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进步的一个过程，这一过程发展到工业革命明显地将人类历史一分为二。”① 这种人们最经常撰写的经济史实际上注意的只是市场经济，是关于乡村活动、小作坊和工场的生产和关于银行、交易所、集市和市场交换的机制。但是，“在市场经济底下还有另一个晦暗的区域，由于缺乏适当的史料，它常常难以观察，这是到处在进行着的最基本的活动，其数量大得惊人。这一丰富的区域，很象覆盖地球的岩层，由于缺少更好的表述，我只得将其称之为物质生活或物质文明。”② 第一卷的卷名“日常生活的结构”很清楚地说明了物质文明的内容，而它的副标题则点出了这种物质文明在历史中的地位——“可能的限度”。所谓物质文明就是人们在最平凡最普通的日常生活（Everyday Life）。它包括一个时代人们衣食住行的各个方面和细节。这种日常生活的结构

① Fernand Braudel: Civilization & Capitalism 15th-18th Century, Volume I The Stucture of Everyday Life, Trawslted by Siân Reynolds Harper & Row, Publislrers, New York, 1981, P23.

② 参《十五至十八世纪的物质文明与资本主义》（第一卷），英译本 第23—24页。

限定了社会表层各种经济活动的可能范围，它是一种长时段的历史现象。布罗代尔说：

> 为了确定前工业时期经济运行的范围，把握它的全部含义，能够不提到它所受到的限制，不提到限定了人类全部生活、并将其规定在各种范围之内，使人们无法达到和无法超越的界限吗？任何时代，包括我们自己所处的时代都会有这样的边界条件，它规定了什么是可能的，什么是不可能的，什么是通过些许努力就能做到的，什么是无论如何都做不到的。在过去，这种边界条件是由不充足的食物供给，相对资源来说过大或过小的人口，低下的劳动生产率，以及控制自然能力的缓慢进步所构成的。在十五至十八世纪，这些限制几乎没有任何改变。①

布罗代尔在第一卷里讨论的主要就是这些方面的问题，它涉及十五至十八世纪欧洲人口构成的变动及影响人口变动的各种因素，如疾病、饥荒、气候等等；涉及当时的农作物类型、耕作技术、及谷物价

① 见《十五至十八世纪的物质文明与资本主义》（第一卷），英译本，第27页。

格；涉及饮食习惯、住房条件、服装式样及风气时尚；涉及能源状况、冶金技术、武器发明、交通条件等；还涉及纸币和信用制度，乡镇和城市生活等等。布罗代尔说，他的目的是要将日常生活引进历史领域。他说，各种“日常生活是由那些人们在历史时空中几乎不加注意的小事构成的。……这些每日发生的事情是不断重复的，它们越是不断重复就越成为一种普遍规则，或者毋宁说是结构。它渗透了社会的各个层次，并规定了社会存在和社会行为的各种方式。”① 作为一种长时段现象，日常生活是其它一切历史活动的基础，它是由人们最普通、最经常、最平凡的活动构成的。如果说忽视历史中人的活动的话，那么，恰恰是传统的历史学忽视了日常生活这一最基本的人类活动，把它长期排斥在历史之外，既然它排斥了这种日常生活，普通人当然就进不了历史的视野，历史当然就成了英雄和英雄崇拜的历史，成了帝王将相的谱牒，成了一部相斫书，一部政治和外交阴谋的汇编。这样的历史固然全部都是人的活动，但它代表了历史上的多少人，又代表了历史活动的多少内容呢？年鉴学派历史学的出发点正是要纠正传统历史的这种偏见，要把更

① 见《十五至十八世纪的物质文明与资本主义》（第一卷），英译本，第29页。

多的人，更多的人的活动纳入到当代人的历史视野中，更全面更完整地把握历史总体和人的总体。在这一方面，布罗代尔继承年鉴学派创始人所树立的历史的人文传统，并将其推进到更具体、更深入的历史研究层次中去，在这个层次中，无论是地理环境与人的交往对话，还是人的最基本的日常生活，历史学家所感兴趣的都不是单纯的物，而是体现在物背后的人。布罗代尔坚持从这里出发来说明和解释十五至十八世纪的历史、特别是它的经济史。这不仅比那种仅仅从经济活动的表面来观察的历史要可信得多，而且比它要更重视、更强调人的因素。

对布罗代尔历史理论还有一个重要批评是指责他的长时段历史事实上把传统的关于事件的历史降到了无足轻重的地位，严重忽视了某些重大事件对历史的影响和作用。作为一个回答，一九六六年，布罗代尔在《地中海》一书的第二版中为该书第三部分增写了一段引言，他说：

> 既然把总体历史仅仅归结为对稳定的结构和缓慢的变化的研究是不够的，事件就应包括在这历史之中。虽然一些经久不变的现实，如稳定的社会，受到种种限制的经济系统，持久的文明，都是发掘深层

历史，把握人类历史本质的正确途径，但本质不等于全体。

……

事件是历史上昙花一现的现象，它们象萤火虫一样逝去，几乎没有闪光就回到了黑暗之中，常常进不了人们的视野。然而，每一事件，无论多么简单，都确有其意义，它照亮了某些黑暗的角落，甚至某些历史的背景。不仅仅是政治史，历史的所有方面：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甚至地理的都被这种间歇爆发的事件的光焰所照亮。①

按照布罗代尔的看法，总体历史并不忽视和排斥事件，一些重要的事件往往是历史的象征符号。怎样运用或选择重要的事件取决于这样一些条件：（1）看一事件是否具有解释的功能；（2）是否产生了某些长远的后果和影响；（3）它对同时代来说是不是重要的事件；（4）是否构成历史锁链中有意义的一环。由于总体历史大大地扩大了史学的研究范围，事件不再占据历史的中心，它包括在总体历史之中，但占据着不太重要的位置，这是自然而然的

① 《地中海》，英译本，第901页。

事情。另一方面，把事件看做是某种象征符号，这也不是什么新的发明，传统史学不也是这样做的吗？任何历史都是选择、重建的结果，其目的不是让事实本身来说话，而是代表史学家来说话。不同的历史可以有不同的史观，不同的选择重大事件的标准，但这并不能改变历史是选择的结果这一事实本身。这一点，布罗代尔说得很明确："历史叙述不是一种方法，特别不是一种客观的方法。而纯粹是一种历史哲学。"①

布罗代尔的历史理论和研究实践大大丰富和发展了年鉴学派总体历史的理论，不管人们怎样批评他，他对年鉴学派的贡献和他对当代西方史学的影响是无法抹煞的。同年鉴学派创始人费弗尔、布洛赫相比，他更重视历史时间的多元性，历史整体的层次性，希望通过长时段历史同其它历史的对照比较向人们展示更丰富更立体的历史画面。他的历史著作力图在非常广阔的时空背景下，将自然、社会和人熔于一炉，其间既有自然与人的不断重复的对话，也有人类集体的命运和个别人物的奋斗，既有普通人琐细平淡的日常生活，亦有惊心动魄的历史事变。他的努力成功与否，人们可以提出质疑和批评，事实上对他的很多批评都来自于这方面，但这

① 《地中海》，英译本，第21页。

种努力本身是无可指摘的，人研究历史不正是为了更好地理解自然、社会和人生，更深深地体察天人之际、古今之变吗？

4-5 当代史学的规范

年鉴学派之所以成为当代西方最有影响的史学流派，不仅是因为它提出了一套历史理论，而且是因为在这种理论指导下产生了一批世界第一流的历史学家，他们撰写了许多优秀的历史著作，这些著作不仅大大改变了当代历史学的面貌，而且也大大改变了当代人对历史的许多基本看法。年鉴学派历史学家的研究基本遵循着费弗尔、布洛赫和布罗代尔的目标，他们力图描绘历史发展的总体，从长时段观点出发揭示其深层结构，因此他们的研究也基本集中在自然生态史、物质文化史、经济社会史和社会心态史等方面。除了总体的研究外，他们也写了许多重要的专史，这些专史不仅填补了历史研究中的许多空白，更为重要的是，这些研究用许多具体的成果支持了年鉴学派的历史理论。当今年鉴学派历史学家研究的课题可以说五花八门、丰富多彩，人类生活、人类历史的每一方面、每一领域几

乎都留下了他们探讨的足迹。他们的研究涉及生态、地理、气候、物产、人口、饮食、服饰、交通、劳动、技术、市场、商业、恋爱、婚姻、性、妇女、儿童、乡村生活、市民、商人、教士、知识分子、疾病、医药、死亡、精神病、神话、巫术、宗教信仰、文化生活、风习时尚等等，小到一个几百人的山村在中世纪几十年中的历史，大到一个民族在几世纪中的心态，可以说应有尽有，无所不包。

当然，上述研究课题并非年鉴学派的专利，正象本世纪初各国历史学家们都在努力探索史学创新的途径一样，今天西方各国的历史学家也都在致力于上述与传统史学不同的新历史课题的研究，不过这种学术兴趣和研究趋向在年鉴学派历史学家那里表现得更为突出和强烈罢了。英国历史学家T·斯托瓦诺维奇在《法国的史学方法：年鉴学派的规范》一书中说，自从一九二九年以来，特别是在一九四六年至一九七二年期间，年鉴学派所作的全部努力已为当代史学创造了一个史学规范。斯托瓦诺维奇反对历史学不可能有共同规范的观点，认为在西方史学史上，有过三个规范。第一个规范从修昔底德开始到圭昔亚狄尼时代达到顶峰，这一规范的中心概念是范例，根据这一规范，历史是当代政治

的工具，其目的是为现实政治提供范例。第二个规范以十九世纪德国史学为代表，它的中心概念是发展，这一规范认为历史是按着严格的线性模式发展进步的。第三个规范则是由法国的年鉴学派建立的，其中心概念是结构——功能，这一规范探讨社会系统的功能和结构，它用多元的时间、空间、人类、社会、经济、文化及事件诸领域的事实来说明社会历史的结构——功能整体，同前后因果相比，它更关心的是部分与整体的关系。

规范是当代美国哲学家托马斯·库恩提出的一个概念，它指的是一个科学共同体或科学家集团所共同拥有的纲领、信念、价值标准及研究方式等等。库恩是在讨论科学史和科学哲学时提出这个概念的，至于历史学中能否有自然科学中那种严格的规范，是值得商讨的。但是，如果我们不是那么严格计较的话，那么我们应该承认，年鉴学派在他们的理论和实践中确实提出了类似规范的东西，它不仅吸引了一大批坚定的拥护者来从事共同研究，而且提出了许多新问题，开拓了许多新领域，这两者恰恰符合库恩所说的规范的两个基本特征。在当代西方史学界，年鉴学派的影响之大，是世所公认的，也是没有能与之匹敌的对手的。即使我们不能说年鉴学派就完全代表了当代西方史学，至少可

以说它是其典型代表。从年鉴学派那里我们可以相当集中地看到当代西方史学不同于二十世纪以前的传统史学的新特征。

当代历史学家没有辜负时代的期望，二十世纪有了自己的新史学。当代美国历史学家奥斯卡·汉德林说：

> 二十世纪历史学家的主要研究方向是认识历史的来龙去脉。他们以各种不同的形式来寻求一种总体，即所谓一个时代的文明、文化或精神，他们希望这种文明、文化或精神在启发性和联系性这两个方面将经得起检验。①

另一位美国历史学家劳伦斯·斯通在“二十世纪的历史学和社会科学”一文中描述了新史学的特征。他说，在过去四十年的大变动中崛起的“新史学”具有四个特征。第一，它用新的分析法而不是旧的叙事法来组织材料，撰写历史。第二，它从新的角度提出问题，它探讨事情为何如此发生，而不是像过去那样问发生了什么事，怎样发生的等。第三，它探讨历史上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三个新领域：（1）人类生存的物质基础，如生态、人口、技术

① 《文摘》，1983年，第7期。

经济等问题；（2）社会史，如各种社会机构及组织的功能、社会的分层和流动，财富、权力、地位的分配模式，政治运动和思想意识的根源等；（3）文化史，它包括信息和思想的传播方式，上层文化的社会政治背景，上层文化与民间文化的相互交流，以及半文盲的大众的文化等等。第四，它研究新的对象。它不再以只占人口总数百分之二的上层人物，而是以广大群众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显然，当代西方史学的特征与年鉴学派的理论主张和研究实践是完全一致的。

年鉴学派不仅为当代西方史学确立了一个规范，而且它的具体研究方法和手段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当代西方史学。很明显，按照年鉴学派历史观的要求，不论是研究自然生态，物质文化、经济社会还是社会心态，都要求占有大量的、各种各样的材料，否则就无从着手进行研究。而过去传统意义上的史料是远远满足不了这种要求的，不仅在数量上，更主要是在质量上不能满足要求，以往的史料主要是档案文件（官方的和私人的），往往记载的是那些所谓重要人物和重大历史事件的，至于千千万万普通人以及他们单调平淡的日常生活和朦胧芜杂的思想观念，传统历史留下的记载少得可怜。正如费弗尔所说："被了解不多的是群众。在全部

时期中没有给我们留下有关群众的任何直接而详尽的证据。就以贵族政治的起因而言，经过好几个世纪之久，历史就没有注意到，历史还是往往只着眼于国王们、王公贵人们、各个民族和军队的领袖们——那些‘创造历史’的人。”① 然而，材料的不足，并不能构成研究的障碍。史料是要靠历史学家去发掘的，或者用费弗尔的话说，是要靠历史学家去“发明”的，重要的是要能提出正确的问题来帮助史学家搜寻史料。布洛赫强调：除非被提问，史料自己是不会说话的。“任何历史学家，除非他是瞎子，都是从问题出发来观察现象的。”② 年鉴学派的理论和规范为历史研究提出了一系列新问题，帮助人们去观察历史，搜寻史料。正因为这样，史料不足并不构成新史学研究的重大障碍。费弗尔说：

> 毫无疑问，有书面史料时，可以根据它们来再现历史。没有书面史料，也可以而且应该通过其他方面来再现历史：语言、符号、风景、瓦片、田野形状和杂草，月食和套牲口的轭，地质学家和化学家对石块和佩剑所做的鉴定，总之，应该

① 《当代西方史学流派文选》，第50页。

② Marc Bloch: "Toward a Comparative History of European Societies"，

> 利用一切来撰写历史。凡是人所有的，依赖于人的，为人服务的、表现人的、标志人的存在、活动和生存方式的东西，都可以利用。①

一旦有了新的眼光、新的观察角度，史料的范围和数量就会突然丰富起来，这时候需要的是付出大量的艰辛的劳动去发掘和整理新的史料。在这方面，年鉴学派历史学家尽了极大的努力，运用和调动了各种各样的专业知识和技术手段，查证了可以说过去留下来的一切。比如说，为了研究中世纪经济社会史，布洛赫不仅应用了各种文字记载、考古材料，而且运用地名学、语言学的知识，从地名和语言中获得史料证据，甚至利用航空摄影所显示的乡村景观来充实自己的证据。同样，费弗尔在研究拉伯雷时代的心态时也运用了多方面的材料，语言的、文学的、哲学的、甚至数学的。布罗代尔通过十五世纪的绘画告诉我们当时的国王也还是用手抓饭吃的，又比如他通过中世纪后期服饰的变化，向我们揭示了中世纪政治力量的消长。拉杜里运用宗教法庭的记录再现了一个三百多人的山村在中世纪几十年中的生活和精神全貌。伏维尔（Michel

① 《国外社会科学》，1982年，第6期，第10页。

Vovelle)根据几万份遗嘱证明了近代宗教观念的衰落。至于用计算机来分析统计商业文件、教区档案、研究人口、物价、收入和经济危机等等更是司空见惯。所有这一切，都大大改变了当代史学的外表形象。然而，必须指出的是，所有这些专业知识和技术手段都是为特定的历史观服务的，离开了这一原则，这些东西就一文不值，充其量也只是炫耀博学。这些东西既不具有方法论意义，更不因为人们运用了它就成了一个独立的史学流派。它们在年鉴学派的研究中（以及在当代西方史学中）始终只是属于从属地位的具体的技术手段，而不是决定一派史学特征的基本原则。记住这一点，对我们观察和理解当代西方史学特别重要。

当然，对年鉴学派不是没有批评的，这些批评既有来自于外部的，也有来自内部的。对年鉴学派历史理论及其实践的最大批评有两条。一是总体历史的虚妄。这一批评包括两个方面：（1）年鉴学派并未实现总体历史的目标；（2）总体历史是虚幻的目标。前一方面的批评特别集中在布罗代尔身上，批评者认为他在总体历史的名义下，割裂了历史，历史被他分裂为互不相干的三块，缺少联系与统一，建立总体历史的目标并未达到。正因为有这样的批评，事实上也存在这种不足，人们对总体

历史目标本身也产生了怀疑，出现或加强了第二方面的批评。特别是从七十年代开始，新一代年鉴派历史学家从内部对总体历史加以批评。但是对总体历史这两方面的批评都只有部分的道理。这是因为：第一，任何理想目标与现实总是会有距离的，或者换句话说，理想目标的实现总是相对的。我们只能批评其间的距离太大，却无法要求两者绝对吻合。第二，一个研究目标的价值不在于它能否绝对实现，而在于它能否提出新的研究课题。这一点，当今年鉴学派的研究可以为总体历史作证。虽然新一代年鉴派史学家不再象布罗代尔的《地中海》那样研究包罗万象的历史（当然并不绝对），却并不能说明他们放弃了总体历史的目标。事实上，他们在各种局部历史的研究中，仍力图体现总体，或者说他们的各自研究合起来正好构成了一个历史总体，展示了历史总体的各个方面。正如当今年鉴学派重要史学家J·勒戈夫（Jacgues Le Goff）所说，种类众多的历史在史学的共同舞台上各有自己的位置，因而这个舞台的范围仍然是总体性的。但是这种总体性现在已经不是靠包罗万象的综合来保证，而是通过寻找总体性的研究对象，也就是说，通过在人口学、生态学、医学、语言学和人种学等的“交接点”上实现真正的跨学科来保证。勒戈

夫列举了一些年鉴派的最新研究著作，认为这些著作是历史总体性和一般所说的新史学的现代类型。这些著作在许多方面有所创新。但同布罗代尔的《地中海》一书中的那种总体历史毕竟有着重大差别。与其说它们是年鉴派前两代历史学家所探讨的那种总体历史，不如说它们是局部的历史，但倾向于全面。当然，要研究总体历史就对历史学家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它要求历史学家不仅是某些细节问题和专业方面的专家，而且是一个具有广博知识和高度综合能力的通才，不仅如此，它还要求一个历史学家具有很强的学术组织能力和开展合作研究的意识，因为总体历史的研究常常需要群体合作，多学科联合。这种高要求也使一些人望而却步，他们反对总体历史的理由很简单：这样搞研究太难了。这自然也是一个理由，但它只会激发有志者去克服困难，而决不会使研究停顿下来。对总体历史理论出现这样或那样的批评是完全正常的，不过，迄今为止的各种批评并不足以批倒总体历史理论，既然这样，它们就成了一种来自反面的促进，推动历史学家们不断去推进总体历史的研究。需要指出的是，年鉴学派所主张的总体历史与当代分析的、批判的历史哲学所批评和反对的“普遍史”或历史“整体主义”是性质不同的两回事。前者是一种实践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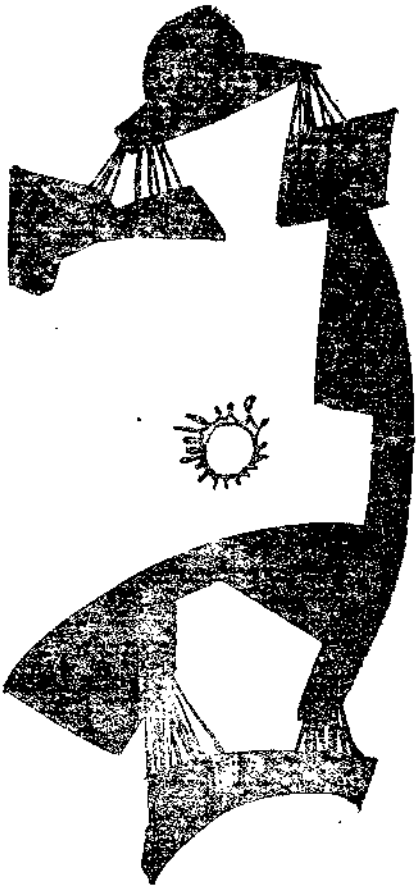
张，而后者是一种学理讨论；前者是对历史学家的工作提出的要求，后者则是对历史认识的可能和限度所做的反省。哲学家自然应该审慎地对人的认识能力本身进行批判，而历史学家则理应全力以赴不断推进和扩大人们对历史的认识。

对年鉴学派的第二条基本批评是它造成了史学的分裂。从年鉴学派的研究实践来看，年鉴学派研究的主要是中世纪和近代早期的历史，当代史他们基本上很少问津。正象一篇动态文章中所说的，当前法国的历史学“在某些总体性的理论上有可观的建树，在一些具体课题领域中却引而不发；近现代史的研究便不如古代史的研究做得多。”① 不仅如此，即使是研究中世纪及近代早期，年鉴派历史学家重视的也基本上是长时段现象，而很少涉足传统史学关心的政治事件领域。出现这种现象自然不足为怪，因为按照年鉴学派的理论，只有在数世纪以上的历史中才能找到长时段现象，才有真正的研究价值，现代史、当代史时间太短，充斥着事件，缺乏做长时段观察的视角。这样实际上是把历史分成了两部分；一部分是长时段历史，一部分是眼前的、短期的事变。有人批评说，年鉴学派造成了两

① Denis Duclos：“法国社会科学及人文科学研究的新方向”，载《国际社会科学》（中文版）1985年第5期。

种历史：当代的短时段的、事件的历史和长时段的、深层的历史。要回答这一批评是颇难的。人们可以争辩说，有什么样的历史观就会有什么样的历史，史学发生分裂不足为怪。据说，由于年鉴学派的影响，在今天的法国，一个中小学生能够说得出公元一〇〇〇年以来法国气候的变迁，告诉你大革命前的面包价格，他们却说不出大革命爆发于哪一年，不知道拿破仑是何许人。对此，人们也啧有讥评。但是，凭什么说学历史就一定应该知道、应该记得一七八九年和拿破仑？然而，这种争辩毕竟不是积极的正面回答。确实，过份地强调长时段现象而贬抑事件在历史中的地位，会碰到两个逻辑矛盾：一、如果没有短暂而激动人心的事件所引起的震荡，深层的历史又怎能浮显出来为人们所注意呢？反过来，研究深层历史，往往不正是为了更好地理解和认识历史表层的喧嚣和骚动吗？既然历史是一个整体，就不应割裂深层和表层，过分厚此薄彼，否则的话，我们的研究到头来又会迷失方向，走进另一个死胡同。举个我们大家都有体会的例子。比如文化大革命，按年鉴学派的历史理论来看，当然是属于短时段的事件，然而，不正是这一事件激发了人们去探讨、认识中国的深层历史，去研究她的文化传统、国民心态、物质文明结构吗？

反过来，研究中国的深层历史，不正是为了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和认识文化大革命这一短时段的历史事件，从而帮助我们更好地从事社会实践吗？把这两者割裂开来，一个历史学家既不可能对深层历史有深入的认识，也不可能对历史表层做出深刻地解释。二、长时段历史现象与短时段事件之间是否存在截然分明的界限？按照布罗代尔的观点，传统的政治史纯属短时段事件，而年鉴学派历史理论所强调的自然生态、物质文明和社会心态则属于长时段历史。但这样简单的区分是颇为表象的。事实上，有许多历史现象，它们既可以看做是单纯的事件，也可以看做是长时段现象，关键在于我们如何选择自己的观察角度，取决于我们本身的眼光是否高瞻远瞩。比如说，在中世纪时代我们经常能看见的国王加冕、贵族册封、王室联姻等现象，孤立地从当时当地的立场来看，这纯粹属于传统历史关心的事件；但如果把这些现象集中起来研究，那我们就能从中看到中世纪的风习、心态，乃至物质文化生活，而一旦这样来看，这些事件不就成了长时段现象了吗？然而，批评终究只是批评，尽管我们还可以列举出年鉴学派“分裂史学”的种种罪状，史学的分裂作为一个事实仍然存在。批评若要深入一步的话，就应对这个事实做出解释。那么，该如何解释这种事实呢？



第五章

历史与人

当代西方历史理论是十分丰富的，以上几章的介绍只是一个非常粗略的概貌，即使如此，我们也能从中看到当代西方历史理论的一些特点。本章拟对当代西方历史理论做一些讨论，希望这能加深我们的理解，并使我们获得一些启示。

5-1 历史与哲学

历史与哲学的关系可以说始终是历史理论中的一个中心问题。这里所说的哲学不是指这一种或那一种哲学学说，而是指一种哲理探讨和哲理追求。历史研究离不开哲学，它不仅需要理论的指导，而且需要追求一种哲理的表达。要认识这一点并不难，但要在具体的研究实践中贯彻这一点却很不容

易。我们知道，历史是具体的，而理论、哲学是抽象的。用抽象的理论来指导具体历史的研究似乎没有什么问题，然而要在具体的历史叙述中体现、表达抽象的哲理就显得很困难了。虽然这两者实际上应该是同一研究过程的两个方面，但似乎很难在研究实践中统一起来，却常常分裂为两种不同的研究方式。前者是一种类似演绎的过程，这一过程的合理性可以用演绎逻辑来证明，而后者却很难找到这种充分合理的逻辑依据。结果在研究中常常出现这样一种情况：当我们从一种理论或哲学出发来解释历史时，往往很容易自圆其说，而当我们试图严格地从具体历史出发来体现和表达某种哲理时，常会感到论据不足或论证无力，如果我们试图超越具体历史的限制去做一般归纳的话，即使我们自己不怀疑归纳结论的正确性，我们也会怀疑这种归纳程序本身的逻辑合理性。结果，历史似乎能为任何一种理论提供证据，却无法证明自己本身是合乎逻辑的。也就是说，我们几乎能从任何理论出发，演绎出头头是道的历史来，却无法从具体的历史出发，合乎逻辑地去体现和表达一种哲理。而历史研究最终所要做的恰恰是后者，即通过具体的历史来表达并帮助人们理解历史中所包含的普遍或一般的哲理。这样，怎样克服上述逻辑困难以实现这一目

标，就成了历史理论和实践中一个最令人困扰的问题。

历史研究中的这一逻辑困难在传统的叙事性历史中并不突出。正如T·斯托瓦诺维奇所指出的，传统历史的目的是为现实提供具体的范例①，只要范例的选择和陈述符合训戒或说教的要求，历史的任务就圆满地完成了，它不再要求具体的范例去表达超出此目的的更一般的哲理。但是也正因为传统史学只是用范例来说话，它遭到了哲学家的轻视。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就曾把历史同诗加以比较。他说，历史与诗的差别在于，前者叙述已发生的事，后者描述可能发生的事；前者的叙述只涉及个别的事件，而后者的描述则带有普遍性。他的结论是写诗这种活动比历史更富于哲学意味，更有价值。亚里士多德的这一看法在很长一段时期里影响着人们对历史的看法，以及对历史学家的看法。哲学轻视史学，直到今天我们还时常能看到这种现象。正象人们说的："也许使人感到惊奇的是，同哲学家和社会学家相比，历史学家通常很少被人视为主宰思想帝国的人物。"②

① 参见本书4—5节。

② 《文摘》，1936年，第2期，R·F·阿特金森："历史学与历史哲学"。

同样，从思辨的历史哲学的角度来解释历史，这个逻辑困难也不严重。启蒙时代以来的哲学家们认为要说明和解释历史的发展，就必须用哲学的眼光来看待历史、用哲学观点来统摄历史和把握历史。黑格尔就声称只有哲学思辨才能透过历史表面的喧嚣去抓住历史的本质。哲学家们从哲学观点出发来解释历史常能轻而易举地避开历史研究中的那个逻辑困难。比如，黑格尔认为世界历史无非是自由意识的发展，东方只知道一个人是自由的，所以东方是世界历史的第一阶段。这是一个完整的三段论，在逻辑上没有任何错误。然而，哲学家尽管能避开逻辑困难，却很容易落到另一个陷阱中去。哲学家们常常忘记了，他们用以解释历史的哲学观点，那个三段论中的大前提本身恰恰是应该首先从历史中抽绎出来的，是应该由历史本身来体现和表达的。也就是说，哲学家若真想避开逻辑困难，首先必须面对这个逻辑难题并解决这个难题。否则的话，他就必然会违背历史意识。所谓历史意识，就是克罗齐所说的历史事件的完整性、叙述与文件的统一性和发展的内在性。① 前面两点是容易理解的，也不是最重要的。历史意识中最重要的是历史发展的内在性，或者说，历史的自律性。历史发展

① 参见本书1—7节。

的内在性或自律性强调历史发展并不服从任何外在的观念和规律、如自由、进步之类，也并不朝向什么确定的外在目标，如天国、乌托邦之类。历史的目的就在历史自身，就在它的每时每刻，正象生活的目的就在于生活本身一样。克罗齐说，把历史看作是朝向某个目标在发展，“就是认定目的是外在于历史的，”“若目的被正确地看成是内在的，即与发展本身同一时，我们就必须得出结论说，目的每时每刻都达到了，同时又没有达到，因为每一达到都是一种新远景的形成，每逢我们获得占有的满足，就会发生不满，驱使我们去寻求新的占有。”① 同样，“把历史看成从恶到善（进步）或从善到恶（衰落、退步）的概念也同样导源于把善、恶、忧、喜实体化和视为外在的那种错误。”“真正的答案不是把进步理解为从恶向善的过渡，好象是从一种状态向另一种状态过渡一样，而是把它理解为从善向更善过渡，从更善看来，恶就是善本身。”② 关于历史发展的内在性、历史的自律性，兰克的观点是最有代表性、也最典型的，兰克强调：

① 克罗齐：《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第63—64页。

② 同上。

每一个时代都是直接面对上帝的。①

既然历史的目的就在历史自身，就在它的每时每刻，既然每一个时代都是直接面对上帝的，那么，历史研究的目的就不应该是去证明各种外在的观念或目的。而应该具体地去说明历史上的每个时代存在的价值和意义，说明它们是怎样直接面对“上帝”的。正是在这一点上的根本分歧，导致了十九世纪历史和哲学的分道扬镳。

在历史学家看来，同逻辑困难相比，违背历史意识是一个更不可原谅的错误。再说，哲学家可以对历史说些外行话，他当然不会太清楚地知道历史学家对他的讥评，但一个历史学家若是也象哲学家那样做，就很难再在同行中立足。正因为这样，历史学家宁肯去面对那个逻辑难题，也不敢违反自己这一行的“游戏规则”。对历史学家来说，历史研究中的最高境界就是克服这种逻辑困难，通过具体和个别的历史来体现和表达一般和普遍，或者用兰克的话来说，从每一具体的历史中看到无所不在的上帝。兰克无疑是十九世纪最优秀的历史学家，他说：“理解人类事务有两条途径，具体知识的途径

① Leopold Von Ranke:The Secret of World History, Selected Writtings on the Art and Science of History, Edited, with translation by Roger Wines New York Fordham Univ.Pr.1981, P20。

和抽象知识的途径，此外别无他途。甚至宗教启示也不外乎这两条途径：抽象的原则和历史。”① 但是这两种途径必须区别开来，历史知识并不是按某种抽象原则来安排史实，使它变得可以理解，相反，历史科学要求在历史本身中找到它的完整的意义和价值，这完全是能做到的。不仅如此，兰克认为历史要比抽象的知识（哲学）优越，因为，“从个别出发，我们确实能够深思熟虑和大胆地去追溯普遍，但从普遍出发，却没有通向个别的道路。”② 历史研究的理想目标就是在每一具体、个别的历史中去体现普遍、一般和永恒，体现无所不在的上帝。兰克为历史研究树立了一个理想，他自己是否达到了这个理想人们可以争论，但这个理想是值得追求的。遗憾的是，兰克的理想并未被他的同时代人理解，十九世纪的历史学家大多只接受了他的从具体历史出发，如实说明历史的主张，却并没有努力去追求他的理想，即在具体的历史中去体现普遍、永恒和上帝。另外，在反对历史哲学的玄想思辨和主观武断的时候，他们还真诚地相信他们是不带任何主观色彩，完全客观地从历史事实出发来

①② 参前引书 Ranke: The Secret of World History, Selected Writtings on the Art and Science of History. P102、P101。

研究历史的，他们竭力要划清历史同哲学的界限，真诚地相信他们能做到客观主义和如实直书。这样，他们放弃了理论的自觉指导，成了科学主义潮流的盲目追随者。

二十世纪历史理论正是从十九世纪所达到的认识出发来重新思考历史和哲学的关系的，当然，激发起这种重新思考的首先是二十世纪的现实。二十世纪的现实在一个更大的范围内提出了重新认识历史的问题，它所要求于历史的不是提供个别道德或政治范例，也不是说明和论证进步与发展，而是解释现实整体的深刻变动。这就要求历史学家拓宽视野，深化认识，从更为宏观的、整体的角度来回答时代提出的问题。它使历史和哲学的关系问题变得更为重要和突出起来。很显然，离开了某种哲理的指导，哲学的眼光，历史学家又怎能从宏观上把握历史呢？斯宾格勒和汤因比的历史哲学著作正是听从了时代的这种召唤的产物。在他们那里，历史就是哲学。斯宾格勒宣称，一切真正的历史著作都是哲学，否则就纯粹是蚂蚁的工作。① 汤因比则说，“当我研究历史的时候，我总是企图渗入人类现象的背后，去研究隐藏在它们背后的东西，我用上帝这个字眼试着称呼自己怀疑隐藏在现象背后的

① 参见本书第3—4节。

东西，因为我找不到别的表达方式。……对我来说，历史是进入宇宙和试着理解宇宙的途径。”① 他们或者把历史看做是人类无可逃避的命运（斯宾格勒），或者把历史看做是人类生存斗争的记录（汤因比），坚持从历史本身来说明历史，而不再为历史寻找外在的原因和目的。汤因比强调研究历史应从“能够自行说明问题的范围”出发，他和斯宾格勒不约而同地把历史研究的范围扩大到了文明、文化或人类社会的整体，并认为一旦把注意力转向这一总体，历史的内在意义就会自动显示出来。他们的研究最为重要的意义是扩大了当代人的历史视野，并从新的角度提出了一些重大问题，虽然他们的著作也被称为思辨的历史哲学，但同传统的历史哲学不同，他们不再从单线的目的论出发来图解历史。

当代分析的、批判的历史哲学是从另一个角度，即从认识论的角度来考虑历史与哲学的关系的，他们更多的是讨论历史研究、历史认识同理论指导的关系。他们反对十九世纪客观主义和如实直书的信条，认为这纯粹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任何历史学家都是从某种观点或理论出发去观察历史的，没有纯客观的史实，史实既然被挑选出来，就必定受到理

① 《当代西方史学流派文选》，第141页。

论的“污染”，因此，历史和哲学的关系在这方面是不可分的。克罗齐甚至认为作为一种精神活动，历史就是哲学，历史研究同哲学根本就没有区别。既然历史学家事实上避不开理论，那么，与其相信自己的客观清白，还不如自觉地去提高自己的理论素养，更好地运用理论来指导自己的研究。这可以说是分析的历史哲学的一个最基本的主张。这一主张就是要求恢复哲理探讨和哲理思辨在历史研究中的地位和作用。正因为历史认识离不开哲学，历史陈述也必然要表达某种哲理，所以分析的历史哲学并不象人们想象的那样会竭力反对思辨的历史哲学，恰恰相反，分析的历史哲学从自己的理论出发必然会在一定程度上承认思辨的历史哲学，肯定它在一定程度上的合理性，晚近的讨论就表现出了这种倾向。分析的历史哲学强调历史与哲学的密切联系除了它的理论意义外，当然还有很重要的实际意义，那就是要求历史积极地去思考和回答现实提出的问题。克罗齐和科林伍德在他们的讨论中都表达了这种意见。

认识澄清以后，最重要的还是实践，既然无论从哪一方面看，历史都离不开哲学，那么在历史研究中处理好历史同哲学的关系，就是要求历史学家既不违背历史意识，又不回避逻辑困难，写出兰克

所倡导的那种理想的历史来。这是摆在当代历史学家面前的一个重大课题。十九世纪的历史学在这方面并不成功，除了前面提到认识上的原因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十九世纪史学本身的局限。十九世纪的历史是事件的历史，它的规范如T·斯托瓦诺维奇所说是发展。要在个别事件的历史中体现普遍，要让这种历史本身来说明历史，事实上是不可能的。因为当时所谓的事件史主要是政治史，它只是历史总体中的一个方面，一旦脱离了历史总体，这种事件史不仅说明不了历史总体，而且也无法说明自身。十九世纪历史学家的口号是“如实说明历史”，或者是“让事实本身来说话”，这口号所标示的理想并不错，但如果找不到历史中能“自行说明问题的范围”，事实自己是不会说话的，单靠这个别的事实，也是无法如实说明历史的。十九世纪史学规范中缺少的正是这样一个范围。这样，历史学家只有两种选择：要么冒违背历史意识的风险去援引外在的线性发展观念，来说明个别事件的意义；要么受制于个别史实的局限，干脆停留在个别事件的考证和描述上。要摆脱十九世纪史学的这种困境，就必须跳出事件史的狭隘框架，冲破历史线性发展的模式，在历史的深度和广度两个方面拓展历史研究的范围。而这正是当代史

学所做的工作。我们从年鉴学派的历史理论和实践中看到的正是这种努力。年鉴学派历史学家坚持从历史本身来说明历史，另一方面，他们又强调从整体出发历史才能说明自身。可以说，他们的理论和实践在处理历史和哲学的关系方面，或者说，在追求兰克的理想方面，为人们提供了更为成功的范例。

年鉴学派历史学家主张研究大时空尺度的历史现象，研究历史的深层结构，研究构成历史最一般基础的普通人的生活和心态，认为从这里才能把握到历史的总体和本质，才能对历史做出合理可信的解释。他们不是从个别事件的前因后果来考察历史，而是从历史的局部和总体、表层和深层的关系出发来说明历史。在这一点上他们和斯宾格勒、汤因比有不谋而合之处。布罗代尔继承和发展了年鉴学派创始人费弗尔和布洛赫的理论，明确提出了长时段和结构的观点。他认为，只有同长时段或结构性的历史相对照，其余历史现象才是可以说明和理解的。将历史分为不同的层次，用深层的结构来说明表层的现象，这样，就能通过具体的历史本身来说明历史，而不再需要借助什么外在的理论。也就是说，这样就能克服历史研究中的逻辑困难，同时又坚持了历史意识，从具体、个别的历

史中体现一般和普遍，揭示历史发展的自律性。现在，以前被当做历史主体的表层历史成了深层历史所说明的对象，而深层历史则类似于一种不证自明的、不假外求的本体存在。因为按照年鉴学派的观点，深层历史或者说历史的深层结构就是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和心态。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并不服从任何外在的目的，他们只是为生活本身而忙碌奔波。也就是说，人类生活或人类历史只是在这个层次上是自在自为的，因而是最具有决定意义的。只是在这个层次上，我们才可以说，历史的目的就在历史自身，在它的每时每刻。千千万万普通人时时刻刻在为生活本身而忙碌奔波，他们并未意识到他们的最琐细平淡的生活在决定着历史、在创造着历史。千差万别的各时代各民族历史中最普遍、一般和永恒的东西正是这种生活中表现出来的基本人性，丰富多彩、纷纭复杂的人类历史正是建筑在这样一个无意识的基础上的。揭示出历史的深层结构，写出历史的无意识基础，极而言之，就是一种哲学，或者至少可以说，在这里历史和哲学是水乳交融的。研究人类事务，归根到底不就是要不断去揭示那些盲目地支配和制约着人类的思想、行为、乃至历史的深层的无意识的力量和因素吗？

5-2 相对主义和进步

历史分为认识和本体，但是，对于人类来说，我们每时每刻所知道的历史，只是我们所达到的历史认识，而不是历史本体。明确地认识到这一点，是当代西方历史理论，特别是分析的历史哲学的一个基本前提。而一旦有了这种明确的认识，就会唤起一种自觉的批判精神，认识历史的努力在这里合乎逻辑地变成了怎样认识历史这样一个问题。一般说来，认识外部世界的任何一种努力，一旦持续下去，都会在某一时刻不多不少地变成对这种认识活动本身的一种反思和批判，认识世界归根到底都可以归结为是认识自我。当代美国哲学家鲁一士在论及康德时说过这样一段话：

> 康德曾经说过，我们日常生活的世界之所以有秩序有联系，并不是因为外物自身的绝对秩序为我们认识而是因为我们是理智的，因为我们的理智有他自己的条理，并且根据这种条理来观察它的经验。……如果真是这样，如果真是我们的理智

> 为我们创造出自然界的秩序，那么“我将如何理解世界”的问题，就恰好不多不少地变成了“我将如何了解我自己”的问题。①

从上述角度来看待当代西方历史理论，我们可以说，它是近代“历史学”独立以来，发展到自我反思阶段的产物。

讨论人怎样认识历史或者说人怎样写历史，是当代西方历史理论的一个重要课题。在这场讨论中，当代西方历史理论，特别是分析的历史哲学，否认存在或者否认人能够认识绝对、永恒的历史本体，强调人对历史的认识永远是主观的，而不可能是纯客观的，认为人研究历史不可能是从客观的史料、史实出发，而总是受某种问题引导，按照某种观点去选择史料、解释史实的。所有这些结论都和长期以来人们对历史的常识看法相左。既然不存在或人无法认识绝对、永恒的历史本体，人不断努力去认识历史又有何意义呢？既然历史永远是主观的，我们又何以区别各种历史的是非优劣呢？从上述结论中必然会引出这样的问题。不仅如此，当代西方历史理论在这方面的结论还招致了严厉地批

① 《西方现代资产阶级哲学论著选辑》，商务印书馆，1964年，第110页。

评，这种批评归结到一点，就是指责当代西方历史理论是宣扬相对主义和不可知论。我们先来讨论批评，再来回答问题。

乍一看来，当代西方历史理论确实难逃相对主义的罪责。然而我们马上可以反驳说，这种相对主义中包含着绝对的东西，因为它指出了人的认识的可能和限度，而这无疑是认识上的一种进步。我们知道，相对主义是从两个方面来否认绝对的，它或者否认存在绝对的东西，或者在观念上承认这一点，然后在实际上否认人能够认识这绝对。这两种形式的相对主义，事实上是一样做法，就是否认人的认识能与外部世界达到绝对同一。姑且不论这种看法的是非对错，它对各种形式的独断论来说，无疑是一种当头棒喝。历史认识的这种所谓相对主义观点对十九世纪历史学中的那种独断主义正是这样一种清醒剂，它把人们从历史学的独断论中唤醒，其功绩是不可抹煞的。还应该看到，对十九世纪实证主义史学中的独断论的这种理论上的批判是二十世纪现实对其批判的一个方面。二十世纪被人们称为是“相对主义时代”，历史认识中的这种相对主义看法是构成整个时代思潮的一个很重要方面。

假如相对主义仅仅是指上述的那种认识，那应该说这是一种进步，而非倒退。但是仅在认识层次

上来讨论相对主义是不够的。从相对主义这一认识出发，可以有两种不同的态度，一种认为既然人的认识是相对的，有局限的，那么人认识世界的一切努力归根到底说来都是毫无意义的，外部世界是不可知的；另一种态度则恰好相反，它自觉地意识到人的认识能力上的局限，并在这种自我批判的基础上更审慎更清醒地去努力认识外部世界。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是我们在讨论中应该注意分清的。前一种态度是应该反对的，因为它宣扬不可知论，认为人在认识世界方面不可能有什么作为，这种悲观消极的态度必然导致行动的瘫痪；后一种态度则是可取的，它并不因为人认识上的局限而放弃认识世界的努力。如果我们对当代西方历史学整体做一观察，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二律背反”的现象：一方面它在理论上否认了人能够认识绝对、永恒的历史本体，另一方面，它又在实践上不断努力去扩展和深化对历史的认识，并深信这种努力的价值和意义。从分析的历史哲学和年鉴学派的工作中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两个方面的探讨和努力。这就说明，当代西方历史学在总体上（除去某些个别）是积极进取的，而不是消极无为的。相对主义特别是不可知论的批评对它来说并不恰当。固然，当代西方历史学已丧失了十九世纪的那付天真和自信，但这只能

说明它的成熟，而决不意味着它的没落。有这样一段话："测验一个人的智力是否属于上乘，只要看他脑子里能否同时容纳两种相反的思想，而无碍于其处世行事。"* 同样，对于一门学科来说也可作如是观。当代西方历史学中表现出来的"二律背反"说明，同十九世纪的史学相比，它已有了自我意识和自我批判的能力，它成长了、进步了。

但问题马上就来了，一般来说，所谓进步是相对一个确定的目标而言的。既然我们承认不存在或人的认识永远不可能达到绝对永恒的历史本体，我们又有什么理由判定一种历史认识比另一种历史认识"进步"呢？假如无法判定进步与否，或根本就不存在进步，人不断努力去认识历史又有什么意义呢？刚才说到，同十九世纪相比，当代西方史学进步了，实际上这里所说的进步仅仅指的是其中的一个方面，即历史学在自我认识方面有了进步，仅仅根据这一点，事实上我们是不能下结论说当代西方史学在整体上一定比十九世纪史学进步。这正象在某种极端的情况下，一个傻瓜也可以有一种自我意识，但我们决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这傻瓜就一定比一个缺乏自我意识的聪明人在认识世界方面也来得高明。要判别历史认识进步与否，我们首先要找

* F·Scott Fitzgerald语。

到一个确切的判别依据，这个依据必须是客观的。可是既然我们已经否认了绝对、永恒的历史本体，我们到哪里去为历史学找一个绝对的、客观的判断标准呢？马克思说得好：

> 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并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亦即自己思维的此岸性。关于离开实践的思维是否具有现实性的争论，是一个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①

事实上，如果我们深究一下的话，就会发现，历史认识的进步，并不表现在历史认识是否接近所谓历史本体，而主要表现在历史认识不断符合社会现实，符合时代的要求和认识水平。也就是说，判断历史认识进步与否的标准存在于时代和社会现实之中。站在二十世纪的立场上，将二十世纪的历史认识同十九世纪的历史认识相比，二十世纪的历史认识无疑要进步得多，没有人能否认这一点，这并不是因为它更接近历史本体，而是因为它更接近二十世纪的现实。是现实为我们判定各种历史认识的是非优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16页。

劣提供了一个标准，一个参照系。无论人们是否意识到这一点，他们在评判各种各样历史认识的是非优劣时，都是以当时当地的现实为参照标准的。

历史是什么？历史归根到底是人类认识现实的一种努力，它要回答的是同时代人的焦虑和渴望，正是历史的这种特点，使得它把判定自身的标准赋予了现实，赋予了它的时代。这和自然科学能相对地独立于社会现实，并能在自身之内保持一个相对独立的评价标准是不同的。人们所以要不断地努力去认识历史，并不是要去达到那个绝对永恒的历史本体，而是力图去追随、去认识不断变化的现实。这种努力永远不会停止，除非现实不再发生变化。正如当代法国哲学家雷蒙·阿隆所说："过去只有当它不再有未来的时候才能最终地固定下来。"①现实是由历史造成的，而历史又是现实的不断累加，现实的不断变化，扎历史总体的各个方面、各个层次，把历史对现实的各种制约和影响逐一地显示出来。变化着的现实之所以要求人们不断重新去认识历史，其原因就在于此。只要历史没有中断，现实仍在变化、发展，未来仍在前头，一代一代人对历史的认识就合乎逻辑地表现为一个逐步丰富和深化的过程，而这实际上是人类历史活动本身不断

① 《当代西方史学流派文选》，第99页。

深入拓广在人类认识上的反映。每一代人对历史的认识相对于他们的时代来说都是真的，对每一特定时代来说，历史就存在于它所达到的历史认识中，也就是说，历史认识和历史本身在每一时代的现实中都达到了相对的、暂时的同一。从这个意义上看，我们只能否定本体论意义上的历史本体，而无法否认认识论层次上的历史本体。现实的不断变化，历史认识的不断扩展和深入，使这个历史本体不断获得日益丰富的内涵。正是在这一过程中，人们才认识到各个时代历史认识的暂时性，认识到历史认识之外存在着历史本体，又认识到绝对的历史本体并不存在，历史本体就寄寓在历史认识之中。那么，这个依存于历史认识又游离于历史认识的历史本体究竟是什么呢？归根到底，它就是无限生动、无限丰富的人类存在本身。

5-3 新的综合

当代西方历史学的发展特别是它在历史理论上的建树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社会科学各门学科在理论和方法上对它的启发、影响。分析的历史哲学受到分析哲学的推动，年鉴学派的总体历史理论也先后

受到人文地理学、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人类学、生态学等许多学科的启发，这些都是很明显的事实。二十世纪的历史学追求对历史总体的理解和把握，不论是斯宾格勒和汤因比那样的历史哲学，还是年鉴学派严谨的历史研究，都把文明、文化、社会整体结构及其变迁等这类总体性的事实做为自己的研究对象。这种研究远远超出了传统历史学的范围，它迫使历史学打开自己长期关闭的大门，大量吸收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的各种成果，借鉴它们的理论和方法、运用它们的专业知识和技术手段来推进本学科的进展。在这种跨学科的交流合作中，历史学逐步地改变了自己的形象，甚至模糊了自己的形象，历史学同许多学科的界限渐渐淡化了，一个学者同时在几个学种中从事研究，一部学术著作同时在几个学科内被奉为本学科的经典，这样的事例越来越多。当然，这还不是重要的，更为重要的是，在这种跨学科的交流合作中，历史学本身也提炼出了自己的理论，并开始积极地影响社会科学的各个学科。这一事实在当前日益强大的科学统一的潮流中很可能是有着重大意义的。

近代以来，开始对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各种现象做分门别类的研究，促使了各门学科的分化和独立，这种分门别类的研究无疑丰富和深化了人类的

各种专门知识，但也造成了科学的分裂。从十九世纪开始，许多有识之士就不断呼吁重建各门学科之间的统一，加强学科间的联系，并希望随着科学本身的进步，各门学科最终成为一门统一的大学科。本世纪以来，新兴的边缘学科不断涌现，跨学科交流和合作日益受到人们的重视，要求学科统一融合的呼声越来越大。那么，这种统一融合的前景如何呢？就目前的情况看，最有可能出现的是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大统一学科。这大统一学科的出现将取决于两方面的条件：一、它必须有一个共同的研究对象，这对象必须对目前各学科都有重大的研究意义和价值。二、必须有一种新的研究角度，能把各门学科的研究在方法论上统一起来。关于第一方面，在当代西方思想界已初见端倪，一个越来越明确的主题正在日益成为所有学科重视的对象，这个主题就是人，全面地认识人，已成为当代西方思想界的一个潮流，这很可能成为大统一学科的基本研究对象。如果真是这样，这即将出现，或正在出现的大统一学科就可以称之为“人学”或“人本学”。至于第二个方面，我们也可以在当代西方的思想界中找到某种迹象。

这种迹象就是在许多学科中普遍出现的从逻辑主义向历史主义转变的趋势。长期以来，逻辑主义

的方法一直是学术研究中最基本的方法。所谓逻辑主义的方法，就是从同时态的或静态的角度来把握对象，通过归纳、演绎、分析、综合来建构解释研究对象的理论——逻辑框架，用以说明研究对象。这种方法可以有效地在任一给定时刻对事物做静态研究，却无助于研究处在动态历史过程中的事物。随着各门学科研究的深入，这种逻辑主义的方法日益表现出它的笨拙和无能，于是历史主义的方法应运而起，日益受到人们的重视。作为一种观点和方法，历史主义是在十九世纪产生的。历史主义注重和强调在动态历史过程中把握研究对象，然而，在不同的时代，历史主义的具体内容是不同的。由于当今的科学研究，已越来越注重整体，研究对象已不再是被还原为或被认为是基本要素的个别事实，而是力图对现象做整体的把握，所以，在动态历史过程中把握对象就意味着把握对象整体在历史中的结构生成和转换，而不是个别事实在历史中的前因后果、来龙去脉。这是二十世纪历史主义与十九世纪历史主义的一个重大区别。如果说，哲学家和科学家（包括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们对十九世纪的历史主义还不以为然的话，他们对二十世纪的历史主义就不能不刮目相看了。这种历史主义在许多学科的研究中的运用已经结出了丰硕的成果，这些成

果大大突破了逻辑主义为各门学科所划定的疆界，把跨学科的交流合作推进了一个时代。

一九六二年，美国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发表了他的划时代著作：《科学革命的结构》，该书开宗明义就提出要“赋予历史一种作用”，书中说：

> 我们如果把历史不仅仅看成是一堆轶事和年表，就会根本改变今天仍然支配我们头脑的关于科学的形象。从前形成这样一个形象，也包括科学家自己所形成的，主要是学习已有科学成就的结果。这种成就载于经典著作之中，近年来也载于那些每一代科学新人从中学到专业的教科书之中。但是这一类书，目的不可避免地是为了说教，它们描述的科学观，决不会比旅行指南或语文课文所描述的民族文化更合乎实际一些。本文要说明的是，这些书从根本上把我们引入了歧途。本文的目的是要勾画出一种大异其趣的科学观，一种可以从科学研究的历史记载本身浮现出来的科学观。①

① 《科学革命的结构》，中译本，上海科技出版社，1980年，第1页。

库恩对历史如此推崇是同他个人的研究经历密切相关的，而他个人的这一经历又对当代科学哲学的戏剧性转变或革命发生了重大影响。库恩说从大学开始后的近十年中，他一直对哲学感兴趣而轻视历史，因为“当时对我来说，正象对今天大多数科学家和哲学家一样，历史学家无非是这样一种人：收集和证实过去的事实，然后按编年顺序加以排列。显然，编写编年史对一个主要关心演绎推理和基本理论的人来说，不可能有什么吸引力。”① 后来他终于从物理学和哲学转到历史，“是因为我发现：科学一经接触历史材料似乎就成了一种特殊的事业，……我不胜惊讶地发觉，历史对于科学哲学家、也许还有认识论家的关系，超出了只给现成观点提供事例的传统作用。就是说，它对于提出问题、启发洞察力可能特别重要。”② 库恩通过对科学史的研究，提出了一种与传统的逻辑主义大异其趣的科学哲学。他在科学发展的历史过程中，探讨科学作为一整体是如何形成、如何发展的。库恩认为科学作为一个整体，是一个以规范为中心的动态结构，科学的发展，既有在同一规范下从事研究的常

① T·S·库恩：《必要的张力》，中译本，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3页。

② 《必要的张力》，第4页。

规时期，亦有新旧规范竞争、交替的革命时期。研究科学哲学，就是揭示作为结构整体的科学在动态历史过程中如何生成、展开和转换。库恩的观点和他的研究成果不仅在科学哲学界，而且在整个思想界引起很大的震动，以致在当时出现了一股“库恩热”。库恩的研究所以引起普遍震动就在于他运用历史主义的观点打破了逻辑主义的僵局，大大推动了科学哲学研究的深入。然而，“库恩革命”并不是个别学科中的偶然现象。

从本世纪二十年代起，瑞士心理学家让·皮亚杰开始从事儿童心理学的研究，希望从发生学的角度来探讨近代以来争讼不已的认识论问题。半个多世纪过去了，皮亚杰的研究获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通过研究，皮亚杰创立了发生认识论的一整套理论，成功地解决了近代以来关于认识论问题的争论，或者说，从一个新的角度卓有成效地回答了传统认识论提出而又无法解决的问题。人的认识是从哪里来的？皮亚杰认为，研究这个问题，如果停留在传统认识论的立场上，我们就只能在经验主义或先验主义之间做选择，而这是无法解决问题的。要突破这种僵持不下的两难选择，就必须把认识论问题放到认识发生、发展的过程中去考察。他说：“传统的认识论只顾到高级水平的认识，换言之，

即只顾到认识的某些最后结果。因此，发生认识论的目的在于研究各种认识的起源，从最低级形式的认识开始，并追踪这种认识向以后各个水平的发展情况，一直追踪到科学思维并包括科学思维。”①“任何关于认识发展的研究，凡追溯到其根源的（暂不论它的生物前提），都会有助于对认识最初是如何发展的这个尚未解决的问题提供答案。”②在皮亚杰看来，人的认识始终处于不断发展和建构过程之中，因此研究认识的发生、发展必然会把人们引导到发生学的即历史主义的角度上去。他说：

> 任何一门科学都总还是不完善的，经常处于建构的过程之中。因此，很清楚，认识论的分析必然迟早会获得一种历史的或历史批判的高度和广度；……③

所谓建构，指的是结构的发生和转换。人的认识是一种结构，这个结构在人的认识中有发生、发展和不断转换的过程。要说明、回答认识论的问题，就必须把这个认识结构放到不断建构的过程中去，从动态历史的角度来研究认识结构的发生和转换。皮

①② 皮亚杰：《发生认识论原理》，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17页，第21页。

③ 《发生认识论原理》，第13页。

亚杰说，

> 认识的获得必须用一个将结构主义和建构主义紧密地连结起来的理论来说明，也就是说，每一个结构都是心理发生的结果，而心理发生就是从一个初级的结构过渡到一个不那么初级的（或较复杂的）结构。①

皮亚杰的发生认识论在当代西方思想界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我们可以看到，他的理论主张与库恩的理论异曲同工，难怪他们互相对对方的工作推崇备至。

以上所举的只是两个比较显著的例子。事实上，在当代西方，从最时髦的哲学释义学一直到现代物理学中的耗散结构理论，我们都能看到对时间——历史的重新发现和高度重视。被认为对哲学释义学做出重要贡献的当代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的代表作就称作《存在和时间》。海德格尔从时间——历史这一角度来探讨存在和本体问题，他在该书的开场白中说："以下论述的目的就是要具体探讨'在'的意义的问题。其初步目标是要说明时间是可据以对任何一种'在'获得了解的地平线。"②在书中

① 《发生认识的原理》，第15页。

② 引自《西方现代资产阶级哲学论著选辑》，第360页，着重号是原有的。

他又说："'在'的意义的问题，就它们所适用的进行追问的方式看来（也就是说，这个问题就是要在'亲在'的时间性与历史性中把'亲在'先行解释清楚），是由它本身驱使而要把自身作为历史的问题来了解了。"① 如果说，海格德尔的论述过于深奥晦涩的话，那么让我们来听听耗散结构理论的创立者比利时物理学家普里高津是怎样看待和论述这一问题的。耗散结构理论研究的是一个开放系统在远离平衡的非线性区从混沌无序向有序和自组织转化的机制和规律，这一理论不仅可以广泛应用于自然科学的各个领域，而且还可以用来研究和描述社会系统的生成和演化，它正日益受到人们的重视。在耗散结构理论中，时间的单向性和不可逆性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普里高津说："……一切都明显地表现出'时间的单向性'这个不可逆现象。从这点出发，我总是把任何一项富有建设性的作用都归功于某种'过程'，而不是采取传统的'静止'的态度对待"②。正因为不可逆性存在于一切系统中，也就是说，时间之流对一切现象都具有本质的

① 引自《西方现代资产阶级哲学论著选辑》，第366页。

② 普里高津："我的科学生活"，见《普里高津与耗散结构理论》，陕西科技出版社，1982年，第5页。

意义，而非一个可有可无的量度，所以普里高津断言，

> 科学的统一问题与时间的问题是如此紧密相联，以至我们无法抛开一个去研究另一个。①

前面我们已经说过，二十世纪的历史主义不同于十九世纪的历史主义，它不是要说明个别现象在时间——历史中的位置，而是力图从动态历史过程中把握结构整体的生成和演化，所以，在逻辑主义和历史主义之间有一个重要的环节——结构主义。结构主义是当代西方的一个重要的学术思潮，它在各个领域都有表现，人们对它的解释也是五花八门，但有一点是共同的，结构主义强调从部分所构成的整体的相互关系上来把握整体的结构，并从整体的结构出发来分析和解释研究对象。结构主义是在反对形形色色的机械的线性因果论和原子论的传统倾向中产生的，当代许多重要的学术理论都带着明显的结构主义的印记。二十世纪出现的结构主义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对十九世纪那种历史主义的扬弃，但是结构主义的思潮一旦产生，新的历史主义的解释

① 伊·普里高津：《从存在到演化，自然科学中的时间及其复杂性》中译本，上海科技出版社，1986年，第22页。

就必然会出现。尽管在西方学术界有着把结构实体化、偶像化，过份强调结构的共时态特性，而否认其历时态演化的倾向，但正象我们所看到的，对结构整体做历史的研究、历史的解释、或者说对结构主义做历史主义的批判的潮流已开始在各个学术领域中出现。这种在结构主义后出现的历史主义，我们可以用皮亚杰的术语恰当地称之为“建构主义”。这种历史主义并没有否定结构主义，而是力图将同时态的结构现象与历时态的建构过程结合起来考察，更深刻地理解和更准确地把握作为整体的各种研究对象。种种迹象使我们有理由相信，这种建构主义的历史主义有可能成为大统一学科——“人学”——中方法论的有希望的候选者。

在当代历史主义再度复兴的过程中，历史学适逢其会，它不仅积极地置身于这种潮流之中，而且为大统一学科的方法论建设做出了独特的贡献。长期以来，历史学一直被人们视为是一门辅助学科、一个资料体，历史学家——正象库恩所提到的——被人们视为是缺乏理论能力和兴趣的事实搜集者和汇编者。所有其它学科都可以藉历史学之助，免去搜集资料、澄清史实的许多辛苦和麻烦，至于历史研究本身的理论和方法，则很少被学科以外的研究者们所注意。十九世纪被称为“历史的世纪”，达

尔文的进化论第一次把历史引进了科学研究并取得了重大的成果，它所造成的冲击和影响遍及整个思想界，人们开始注意到历史观点、历史方法在认识世界、研究科学中的重要性。但是即使从那时起，在很长一个时期内，人们对历史观点、历史方法的认识还是相当肤浅的，仅仅把它看做是搞清事情的来龙去脉，前因后果。在大多数学科中，所谓历史观点、历史方法只是被当作研究中可有可无的点缀，并未真正受到重视，也没有产生积极的成果。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固然是因为大多数人还缺乏对历史观点、历史方法的真正理解，但历史研究本身拿不出真正有说服力和创造性的理论及成果来是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历史与社会科学之间长期以来一直不能进行真正的对话，就是因为它们之间缺少公平和对等的合作、交流。而现在，随着当代西方历史学的发展，这种状况已有了根本的改变。兰克认为历史是认识人类事务的两种方法之一，科林伍德主张历史是人类求知的第三条途径，尽管他们都做了相当的努力来改变人们对历史的看法，但真正使这种努力获得成功的在当代首推年鉴学派。因为通过年鉴学派的努力，历史学真正拿出了有说服力和有创造性的理论和成果。年鉴学派的理论揭示了历史时间的多元性和历史发展的层次性，推翻了线性

因果的历史观，而代之以长时段和结构功能的历史观，这种理论不仅推动了历史研究本身的深入，也大大启发了其它学科的研究。根据年鉴学派的历史理论，历史研究主要是对人类历史中的结构现象做长时段考察，以此来说明各种历史事件和现象；研究结构现象是要揭示其在历史中的生成和变迁，结构是一个多功能相关的整体，考察结构的生成和变迁不能也无法简单地描述其来龙去脉，而必须将其放在长时段、多层次的历史总体中去揭示其内在逻辑及其生成、展开和转换。年鉴学派的这种理论和目前正方兴未艾的历史主义的观点和主张是完全合拍的。不仅于此，年鉴学派的历史学家认为，在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统一融合，或者说一体化的过程中，历史将发挥综合作用，这种作用同数学在自然科学中所起的作用是相同的。布罗代尔说："在我看来，在一切可能的观点中，长时段观点对所有社会科学来说，是最适合于深入进行观察和分析的观点。"① 从当代西方学术思潮变化的大势来看，年鉴学派历史学家的这种看法并非自夸，而是有充分的根据的。可以相信，在当代人文科学、社会科学一体化的过程中，历史的综合作用将日益显著和重要。离开了历史的综合，统一的人学或人本学的

① F·Stern: The Vareities of History.P427。

出现将是难以设想的。

应当说明，统一的人学或人本学很可能是一种广泛的综合性的研究，而不是一门疆界分明或包罗万象的新学科。科学一体化意味着学科间的界线逐渐模糊，学科间的联系日益密切，而不大会是各门学科的完全消失。所以，今后的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很可能出现一种新的分化，即不同研究层次的分化，很可能出现两个不同的研究层次：综合性研究层次和具体专题研究层次。前者标志着科学一体化的趋势和其结果，而后者则是原有的学科分类的保留。前者研究人的整体，后者则为这种研究积累各种具体的经验材料；或者反过来说，前者是一种基础性研究，而后者是在基础之上的专题深入或应用研究。如果上述说法能够成立的话，我们就可以为年鉴学派在历史学中造成的“分裂”做出一种新的解释了。在第四章结尾时我们曾提到对年鉴学派的一种批评，这种批评指责年鉴学派在历史学中制造分裂，把历史分成了两个部分：长时段的历史和短时段的历史。对于这种批评，年鉴学派似乎难以反驳，然而，在科学一体化的进程中，历史学的这种“分裂”可能反映的正是一种必然。

5-4 历史与人

历史是一门人文科学，同其它社会科学及哲学不同，历史不是从抽象的理论、概念出发来研究人，而是从具体的历史出发来研究人，它力图在具体的历史中再现具体的人，把握具体的人，从而帮助人们更好地认识人、理解人。历史与人的关系比其它学科与人的关系更为具体和切近。然而，历史对人的意义，人在历史中的地位，只是到了当代，才变得格外重要和凸显起来，人们对此也只是在当代才有了新的更深刻的认识。

当代西方是以第一次世界大战为起点的，然而，大战只是时代的助产婆，当代西方并不是大战的产儿，它的根是深深扎在近代历史的土壤中的。近代西方是科学日益昌盛发达的时代，也是宗教精神和信仰及西方传统价值观念日趋衰败、走向崩溃的时代。科学和宗教此长彼消，到十九世纪末达于极点，以致当时德国的哲学家尼采惊呼："上帝死了。"尼采通过一个寓言，借一个疯子之口，说了这样一段话：

> 上帝灭亡了。上帝不会复生。我们已经把他杀死了。我们这些最大的凶手，将何以安慰自己呢？世界所拥有一切东西中最神圣和最强有力的上帝已经在我们的屠刀下流血而死了。①

这一段话中，上帝是一个隐喻，一个象征，它指的是一千多年来塑造并培育了西方文化的基督教精神和信仰。这种精神和信仰在十九世纪末的西方已经无可挽回地崩溃了，因此尼采说上帝死了。是谁杀死了上帝？尼采回答说，是我们，是我们西方人自己摧毁了自己文化的古老根基，自己摧毁了自己的精神支柱和信仰。在尼采看来，造成上帝灭亡的原因一是科学的进步，二是人自身的沉沦。上帝死了，谁来安慰我们？尼采的话给正在走向新世纪、新时代的西方投下了一道不吉祥的阴影。

然而，尼采的危言耸听在当时并未引起太大的震惊。上帝死了，人们并未感到痛心疾首。甚至没有意识到这一事实，人们在日新月异的科学中找到了新的精神慰藉，信念和希望。科学代替了上帝，成为人们崇拜和信仰的偶像。十九世纪弥漫于西方的不是对上帝死了的恐惧，而是对科学将带来无穷

① 转引自L·J·宾克莱：《理想的冲突》，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84年，第198页。

进步的乐观和自信。第一次世界大战真正惊醒了甜梦中的西方，科学进步所约许的人类幸福的终极理想并未出现，相反，却在空前野蛮、残酷的战争屠杀中显示了自己的无穷威力，没有比这更强烈、更残酷的对比和讽刺了。美国现代派诗人艾兹拉·庞德一九一九年在他那首著名的诗中写道，

无数的人死了，
其中有最优秀的，
为了裨尽牙齿的老娼妇，
为了油劣的文明，

美丽的嘴边微笑的魅力，
锐眼，都已经埋进地里。

为了几百个戏破的铜像，
为了几千本磨损的书籍。①

在近代西方人的观念中，科学意味着理性，意味着进步。现在，面对创巨痛深的现实，这种观念变得多么可笑。与近代人的乐观、自信相反，对灭绝人类的战争和战争威胁的恐惧和忧虑成为现代人生活中

① 埃兹拉·庞德："休·赛尔温·莫伯利"，载《外国现代派作品选》，上海文艺出版社，第一册。

的一个重要内容。当代著名思想家弗洛伊德说：

> 对人类命运攸关的问题，在我看来即人类的文化发展是否会控制住人的进攻和自我破坏的本能对其生活的扰害，以及能控制到什么程度……人对自然力量已有了这种程度的控制能力：他们借助自然力量，要彼此消灭到最后一个人是毫无困难的。他们知道这一点，由此生出他们大部分现时的不宁，不快及焦虑心情。①

战争并不是现代社会的产物，但是使战争拥有了灭绝人类的能力的却是现代的特征，这种能力是科学赋予的。所以，对战争的忧虑，归根到底就成了如何控制科学的日益增长的力量这样一个问题。现代科学正在不断加速地向前发展，并迅速而深刻地改变着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科学将把人类带往何处？人类怎样才能享受科学带给人类的福祉，而避免它可能造成的灾难？这是摆在当代人面前十分严峻而迫切的问题。

当代西方人生活中的另一个大问题是个性的丧失，或者说人的沉沦。现代社会是大众社会，现代化带来的一个重要后果就是社会生活的世俗化和大

① 转引自：《理想的冲突》，第120页。

众化。一方面，普通大众在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影响和作用日益增强；另一方面，现代生活中那种远离自然的人为的生态环境，迷狂迅速的节奏，机械单调划一的工作和消闲方式，使个人完全淹没在人群之中，丧失了他的个性。人在社会中的身份和角色愈来愈多变，愈来愈不确定。不少人对此痛心疾首、忧虑至深。有人这样写道，

> 我们时代的经济、技术和政治的力量塑造了一种新型的人，叫群体人（mass-man）。……群体人的出现是我们当代一桩可怕的事件。群体人是一般的人，他不象“有创造性的少数人”那样严于律己，给自己提出种种难题和任务，他宽于待己，苟且偷生，不求上进，仅仅做一个随波逐流的浮标而已。……群体人仅仅得到一点现代生活技术的指导，并没有受过技术的教育；它感受了现代机器的炫耀和力量，但不理解机器具有的力量，以及机器提出的重大问题。因此，群体人给人一个印象：他是从文明中间突然冒出来的原始人。他为人平庸、呆板，到处出现、不活动、贪婪，他把一切与众不同的、优秀

的、独特的、合格的。精选的东西一概踏在脚下。①

这种状况在当代文学作品中也得到了充分的反映，以致法国的一位批评家将现代小说与十九世纪的小说做了这样一个对比：

> 在那全盛时代（指十九世纪——引者），小说人物真是享有一切荣华富贵，得到各种各样的供奉和无微不至的关怀。他什么都不缺少，从短裤上的银扣一直到鼻尖上脉络暴露的肉瘤，现在他逐步失去了一切：他的祖宗，他精心建造的房子（从地窖一直到顶楼，塞满了各式各样的东西，甚至最细小的小玩意），他的资财与地位、衣着、身躯、容貌。特别严重的是他失去了最宝贵的所有物：只属于他一个人所特有的个性。有时甚至连他的姓名也荡然无存了。②

在这样一个前途未卜的时代，个性的丧失和人的沉

① 罗伯特·贝奈：“什么使我们苦恼？为什么？——论灾难和荒诞的根源”，载《国外思潮》（三）。

② 〔法〕纪塔丽·萨罗特：“怀疑的时代”，载《外国文艺》，1980年，第6期。

沦，意味着在迅速变动的历史关头放弃责任，随波逐流，其后果将是不堪设想的。当代西方风行一时的存在主义哲学强调自我选择、承担责任，反对人的沉沦，正是针对这种现实的。要选择自我首先必须认识自我，在当代西方，人们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更迫切地渴望知道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将到哪里去？当代人强烈的寻根意识正是来自这种深深的渴望。

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焦虑和渴望，可以说，当代人的焦虑是对前途未卜的焦虑，当代人的渴望是对认识自我的渴望。全面地认识人成为摆在当代西方思想界面前的最重大的任务。

人是什么？在一个没有上帝的时代里，这个问题只有人的历史才能讲清楚。这不是简单的逻辑推理，而是当代许多思想家深思熟虑后的共同结论。与传统的对人所做的各种本体论性质的规范定义不同，当代思想家对人的定义是“操作性”的。科林伍德主张人性就是历史，这是当代关于人的定义的一个经典表述。这个定义并未告诉我们人究竟是什么，只是告诉我们如何去认识人，从什么途径出发去研究人。尼采痛感人的沉沦，鼓吹“超人”，狄尔泰批评尼采说：

> 尼采一个人苦思冥想，想去寻找原先的本质和他自己非历史性的存在。全然是白费力气。他一层又一层地剥下去，然而又留下些什么呢？结果是只留下由历史条件所制约的某一单个的人和文艺复兴时超人的某些特征。人是什么，只有他的历史才会讲清楚。若人们把过去置诸脑后，以便重新生活，就会完全徒劳无益。他们无法摆脱过去之神，因为这些神已经变成了一群游荡的幽灵。我们生活的音调是取决于伴随着过去的声音的。只有屈服于历史所产生的巨大客观力量，人才能够从眼前的痛苦和短暂的欢乐中解脱出来。无论是主观的任性也好，自私的取乐也好，都不能使人和生活得到调和。只有把他主人公本人隶属于世界的进程才能促成这种调和。①

人无法脱离他的历史，认识人也无法撇开他的历史。正因为这样，文德尔班强调："人是有历史的动物。"② 应该从人的历史出发来研究人，我们在

① 《当代西方史学流派文选》，第9页。

② 《西方现代资产阶级哲学论著选辑》，第61页。

近代一些思想家如康德、黑格尔那里已经可以看到类似的主张，然而只是到了当代，这一点才真正受到了普遍的重视。存在主义哲学家认为："人是无所谓有什么本性的，他唯独只有一部历史。"① 雅斯贝斯说：

> 对于我们的自我认识来说，没有任何现实比历史更为重要的了，它向我们显示人类最广阔的天地，给我们带来生活所依据的传统的内容，指点我们用什么标准来衡量现世，解除我们受自己时代所加予的无意识的束缚，教导我们要从人的最崇高的潜力和不朽的创造力出发来看待人。②

存在主义的主张和科林伍德的观点是完全一致的。科林伍德曾说过完全相同的话："严格说来，没有人性这种东西，这一名词所指称的，确切地说，不是人类的本性而是人类的历史。"③ 人是什么的问题实质上就是人性的问题。正象意大利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葛兰西所说："'人是什么？'的问题永远是

① 《近现代西方主要哲学流派资料》，商务印书馆，1985年，第56页。

② 《当代西方史学流派文选》，第36页。

③ W·J·Van der Dussen: History as a Science, P372.

所谓'人的本性'的问题或者是所谓'一般的人'的问题"。① 当代思想家将人性问题等同于人的历史，并不是要否认人性问题，而是强调不能脱离人的具体的历史来研究这个问题。而这又是有着明确的针对性的，它主要是针对那种一味用自然科学的方法来研究人性问题的做法所提出的一个主张。我们知道，人性问题是一个很古老的问题，但对每一时代的人来说，又始终是一个很新鲜的问题。近代以来，受自然科学的影响，* 心理学等一些新兴学科用自然科学的方法来研究人性问题，他们撇开人的历史，从孤立的、静止的角度来观察人，用类似自然科学那样的实验方法来研究人。无可否认，用自然科学的方法研究人可以帮助我们认识人性的某些方面，比如说，当代美国心理学家马斯罗所提出的"需要层次"的理论，就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人性的某些共同点。但是这种研究对我们全面地、特别是

① 安东尼奥·葛兰西：《狱中札记》，中译本，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99页。

* 当然，自然科学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它在不同时期对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的影响也不能一概而论。不过，近代自然科学所特别强调的客观中立的立场、分门别类的研究、决定论的观点、还原论的方法、线性因果的解释等对其它学科的影响最大，至今遗害犹在。至于现代自然科学的一些新原则如测不准原理、系统论方法、不可逆观点等，由于某种时间滞后因素的影响和传统观念的抗拒，对其它学科的影响反不如前者大。

具体地认识人性、把握人性是远远不够的，因为它对人做了重大的、甚至是本质性的简化，要真正认识和把握具体、生动而丰富的人性，只有把人放到其体的历史中去。心理学家固然可以告诉我们人的需要分为若干递进的层次，却无法告诉我们为什么在不同时代、不同民族人们对这些需要的评价和认识是如此不同，而要知道这些，只有诉诸历史。正如英国历史学家卡尔所说：

> 那个难以捉摸的“人性”的实体，从一个国家到另一个国家，从一个世纪到另一个世纪，是如此变化多端，因而不能不认为它是由占优势的社会状况和社会习俗所形成的一种历史现象。①

既然人是什么只有人的历史才能讲清楚，那么，对历史的研究归根到底就是对人的研究，历史学就成了一门不折不扣的人学。从总体上说，当代西方历史理论正是这样来认识历史和历史学的。它反对十九世纪实证主义史学的最重要的理由，就是实证主义史学忽视了历史的人文价值，忘记了历史的人文精神。从狄尔泰开始的分析的历史哲学反复

① 卡尔：《历史是什么？》，第81页。

强调的就是这样一点：历史是人的活动，研究和解释历史也同样是人的活动。人的活动离不开人的主观情感、精神和意志，而这是自然科学无法真正把握的东西，由此可以引出分析的历史哲学几乎全部的理论主张。以斯宾格勒和汤因比为代表的当代思辨的历史哲学则从另外一个角度重新提出了人的问题，他们的共同出发点就是反对科学万能的迷信，呼吁人们重视和关注现实的人生和人的前途命运，强调人应该认清自己的命运，主宰自己的前途，而不能听任自己所创造的物质力量的摆布。历史研究人、认识人，不是研究个别人，或人的个别方面，而应是大写的人，也就是说，历史应研究人的总体。这是年鉴学派所极力主张的观点。研究人的总体，首先应研究构成这总体的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普通人；不仅如此，应研究构成历史主体最重要部分的普通人的生活。人的总体其实也就是历史的总体，历史是人创造的，特别是占人口总数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普通人创造的。普通人创造历史，不仅仅表现在或者主要不表现在在某些历史关头他们受某种信仰、观念、主义鼓舞所激发出来的狂热或激情，所成就的事业如革命、起义、造反、暴乱等等；更重要的是体现在他们琐细平淡的日常生活中的行为和观念。决定历史和制约历史的力量归根到底源自

于这些尽乎本能的和无意识的生存活动之中。年鉴学派的这种历史观无疑要比单把眼睛盯在革命、造反、战争、动乱之上的历史观更能抓住历史的根本、人的根本。并不是每个人或每一代人都有幸参与重大历史事变并在其中扮演一个角色的，但每个人和每一代人都必然地生活在历史之中。在漫长而宏伟的历史生活中，激动人心的事变和人物只占极小的一部分，历史中最大量存在的是普通人日常的生存活动。研究历史、研究人怎能忽视这一最基本最重要的事实呢？通过历史来认识人，只有深入到历史的这一层次，才能全面地把握人。这一点可以说是年鉴学派为当代人认识自我做出的最重要贡献。

认识自我是为了选择自我，历史并不告诉人们如何去选择，它所能做的只是为这种选择提供一种必要的认识，在这一活动中，历史引导人们面向未来。德国哲学家谢林说：

> 使人得到解放，脱离客观世界的恐怖，这是理性的一次大胆的冒险；这次冒险是不会失败的，因为人将随着认识他自己和自己的力量，而变得更加伟大。如果让人意识到他现在是什么，他就会立刻知

> 道他应该是什么；让他在理论上重视自己，他就会紧接着在实践上重视自己。①

历史对于人的不可替代的意义大概就在这里吧。

① 谢林："论自我是哲学的根本"，转引自《先验唯心论体系》，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77年，译序。

后　记

这本小册子得以完稿，首先要感谢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的朱孝远、萧功泰、周育民，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的王晴佳，复旦大学历史系的刘心勇在有关资料上给予我的慷慨帮助。在此予以致谢。

刘　昶

1986.9.16.

走向未来丛书

一九八四年出版

人的发现	李平晔著
增长的极限 （罗马俱乐部关于人类困境的研究报告）	李宝恒译
激动人心的年代	李醒民著
GEB——一条永恒的金带	道·霍夫斯塔特原著 乐秀成编译
现代物理学与东方神秘主义	根据F·卡普拉的《物理学之道》编译 濮 耕编译
现实与选择	朱嘉明 吕 政著
经济控制论	何维凌 邓英淘编著
探险与世界	于有彬编著
看不见的手	杨君昌编著
语言学与现代科学	陈明远编著
在历史的表象背后	金观涛著
让科学的光芒照亮自己	刘青峰著

走向未来丛书

一九八五年出版

人的现代化 〔美〕阿历克斯·英格尔斯等著　殷陆君编译
大变动时代的建设者　汪家溶编著
没有极限的增长　朱利安·林肯·西蒙原著
黄江南　朱嘉明编译
西方社会结构的演变　金观涛　唐若昕著
在国际舞台上　陈汉文编著
昨天　今天　明天　邓正来编著
摇篮与墓地　陈越光　陈小雅著
择优分配原理　茅于轼著
第三次数学危机　胡作立著
凯恩斯革命　杨君昌编著
艺术魅力的探寻　林兴宅编著
西方文官系统
杨百揆　陈子明　陈兆钢　李盛平　缪晓非著
动态经济系统的调节与变化　邓英淘　何维凌编著
新的综合　〔美〕爱德华·奥尔本·威尔逊著
李昆峰编译

走向未来丛书

一九八六年出版

富饶的贫困	王小强　白南风著
定量社会学	郭治安　姜　璐　沈小峰编译
儒家文化的困境	蒋功秦著
系统思想	〔美〕小拉尔夫·弗·迈尔斯主编 杨志信　葛明浩译
日本为什么“成功”	〔日〕森岛通夫著　胡国成译
悲壮的衰落	金观涛　王军衔著
弗洛伊德著作选	约翰·里克曼编　贺明明译
西方的丑学	刘　东著
十七世纪英国的科学、技术与社会	〔美〕R·K·默顿著 范岱年　吴　忠　蒋效东译
画布上的创造	戴士和著
梁启超与中国近代思想	〔美〕约瑟夫·阿·勒文森著 刘　伟　刘　丽　姜铁军译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德〕马克斯·韦伯著 黄晓京　彭　强译
信息革命的技术源流	宋德生著
增长、短缺与效率	〔荷〕亚诺什·科尔内原著 崔之元　钱铭今译

走向未来丛书

一九八七年出版

走向现代国家之路	钱乘旦 陈意新著
竞争中的合作	陈汉文编著
计量历史学	〔苏〕科瓦尔琴科主编 闻 一 当 吟译
哲学的还原	麦克斯韦·约翰·查尔斯沃斯著 田晓春译
凯恩斯理论与中国经济	林一知著
人的创世纪	张 猛 颐 听 张继宗编著
社会研究方法	〔美〕艾尔·巴比著 李银河译
发展社会学	胡格韦尔特著 白 祥 丁一凡编译
上帝怎样掷骰子	陈克艰著
空寂的神殿	谢选骏著
震撼心灵的古旋律	郑 凡著
以权力制的权力	朱光磊著
整体的哲学	金观涛著
人体文化	谢 长 葛 岩著
人心中的历史	刘 昶著
探寻新的模式	罗首初 万解秋著
发展的主题	周其仁 杜 鹰 邱继成著
社会选择与个人价值	〔美〕肯尼思·阿罗著 陈志武 崔之元译
对科学的傲慢与偏见	〔英〕查·帕·斯诺著 陈恒六 刘 兵译
马克斯·韦伯	〔英〕弗兰克·帕金著 刘 东 谢维和译